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

（第一卷）

孙伯鍨 侯惠勤 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8·南京

责任编辑：王其平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
（第一卷）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南京大学校内）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练湖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25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416千 印数：1—9000
定价：3.75元

ISBN7-305-00137-6/B·8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

编　委　会

主　编　孙伯鍨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方云光　孙伯鍨　刘林元

张一兵　李华钰　严　强

严高鸿　辛望旦　姚顺良

侯惠勤　徐永祥　崔绪治

编者说明

本书是三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的第一卷。其内容是阐述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发展和传播的历史，绝大部分是总结和概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位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中的伟大贡献的。本书是应教学需要而写，因此，除要求内容完整、份量适中、文字简洁流畅而外，还要体现以下特点。(一)突出思想史的特点。即在充分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以往一切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批判继承关系以及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基础上，着重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命题和原理的演变和发展线索。(二)突出学术性和当代性。在认真研究第一手资料、注意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站在当代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所有重大理论争论问题，作出有独立见解的分析。(三)突出教科书的特点。在力求做到线索分明、重点突出、概述准确、分析精当的同时，对若干涉及重大理论争论和尚需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均加以简要注释。各章都附有讨论和思考题。

本书分为十二章，由下列同志集体编写：

第一、二、十二章——侯惠勤；

第五章第一、三节——侯惠勤；

第五章第二节——侯惠勤、陈晓明；

第三章——许俊达；

第四章——吴大益；

第六章——宋龙祥；

第七章——孙伯鍨；

第八章——赵锡祺；
第九、十一章——江丹林、孙伯鍨；
第十章——顾瑞祥、陈晓明。
全书由孙伯鍨、侯惠勤、姚顺良作了修改和统稿。

2633/13

前　言

今天，马克思主义作为公认的最强大思想力量在继续影响和改变着世界历史的进程，同时，它也在由于历史的发展本身所提出的种种挑战中不断地改变自身。和一个世纪前相比，当今的马克思主义无论在理论形态或社会功能上，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上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中，却始终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它毕竟是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和活动直接联系着的，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源地。事实也是如此。当代意识形态方面的每一个重大争论，以及任何一种想要突破现有结构框架而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向前推进的理论尝试，都要在重新“回到马克思”的形式下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其实仍然是当代史，是把当代的问题提到历史的范围内加以解决。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任何历史研究都会自然而然地具有现实性。相反，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暴露出来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缺乏鲜明的针对性和强烈的现实感。这是很值得人们反省的。本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的哲学，它还远远没有成为历史，并且正在进步人类的现实斗争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那么，研究它的发生发展的历史却何以不是去引导人们获得新的认识，发现新的真理，反而给人们一种重复已知的东西的陈旧感呢？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学科的研究还缺乏时代气息和创新意识，不是非常明确从当代世界的实践要求和思想矛盾出发，历史主义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而是把它完全看作过去的事件单纯地加以复述。

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既是历史科学，又不仅仅属于历史科学。这是它同其他历史科学的重要区别之一。从历史科学的角度看，它有时间上的先后，有“史”“今”之分；而从当代新学科的角度看，它又是一个统一的时空结构，并不存在“史”“今”的明显界限。整个地来看，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最简单、最基本的形态乃是它的发生形态，这构成它的统一结构的晶核。可以说，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史，构成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学科的根基。如果套用“厚今薄古”的公式而忽略这点，那么只能是舍本求末。所以，如果为了增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现实感，简单地把重点转移到当代并不可取。缺乏内在理由和坚实根基的转向只能导致随波逐流，终将剥夺学科存在的权利。但是，如果只停留在对以往历史的经验描述上，那么历史就毕竟只是历史，它同现实总是会保持着距离。因此，实现“史”“今”转换的机制在于透过对历史的研究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富于生命活力的深层结构，以此为基础，把这一哲学在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扩展统一起来。这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不断深化和现实化所应解决的最重要的课题。

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包含着发生和发展两个方面的内容。把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方法论的重要改进。过去有一种偏向，似乎发生和发展是时间上截然分开的两个阶段，因此，只有形成史才存在着发生问题。实际上，发生和发展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两个侧面，尽管在不同阶段上其侧重点有所不同。从形成史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无”到有，发生问题较为突出。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并没有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它不仅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革命变革，也是人类以往先进思想的合理继承。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就内在地包含着“发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后的历史来看，基本上是传播和应用的过程，发展问题十分

突出。但是，各国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时代的转换，必然要求在传播过程中获得新的生长点和填补前所未有的空白。由此看来，发展过程也内在地包含着“发生”。这样，应当纠正两种偏向：一是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他社会思潮的区别和对立，把这一哲学借以发生、发展的各种思想来源割断；一是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过程中的统一性，抹杀了它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性，结果统一性变成了机械的单一性。从发生和发展的结合上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必将使我们的视野大为拓宽，现实感大为增强。

处理好上述两方面的关系，关键在于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内在活力。从根本上说，理论的力量来自实践，然而它又决不是消极地依赖于实践。有些理论是灰色的，而马克思主义则始终是常青的生命之树；有的理论同实践格格不入，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却始终同人类实践息息相通。不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构本身的特点，不揭示出它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内在机制，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简单化、庸俗化。必须把辩证法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历史，把握它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矛盾性。社会实践中的矛盾只有通过思想(逻辑)矛盾的中介才能推动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产生过程中，正是思想、理论上的矛盾所引起的怀疑与苦恼，推动着马克思、恩格斯去不断地探索，从一个研究领域转到另一个研究领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理论和体系内部的某些不协调以至空白，也是推动理论本身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重要动力。当然，在前一种情况下，矛盾表现为两种思维逻辑、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之间的尖锐冲突；在后一种情况下，矛盾则表现为理论内部的不平衡性和不完备性，它要求通过理论本身的协调发展而达到互补统一。但是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必须要敢于触及理论结构自身的内在矛盾，才能促进其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作为受篇幅限制的教科书，本书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所有问题作完备无缺的阐述，也不可能就所有和当代有关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详尽的探讨，而是力求提供理解这些问题的基础和线索。即使就这一方面来说，本书作者们所作的工作也基本上是尝试性的。

目　　录

第一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

(1837—1847)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最初的政治和哲学观点——革命民主主义和青年黑格尔主义 ……………………（ 1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理论活动的历史文化环境 ……………………………………（ 1 ）

一、19世纪初期的西欧和德国社会 ………………（ 2 ）

二、19世纪初期德英法优秀思想文化的主要成就及其综合趋势 ………………………………（ 7 ）

三、马克思恩格斯的少年时代及其家庭和学校教育 ……………………………………………（ 14 ）

第二节　黑格尔哲学的解体和青年黑格尔运动 ……（ 17 ）

一、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及其解体的必然性 …（ 17 ）

二、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推动了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兴起 ………………………………………（ 19 ）

三、对普鲁士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促进了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发展 ……………………………（ 24 ）

四、普鲁士政府反动倾向的加强和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分裂 ……………………………………（ 27 ）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向黑格尔哲学和革命民主主义的转变 ……………………………………（ 30 ）

一、马克思转向黑格尔哲学的动因——对应有和现有对立的哲学思考 …………………………（ 30 ）

二、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对世界和哲学相互作用的最初考察 ……………………………（ 32 ）

三、恩格斯转向黑格尔哲学的动因——对信仰和

理性冲突的哲学裁决 ……………………………（36）
四、恩格斯批评谢林的文章——用理性主义对抗和摧毁非理性主义 ……………………………（41）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世界观的第一次转变——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45）
第一节 《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动摇了对黑格尔哲学的信仰 ……………………………（45）
一、马克思对书报检查制度的批判 ……………………（46）
二、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最初涉足 ……………………（51）
三、恩格斯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文章 …………（56）
第二节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及其所引起的解放作用 ……………………………………………（59）
一、费尔巴哈的"主宾原则"和人本主义异化方法对马克思的最初影响 ……………………（60）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的初次批判…（64）
三、恩格斯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 ………（70）
第三节 《德法年鉴》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 ……………………………………（72）
一、宗教异化的根源是政治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分离 ……………………………………………（74）
二、无产阶级的解放不是政治解放而是人类解放 ……………………………………………（78）
三、关于无产阶级世界历史使命的初步论证 ……（80）
第三章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的第二次转变——向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 ……（85）
第一节 《1844年手稿》构成马克思主义完整世界观的最早雏形 ……………………………（86）
一、异化劳动理论的提出和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胚胎的形成 ……………………………………（86）

二、对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的经济学哲学论证 …… (91)
三、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评价和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初步改造 …… (93)
四、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初融合 …… (97)
第二节 《神圣家族》接近于发现历史唯物主义 …… (98)
一、对思辨哲学方法及其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 …… (98)
二、从异化史观向实践观点的过渡 …… (100)
三、从抽象人的观点向现实人的观点转变 …… (102)
四、对历史唯物主义某些基本原理的最初阐明 …… (104)
第三节 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点的制定 …… (107)
一、物质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发现 …… (107)
二、论证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新思路 …… (109)
三、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 …… (111)
四、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制定 …… (113)
第四节 《德意志意识形态》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 (116)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 …… (117)
二、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 …… (118)
三、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生产关系） …… (120)
四、社会进步的机制及其实现的形式 …… (122)
五、个人和社会、主体和客体、自由和必然在历史中的关系 …… (125)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开问世及其和工人运动的结合 …… (129)
第一节 反对工人运动中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斗争 …… (129)
一、同魏特林空想共产主义的论战 …… (129)
二、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论战 …… (131)
三、同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论战 …… (136)

第二节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145）
一、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伟大纲领《共产党宣言》的诞生 ……………………（145）
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证 ………（147）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世界历史性意义 ……（156）

第二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验证和发展(1848—1875)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848年欧洲革命风暴时期的验证和发展 ……………………（157）
第一节　革命事变进程对唯物史观的验证 …………（157）
一、1848年欧洲革命的客观基础及其发展规律 …（158）
二、资产阶级及其历史作用的演变 ………………（164）
三、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及其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原则 ……………………（169）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和革命学说的发展 ………（172）
一、不断革命理论的形成及其实践意义 …………（173）
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完善和具体化 …………（177）
三、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奠基 ……………………（181）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 ………（188）
一、意识形态和历史主体的活动 …………………（188）
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演变规律 ……………（192）
三、科学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 ………（196）
第六章　《资本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201）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资本论》的创作过程 ……………………（201）
一、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发展及其成熟的标志 ……（201）
二、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到《资本论》……（207）
三、《资本论》的主题和结构 ……………………（212）

第二节 《资本论》中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 ………（216）
一、对生产力概念的深入研究和精确表述 ………（216）
二、生产关系总体系的各个环节及其相互关系 …（222）
三、社会的经济结构及其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 …（226）
第三节 《资本论》中关于历史过程的学说 ………（234）
一、社会结构学说和历史过程学说在马克思不同时期著作中的地位 ………………………………（234）
二、全部历史的分期 ………………………………（236）
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 ……（239）
四、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 …（243）
第七章 《资本论》中的科学方法论 ……………………（248）
第一节 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再改造 ………（248）
一、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批判和改造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 ………………………………（248）
二、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和《资本论》中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对立 ………………………………（252）
三、《资本论》是马克思的"辩证逻辑学"…………（255）
第二节 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方法的批判 ………（257）
一、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一般特征的揭示 ………………………………………………（257）
二、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批评 ………………（260）
三、对庸俗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批判 ………………（262）
第三节 《资本论》的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264）
一、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论原则 …………………（264）
二、《资本论》中经济范畴的运动 ………………（266）
第四节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环节 ……………（269）
一、逻辑体系的开端——"细胞"或"元素"范畴的确定 ………………………………………………（269）
二、科学抽象的作用。科学抽象和非科学抽象 ……（271）
三、逻辑和历史的统一………………………………（272）

四、分析和综合的统一。归纳和演绎的统一 …… （274）
五、从本质到现象的转化过程中中介范畴的作用 …（277）
第五节 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同一 …………（278）
一、如何理解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同一 … （278）
二、《资本论》对黑格尔“三同一”思想的改造和运用 ……………………………………（280）
第八章 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公社时期和70年代前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284）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和完善 ………（284）
一、打碎和摧毁旧的国家机器 ………………… （286）
二、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形式 ………………… （289）
三、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时期的国家 …… （293）
第二节 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预测 …………（298）
一、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 …………… （298）
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及其基本特征 ……………………………………………… （300）
第三节 捍卫科学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论战 ………（307）
一、关于国家的本质。驳“自由国家” ………… （308）
二、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规律。驳“铁的工资规律” ………………………………………… （311）
三、自治和权威。驳无政府主义 ……………… （313）

第三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阐发及其在欧洲的传播(1876—19世纪末)

第九章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系统阐发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化 …………………………………（317）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最新自然科学成就的哲学概括和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系统确立 …（317）
一、从新自然观的出发点的制定到自然辩证法体

系的确立 ……………………………………… （317）
二、自然辩证法体系的确立是恩格斯批判地研究自然科学和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辉煌成果 … （324）
第二节 恩格斯对自然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系统阐述 ……………………………………… （330）
一、物质及其存在的形式 ……………………… （330）
二、自然界的辩证本性 ………………………… （335）
第三节 自然科学的逻辑方法 ………………… （341）
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逻辑方法的革命 ……… （341）
二、怎样在自然科学中应用辩证逻辑 ………… （345）
三、辩证逻辑是探求真理的方法。真理与假说 … （350）
第四节 在统一世界观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系统阐述 ……………………… （357）
一、《反杜林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 ……… （357）
二、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基础…… （360）
三、唯物辩证法同先验形而上学方法的对立及其在各个领域中的表现 ……………………… （365）
四、暴力的本质和作用以及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 （369）
第十章 把历史唯物主义推广应用于原始社会史的研究 ……………………………………………… （374）
第一节 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贡献 ……………………………………… （375）
一、马克思转向原始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原因 …… （375）
二、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探讨的几个问题 …… （378）
第二节 恩格斯对原始公社史的进一步研究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 （388）
一、关于人类起源和原始社会史分期的方法论原则 ……………………………………………… （388）
二、原始社会的发展及其向文明社会过渡的机制。

"两种生产"的理论 ……………………………（394）
三、家庭、个人和阶级在历史发展中的关系 ………（399）
四、国家的起源、本质和消亡 ……………………（403）
第十一章　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捍卫和发展 ……………………（409）
第一节　恩格斯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 ……………………………………（410）
一、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历史功绩和局限性…（410）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当然继承者……………………………………………（416）
第二节　恩格斯论哲学的基本问题 ………………（418）
一、思维对存在的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418）
二、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彻底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421）
三、历史发展中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辩证法 …（425）
第三节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427）
一、恩格斯对"经济基础"的再解释 ……………（430）
二、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实现于人的自觉能动的活动中。驳"经济关系自动起作用" …………（432）
三、历史活动中的必然和偶然、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恩格斯关于"合力"的思想 ……………（434）
四、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是通过一系列中介环节的交互作用实现的 …………………（437）
第四节　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439）
一、恩格斯论分工和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 ……（439）
二、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原则，同时充分重视主体在认识中的能动作用 ……………………（442）
三、恩格斯论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区别。驳"真理多元论" ……………………………………（444）

第二十章　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的传播和发展 ……………………………………………（448）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和继承者们 …………（448）
一、走向马克思主义之路 …………………………（449）
二、在跨世纪时代面前的选择 ……………………（454）
三、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 ………………………（460）
第二节　促使马克思主义和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463）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化和通俗化 ……（464）
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理论的探索 ……（470）
三、批判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错误思潮 ……………（475）
第三节　巩固和拓宽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思想成果 ……………………………………………（481）
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补充和完善 ………（482）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和开拓新的知识领域 ……………………………………………（489）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最初的政治和哲学观点——革命民主主义和青年黑格尔主义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理论活动的历史文化环境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历史上任何一次哲学变革，既是变化了的社会条件的理论表现，又是更为深刻的社会政治变革的先导。因此，只有将它放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才能准确地加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最辉煌的日出，它既是对以往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合理继承，又是根本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伟大变革。离开了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要准确地把握这种思想史上的革命性飞跃更是不可能的。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空前的思想发现，“在过去的时代就是最天才的头脑也不能把它硬想出来。只有在人类历史的一定点上才能揭穿它的秘密。”① 这个“一定点”，从时间上说，就是19世纪中叶，从地域上说，则是西欧互相毗连的几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乡，德国的社会状况显然是首先应当注意考察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是德国的产物，“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不是

①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专属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①] 所以，我们的叙述必须从19世纪初期的西欧社会开始。

一 19世纪初期的西欧和德国社会

作为资本主义最先发展起来的地区，西欧和德国这时正处在两大革命时代交替的急剧变动时期。其主要表现是：从总体上看，资本主义仍然处在上升阶段，大多数西欧国家仍然面临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但是，英法等最发达的国家已经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暴露，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已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以批判和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潮流也已经形成。简言之，这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行将丧失、无产阶级日益占据历史舞台中心的转变时期，是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三种社会力量公开较量的时期。这一历史时代的主要特点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两大潮流，正在向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事业汇合；代表人类进步方向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也正在朝着更高的综合化的趋势发展，以服务于这一伟大的事业。

英国工业革命的胜利进军是造成这种深刻历史变动的重要原因。以蒸汽机、纺织机和机床等工具机在生产中的广泛运用为标志的这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它不仅首先在英国完成，而且势不可当地向欧洲大陆扩展。在纺织等古老工业部门，大机器已取代了手工业；一系列采用大机器的新兴产业部门（化工、造纸、铁路、航运等），正在迅速崛起。它的直接后果是生产力的大解放。“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47页。

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①

工业革命在半个世纪内就深刻地改变了英国社会的全部经济生活。无数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的中、小企业在大工业的冲击下破产、倒闭，巨大的工厂和城市形成了。在这里，一方面集中着人数极少而拥有巨大财富的工厂主，另一方面集中着一无所有而人数日益增多的产业工人。资本变成了决定性的、囊括一切的社会关系。原先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正向单一的雇佣劳动关系过渡，阶级关系变得简单了。

由于工业革命，现代化的生产过程获得了空前规模的社会性。由大机器所促进的劳动分工的发展，引起了整个社会生产过程和个别生产部门的专业化趋势，引起了各个企业彼此间越来越严重的依赖性，引起了资本和企业的集中以及工人群众的集聚。世界市场的形成及其日益巨大的作用，使越来越多的民族卷入了这架按其特有规律迅速运转着的机器，它强迫人们打破民族和地域的界限而走向世界。但是，大工业生产过程的这种社会化本性却被束缚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狭小形式中，成为资产者实现其利润欲的工具。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经济危机、阶级斗争和战争，都是这个矛盾合乎规律的产物。②原先资产者用于战胜封建主义的强大武器——解放生产力，现在已成为消灭自身的力量。

"但是这个产业革命的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③这是根本区别于古代无产者的产业工人阶级，它不仅是现代社会一切苦难的承担者，而且还是这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大工业的承担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就是资产阶级生存条件所固有的矛盾。资产者作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离开它的对立面工业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1页。

② 1825年在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危机，此后每隔几年这一悲剧就重演一次，成为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6页。

产者就不能生存，而工业无产阶级只有彻底消灭一切形式的私有制，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尽管当时它们还面临着封建主义这个共同的敌人，然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毕竟还是日益发展起来了。这一斗争一开始是自发的、限于经济领域内的斗争，后来逐渐向具有政治性质的斗争转变。19世纪30年代是个转折点，"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① 工业革命的推进固然为这种转变奠定了基础，它使得无产者有可能超越个别企业、个别行业的局限而作为一个阶级去行动。但是，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也是促进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

"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② 法国革命从一开始就把锋芒对准了封建专制主义王朝的政治统治，而且具有相当自觉的性质。它从攻占法国封建专制统治的象征——巴士底狱开始，仅过了一个多月，就制定并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尖锐地提出了夺取政权和变革旧政治制度的问题。它以后的发展，基本上是围绕建立代议制、保卫共和国这一目标进行的。尽管波旁王朝也曾有过短暂的复辟，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成就毕竟已是任何腐朽的封建势力所无力完全取消的。事实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已经得到了历史的承认。但是，法国大革命及其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同时也打破了人民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公开暴露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根本利益上的对立。

虽然资产阶级在其革命时期，其阶级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确有某种一致性，某些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也确实表现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290—291页。

了为真理和正义而献身的精神，但他们却并不真正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暴风雨初期，就胆敢从工人手里把他们刚刚获得的集会结社权取去。……这种法律，靠国家警察的力量，把资本和劳动间的斗争限制在有利于资本的范围之内，并且经过几次革命，几个朝代，照样保存下去。”①1830年通过最后镇压起义人民而建立起来的“七月王朝”，以及1832年英国通过改革法案而实现的选举改革，更充分暴露了自由资产阶级和下层人民的根本对立。他们不惜牺牲无产者和人民的利益，以便与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相妥协，维护本阶级的私利。马克思在总结法国革命的历史时说：“1830年自由资产阶级终于实现了它在1789年的愿望，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政治启蒙运动现在已经完成，他们不再把立宪的代议制国家看作国家的理想，不再认为争得立宪的代议制国家就是致力于挽救世界和达到全人类的目的，相反地，他们把这个国家看做自己的排他的权力的官方表现，看作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确认。”②资产阶级狭隘本性的暴露教育了无产阶级，使它逐渐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而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的两次起义，1838年至1848年英国工人的宪章运动，以及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就是这一历史性转折的标志。

德国是这个时代矛盾的焦点。两大基本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这里交织和重合；完成反对封建专制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双重革命任务都落在无产阶级身上。这是德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造成的。与英、法相比，资本主义在这里的发展要晚得多。直到18世纪末，它基本上还是封建农业国，比重很小的工业主要是分散的手工工场。更为重要的是，“在德国土地上遍布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数不清的巴士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8页。

狱，却没有扫荡这一切的风暴使德国资产阶级能够展翅高飞；只有法国征服者的宝剑才给它开辟了道路"。①

因此，尽管到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的工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被法国占领和深受其影响的东北部（莱茵、萨克森、威斯特伐利亚等），已成为欧洲发达的工业区之一。但是，这并非由于德国资产阶级依靠自身的力量打败了封建主义，而是拿破仑的征服战争所带来的结果。这就注定了它先天不足。它的兴盛时期适值英法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开始走向反动、欧洲列强既相互争夺又相互勾结。无论是英法等资产阶级大国，还是沙俄等封建大国，都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德国出现。这就致使它的发展总要以卑躬屈膝为代价。当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才刚刚提上议事日程，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却已逐渐成为过去，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正在迎面而来。因此，当德国资产阶级准备同封建专制势力相对抗时，它本身已经同无产阶级处于尖锐的对立中了。它在自己的前后都看到了敌人，而自身又十分虚弱，这就注定了它本性的怯懦和卑下。它反封建的斗争必然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垂涎法国资产阶级已到手的革命成果，向往通过掌握政权，废除封建制度，实现民族统一，以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它又极怕人民革命，不敢走自下而上的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道路，而企图寻找一条依靠封建国家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因而具有勾结封建势力的妥协性。可见，德国资产阶级刚一出世就已经是属于旧世界的了。它不代表新时代的趋势，甚至无力去完成为自身的发展所必需的反封建的任务。它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向往，就只剩下对其理论原则（理性、自由、人权等）的赞颂；它的革命行动和革命成果，就只体现在抽象思维领域，表现为"青年德意志"的文学一政治运动和"青年黑格尔"的哲学一政治运动。这样，德国日益迫近的民主革命就需要新的社会力

---

①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卷，第41页。

量来担当。这个重大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正在不断发展、并已组织成为一个阶级的现代无产者身上。

当时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工人运动正向着有组织的方向发展。1834年在巴黎成立了以德国手工业工人为核心的流亡者联盟；1836年工人从该联盟中分化出来，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组织，即流亡者同盟。这是德国工人阶级最早的组织之一，其成员已开始"组织成为(虽然还不是充分自觉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了"。①然而，支配着各国工人运动的却是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德国工人阶级第一个共产主义理论家威廉·魏特林，已经天才地猜测到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消除人类的一切剥削和压迫，并通过自己的著述（主要是《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宣传和组织，为本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事实上并不理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他的学说带有很大的神秘主义和空想成分，不能为工人运动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这样，创立一个以揭示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为内容的科学世界观，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就成为正在发展的工人运动的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一历史趋势的产物。

然而，经济条件和阶级关系的变动并不能自发产生任何哲学，理论思维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要以19世纪中叶以前人类的全部优秀文化成果为前提，其中最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古典理论（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和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二　19世纪初期德英法优秀思想文化的主要成就及其综合趋势

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动，必然要通过思想文化成果反映出来。在19世纪初期，人类精神文化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重大进展，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7页。

同它的时代和时代的潮流密切联系的。和当时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两大历史潮流相一致，19世纪最先进的文化成果也荟萃于资产阶级古典理论和正在兴起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中。由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正在取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成为历史的主流，这一时期的优秀文化成果也开始从不同的方面向新的无产阶级的哲学世界观逼近，从而表现出在更高程度上走向整体综合的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综合当时人类最优秀文化成果的最伟大的结晶。它"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大卫·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配第是第一批表明经济过程中有着客观的、可以被认识的规律性的人物之一。他把培根和霍布斯的自然规律的观念应用到经济和政治问题之中，把它们一概称为人们不能违反、只能遵循的"自然法则"。[①] 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这一形象的说法，进一步揭示了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并把它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前提。他论证说，自私自利无疑是人的经济活动的主要动机，但他们只有在向别人提供劳务，将自己的劳动和劳动产品进行交换时，才能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幸福，而分工即由此产生和发展。因此，"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

① 例如，他在《赋税论》中指出："总的说来，我们应当很好地考虑一下这种情况，就是高明的医生并不乱给病人用药；相反，他们都密切注意并遵循自然的运动，而不用他们自己的猛烈药方来反抗自然的运动。同样，在政治问题及经济问题上，也必须用同样的方法。因为，Naturam expellas furca licet usque recurrit（人虽然能一时强胜自然，但自然仍将恢复其威力）。"见《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货币略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7—58页。

益。"①稍后的李嘉图推进了斯密的认识，他不仅明确地提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客观的经济规律，而且把这一研究确定为对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分析，对处在这一体系下的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分析。他抓住各阶级之间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试图从生产的条件和利益入手，寻求分配的规律，即"全部土地产品在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名义下，分配给"土地所有者、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比例"。因此，他认为："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②

把理论研究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寻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联系和"自然规律"，并进而发现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对立，这是古典经济学的重要贡献。斯密论证了社会三大"基本阶级"在分配社会总劳动产品中的对立关系，认为工资与利润、利润与地租一般呈相反方向变化。李嘉图在更明确分析社会各阶级利益对立的同时较多地强调了资本所有者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认为"任何使工资增加的原因都必然会使利润减低"，"利润的高低恰好和工资的高低成反比"。尽管这主要还是着眼于分配的角度，但毕竟已是从经济根源上说明阶级的对立。

劳动价值论是古典经济学的最高成就。斯密在政治经济学史上首次提出，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他把这一理论局限于简单商品时期，即没有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早期状态"，并提出了自相矛盾的二元劳动价值观。③李嘉图排除了斯密在价值尺度上的二元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只能由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决定，不能把耗费的劳动和购买的劳动相混同。他论证了劳动价值理论完全适用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并把这一理论贯彻到对地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下卷，第27页。

②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页。

③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版，第309页。

租、利润、利息的研究，从而为解决剩余价值的起源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但是，古典经济学家并没有把劳动价值理论贯彻到底。他们没有勇气提出并解决下列难题：第一，如何说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如果商品价值取决于所耗费的劳动，那么工人应获得他们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然而事实上，工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样，劳动价值理论就和资本主义占有规律发生了矛盾。第二，如何说明现实经济生活中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如果商品的价值由所耗费的劳动量所决定，那么不同产业部门的利润率显然要有差别；然而事实上，相同的资本趋向于提供相同的利润率。就是说，劳动价值理论和平均利润规律发生了矛盾。斯密把利润归结为资本的收入，以价值上的二元论背离了劳动价值论；李嘉图则试图证明生产价格与价值是同一个东西，可以置它们间的偏离不顾，从而实际上放弃了唯有劳动才能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

古典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的这种不彻底性，反映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缺乏历史主义观点。在他们看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是唯一能存在的、顺乎自然的关系，是人的超历史的自然本性所决定的。尽管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和各阶级在经济上的对立，但他们的根本立足点还是把资本主义看作是天然合理的。任何科学探索一旦和这个前提相矛盾，结果就必然要牺牲科学。可见，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性妨碍了古典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他们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

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来看，空想社会主义要坚决而深刻得多。它从一开始就提出了消灭剥削和实行社会平等的主张，其中最激进的派别，甚至提出了废除私有制和实现计划经济的要求。但是，在世界观方面，只是到了 19 世纪初产生了以圣西门、欧文、傅立叶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才真正有了某种进步。他们开始把历史看作由低级向高级有规律地发展的过程，试图说明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合规律的结果。圣西门断言社会历史并非偶然事件的简

单联结，而是跟宇宙一样按规律发展的。他研究了自罗马灭亡以来的历史，从中得出结论：人类社会是不断上升和连续发展的，每个新社会制度都要比先前的制度更加进步。因此，"中世纪形成的科学和封建体系，比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政治和宗教体系更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人类的文明。"① 他认为，人类的黄金时代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而是将来。傅立叶把人类社会经历过的发展阶段概括为四个时期，即蒙昧时期、宗法时期、野蛮时期、文明时期，并推断下一个发展阶段将是协作制度时期。

其次，他们还试图用生产状况和所有制去说明整个社会的性质。圣西门是最先提出所有制是社会制度的本质这一思想的人。他指出，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政府形式是本质，实际上，"确定所有制才是本质，这种制度正是社会大厦的基础。"他还尝试用产业发展的需要去说明所有制的状况，认为"生产是社会联合的目的，因此指挥生产的人过去和将来总是站在社会联合的领导地位"。② 傅立叶同样试图用生产状况说明每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特征。他认为宗法社会的特征是小生产，野蛮社会的特征是中等规模的生产，文明社会中所产生的兴盛和危机都是生产状况的矛盾产物。他还提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新增的生产力"要求消灭私有制的观点，看到了生产力的巨大社会作用。

再次，他们也或多或少看到了阶级斗争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圣西门用财产从僧侣和贵族手中向实业家手中转移以及他们之间的阶级斗争，来说明法国自 15 世纪到18世纪的整个历史过程。在具体分析法国大革命性质时他认为，这"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市民等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市民等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③

---

① 《圣西门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85页。

② 《圣西门选集》上卷，第22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页。

最后他们对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也作了许多有价值的猜测。圣西门第一次明确地表达了“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领导”的思想，这意味着国家必将被废除。傅立叶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家庭关系、政治设施等等的批判中，提出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并主张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对立。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全部批判和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仍然是建立在非科学的世界观之上的。对抽象人性的迷恋和对群众历史作用的轻视，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根本缺陷。傅立叶把社会主义原则（协作、按劳取酬等）看作人的天性的要求。他认为，应当改变仅仅是人的生活环境，而出路就是建立符合人的天性的劳动组织——“法伦斯泰尔”。圣西门把生产的发展归结为科学知识的进步，因此，伟大的发明家就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他们的共同结论是：“只有依靠有天才的人，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得到改造。”这样，他们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因为他们“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①

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等），更为广泛地考察了阶级斗争和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因而在历史观上有所前进。他们批判了 18 世纪唯物主义者否认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的错误，接近于得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结论。②他们发现了各大社会集团的物质利益是人们历史活动的动因，从而阶级斗

---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5页。

② 基佐提出，历史并非英国国王查里、法国国王非利普开始，而是从人民开始的。米涅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试图说明：历史不是伟大人物的传记，而是人民的历史。（参阅《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

争是历史事变和社会发展的动力。①他们觉察到经济生活的变化是社会政治变动的根本原因，试图用财产关系去说明政治制度。②但是，当他们解释阶级和财产关系的起源时，却把它归结于各民族之间的征服和掠夺战争，并且最终归咎于人类天生的“征服欲”。这就在实际上又倒退到18世纪唯物主义者的抽象人性观点。

真正对抽象人性观点有所突破的是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的真正革命意义，就在于它摒弃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具有任何最终性质的观念，从而否定了人性永恒不变的性质，它视矛盾为发展的源泉，从矛盾运动中揭示历史过程的内在动因，从而打破了关于“意见”决定“环境”和“环境”决定“意见”的循环论证的怪圈。他提出了探究人们的思想动机后面的更为深刻的历史动力问题，并把它归结为贯穿在人们的历史活动之中但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理性”的辩证运动。他在“向我们暗中指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同时，又以自己一贯而彻底的唯心主义立场窒息了这个熠熠生辉的天才思想。

费尔巴哈架起了通向唯物主义的桥梁。他直截了当地宣告他的哲学的基础是自然界和人，把黑格尔杜撰的“绝对精神”抛在一旁。他用具体的、感性地存在着的人取代了抽象的自我意识，确立了人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他不仅把人看作是自然存在物，而且看作是相互需要和喜爱交往的社会的存在物，从而“使‘人

① 米涅提出：“变革涉及利害关系，有利害关系就形成党派，有党派就有斗争。”因此，法国大革命是“构成法兰西民族的几个阶级争夺政权的六年”。基佐把法国和英国的革命史都看作阶级斗争的历史；梯叶里也持相同的观点，并认为斗争的“两方面都是为着真正的利益而进行战争”。（参阅《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

② 基佐提出：“要了解政治制度就必须研究这个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及其相互关系。要了解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就应当理解土地关系的性质。”（参阅《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

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①但是，费尔巴哈既不懂得人们相互之间进行交往的真实基础，也不懂得“社会”一词除了人们的感情联系之外还包括哪些现实内容。他仅仅从人们生理的和情感的需要去理解他们之间的交往，因而“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因此最后还是把人看作孤立的人类个体。

可见，新的哲学世界观的创立，不仅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需要，而且也是继承和发展上述各种优秀文化成果，在更高的水平上加以综合的需要。

三 马克思恩格斯的少年时代及其家庭和学校教育

新世界观的两位创始人都出生于德国西部的莱茵省。该省在1794年至1815年间为法国所占领，推行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它不仅是当时德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属于该省的鲁尔区已成为欧洲最重要的煤炭基地），而且是受法国革命和法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地区。

卡尔·马克思，1818年5月5日出生于莱茵省的特利尔市。在众多的兄弟姐妹（四男五女）中，他天资最高。他父亲称他为自己的“幸运儿”，并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在马克思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除了他的父亲（特利尔市高等上诉法院律师）亨利希·马克思（1782—1838）以外，还有他的邻居（未来的岳父、特利尔的枢密顾问官）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1770—1842），以及他在特利尔中学读书时的老师（该校校长）约翰·胡果·维登巴赫（1767—1848）。亨利希·马克思学识渊博，精通法学，富有哲学素养。他熟悉伏尔泰、卢梭、莱辛、莱布尼茨、康德、牛顿等18世纪伟大思想家的作品，思想上倾向于启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8页。

学派的理性主义，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宗教观念上是一个倾向于像康德那样把信仰和理性结合在最高道德之内的开明新教徒。冯·威斯特华伦男爵也很有教养，擅长英语，并能自如地阅读古希腊、古罗马作家的作品。他喜欢浪漫主义文学，尤其是荷马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他关心社会问题，其中包括圣西门学说所提及的那些问题。1830年至1835年，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读书，校长维登巴赫兼教历史和哲学。他是一个坚定的康德主义者，主张把学校的教学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原则之上。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自由派教师，学校也因而成为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活动场所并受到了警察当局的监视。开明、自由、进步的家庭和学校的环境，使马克思一开始就受到了较高层次的文化熏陶。他在中学毕业时所写的作文，反映了他生活的那个环境所给予他的思想影响。在一篇关于宗教问题的作文中，马克思把宗教看成是个人道德完善的手段和途径。在另一篇用拉丁文写成的文章中，马克思表明了向往一种能保证人民自由的政体。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用德文写的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它表现了少年马克思的崇高志向，闪现了他那天才思想的火花。在作文中，马克思把为人类造福和自身的完善结合起来，认为“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因此，“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这里表现了他对启蒙思想家关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天然一致的抽象人道主义观点的领会和赞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承认选择职业的自由的同时，又清醒地估计到这种选择必然受到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他说：“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合适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中的关系，早在我们能对它施加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确定

了。"①尽管他所说的"社会关系"并不包含十分确定的内容，但仅就这一点而言，他的思想也已经脱去了童稚的天真，而能够把错综复杂的外部关系作为思考问题的背景。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莱茵省巴门市。和马克思的开明、自由的家庭气氛相反，恩格斯的家庭笼罩着宗教虔诚主义和对于金钱的热烈崇拜。②他的父亲是一个勤奋、干练的工厂主，思想和生活方式都很保守，但爱好音乐。在家中他十分专断，总想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笃信宗教、善于经营的"欧门·恩格斯"商行的继承人。但是，恩格斯的生活环境也有促使他追求自由主义的宗教和政治观点的因素：对生活的热爱和同下层人民（尤其是工人）的接触，以及日益增长的人文知识（文学、诗歌、历史等）和对自然科学知识的酷爱。在前一方面，他母亲曾给予了良好的影响，而父亲的严格要求也使他从童年时代起有机会大量接触下层工人的实际生活；在后一方面，恩格斯就学的爱北斐特理科中学给他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这样，在恩格斯的心灵中，自小就埋下了生活和宗教、知识和信仰互相冲突的种子。这些冲突最终导致了恩格斯逐渐卷人社会斗争，走上无神论和青年黑格尔主义的道路。

生活环境的不同，使马克思同恩格斯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有很大差异。但是，他们思想发展的道路却惊人地相似。两者都经过严肃思考和独立探索，批判地克服了环境所给予他们的思想影响，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形成了虽未成熟但却是独具特色的世界观——青年黑格尔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75页。

② 虔诚主义是集加尔文教传统和清教派传统于一身的宗教派别，它敌视一切乐生观点，要求信徒保持严格的信仰和刻苦的生活方式。因此，它竟连诸如歌德一类的德国古典作家都视为下流作家而加以否定。（参阅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文版第4章《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第二节 黑格尔哲学的解体和青年黑格尔运动

青年黑格尔运动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德国发生的一场哲学—政治运动，它是即将来临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声。在精神生活领域，德国是一个宗教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国家。封建君主政权历来把基督教奉为"国教"，使之成为专制制度下的偶像和精神支柱。宗教和理性、专制和自由的冲突，使宗教在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首当其冲。然而，德国的这场斗争却十分奇特。批判宗教和专制制度的激进思想，并不是作为"异端"同教会和国王公开较量，相反，他们却是通过普鲁士官方哲学的内部争论悄悄地进行的。这固然要归咎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怯懦，因为他们不敢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变革愿望，而宁愿把现实的社会内容转化为抽象的思辨语言。于是"用来表达这些思想的晦涩的哲学语言，把作者和读者都弄得昏头昏脑，同时它也把检查官的眼睛蒙蔽了"。但是，造成这种情况也是由于黑格尔哲学本身兼有革命和保守的两重性质，因而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

一 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及其解体的必然性

黑格尔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矛盾在逻辑上的完成。康德是第一个打开了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缺口的人，然而他的先验认识能力和"自在之物"的本体二元论，不仅导致了现象和本质、自由和必然、理想和现实的一系列形而上学的对立，而且使辩证法因脱离了综合的前进运动而仅仅成为"现象的逻辑"。费希特抛弃了康德的"自在之物"，他使"非我"依赖于绝对的自我，而后者推动着人类通过行动设定自身和自身的对象("非我")。但是，当他不能不把自然界看作绝对自我的无意识的创造物时，他又陷入了

无法消除的矛盾（自我意识和无意识）之中。谢林为克服这一矛盾，用无意识的绝对"同一"取代自我意识作为世界本原。在他看来、无意识的绝对通过逐步发展，克服自己的无意识性，最后在人类中觉醒、变形，成为意识到自己的内在目的并加以实现的绝对自我意识。然而，把无意识的精神看作本原并夸大其和意识的对立，必将导致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黑格尔用思维和存在的辩证同一性代替谢林的意识和无意识的对立运动。在他看来，思维(或"绝对理念")是主体又是客体，是自我又是非我，逻辑过程因而就具有无所不包的性质：它既是思维规律也是自然界和社会的一般规律。这样，黑格尔以最彻底的唯心主义一元论，清除了康德的二元论的非理性主义和逻辑矛盾，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创立了作为逻辑和方法的完备的辩证法体系。但是，把存在规律唯心主义地消解在思维规律之中，并不能真正克服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矛盾。相反，辩证法却因此被窒息了。当黑格尔哲学把思维当作本体、当作认识过程、历史过程和一切人类活动的主体时，它必然要把一些逻辑本身所无法包容的东西（如宗教等的非理性因素和外部自然）囊括在其中。鉴于它们是思维(逻辑)的对立因素，因而被解释为思维的外化、异化，作为思维的外化或异化并不是与思维无关，它们是思维所创造出来的，并且最后要被扬弃而复归于思维。这样，黑格尔除了承认思维中矛盾和运动以外，其实并不真正承认自然界和社会中的辩证运动。黑格尔哲学所隐含的这个方法和体系的矛盾，预示了它解体的必然性。

这一矛盾首先在对当时最具实践意义的宗教和政治问题上尖锐地表现出来。把理性和信仰调和起来的企图使黑格尔哲学陷入了困境：一方面，它用纯逻辑的绝对理念取代基督教的非理性的上帝，把理性提到了信仰之上；另一方面，他又保留了信仰的至上地位，使宗教和哲学等同。宗教信条中的三位一体被解释成辩证运动的三段式的象征，神是绝对理念的象征，基督是在自身中结合着精神和自然界的具体概念的象征。黑格尔为了用哲学论证

宗教，不得不排除其中的神秘主义和纯粹教义学，而为了用宗教论证哲学，又不得不把神秘主义输入哲学。他必然要遭到来自两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正统的基督教神学家不满意他用理性主义对宗教所进行的裁剪，反对抬高理性而贬低信仰，要求维护宗教的绝对权威。老年黑格尔派的著名代表辛利克斯强调："不是哲学，只有宗教，才是绝对真理的启示。"另一方面，那些忠实于辩证方法的黑格尔弟子也不能容忍他对宗教的这种退让。他们竭力要作出无神论的结论，把宗教降低为受理性审视和批判的对象。

在法哲学方面，黑格尔由于企图使理性和国家相融合，把现存的国家抬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因而同样陷入了无法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他看到了国家的存在同经济发展以及阶级斗争相联系，认为国家出现于"家庭"和"市民社会"之后；另一方面，他又把国家看作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外在必然性"和"内在目的"，并且是国家把自己分为家庭和市民社会这两个有限性的领域，因而国家又以普遍利益的代表者的身份凌驾于一切现实利益的对立之上。他虽然没有把理性国家直接和某种具体的国家制度等同起来，因而尚能以隐蔽的方式表达资产阶级要求政治变革的愿望，但实际上，他却处处肯定王权，并把君主立宪制度看作现实中最合理的国家制度。这就暗中保护了现存的普鲁士王国政府。可见，黑格尔的法哲学同样为各种观点极不相同的党派提供了活动的地盘。激进派力图从中找到变革政治制度的根据，保守派则力图找到维护现存政权的依据。激烈的争辩和交锋，使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日趋尖锐，终于导致了他的学派的公开分裂和解体。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全部历程，就是黑格尔哲学历史命运的生动记录。

二　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推动了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兴起

宗教批判揭开了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帷幕。在这个批判中，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1808—1874)的《耶稣传》(1835年)打响

了第一炮。施特劳斯力图通过揭露福音故事的神秘性质，揭示宗教观念的非理性本质，证明宗教和哲学、信仰和理性之不可调和。①他认为理解福音故事是理解宗教本性的关键。在具体考察四部福音书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神话起源说"。他通过揭露福音故事中大量神秘的因果联系（如"玛利亚受圣灵感动怀孕"、耶稣"复活"及类似的"奇迹"）和逻辑矛盾，断言作为宗教观念中"神人"合一的基督并没有历史的真实性。只有摒弃了附加在他身上的神秘内容，才能恢复耶稣真实的历史形象。实际上，耶稣本人不过是一个年青的普通犹太传教士。

那么，关于基督的神话是如何产生的呢？施特劳斯认为，既不是来自"神授"，也不是耶稣本人或其他人的创造，而是早期基督教社团以幻想的传说形式所表达的对于救世主降临的期待，本质上是一种对自身缺乏理解的意识（即许多人的无意识的杂凑）。施特劳斯用黑格尔哲学的术语把这种无意识的意识称做"实体"。不过，施特劳斯并没有因此得出无神论的结论。他从泛神论的观点出发，只赋予逻辑以神的特性，而把宗教归结为世俗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对宗教的考察只能通过历史的批判，而不能通过逻辑推演。这样，他就从两方面超出了黑格尔哲学：其一，由于承认在逻辑真理之外还存在着和它并不必然吻合的世俗历史，这就提出了历史和逻辑的关系问题，从而为打破黑格尔哲学的逻辑神秘主义开了先河；其二，由于揭开了罩在福音故事上面的神圣帷幕，证明耶稣只具有有限的历史意义，而不具有绝对真理的象征意义，这不仅否定了宗教的历史真实性，而且否定了把宗教和哲学加以调和的可能。因此《耶稣传》在德国思想界产生轰动是自然的。但是，施特劳斯的观点毕竟只是含混不清的神话理论，有很不科学之处。他仅从形式上去考察了基督教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① 施特劳斯首先把黑格尔学派分成左、右两派，并自认为是黑格尔左派，其主要根据是看其坚持或反对黑格尔关于哲学宗教一致的观点。这一划分后来得到了公认。见施特劳斯《黑格尔学派在基督论方面的各种派别》。

并没有真正揭示其社会历史根源。当他把这一切归结为许多世纪中无意识的杂凑时，由于缺乏对这种蒙昧意识的更加深刻的说明，致使问题仍然停留在神学的藩篱中。此外，他在考察宗教以至世俗历史时，由于过分强调了无意识行为的作用，忽略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自觉性，宿命论的色调就十分明显。因此，起来批判施特劳斯的就不仅有基督教神学家，而且有站在无神论立场上的青年黑格尔派。属于后者的，当首推布鲁诺·鲍威尔。

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从更为彻底的方向推进了对宗教的批判。他在否定福音书的全部内容的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从无神论的立场明确提出了关于宗教观念的来源和本质问题。①与施特劳斯不同，他的理论基础不是“实体”，而是个别的“自我意识”。他们之间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下述问题上。(1)关于福音书和基督教的起源问题。鲍威尔认为福音故事并非如施特劳斯所主张的那样，由当时传道的团体无意识地杂凑而成，相反，它完全是一些抱有一定宗教目的的人物有意识地编造的，从而体现了个别自我意识的创造力。因此，福音故事并不具有任何历史的真实性。(历史上是否有耶稣这个人也还大成问题)它们仅仅体现了自我意识的普遍性。他指出，为了证明“神话起源说”，施特劳斯力图把四部福音书彼此协调起来，抹杀了它们各自的特殊性，因而产生了许多矛盾。而且，如果仅仅把圣经故事归结为早期基督教社团的无意识的杂凑，就不可能真正否定神的观念，因为脱离了自我意识的“实体”必然是神秘的、超自然的观念。因此，鲍威尔断

① 鲍威尔的思想有个演变过程。他起初是个正统的黑格尔分子，参加了黑格尔哲学遗著《宗教哲学讲演录》的编撰工作，主办过保守的《思辨神学杂志》，并曾站在护教论的立场上反对施特劳斯，否认批判宗教教条的权利。1838年发表的《启示史批判》，表明了他在思想上的转变。他已开始把宗教和绝对真理加以区分。此后，他迅速地转向了更激进的无神论立场，对宗教持更彻底的批判否定态度。因此，我们这里所概述的，是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观点。

言，施特劳斯的观点“是对奇迹的信仰，是宗教观念在批判观点中的再现，是对自我意识的宗教的粗鲁行为和忘恩负义”。(2)关于宗教的本质。施特劳斯虽然否定了宗教是绝对真理的启示，否定了它作为神的地位，但他并没有否定其属神的内容，没有否定其作为世俗历史一个阶段（部分）的地位。鲍威尔提出宗教的本质不是神，而是人的自我意识。因此，在他看来，对于宗教来说，福音故事并不重要，关键是体现了自我意识的普遍性的宗教范畴。照此观点，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的出现是个进步，它使人类开始认识到自我意识的普遍性，并从盲目的自然崇拜中解放出来。但是，宗教从根本上说，并非自我意识的实现，而只是它的异化，是对人的普遍本质的歪曲。由于基督教仍然把人的自我意识作为异己的彼岸力量加以崇拜，因此，它必然是“人类的精神枷锁”，是麻醉人民的“鸦片”。(3)关于历史的根本动力问题。施特劳斯认为“实体”所固有的内在运动乃是历史的真正过程，绝对精神凭借着这种本质上是无意识的精神力量的运动而实现自身。鲍威尔以“自我意识”为历史运动的起点，它经过“异化”（否定），再经过“批判”(否定的否定)而复归于自身，从而达到真正的“自由”。鲍威尔认为，“实体”和“绝对观念”不过是被宗教幻想所对象化了的自我意识的不同阶段，是异化了的现实。因此，理性的发展，本质上就是通过“个别的自我意识”揭露和批判非理性现实的过程。理性的现实乃是自我意识以“批判”为手段，扬弃对象的异己性而达到的不受任何制约和束缚的“自由”状态。鲍威尔对宗教的更为彻底的批判，对现存事物的更为大胆的否定，一下子征服了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激进派。他成了当时德国思想界中这个派别的精神领袖。但是，鲍威尔的观点中也包含着把黑格尔哲学庸俗化的因素。在黑格尔哲学中，“实体”和“自我意识”作为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客观（自然）和主观（精神）方面，它们始终处在一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之中；鲍威尔却把“自我意识”提升为主体，把相互作用变成了“自我意识”单方面地批判扬

弃"实体"。于是，主客体的对立实际上被取消了，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被他改装成了主观唯心主义。

从根本上对黑格尔哲学和宗教进行了冲击的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他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出发，第一个真正打开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缺口，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把批判宗教和批判唯心主义结合起来，是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特点。他发现宗教和思辨哲学的共同错误在于，他们都从思想和观点出发，而不是从感性的存在出发。由于真实的感性存在只能是人和人的基础——自然界，因此，"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①] 唯物主义的"主宾原则"及由此产生的"颠倒过来"的方法，是费尔巴哈批判宗教（及思辨哲学）的主要原则。他提出："思维和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词，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 由于宗教和思辨哲学把主宾颠倒了，因此，只要再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②] 和鲍威尔一样，费尔巴哈把宗教看作人的本质的异化。他认为："人关于神的知识就是人关于自身的知识。"人的宗教意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宗教中全知全能的上帝，就是消除和摆脱了个人局限性的人的普遍的"类"本质。但是，宗教把人的"类"特性移到了幻想的彼岸，使人们把自己的本质当作异己神的世界加以膜拜。这样看来，宗教又是"人的无意识的自我意识"。费尔巴哈是如此干脆、有效地揭开了宗教和思辨哲学的神秘帷幕，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当他致力于把宗教的世俗基础归结为感性存在的人时，不仅使宗教问题从神学问题变成了世俗问题，而且使人本身以及人和人的社会关系成为唯物主义哲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这就为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道路。但是，费尔巴哈并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84页。

② 同上，第115、102页。

没有真正克服黑格尔哲学。尽管他紧紧地抓住了自然和人，甚至"把'人对人'的社会关系当作理论的基本原则"，然而他却从来未能发现现实的人。他不懂得自然和历史的统一性，不懂得"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相反，他最终还是陷入了把全部人类历史归结为宗教史、认识史的唯心主义泥淖。原因在于，从总体上看，他的唯物主义仍然是直观的、机械的。当他强调人的客观实在性时，他只是把人看作纯粹受动的自然存在物，而没有把人看作感性的实践活动，没有把人的感性理解为"感性的劳动和创造"；当他强调人是区别于动物的自觉主体时，他就只是从思维、精神和意识方面上去把握人。因此，只有把唯物论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人的自然的、受动的方面和能动的创造性的方面统一起来，才能有真正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新哲学问世。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变革步骤，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实现的。

三　对普鲁士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促进了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发展

由《耶稣传》的发表所引起的激烈争论毕竟还停留在抽象王国里，它对于顽固的普鲁士基督教国家的冲击是微弱的。一些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已经朦胧地感到，需要把针对彼岸世界的宗教批判引向针对此岸世界的政治批判，把思想转变为行动。但是，由于未能得到现实社会力量的支持，他们的这一要求仍然以德国思想家特有的思辨方式表现出来。他们认为只要把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加以推广，揭露国家和社会中的不合理性，就足以使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合理化。奥古斯特·冯·切什考夫斯基（1814—1894）的行动哲学，就是按这一方向改造黑格尔哲学的最早尝试。

切什考夫斯基认为，黑格尔哲学的根本缺陷在于面向过去。尽管他提出了世界的发展规律，然而这种规律却只是被他用来解释过去。实际上，只有从过去和现在推演出来的一般特征，自觉

地塑造未来，才能改变世界。因此，必须以行动哲学代替黑格尔的保守哲学。他从以下两方面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改造。（1）关于未来和现实的关系。他认为，由于黑格尔把未来排除在思辨范围之外，把现实局限在必然性由过去到现在的推移，因而没有真正把握现实。其实，现实应当包括已经形成的现实和正在形成的现实，而后者就是所谓“未来”。因此，未来也是现实的，也在理性的视野之中，因而是可知的。既然动物学家居维叶能够从一颗牙齿再现该动物的解剖模型，那么哲学家也应当可以用理性的规律去构造和预测未来。①（2）关于思维和意志的关系。他认为，由于黑格尔把人的能动活动仅仅理解为思维，把意志仅仅看作思维的一种特殊方式，因而不能把历史看作人的自觉活动、合理意志的产物。由此可见，要使人在历史活动中摆脱作为不自觉的工具的地位，必须强调意志高于思维。只有由意志所直接支配的自觉行动才能创造历史。切什考夫斯基把这种以确定未来为基本任务，使人能够通过自觉行动自行决定自身命运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哲学”。他是青年黑格尔派中首先把空想社会主义确定为未来目的的人，最早开辟了从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方向。但是，行动哲学所提出的“实践”概念尚不是实际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活动，而是一种批判、一种仅限于用应该实现的理想来否定现存制度的主观意志活动。因此，它在对黑格尔哲学的保守体系有所突破的同时，却由于割裂了应有和现有的关系，导致了向费希特主观唯心主义的倒退。

---

① 切什考夫斯基于1838年发表的《历史哲学引论》全面论证了他的行动哲学。他在谈到真正的现实必须包括未来时指出：“在我们看来，我们应当从一开始就说明，没有对未来的认识，没有未来这个作为人类使命之现实的、历史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就不可能认识有机的和理想的整体，也不可能认识世界历史的必然过程。因此确定未来的可知性，对于历史机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前提。”（转引自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第186页）

阿尔诺德·卢格(1802—1880)以其政治批判的实际行动引导青年黑格尔派转向政治运动。起初，他在由他编辑出版的《哈雷年鉴》（1838年）中，仍然只是从自由主义的理性原则出发，针对基督教正统派一般地进行宗教批判。但是,宗教顽固派借国家名义压制批判，普鲁士政府公然维护教会权威并反对一切改革，因而打破了卢格原来的幻想，促使他把对准宗教的批判转向了对准普鲁士国家的批判。卢格批判的核心问题是关于国家的本质。卢格认为，自由原则是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和普鲁士国家的共同基础，唯有基于这个原则才能使国家趋于完善，担负起继续改革宗教、推进立宪运动和历史发展的任务。然而普鲁士国家却在浪漫主义影响下日趋反动，从而背叛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批判普鲁士国家的反动倾向，割断其同反动势力的联系，乃是哲学的根本任务。这样，以他和艾希特迈耶尔一起发表在《哈雷年鉴》上的题为《新教和浪漫主义》的文章为标志，青年黑格尔运动开始脱离纯宗教批判，迈向哲学一政治批判运动。卢格的功绩在于：他"使黑格尔体系的政治方面同时代精神一致起来并且使这个体系重新受到民族的尊敬"。

莫泽斯·赫斯（1812—1875）从两个方面推进了对"行动哲学"的论证。(1)哲学推演和历史分析的结合。他按照黑格尔的方式把世界史变成自由和平等的实现过程，并把德、法、英三种革命看成自由平等实现自身的三个阶段。德国通过宗教改革，给世界带来了精神自由，然而因其局限于思想本身而不能在实际上解放世界；从思想到行动的转变由法国的革命完成，它通过社会风尚的解放使精神自由获得了具体的内容，然而由于它未能触动社会不平等而只对社会生活发生了相对的影响；即将爆发的英国革命将是以消灭社会不平等为目标的社会革命，由于它兼备德国的思辨精神和法国的行动毅力，因而必然能够完成解放人类的事业。这样，赫斯不仅论证了从思想转变为行动的必要，而且把政治批判的对象逐步从国家转向私有制和贫富对立等社会问题。用社会

主义原则代替自由主义原则，用德法思想联盟代替德国的批判哲学，是赫斯论证行动哲学的基本思想。但是，由于他不能把未来理解为具体实践的结果，而是仅仅作为理想，因此，他的行动哲学仍然是向费希特的回归。（2）人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结合。赫斯对行动哲学的真正突破，是他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对共产主义进行论证，从而提出了哲学共产主义观点。它从费尔巴哈的"类"概念出发，把历史看作人的"类"本质不断返回自身的过程，把个体和"类"的分离看作一切异化的根源，把共产主义看作实现人的本质的要求。由于人的本质是平等和自由，因而未来社会的个人应该克服一切压迫手段（政府和法律等），确立无政府状态，以便实现完全的平等和绝对的自由；由于私有财产造成了个体和类的颠倒和分离，造成了人对人的奴役和个性的抽象化，因而未来社会应该彻底废除私有财产，使之成为社会财产并按人的本性和需要进行管理；由于把个体维系在"类"的共同体中的最自然、最根本的纽带是"爱"，因而未来社会应该废除一切导致精神奴役的宗教形式，以便建立一种"信奉爱和人道的宗教"。赫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先验地、逻辑地推论出共产主义，因而他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具有空想性质。他从抽象的自由原则出发，把批判和否定的创造作用绝对化，以致他的观点又不可避免地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青年黑格尔派的行动哲学和政治批判，终究没有转变为改造世界的实践力量。

四　普鲁士政府反动倾向的加强和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分裂

从黑格尔哲学中寻找变革依据的青年黑格尔运动，虽然表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要求，然而它一开始就把希望寄托在对于普鲁士国家的幻想上。1842年底，当即位不久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迅速撕下他的自由主义的伪装，公开暴露其反

动面目的时候，①青年黑格尔派便因幻想的破灭而迅速分化了。以布·鲍威尔为首的柏林“自由人”小组，日益脱离现实的政治斗争而热衷于空谈和幻想，并逐渐转向敌视群众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反动立场。受反动专制政府迫害的费尔巴哈则被迫远离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汹涌前进的时代潮流面前落伍了。而一些希望进行新的斗争的激进分子，也苦于看不到出路而苦闷、彷徨。历史发展的进程表明，以黑格尔哲学为基地的青年黑格尔运动已濒临绝境：它不仅不能同新的社会力量相结合（他们中的大多数对1844年6月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持敌视态度就是证明），而且在理论上也走到了绝路。麦克斯·施蒂纳（1806—1856）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4）的出版，就是这一运动陷入理论困境的标志。

施蒂纳把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合乎逻辑地导向了极端——唯我论和主观虚无主义。在他看来，黑格尔把“精神”主体实体化，基督教把“上帝”人格化，这固然是荒谬的，因为“精神”和“上帝”本来是不具有形体的抽象物。但是，当鲍威尔用个别的“自我意识”、费尔巴哈用“类”取代“上帝”和“绝对精神”时，他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谁也不能否认，“自我意识”只能是人的自我意识，而人则只能是具体的、暂时的、个别的“我”。除了“我”以外，难道还存在一个具有形体性的“人”或“类”吗？要知道，“我就是‘我’，你也是‘我’”。他质问费尔巴哈，“人类本身是什么，你宣传的对人类的爱是什么？它难道不是一种怪影，抽象的存在物和想象的东西吗？你的人类若不是在人们的头脑中，不是在个人的头脑中，又在哪里呢？所以除了个人及其要求、意向和意志以外，没有任何现实的东西。”这样，“我”便成

① 普鲁士专制政府从两方面扼杀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改革呼声。一是加强对大学讲坛的控制，继费尔巴哈、施特劳斯之后，布·鲍威尔、阿·鲁藤堡等相继被剥夺了在大学的讲学权。二是加强了对出版物的控制，在实行更为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同时，连续查封了当时最有影响的自由派的三大报刊。它们是《莱比锡总汇报》（1842年12月底），《德意志年鉴》（1843年1月3日），《莱茵报》（1843年1月，允许其出版至1843年3月31日）。

了"唯一者",而世界不过是"我的所有物"。这样一来,青年黑格尔运动也就以其荒唐的结局,走完了用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辩证法)来克服它的另一个方面(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全部历程。

青年黑格尔运动的主要功绩是通过对宗教和专制主义的批判而提出了对现存社会的改造问题。尽管他们之间的观点有很大差异,却一致认为当前的现实是一种颠倒了的世界,因而都致力于探索消除异化,实现解放的道路。但是,由于他们把世界的本质都归结为某种精神的东西,因此又毫不例外地把改变世界归结为改变人的意识。"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归根到底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现存的东西,也就是说,通过另外的解释来承认现存的东西。"① 因此,尽管他们在词句上都非常革命,但实质上却是十分保守的。施蒂纳的哲学集中体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这种矛盾本性。它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强烈地抨击现存的一切,而其实却正好"表达了那些想变成真正资产者的现代德国小资产者的期望"。②

青年黑格尔派主要的批判武器是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和传统的人道主义。但是,当他们把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引导到主观唯心主义方向时,就为反辩证法和反人道主义打开了大门。由于他们用绝对的唯一主体("自我意识"、"唯一者")取代了黑格尔的蕴涵着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主体——客体,这就取消了作为辩证发展的基本形式的主体和客体的矛盾。又由于他们把个人的主观意识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就势必要导致非理性主义的抬头而走向反人道主义。施蒂纳正是通过这条路走向反人道主义的。他认为,"唯一者"是没有前提、没有历史、不能加以规范的,他只能"从这创造性的无之中诞生"。他自认为发现了真正的"自我"。他说:"如同我在事物背后发现正是作为精神的我一样,以后我也必然在思想背后发现自己作为思想的创造者和所有者。"这样,整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2页。

② 同上,第481页。

世界就都变成了"我的世界","我的所有物"。[1]施蒂纳不仅整个背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且公开打出了反人道主义的旗帜。他用极端的利己主义取代了合理的利己主义,用个体的天生不平等取代人生而平等的观念。为了"我"的发展,他甚至认为可以"从我本身获得杀人的权利"。

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以极端的方式表现了青年黑格尔运动的消极面。它的出现,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实践上,都证明了这个运动已走上了绝路,它的解体是必然的。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不断消除青年黑格尔派的错误思想的过程中开辟了通向新世界观的道路。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向黑格尔哲学和革命民主主义的转变

既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家庭及周围环境所赋予他们的思想影响中,并没有什么革命民主主义和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因素,那么显然需要研究,他们最初的世界观是如何形成的。尽管同他们后来所完成的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相比,这个过程并不那么艰难复杂,但它却是马克思恩格斯独特的理论道路和探索精神的最初展现。它生动地记载了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现实——和社会生活保持深刻的联系,追求真理——和时代精神息息相通的理论品格。这个过程的完成,使他们站到了自己同时代人的前列,形成了创立新哲学世界观的良好思想起点。

一 马克思转向黑格尔哲学的动因——对应有和现有对立的哲学思考

根据父亲的意愿,马克思在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法律。开始入

① 参见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转引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上册)第1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波恩大学，一年后又转到柏林大学。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重要转折就是在这里完成的。和当时德国其他大学相比，柏林大学不仅有最良好的学习风气，而且作为研究黑格尔学说的中心而蜚声学坛。马克思入学之际，适值该校两大法学学派（黑格尔学派和历史学派）的著名代表爱德华·甘斯教授和卡尔·弗里德里希·萨维尼之间的论战方酣。围绕着立法原则和根据的这次论战，一下子把哲学问题提到了突出地位。

最初，马克思并不喜欢黑格尔哲学的“离奇古怪的调子”。但他在对法学理论的严肃的思考中，在对应有和现有，理想和现实的关系的深入探索中，逐渐转向了黑格尔哲学。①

早在波恩大学读书的第二学期，出于对政府当局压制学生自由的不满，加上和燕妮的爱情时有波折，马克思曾一度沉溺于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但是，他很快发现，对待生活的这种纯粹理想主义无济于事，必须冷静地面对现实。他在反思中严厉地批评了自己的诗歌创作，责备这些诗作把主观思想同现实对立起来：在这里，“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模糊了，而一切正在模糊的东西都失去了轮廓，对当代的责难，全凭空想编造、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完全对立。”

在法学研究中，把应有和现有对立起来所产生的困扰，同样促使马克思重新审查那些原先使他倾倒的哲学理论。由于对现存的法学理论不满，他曾试图创立一种理想的法学体系。他根据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原则，首先建立起先验的法概念。但是，由于始终未找到从这些先验的法概念过渡到现实的法的途径，他终于认识到，从任何先验原则出发的方法都是不可取的。不首先获得一种能更加合理地解释现实的哲学世界观，就不可能在法学或其他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的突破。

---

① 马克思1837年11月10日致父亲的信提供了他这一探索过程的第一手材料。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1页。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该文。

和青年黑格尔派的直接往来，加速了马克思转向黑格尔哲学的进程。由于苦心构造法学体系而累倒了的马克思，由医生建议到柏林郊区施特劳拉养病（1837年4月—5月）。在那里，他开始和“博士俱乐部”的成员们频频接触。同时，他又“把黑格尔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还看了他的大多数学生的著作”。他终于发现，自己深深为之苦恼的现有和应有的矛盾，在黑格尔哲学中已得到较为合理的解决。马克思从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中受到了深刻启示，认识到思维不应当把先验的规律强加给客体，而“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在的矛盾的东西而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① 他在同自己的文学和法学创作中的理想主义告别的同时，也告别了康德和费希特：“从理想主义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马克思就站到了资产阶级古典哲学的思想顶峰，为创立新的哲学世界观奠定了良好的起点。这是马克思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界碑，正如他本人所评价的那样：“生活中往往会有这样的时机，它好像是表示过去一段时期结束的界标，但同时又明确地指出生活的新方向。”

二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对世界和哲学相互作用的最初考察

马克思坚定地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他彻底放弃了专攻法学的打算，决心献身于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博士论文》论题的确定，表明了马克思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的意图。② 他力图通过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1页。

② 从1839年起，马克思对古代哲学史、主要是希腊后期哲学进行了系统的认真研究。不久，他确定把伊壁鸠鲁哲学作为其《博士论文》的题目，并写下了有关的摘要和笔记共7册。1841年3月他完成了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博士论文。马克思由于提交该论文，在未经答辩的情况下就被耶拿大学哲学系授予博士学位。

对希腊后期哲学的批判考察，探索和确定黑格尔以后哲学发展的方向，以解决当时德国政治和社会生活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希腊哲学在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发展和黑格尔以后的青年黑格尔运动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在这两个时期，个性自由和自我意识都成了时代精神的体现。他认为："只是现在，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体系为人理解的时代才算到来了。他们是自我意识哲学家。"不同的是，在希腊后期，尤其是在自由思想遭到践踏的罗马社会中，自我意识哲学的出现意味着人们逃避外部现实，追求内心的宁静和满足。而黑格尔以后的德国自我意识哲学，则力求将哲学转化为意志和行动，以便改变外部现实。尽管如此，它们毕竟是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博士论文》清楚地表明了他"所持的还完全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观点"。把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原子论看作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哲学，这个观点本身就来源于黑格尔的哲学史；而把这种自我意识哲学当作时代精神的象征，也是当时青年黑格尔派的基本哲学倾向。

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成员一样，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也认为黑格尔哲学的本质的东西是被他的保守体系所掩盖的辩证发展观。因此，黑格尔哲学并非像他的正统派弟子们所反复论证的那样，是什么"哲学理念的绝对现实性"，而是一种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科学。老年黑格尔派恰恰忽略了黑格尔本人的这个思想："科学并不是现成的，而是一个在形成中的东西。"马克思已经看到，黑格尔的保守体系妨碍了他对哲学史的正确评价。他指出："黑格尔对于他主要地称之为思辨的东西的观点，也妨碍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认识上述那些体系对于希腊哲学史和整个希腊精神的重大意义。"① 他由此提出研究哲学史的一个有价值的方法论原则，就是必须把一个哲学学说的客观内容同它的主观的阐述形式加以区分，以便"把那种像田鼠一样不声不响地前进的真正的哲学认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89页。

同那种滔滔不绝的、公开的、具有多种形式的现象学的主体意识区别开来”。①

黑格尔对德谟克利特哲学、特别是伊壁鸠鲁哲学抱有敌意。他在自已的《哲学史讲演录》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他们，并认为后者仅仅是前者的翻版。和黑格尔相反，马克思十分推崇伊壁鸠鲁哲学，把他看作希腊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包含了深刻的辩证法思想，这使他不仅高于其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而且超过了德谟克利特。马克思第一次对伊壁鸠鲁关于“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的思想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它用辩证法的观点“解决了一个在希腊哲学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中，只承认原子在虚空中的直线式下降和众多原子的冲击这两种运动。而一个仅仅呈直线下降的原子，由于缺乏能动的原则，就不能解释众多原子的冲击何以产生。并且，这种原子不过是空间中运动着的点，因而根本谈不上个体性和自身完整性。为了表现原子的自满自足的整体性，它就不能只具有空间的相互外在性，而且还必须包含内在的差别性即否定性于其自身中。如果说直线运动表现了原子的空间规定性、外在制约性和物质性，那么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则表现了原子的个体性、独立性和观念性。因此马克思认为，直线运动和偏斜运动是伊壁鸠鲁的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着的内在矛盾。这种内在矛盾是原子的灵魂，是它的自我规定和自身运动的能动原则。这就改变了原子世界的整个内部结构，使原子具有了斥力。因而它能打破盲目必然性的摆布，并使众多原子的冲击成为可能。可是，原子在其生命过程中具有三个环节：直线运动表现它的直接性即肯定性；偏斜运动是它的否定；原子的冲击是否定的否定。经过这三个环节，原子便按照它的概念实现了。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是根据黑格尔辩证法的结构去理解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的，突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70页。

地表现了重视个别自我意识的整个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重要的是，虽然马克思本身并没有意识到，但实际上在这里他已第一次表明了物质(原子)根据其内在必然性（矛盾）而自己运动的思想。

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观点同样地解释了伊壁鸠鲁关于原子的“质”的规定。原子应不应当具有“质”？这个问题本身就包含着矛盾。说原子有特质，是和原子的永恒不变本性相矛盾的，因为任何特质都是变化的。然而如果说原子没有质的差别，又无法解释它们何以能在空间中彼此区分开来。伊壁鸠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一方面作出某些规定，肯定原子有特质；另一方面又作出一些相反的规定，否定原子有特质。他用矛盾的观点来把握原子的质。马克思指出：伊壁鸠鲁“是这样规定一切特质的，即认为特质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反之德谟克利特再没有从原子本身来考察其特质，也没有把那包含在原子的概念和存在之间的矛盾客体化”。伊壁鸠鲁提出原子除具有德谟克利特所规定的形状、体积的差别之外，还具有重量这种特质，伊壁鸠鲁就把原子概念中本质与存在的矛盾客体化了。

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的卓越之处在于他把原子的概念和存在之间的矛盾归结为它的内在矛盾，和德谟克利特不同，伊壁鸠鲁不把原子仅仅理解为构成物体的元素和宇宙形成的始基。原子不但是构成万物的质料或元素，而且是创造万物的力量源泉。原子的这两重性质被伊壁鸠鲁视作它的不同规定性。这样，那“在原子的概念中所包含的存在与本质、质料与形式之间的矛盾，便被设定在个别的原子本身内了”。于是，从本质世界（原子）向现象世界（具体事物）过渡的桥梁就架通了。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也揭露了伊壁鸠鲁哲学体系中的矛盾。在伊壁鸠鲁看来，原子不仅是万物的本原，而且是个别自我意识的原型和象征。因此，他必然否定在自我意识以外还有任何东西能具有永恒性和绝对合理性，否则自我意识的绝对主宰地位就会动摇。然而在天体现象中，伊壁鸠鲁却看到了他赋予原子的那些规

定性都得到了完全的实现：天体是个别的，独立的、永恒不变的；它们偏离直线而运动，并以自身中产生出的时间作为自己显现的形式等等。这样，他赋予原子个别（自我意识）概念的形而上学规定，却存在于和个别自我意识相对的天体现象中。因此，他不得不在天体学说中放弃了他原来的原子论方法，认为对天体的认识必须使用多种解释，从而使他的体系陷于最大的矛盾之中。但是，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体系存在着的这种不彻底和矛盾，却是从彻底的反神学立场出发的，针对当时确实存在的对天体的恐惧和迷信，他认为把感性的东西永恒化是产生迷信和拜物教的根源，因此理所当然地要否定天体就是原子的直接实现。然而这样一来，他就抛弃了自己原子学说的最大特色（具体的个别性）而向抽象的个别性倒退。

总之，马克思根据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把伊壁鸠鲁的自发辩证法发挥到自觉的高度，把分散的、不系统的思想发展为一种完整的体系。他从世界的本质（原子）开始，通过原子的直线运动——偏斜运动——排斥运动等辩证的环节，把本质的世界、现象世界、感性个别的自我意识统一起来，构造了关于宇宙的辩证发展的完整思想。不难看出，这是一个经过青年黑格尔主义改装了的伊壁鸠鲁主义。

但是，《博士论文》也表明了不同于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特点，预示着马克思后来思想发展的独特道路：首先，在自我意识问题上，和鲍威尔等人只停留在谈论抽象的个别性不同，马克思重视的是感性和经验的个别性。他认为抽象的个别性只是自我意识的"原则"，而经验的个别性才是具体现实的个人。只有通过后者才能完全地把握自我意识。因此，必须把普遍性、个别性和否定性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形成自我意识哲学的完备结构。这说明马克思已不满足于抽象个人的观点，开始把视线转向研究感性的具体的个人。其次，在自由问题上，虽然马克思也十分强调个人的自由和独立，但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不同。他并不否定外部世界的合理性，他同意黑格尔关于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的观点。

马克思因此批判了伊壁鸠鲁的自由观，批评他从经验个别性向抽象个别性的倒退。马克思认为应当把斯多葛派的必然性和伊壁鸠鲁的偶然性统一起来，因为自由只能是“定在中的自由”。

归根到底，马克思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分歧，集中表现在对哲学和现实的相互关系的理解上。他承认，哲学应当成为改造非理性现实的武器，成为行动哲学。黑格尔虽然把绝对精神的发展描述为一种能动的过程，但这只是一种脱离人类的抽象思维实体的能动性，仅仅适用于概念自身的演化和发展。当问题涉及哲学对于现实世界的作用时，绝对精神的抽象能动性就无能为力了，这时，哲学的理性必须转化为“意志”，即转化为个别自我意识这种体现实践精神的“主观形式”。但是，马克思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不同，他没有因此而退回到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没有把精神同现实割裂开来并赋予自我意识以绝对的意义。在他看来，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向自我意识哲学的转变，决不是要抛弃它的内容，而是要赋予它的内容以主体性的形式，以便通过这种主体形式同现实发生积极的关系。因此，在马克思那里，自我意识并不具有纯粹主观的意义，它只是客观精神(真理)在主体意识中的体现。实际上，自我意识是形式，其内容仍然是普遍理性的法则。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进程是哲学意识同感性意识相互作用的结果，表现为哲学和现实世界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每一个阶段都开始于一种已达到完成的哲学体系的制定，如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和近代的黑格尔哲学。但这只是哲学的内部完成，它要实现自身，必须转向外部世界，和世界发生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包括两个方面：客观的方面即哲学同外部感性世界的相互关系，即“反思关系”，双方的相互转化关系。哲学反对世界，将自己的本质强加给它，使世界哲学化。与此同时，世界也将自己的本质转交给哲学，使哲学世界化。这种既对世界，又对哲学革命化的双重过程，表现在哲学和世界相互作用的主观方面，即哲学同它的精神承担者、哲学家本身的意识的相互关系上，

这就对体现哲学精神的个别的自我意识提出了双重要求："其中一个要求是转向世界，另一个要求是转向哲学本身。"不难看出，马克思是试图在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实现主体、客体的统一，但摆脱它的神学倾向和与之相关联的宿命论观点。

《博士论文》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次巨大的自我深化。它为马克思直接投身政治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 恩格斯转向黑格尔哲学的动因——对信仰和理性冲突的哲学裁决

移居不来梅的时期（1838年8月—1841年3月）是恩格斯转向黑格尔哲学、形成自己的独立世界观的时期。生活在这座资本主义较为发达、政治和哲学上的自由主义影响较为广泛的城市，使恩格斯早已萌发的内心冲突迅速地激化，推动着他的思想发生急剧的变化。

信仰和知识、宗教和现实的对立是引起恩格斯内心冲突的原因。还在中学读书时，随着知识和实际生活经验的增长，他就从宗教神学的一些明显谬误中产生了对信仰的最初怀疑，从信教工人的悲惨生活中产生了对宗教的敌意。摆脱宗教蒙昧主义的愿望日益强烈。他提出："我们要走出去，跨入自由的天地，冲决谨小慎微的束缚，为夺取生活的桂冠，为有所作为而奋斗。"来到不来梅后，酷爱文学的恩格斯很快就为当地的"青年德意志"所吸引，成为该派的积极的成员。在给弗·格雷培的信中，他宣布，"我应当成为一个青年德意志分子，或者不如说，我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青年德意志分子。"但是，"青年德意志"的反封建斗争局限于文学方面，而且在思想上还没有上升到无神论。帮助他最终克服内心中信仰和理性冲突的还是青年黑格尔运动，而最先使他的思想发生深刻转变的则是施特劳斯的《耶稣传》。

由于"开始对自己的乌培河谷时期的信仰产生怀疑"，恩格斯开始（1839年4月）注意阅读各种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宗教和哲

学书刊。其中有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卢格创办的《哈雷年鉴》、亨格斯坦堡编辑的《福音派教会报》、伊·海·费希特编辑的《哲学和思辨神学杂志》以及克·梅尔克林的《现代虔诚主义述评》等。通过这些书刊，恩格斯已经间接地了解到黑格尔的哲学观点。但是，他并没有马上放弃"青年德意志"观点而转向黑格尔，作为合乎逻辑的过渡，他选择了施莱艾尔马赫尔（同年7月）。① 他认为，这种按"青年德意志"精神对宗教所作的解释是可取的，"我已经接受了我在这个学说中发现的哲学原则"。在宗教问题上，"温和的超自然主义"取代了他以前曾信仰过的虔诚主义。

但是，对施特劳斯的进一步研究，很快就粉碎了恩格斯企图"在实证的基督教和当代文化水平之间找到一个交融点"的信念。施特劳斯对宗教的非理性本质的揭露使恩格斯终于发现，信仰"原来就像海绵一样漏洞百出"。他彻底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并兴奋地宣布："我目前是一个热心的施特劳斯主义者了。"（同年10月）此后，恩格斯开始直接研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等，并形成了黑格尔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世界观。1840年1月，他总结地回顾了自己的这段历程，肯定地指出："由于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阳光大道。"这一转变不仅是理性对信仰的胜利，而且标志着他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决裂。因此，尽管恩格斯明确表示自己坚决站在青年黑格尔派一边，"不会成为像辛利克斯等人那样顽固的黑格尔主义者"，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退回到主观唯心主义立场，走上抽象的自我意识哲学或批判哲学的道路，而

---

① 施莱艾尔马赫尔宣传的是一种合理的或实证的基督教，它存在于个人的心灵，并接受理性的滋润和检验，使宗教从属于理性，这正是恩格斯当时所感兴趣的。正如他在给弗·格雷培的信中所说："宗教之树长于心灵，它隐蔽着整个人，并从理性的呼吸中吸取养料。而它的果实，包含着最珍贵的心血的果实，是教义。""圣经的教义也应当用理性去领会。""这就是施莱艾尔马赫尔的学说，而我赞同的也正是这个学说。"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504—512页。

是力图根据黑格尔哲学中的理性原则和辩证方法作出革命的政治结论。

和哲学观点相比，恩格斯的政治观点显得更为激进，这是他对下层社会生活直接感受和深入观察的结果。对工厂主贪婪、冷酷的剥削本性的憎恶以及对工厂工人悲惨生活的深切同情，是促使恩斯格对宗教、对现存社会制度产生愈益强烈的反抗情绪的根本动因。他的第一篇政论文章《乌培河谷来信》就是以他对家乡的现实生活的亲身观察为根据的。① 工厂劳动的压榨和宗教神学的麻醉相结合，使该地区的劳动者处于极其悲惨的生活境地。"下层阶级，特别是乌培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光是爱北斐特一个地方，2500个学龄儿童就有1200人不能上学，而是在工厂里长大的。"对宗教的虔诚主义，使得被剥削者对自己所遭受的苦难麻木不仁，同时却使残酷的剥削者们的良心得到安慰。恩格斯尖锐地指出："厂主中间对待工人最坏的就是虔诚派教徒。他们千方百计降低工人的工资，据说还是为了使工人不致酗酒。"

过了一年，在恩格斯转向了黑格尔哲学以后，他的主要仇恨便集中到宗教和一切黑暗势力的总代表——威廉三世身上。恩格斯愤怒地写道："我恨死了他，如果我不是对这个恶棍极端卑视，我会恨得更厉害。"② 对国王的仇恨表明了他反对普鲁士现存国家制度的不妥协立场。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成员不同，恩格斯在一开始就没有对普鲁士国家及其所代表的专制权力抱任何幻想。他指出："只有当皇帝被人民打得晕头晕脑时，只有当他的宫殿的玻璃窗被革命打得粉碎时，我才能期待他办些好事。"③ 诉诸群众的革命，表明恩格斯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已经形成。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93—518页。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引自该文。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550页。

③ 同上，第550页。

四 恩格斯批判谢林的文章——用理性主义对抗和摧毁非理性主义

恩格斯在柏林服兵役期间（1841年9月至1842年9月）开始了和青年黑格尔派的直接交往。他作为柏林大学的旁听生选修了谢林、米希勒、马尔海涅克等的哲学和神学课程。在这里，他参加了聚集在《雅典神殿》杂志周围的青年黑格尔派柏林小组，迅速越过了施特劳斯的泛神论观点而成为无神论者。恩格斯的黑格尔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世界观的第一次充分表露，就是他对“启示时期的谢林”的批判。①

恩格斯把对谢林的批判看作是间接地对普鲁士政府的批判。实际上，谢林重返大学讲坛主持哲学讲座本身，就是威廉四世政府加强反动思想专制的信号。法国大革命的外在影响和德国成长着的资本主义的内在要求，使青年黑格尔运动不可遏止地成为冲破封建思想藩篱的解放力量。“基督教的全部基本原则以至迄今为止凡是被称为宗教的东西，都在理性的无情批判下崩溃了；绝对观念要求成为新纪元的缔造者。”普鲁士政府终于发现了黑格尔哲学对其统治的威胁，于是把谢林从慕尼黑召到青年黑格尔运动的中心——柏林大学主持哲学讲座，指望他“降伏黑格尔哲学”。而已经完全转变为官方哲学家和天主教神学家的谢林，竟不顾66岁的高龄，十分卖力地“为普鲁士国王的需要维护自己的体系”。因此，恩格斯特别强调，谢林和黑格尔之间，不仅是理论之争，而且是“在政治和宗教方面争夺对德国舆论的统治地位即争夺对

① 谢林曾以他独创的“同一哲学”体系推进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但是，1804年以后，随着他在政治上的衰退并逐渐投入封建反动派的怀抱，他在哲学方面也逐渐向反理性主义的启示哲学倒退。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十分强调严格区分“早期的谢林”和“启示时期的谢林”。

德国本身的统治地位”的斗争。[①] 他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战斗勇气，率先连续发表了批判谢林的重要文章。[②]

恩格斯对谢林的批判是从彻底的理性主义立场出发的。谢林的出发点是本质和存在、理性和经验、潜在力和行动的二元论。他认为，本质（或观念）是“先于经验理解的东西”，而存在则是“根据经验理解的东西”；理性仅是认识的潜在力，即逻辑上的必然性和概念的思维，而经验则是和启示或信仰相联系的“自由”思维；潜在力是没有行动的认识，它只能转化为逻辑的存在，而行动则是“不可追溯的存在”（上帝）的“自由”创造。与此相应，他提出了否定哲学和实证哲学的区分：以事物的本质为对象的否定哲学，只能证明世界的本质，而不能证明“实在的世界”。对存在的证明只能依靠实证哲学，经验才是“实证”知识的唯一源泉。显然，理性和经验二元论的实质，是在经验的名义下宣扬“对权威的信仰”和“感觉的神秘主义”。[③] 因此，恩格斯说：“我们一开始就应当反对这样的分裂。”

和谢林相反，恩格斯从理性主义出发，努力论证理性和实存、理性和经验、理性和行动的统一。（1）理性并非离开世界而独自存在的东西，它本身就是现实的存在。即使是作为认识的潜在力，它也意味着向现实认识转化的必然性。因此，理性不仅是万物的尺度，而且是实存的根据，“万物都应当在理性面前证实自己的

---

① 上述引文分别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13页，209页，217页，197页。

② 这些文章是：《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哲学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193—197页。下述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此。

③ 谢林从右的方面对黑格尔理性主义的批判，对后起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尤其是存在主义有较大影响。实际上，在他的哲学讲座听众中，就有后来成为存在主义奠基人的索伦·基尔凯戈尔（1813—1855）。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第76页。

实存”。如果理性不能证实事物的存在，合乎理性的东西不能转化为现实的东西，那只能使理性成为空洞的抽象而非理性化。（2）经验并非是和理性相分离的独立本原，它归根到底只是证实了存在的必然性即理性。因此，虽然证实事物的存在离不开经验，然而它并非绝对本体。先于一切思维的经验是先验的经验论，而不是纯粹的经验论。这种经验“把完全没有理解的东西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完全以信仰为转移，并且只为信仰而存在”。（3）理性不仅“是认识的必然性”，同时也是无限的行动。理性通过行动而转化为现实，创造现实，因此，行动是本质和存在、理性和经验同一的中介。“只有通过认识的行动证明自己的可靠性的那种理性，才是现实的理性。”显然，依靠那“深远的非静止的辩证法”，才能克服上述对立。对谢林的二元论的克服，归根到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对谢林的局限性的胜利，谢林克服不了这个矛盾”。

对谢林的批判，表现了恩格斯独特的黑格尔主义立场。毫无疑问，他批判谢林的思想武器和基本立场都是黑格尔主义的，是用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批判非理性的宗教神秘主义，用唯心辩证法批判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因此，在这个批判中，他既未发现黑格尔哲学的致命弱点，也未理解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批判宗教的唯物主义实质。但是，恩格斯并非无保留地赞同黑格尔，他已经看到黑格尔哲学的前提同它那“细心的，甚至是谨小慎微的”结论之间的矛盾，已经抓住了黑格尔哲学中最有价值的观点，即否定性辩证法。而且，他已经意识到，要清除黑格尔哲学中的一切神秘之处，必须结合费尔巴哈的理解去把握黑格尔。他认为，黑格尔的强有力的、永不静止的辩证法，就是“人类在纯思维中的意识”，即“人类的自我意识”。这固然说明他还没有意识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但却已透露出企图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加以结合的朦胧意识。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各自的独立探索，都站到了时代潮流的前列，站到了当时人类理论思维的高峰。同时，他们的世界观中

也依然存在着矛盾，存在着继续前进的必要性和根据。

思考和讨论

1.如何理解19世纪中叶的时代特点和优秀文化成果的综合趋势。

2.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是怎样转向黑格尔哲学的？

3.青年黑格尔运动是怎样兴起的？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哪些？提出了哪些思想观点？

4.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通过伊壁鸠鲁原子论的阐述表达了什么样的基本思想？和鲍威尔的哲学思想相比有什么明显特点？

5.恩格斯是如何批判谢林的非理性主义的？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世界观的第一次转变——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第一节　《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动摇了对黑格尔哲学的信仰

在马克思、恩格斯最初形成的世界观中，实际上存在着深刻的矛盾：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哲学之间的对立。由于对旧制度采取不妥协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表达了社会下层人民群众的愿望，因而必然要求他们深入探索根本改造现实社会政治的道路，但黑格尔哲学并不从现实社会的物质关系出发，它仅仅把精神看作是世界的"本质"，这就导致把改造世界的现实问题变成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思辨问题。这种对立在马克思、恩格斯越来越深入地卷入政治斗争以后，便迅速显露并日益尖锐起来。《莱茵报》时期，是他们直接投身政治斗争并对黑格尔哲学的信仰发生深刻危机的时期，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大转变。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以报刊为阵地介入政治生活并非偶然。从客观形势看，由于普鲁士政府逐渐撕下了"自由主义"的伪装，日益强化思想政治上的反动专制，因而可供选择的政治手段寥寥。1841年10月14日布·鲍威尔被剥夺了在波恩大学(随

后是一切大学）任教的权利，同年11月15日老谢林应召到柏林大学主持哲学讲座。这两个互相关联的事件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表明反对派以大学讲坛为斗争舞台的道路已被堵塞。马克思也因此而取消了在大学谋取教职的念头，剩下的就只有报刊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斗争工具了。从主观情形看，对于像马克思、恩格斯这样已具有强烈革命民主主义倾向的斗士，反动当局的高压政策只能把他们推向更加激进的政治立场。同时因对于黑格尔主义的信仰，又使他们特别重视理论批判和报刊舆论这个武器。因此，通过创办自由报刊以争取世界的理性化就合乎逻辑地成为他们当时的政治选择。于是从1842年初，他们就加强了同《莱茵报》的联系。①

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成为该报的撰稿人。而在他担任了该报的主编(同年10月)以后，《莱茵报》日益表现出革命民主主义的倾向。终于在1843年3月31日被查封。在这期间，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理性和利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成为他一直为之苦恼的问题。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问题的辩论，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就摩塞尔地区的农民状况同《莱茵报》记者的论战，等等，成为促使他研究经济问题并转向唯物主义的最初动因。而《莱茵报》的被查封，则宣告了创办自由报刊实现社会改造的理想破灭，从而成为推动马克思诉诸革命、诉诸无产阶级的重要因素。

一　马克思对书报检查制度的批判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是“马克思的第一篇政论

① 《莱茵报》于1842年元旦在科伦出版，由当地一些富有的资产者（如康普豪森、达哥柏特·奥本海姆、梅维森等）集资创办。起初，它是莱茵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机关报，青年黑格尔派一开始就在那里发挥重要作用。赫斯、鲍威尔、科本、荣克、施蒂纳、鲁藤堡等都曾是该报编辑部的决策人或正式撰稿人。

性文章，他以这篇文章开始了他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政治活动"。出版自由问题是当时德国进步力量最为关注的政治问题。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按照卡尔斯巴德决议于1819年10月18日颁布的。在它施行的20多年中，德国著作界处于一种精神产品极其贫乏的"精神大斋期"。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已成为进步舆论的最强烈的呼声。但是，普鲁士王室内阁却在自由主义的伪善面具下，于1841年12月24日用新的书报检查令重新肯定了书报检查这一制度。一个月后，马克思便写出了激烈抨击新书报检查令的文章。他从作为真理的客观精神和理性出发，揭露了新书报检查令的自相矛盾，以及它反对理性、压制精神自由的实质。在马克思看来，理性和精神自由是一致的。由于理性是独立于任何个人而存在的客观真理，它不属于任何人所专有，因而是普遍的、自由的。而书报检查制度却把精神的全部完美性硬加在少数的书报检查官身上，"硬说他们在行动中没有怨恨、没有私欲，也没有人类的弱点"。这就势必无视理性自身的规律，以个人任性冒充理性，给精神施加暴力。在马克思看来，理性、精神自由和出版自由是一致的。由于精神自由并不意味着个人可以随意行动，而是意味着人们对客观真理的自由探讨，因此，只有当这种探讨合乎对象本身的性质，并且能够引出合乎真理的结果时，它才真正体现精神的自由。出版自由就是人们探讨真理的自由，出版物的任务只在于体现真理。它既不能表现个人的任性，也不能服从于一种指定的表现方式；因为精神本来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它不为任何单一的方式所决定，而必须体现整个人类。书报检查令的出发点恰恰是对真理本身完全歪曲和抽象的理解；它否定真理应该用事物本身的语言来说话，应该表达事物的本质和特征；它不顾对象本身的性质，硬是给真理添上一种色彩，即"官方的色彩"。在马克思看来，理性和法是一致的。理性是客观真理，法是客观自由的形式。对于法来说，只有行为本身才是它的对象。因此，理性知识都具有确定的客观标准。而书报检查令却禁止发表

"带有有害倾向"的作品，以人们的思想方式为对象。它不仅要惩罚人们的行为，而且要惩罚人们的思想。因此，这是最可怕的恐怖主义。最后，在马克思看来，书报检查制度同宗教是一致的，检查令保护基督教，严厉禁止对宗教的任何批判。但是，对宗教的保护也就是对现存国家制度的保护。他指出，维护书报检查的人们想"使之成为国家支柱的并不是自由的理性，而是信仰；对你们来说，宗教也是现实世界的普遍肯定……"①

通过上述分析，马克思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第一，书报检查所产生的恶果不应归咎于个别检查官的不法行为，而是书报检查制度本身的"客观的缺点"。归咎于个人实际上是专制主义的伎俩。"虚伪自由主义的表现方式通常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的本质——当前的制度。"因此，"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② 第二，现实的普鲁士国家决不是理性和道德的国家，而是需要彻底改造的非理性的基督教国家。马克思把理性国家和普鲁士政府、出版法和书报检查令、法官和书报检查官作了明确的区分，用前者反对后者。他虽从黑格尔理性国家的概念出发，却得出了彻底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结论。马克思抨击书报检查令的文章，鲜明地体现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也反映出他和黑格尔思想观点的分歧正在扩大。书报检查制度禁止了这篇文章的发表，一年后它才被收入由卢格出版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

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也是关于出版自由问题的。这就是他写于1842年5月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③。他在致卢格的信中对该文作了如下评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页。

② 同上，第5、31页。

③ 和普鲁士其他各省的议会一样，莱茵省议会也是一个维护地主特权的反动议会。虽然在它的79名代表中包括诸侯代表4人、地主代表25人、市民代表25名和农民代表25名，但其全部活动几乎都围绕着维护地主的特权而进行。

"联系关于出版的辩论，我又回到书报检查和出版自由的问题上来，不过我是从另一些观点来考察这个问题的。"粗看起来，它和前一篇文章一样，对出版自由的论证仍旧是以理性和自由为基础的。但实际上，两篇文章存在着重大差别。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对理性的理解，已不是停留在抽象的客观精神或人类精神上，而是具体化为"人民精神"。尽管这时他对人民一词的理解还比较空泛，但毕竟已明确是指大多数人，尤其是广大贫苦阶层。由此出发，马克思对出版自由的论述有了更新的观点。

首先，马克思分析了出版自由的不同态度是同各等级的利益相联系的，反映了等级利益和普遍利益的对立。马克思指出：在省议会的辩论中，诸侯等级是出版自由的死敌，是书报检查制度的绝对拥护者；贵族等级以人民还不成熟为理由，极力为书报检查制度辩护；市民等级具有"不彻底的自由主义的天生软弱性"，他们从赢利的观点出发，把出版自由仅仅解释为新闻职业的自由；只有农民等级大胆发出了"检查制度过时了"的呼声。这个事实充分暴露了站在这场辩论背后的是各个等级的利益。马克思指出："在这里论战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等级。还有什么镜子比关于出版的辩论更正确地反映省议会的内在实质呢？"[①] 上层等级的代表捍卫的是私人利益，只有农民等级的代表才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普遍利益。由此可见，理性自由的社会支柱不存在于权贵中，而存在于受压迫的劳动人民中。

其次，马克思把自由看作是社会中不同等级的人的本质的必然表现，关于出版自由的争论反映了普遍自由和特殊自由的对立。马克思认为，自由确实是人们所固有的，各种自由向来都存在的，它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没有一个人会反对一般的自由，他们反对的只不过是别人的自由。对于统治等级来说，他们反对的就是人民的自由。因此，"问题不在于出版自由是否应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页。

当存在，因为出版自由向来是存在的。问题在于出版自由是个别人物的特权呢，还是人类精神的特权”。由于贵族等级的代表企图把自由解释为少数人的特权，而不是人民的普遍自由，这样，“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得出结论说，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是有害的思想，是‘逻辑地构成的体系’的幻想。为了拯救特权的特殊自由，他们就斥责人类本性的普遍自由”。

再次，马克思认为出版自由反映人民的呼声，表达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因而关于出版自由的争论反映了人民精神和反人民精神的对立。马克思认为，出版物对于人民来说，是揭示其精神存在的最一般的方式，因此，它必须是自由的。由于理性和道德的实质是人民精神，所以，只有表现这种精神的出版物才是自由的出版物。“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的出版物是变物质斗争为精神斗争，而且是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理想化的获得体现的文化。”书报检查是企图从外部对报刊施加压力，否认报刊具有自己内在的规律。屈从于这种检查制度的报刊“是不自由所固有的无性格的丑态，这是文明的怪物，洒满香水的畸形儿”。①

最后，马克思把争取出版自由同彻底变革现行国家制度联系起来，揭示了等级议会制同人民代议制的对立。马克思看到，争取出版自由不仅是要废除书报检查制度，而且要从根本上变革现存的等级代议制。他指出：“回顾出版问题的全部讨论过程，我们便不能抑制内心的痛苦和悲伤，这种情感是由莱茵省那些摇摆于故意顽固到底的特权和先天软弱的不彻底的自由主义之间的代表们的会议引起的。”② 这证明，莱茵省等级议会并不真正代表人民意志，而“脱离被代表人的意识的代表机关，就不成其为代表机关”。马克思实际上得出了如下结论，现存的普鲁士国家制度是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74、94页。

和理性国家概念相矛盾的，它的存在是没有根据的。他认为变革的力量来自人民，“查理一世就是由于来自下面的神的灵感才走上断头台的”。而要真正获得自由，就必须“不仅用矛头而且要用斧头去为它战斗了”。

不难看出，马克思的上述分析仍然是把精神、理性看作历史的决定力量，其基本的哲学立场还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已经发现理性的国家和法的概念同它的经验存在是对立的。这一点导致了他对理性主义国家观的动摇，悄然开始了他向唯物主义观点的过渡。

二 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最初涉足

虽然在出版自由问题上，马克思已经看到了各等级的特殊利益支配着他们各自的政治态度，但是，反映在出版自由问题上的物质动机毕竟还是多少被掩盖着的，它还不足于完全动摇马克思在法权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他继续把理性和法看作起决定作用的力量，要求议会代表不要为物质利益所左右，而致力于维护出自人类本性的法的纯洁和尊严。但是，当他一旦涉足到直接的物质利益问题，关于法的任何虚幻观念就必然要受到根本冲击。关于林木盗窃问题的辩论是他第一次碰上了的牵动着广大贫苦农民命运的物质利益问题。

当时林木盗窃问题日益显得严重起来。在整个 40 年代，普鲁士各地审理的约 20 万件左右的刑事案中，属于这一性质的案件竟有 15 万件。造成了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生计无着的贫苦农民与林木占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尖锐。由于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丧失土地的农民不得不依赖在森林里拾拣枯枝和草莓作为生活的来源。而国家则为了维护林木占有者的利益，制定越来越严厉的惩罚性的法律。在莱茵省议会辩论中，贵族等级居然要求把拣枯枝也算作盗窃林木而予以制裁。贵族等级的这种蛮横要求，竟然受到了普鲁士王国政府的赞许和鼓励。针对这种

情况，马克思写了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辩论的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公开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辩论，是马克思写作这篇论文的直接目的。他论证了农民行使其习惯权利的正当性，鞭挞了把农民的行为视为"盗窃"和违法的林木占有者的代言人的卑劣行径。他指出，必须明确拣枯枝和各式各样的盗窃行为之间的本质差别，抹杀这种差别，就是消灭了法律本身。他说："不论历史或是理性都同样证实这样一件事实：不考虑任何差别的残酷手段，使惩罚毫无效果，因为它消灭了作为法的结果的惩罚。"① 那么，区分两者的客观标准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拣枯枝决非盗窃，因为枯枝并非林木占有者的财产。贫民在拣枯枝时，"没有任何东西同财产脱离。……因为林木占有者所占有的只是树木本身，而树木已经不再占有从它身上落下的枯枝了。"对于财产本身来说，它的客观规定就是价值，它具有完全确定、早经确认的界限。"价值是财产的市民存在的形式，是使财产第一次获得社会意义和相互转让能力的逻辑术语。"② 既然财产代表了所有权的确定方面，这是富人的权利，那么，拣枯枝的权利则来自所有权的不定形方面，这是失去了财产的穷人的权利，因而同样是合法的。如果要问，事物的这些客观规定又由什么决定？马克思认为，它们取决于"事物的本性"，即它们的自然属性。自然界本身就提供了贫富对立的例子：一方面是脱离了有机生命而被折断了的枯枝，另一方面是根深叶茂的主干。穷人把拣枯枝当作自己的习惯权利正起源于此。富人连大自然对穷人的这点施舍物也不放过，并企图把穷人的习惯权利变成他们的独占权利，这就完全暴露了他们贪婪和残忍的本性。

显然，马克思的这个分析还不是从经济学方面，即从私有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9页。

② 同上，第141页。

产本身的合理性方面作出的，而是从法律本身，即从财产的法律意义上作出的。因此，他虽然谴责了私有者的贪婪和残忍，但并没有否定私有财产本身。他的批判在逻辑上似乎是严密的，但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却仍显得苍白无力。

在马克思看来，国家和法作为理性自由的存在方式，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普遍利益。因此，它应当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公民，应当保护受压迫的广大贫苦群众。然而现实中的普鲁士国家及其法律却只为林木占有者说话，实际上已"沦为林木占有者的工具"。在这里，"林木占有者的利益应该成为左右机构的灵魂"，"一切国家机关都应该成为林木占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占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在这里，国家的概念和它的经验存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马克思认为，这种受私人利益支配的国家制度实际上是反国家和违反法律的东西。按照马克思当时的信念，真正的国家和法的概念当然应该能够战胜和克服私人利益。然而实际上，私人利益却处处占了上风。他痛苦地看到：在应该为了保护林木的利益而牺牲法的原则，还是应该为了法的原则而牺牲林木的利益问题上，总是利益占了法的上风。"为了保证自己对森林条例违反者的控制，省议会不仅打断了法的手脚，而且还刺穿了它的心。"① 为什么强大的国家理性在私人利益面前竟显得如此软弱无力？这是使马克思感到极度苦恼的疑问。一旦确认了物质利益必定支配着国家立法活动这一事实，就势必要导致马克思迄今所信奉的唯心主义国家观的彻底崩溃。他之所以还没有立即抛弃唯心主义的出发点，是因为他从物质利益支配国家的立法过程这个事实中暂时还作不出相应的革命结论。他只能继续诉诸理性和法，力图从原有的哲学信仰出发去解决理性和现实的矛盾。这从他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最后一篇文章（《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8页。

1842年12月中旬，《莱茵报》刊登了该报记者彼捷尔·科布伦茨寄自摩塞尔河谷的两篇通讯。其中报道了该地区乡镇管理中的不合理的现象。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立即指责他报道失实，“是企图煽起不满情绪并削弱当局和臣民之间的联系”，责令作者用具体的事实作出答覆。在科布伦茨拒不答覆的情况下，马克思亲自担负起了与冯·沙培尔论战的责任。《摩塞尔记者的辩护》就是他拟定要写的一组答辩文章中的第一篇。这篇文章表明，虽然总的立场未变，但他对旧哲学的信仰危机在加深，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在加强。

首先，在国家和私人利益关系上，马克思突破了单纯谴责私人利益、说他把国家变为自己的工具的伦理批判立场，开始正视国家本身的“缺陷”。他发现，要弄清摩塞尔地区的贫困问题，“必须至少看到两个方面，即私人方面和国家方面，因为不能想象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和政府无关，正如不能认为摩塞尔河沿岸地区位于国境之外一样。”大量数字说明，这一地区的葡萄种植者和葡萄酒酿造者的申诉是真实的，倒是特利尔专区政府专门指派去弄清事实的官员在极力歪曲事情的真相。这说明，在私人利益和国家的对立中，卑鄙下流的并不总是私人利益。实际上，摩塞尔地区的贫困状况“同时也就是治理的贫困状况”，它表现了“现实和管理原则之间的矛盾”。不能设想，国家的管理原则是完美的，而它管理下的现实却是贫困的。

那么，国家管理原则的缺陷是否仅仅表现在少数不称职的官员身上呢？马克思断然否定了这种观点，指出国家的管理原则不是由个人意志决定的，而是由客观关系决定的。他说：“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

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①

现在要问，在国家管理原则和客观现实的矛盾的背后，决定着管理原则的又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要解决现实和管理原则之间的矛盾，必须摧毁导致这种矛盾的"本质的关系的势力"。"这些本质的关系就是管理机构内部的官僚关系以及管理机构和被管理机构之间的官僚关系。"② 这种官僚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明确划分出各个等级，首先是"把公民分为两类（作为治人者的积极的、觉悟的公民和作为治于人者的消极的、不觉悟的公民）。"③ 由此决定了在官僚机构内部，任何官员只服从于上级，只执行早已由上级规定的原则而不能作丝毫改变。在官僚机构和被治理者之间，则存在着一种敌视的关系。任何被治理者对管理状况的不满，都必然归结为他本身不怀好意。这就势必造成治理者和居民之间的尖锐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要消除冲突，必须借助于第三个因素，这就是自由报刊。

马克思分析的第三种客观关系是自由报刊和社会舆论的关系。他认为，无论是普鲁士国家还是私人利益，都不代表真正的普遍性领域。消除二者对立的第三者应该具有以下特点：它既是政治因素，又是非官方因素；既是市民的因素，又不和私人利益纠缠在一起。"这个具有公民的头脑和市民的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自由报刊的内部规律就其实质来说是民主的。只有在报刊上，人在现实中的从属关系才可以不起作用，从而在权利平等的情况下彼此都作为公民进行批评。这样，大多数人的愿望才能真实地表达出来，人民精神才能得到实现。因此，"自由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地，它也制造这种社会舆论"。

马克思的上述分析虽然表现出某种唯物主义的倾向，但是，由于它并没有从客观的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物质的关系，更没有揭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6页。

② 同上，第229—230页。

③ 同上，第226页。

示出社会关系客观性的真实根源。因此，不能认为他已经从根本上超出了黑格尔。但重要的是，黑格尔哲学的深刻矛盾已经暴露。马克思已经发现，要揭示物质利益和国家之间的真实关系，仅仅依靠黑格尔哲学是无能为力的。

三 恩格斯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文章

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是在《莱茵报》时期开始参加政治斗争并因此而转向唯物主义的。当时，恩格斯也试图通过争取出版自由而实现国家制度的合理化。他指出："普鲁士的舆论愈来愈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代议制和出版自由，特别是后者。不管国王怎样，首先要他给予出版自由，而出版自由一旦争得，再过一年必然会争得宪法。"[①]在斗争过程中，恩格斯同样发现了唯心主义世界观同客观现实之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一样，恩格斯原来也认为现存的普鲁士专制政体由于同国家的本质相矛盾，因而必将导致这一政体的根本改变。通过对法国七月革命结果的考察，他痛苦地发现自由理性在专制主义面前原来是软弱无力的。1842年10月，恩格斯发表在《莱茵报》的文章《集权和自由》就表达了他的这种焦虑心情。1830年七月革命后的法国，曾给欧洲的自由主义者以很大的鼓舞。那里存在着欧洲最自由的制度：人民主权、出版自由、有陪审员参加的司法独立以及议会政体等原则，一时都被宪法所承认。然而这一切，竟然在倾向反动专制主义的基佐内阁面前荡然无存。这个事实使反动派欣喜若狂，"而对一切期待着七月革命来解决欧洲的人们来说，则是最痛苦的侮辱。"[②]恩格斯企图在不怀疑自由原则的前提下，解释这个事实。他把造成这个事实的原因归结为法国国家制度的缺陷：第一是由于法国宪法措词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392页。

含糊，未对自由的原则作出严格的规定；第二是由于集权。恩格斯认为，集权所具有的矛盾是国家所固有的。一方面，集权是国家的本质、国家的生命基础，从专制君主政体到共和政体，都是集权的。正是在集权的条件下，每个公民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才能实际拥有司法权和公众事务的管辖权。因为集权使国家的管辖范围和职权限定在一切具有普遍意义的事情上，而个人的私事则被排除在外。但是另一方面，也正因为集权，又不可避免地使国家超越自己的范围，使它把自己这个特殊的东西规定为普遍物、至高无上者，并希图取得只有历史才具有的权限和地位。因此，集权和专制又有着必然的联系。"集权的历史是同专制的历史平行发展的。"可见，恩格斯虽然还继续崇尚理性和自由，但他对于通过国家来实现这个目标的信念已经动摇。和黑格尔不同，他不再把国家看作普遍物，而是看作一种特殊的东西。他认为，通过国家实现的只是形式上的自由，而非绝对的、真正的自由。"要实现与绝对自由相等的真正的主观自由，需要的是其他的实现形式，而不是国家。"所谓"其他的实现形式"究竟是什么？他的想法还是含混的，因而只抽象地寄希望于历史的进步。

迁居英国是恩格斯思想发展中的重要转折。1842年11月他来到曼彻斯特，第一次直接接触到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大工业所产生的无产阶级，开始置身于宪章运动和欧文派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之下。正是通过对当时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恩格斯实现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在这里，他继续为《莱茵报》撰稿，一个月内就发表了五篇短文，这反映了恩格斯到达英国后的最初阶段的思想进展。对物质利益作用的关注和对工人阶级状况的研究，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突破。在英国，物质利益的作用是那样的简单明了，它在社会生活中处处占支配地位，理想、道德、观念被毫不客气地挤到一边。这里是"从来没有过原则斗争的；它们之间只有物质利益的冲突"。这个事实虽使恩格斯的思想产生了巨大震动，但他最初仍然企图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加以

解释。他写道："所谓物质利益在历史上从来也不会是独立的主导的目的，而总是有意无意地为指出历史进步方向的原则服务。"①他认为物质利益的统治是封建主义的主要标志，是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因此，英国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落后，"比大陆落后了几个世纪"，还"完全浸沉在中世纪的野蛮境地"。在他看来，这种私人利益占统治地位的情况，正是英国必然发生革命的原因。人民日益觉醒的道德意识，将是推动消灭这种社会不公平的革命的动力。但尽管如此，对社会现实的细心观察和天生敏感的政治嗅觉，仍然使恩格斯获得了一些重要的思想进展。

首先，他把统治阶级的自私自利和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作了原则区分。他看到，英国的发展完全依赖于大工业，而工业本身是包含着矛盾的。它造成了社会的分裂和无产阶级状况的"日益恶化"。"因为工业虽然可使国家富庶，但同时也造成了急速增长着的赤贫如洗、勉强度日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是消灭不了的，因为它们永远也不能获得稳定的财产。"②因此，如果说，驱使富翁们争权夺利的是卑劣的物欲，那么无产者的斗争则是捍卫自己的生存和做人的权利，因而是完全正义的。

其次，他把物质利益冲突和政治上的党派斗争联系起来。他看到，尽管英国的党派斗争十分复杂，但从物质利益上看，只有三个大党：土地贵族的党、金钱贵族的党和激进民主派的党。最后一个党是同工人阶级的觉悟相联系的，因而暂时还只是一个形成中的党。

最后，他把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作了明确的区分。恩格斯看到，共和政体给人们带来的只是形式上的自由，议会并不能代表人民的真正意志。只要私人利益占统治地位，就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因此，社会革命的任务不在于用一种政体代替另一种政体，而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生活条件，首先是消灭群众的贫困。原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46页。

② 同上，第549页。

尽管是最终目的，但它还需要利益开路。恩格斯由此得出一个极重要的结论："这个革命在英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像英国发生的一切事件一样，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才能够发展成为原则，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①当然，在恩格斯看来，上述各点都是由英国发展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并不具有历史的普遍性。思想、原则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观点，还是他的基本观点。但是，上述分析清楚地表明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信仰已经动摇，新的唯物主义观点在形成。他本人也深感许多问题须要再学习和研究，因此，在写了一篇关于谷物法的通讯之后，便结束了对《莱茵报》的投稿。他开始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同时阅读大量的社会主义文献。这导致他最终完成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

第二节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及其所引起的解放作用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1843年是令人困惑的一年。"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他们：通过自由报刊诉诸理性的努力失败了，哲学借以对世界发生作用的杠杆断裂了，理性和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出现了。真正的理性何在？变革现实的真正根据何在？当他们正在苦闷、彷徨和重新摸索前进的时候，费尔巴哈的两篇篇幅尽管不大，但却极其鲜明、扼要地表达了其人本主义观点的论文发表了。②像在黑暗的路途中透进的一缕阳光，它立即鼓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51页。

② 指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写于1842年1月，发表于一年后在瑞士苏黎世出版的《德国现代哲学界轶文集》，《未来哲学原理》同年同一地点以单行本出版。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604－605页。

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为他们重建哲学和现实生活的联系架设了新的桥梁。它自然地成了更高形态的世界观问世前的"中间环节"。①马克思此后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的批判，对各种空想共产主义学说的批判研究，以及后来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论文，都和费尔巴哈的思想有着多方面的联系。

一 费尔巴哈的"主宾原则"和人本主义异化方法对马克思的最初影响

费尔巴哈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并不陌生。两年前，当《基督教的本质》问世时，他的名字就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整个青年黑格尔派所熟知。但是，马克思当时特别感兴趣的是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的批判和对无神论的论证，以及对黑格尔宗教哲学的否定。因此，他并没有把费尔巴哈和布·鲍威尔加以区别，而是同样看作整个青年黑格尔派批判锋芒的锻造者、当代"自我意识"哲学的卓越代表。②而现在，面对费尔巴哈的哲学新著，依靠在《莱茵报》时期所积累的政治实践经验，马克思终于惊异地发现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从中看到了探索人的解放问题的新思路。

费尔巴哈哲学的出发点是感性的人，他认为这"是一切东西

---

① 如何估计费尔巴哈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一直存在着重大分歧。普列汉诺夫在其著名的关于马克思思想发展"三阶段论"中，把"费尔巴哈"作为其中的一个阶段。奥·拉布里奥拉认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名副其实地是马克思的启示录，以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马克思始终是费尔巴哈的信徒。"苏联理论界30年代有过根本否认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的作用的倾向，用"黑格尔—马克思"的公式批判"三阶段论"。我国学术界目前也有类似观点。

② 参阅马克思《博士论文》。例如，马克思认为他们都用感性的具体代替了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思辨（鲍威尔是"个别的自我意识"，费尔巴哈是"感性的人"）。他在论文准备材料中写道："普遍思想总是同主语相脱离的谓语，所有哲学家把这种谓语作为主语。"

都围绕其周围的要点”。他赋予这种感性个体的基本规定是：第一，精神和肉体、理性和欲望的统一，由此引伸出人和自然相统一的哲学原则；第二，个体和类的统一，由此引伸出人和人相统一的哲学原则；第三，作为认识主体和作为感性对象的统一，由此引伸出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哲学原则。从这些基本的前提出发，他得出了改革哲学的三个最重要的结论。(1)主宾颠倒。他认为，既然主体和本体是感性的、具体的、有限的事物，而普遍的理性不过是这个主体的属性和派生出的东西，那么，批判思辨哲学的有效方法，就是把它的原则颠倒过来。“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2)揭露和消除人的本质的异化。他指出，异化的实质是人的类本质和人的感性存在的分离。既然“人的本质只是包含于共同体之间，包含于人与人的统一之中”，那么，当人和人相分裂，个人成为孤独的原子时，他就处于异化状态。而消除异化、实现人的类本质的唯一途径就是重建人的社会共同体。(3)德法联盟。他预言，既然哲学的主要工具是思维和直观，只有两者的结合才是生活的真理，那么，善于思维的德意志民族就必须同善于实践的法兰西民族相结合。从根本上说，这是男性原则和女性原则的结合，是最高的完美和谐。“心情，是女性的原则，是对有限事物的官能，是唯物主义的所在地——这是法国式的想法；头脑，是男性的原则，是唯心主义的所在地——这是德国式的想法。”①

这样，费尔巴哈就以其特有的方式，预示了德国哲学变革的方向：用“颠倒过来”的方法，批判改造黑格尔哲学；用人本主义异化的方法，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用德法联盟的方法，组织实践新哲学的社会力量。这正是1843年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部分青年黑格尔派从中看到的出路和希望，成为此后一个时期他们的理论活

---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11—112页。

动的主要方向。但是，实际上费尔巴哈哲学本身包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这主要的是唯物主义原则和历史主义原则的对立、人道主义原则和感性直观原则的对立。因此，它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取得的某些突破和前进，同时又伴随着失误和倒退。它不能真正地制服黑格尔哲学，更不可能为共产主义提供科学的理论论证。这就使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这一阶段显得十分复杂：他们借助于费尔巴哈取得的思想成果愈多，推动哲学的真正进步的困难就愈大。克服对"费尔巴哈的迷信"，很快将成为他们所面临着的新课题。

创办《德法年鉴》，是他们这一时期理论活动的基本线索。早在1843年1月，当《莱茵报》即将被查封的通知已经到达编辑部的时候，马克思就已放弃了使它存在下去的幻想。他清楚地认识到：在书报检查制度下的德国不可能允许自由报刊的存在，而且仅仅依靠合法报刊的力量也不能真正触动反动的官僚制度。他在给卢格的信中写道："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我正在写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在德国这里将找不到书报检查官来检查，也找不到出版商来出版，也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因此，应该把自由报刊的阵地转移到国外。①

正在这时（1843年2月）在瑞士苏黎世创办《德意志信使》的海尔维格，邀请马克思为他们撰稿；同时，卢格也邀请马克思到瑞士合作编辑由维干德出版的《年鉴》。马克思本来已经答应了海尔维格，但由于后者于3月初被逐出苏黎世，因而不得不放弃《德意志信使》的出版，他便应邀同卢格合作创办新《年鉴》，而地点打算另行寻觅。

在费尔巴哈哲学的启示下，马克思致信卢格，主张在新杂志中把德国的哲学激进主义同法国的政治激进主义结合起来，以便把思想的力量同行动力量结合起来。为了贯彻这一原则，他建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9—440页。

把《德意志年鉴》改名为《德法年鉴》，并提议在和德国接壤的法国城市斯特拉斯堡出版，象征着两国激进力量的联合。信中写道："除了斯特拉斯堡(或不得已时，瑞士)以外，几乎其余一切地方都不是原则，而是阴谋"，"《Deutsche-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德法年鉴》)这是原则，是蕴育着后果的事件，是能够唤起热情的事业。"卢格当即覆信表示赞同。

但是，《德法年鉴》的创办远不像他们原来想象得那样顺利，它不仅延迟到1844年3月才出了一期合刊，而且就此夭折了。开始，他们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寻找出版人。原来保证要负责出版新年鉴的维干德，突然改变了主意，拒绝出版。后来的出版人弗吕贝尔由于加强了他出版的《瑞士共和主义者》报的民主倾向，受到了原来拥护他的瑞士激进派的攻击，加上当局以反宗教罪所给予他的迫害，不得不一再拖延《德法年鉴》的出版。

接着，为物色撰稿人又遇到了很大困难。费尔巴哈认为德国还远不具备从理论转向实践的条件，因而拒绝为杂志撰稿。[①] 法国著作家对撰稿的邀请反映十分冷淡：大多数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是有神论者，他们不喜欢把否定上帝和消灭宗教放在首位的德国激进派。因此，当时在巴黎的拉梅耐、路易·勃朗、拉马丁、卡贝、孔西得朗等均拒绝为《年鉴》撰稿。再就是出版经费问题，由于发行股票的计划落空，最后只好由卢格出资6000塔勒作股金。更主要的是，在创办这家杂志的指导思想上，两位主编经过了长时间的协调才取得了勉强的一致。

从表面看，当时马克思和卢格的思想倾向极为一致。他们都赞同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都主张根据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原则改造社会，把哲学和政治结合起来。但是，在对费尔巴

① 1843年6月20日他在致卢格的信中说："我根本不反对这个想法本身，相反地，同法国精神接近，这对我来说甚至不仅仅是一件诱人的事情，但是从实践观点来看，这件事情在目前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还不能从理论转向实践，因为我们还没有理论，至少还没有阐发得很全面的理论。理论仍然是当务之急。"转引自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第572页。

哈人道主义的理解特别是共产主义的态度上，却潜在地存在着根本分歧。卢格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把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理解为一种抽象的民主原则，一种新的教条。而马克思则把它视为探索社会解放新途径的思想武器，认为必须通过对整个旧世界的批判以发现新世界。卢格对彻底改造德国的可能性持完全悲观的态度，认为不必通过社会改造，只要通过普及教育，就能实现人民的精神解放。而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革命实现社会的解放，才能彻底医治德国。卢格力图把各种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潮都装入费尔巴哈哲学的口袋：先是把它们同样作为人的解放的抽象教条，继而则必然因观点相左而敌视他们。马克思则主张对它们进行认真分析批判后再决定如何对待这些思潮。这一系列分歧的实质透过马克思1843年9月给卢格的信就不难发现。信中写道："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① 敢于破除一切抽象的不切实际的教条，敢于向整个旧世界彻底宣战，是马克思的最重要的品格，也是他能够最终超越费尔巴哈的内在根据。但这正好是卢格所缺乏的。

因此，马克思为《年鉴》规定的方针是："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② 这包含着双重重要任务：一方面是破除一切虚假的意识（无论它以宗教的形式或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现），以便脚踏实地；另一方面是实践真理，以便改造世界。

可见，马克思和卢格的分歧，是根本性的思想政治观点的分歧。尽管它开始还被对费尔巴哈的崇拜所掩盖着，但随着马克思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它的暴露和激化就是难免的了。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德法年鉴》继续出版已不可能。

二 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的初次批判

《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所产生的思想苦恼，使马克思萌发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418页。

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最初动因。黑格尔在法哲学中证明了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同时通过对君主立宪制国家形式的颂扬，表现了他向王室和贵族暗送秋波的庸人心理。早在1842年春，马克思就站在青年黑格尔派的激进立场上，开始了“在内部的国家制度问题上对黑格尔自然法的批判”，反对他的君主立宪制学说。① 当时马克思把国家看作是以政治、法律、伦理形式实现的人类理性。依据这个尺度，他肯定了黑格尔关于封建政体和专制国家在历史上已过时的见解，同时也否定了他的君主立宪制主张。马克思看来，同黑格尔的观点相反，君主立宪制并不是政治国家发展的完成，而是一种受历史限制的和暂时的国家形式。现在，马克思的目的是，通过继续批判和研究，从哲学上论证他在《莱茵报》时期提出的关于人民主权和人民国家的思想。写于1843年3月至9月的未完成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这一批判的主要成果。②

和以往的批判不同，马克思现在是把重点放在揭露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实质上，以期根据费尔巴哈所发现的原则根本改造黑格尔，从而为社会解放的新理论奠定基础。在他看来，国家理性决非是市民社会的先验基础，相反，市民社会本身即居民现实生活中的不同的物质利益领域，才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这是把费尔巴哈的“颠倒过来的”方法具体地用来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学说的首次尝试，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的：“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不应当到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轻蔑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这段话扼要地概括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学说所作的批判研究的主要思想成果。从此，一个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21、434页。

② 原稿批判了作为黑格尔法哲学的中心部分的国家学说。其中对第257至第260节的批判部分散失了。现存手稿是从第261节开始至313节中断。

物地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方向开辟出来了。

但是，马克思作出的这一结论并不是简单地仿效费尔巴哈。他首先要消除自己的思想困惑。他虽然看到国家事实上已降低为私人利益的工具，但他还是无法想象非理性的私人利益领域竟会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消除这一困惑，马克思是不会同黑格尔的国家观彻底决裂的。直到1843年5月，马克思虽然站在穷苦人民的立场上，但他仍然把建立新世界的人区分为“能思想的人”和“受苦难的人”，把前者看做人类理性的代表。[1] 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上他仍然持唯心主义的观点。过了几个月，即《法哲学批判》的手稿已大致完成时，马克思表述了下述思想：“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形式出现而已。因此，批评家可以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并且从现存的现实本身的形式中引出作为它的应有的和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2] 这是个含蕴深刻的转折。乍一看来，它似乎还是黑格尔“现实即理性”观点的发挥，然而，实际上，它已经蕴藏着这样的一种认识：冲破意识形态(宗教、哲学和政治)的幻想，从现实社会领域寻求产生理性的力量，用现实的普遍性代替黑格尔抽象的普遍性概念。后来发现，这个区别于黑格尔普遍性概念的现实普遍性领域就是市民社会中的无产阶级。为了不是从哲学中而是从现实中发现理性的力量，就必须运用费尔巴哈的“颠倒过来”的方法，把黑格尔的国家学说翻转过来，并加以认真地改造。

黑格尔吸取了亚当·斯密的观点，把国家或法律—政治领域同经济—社会领域区分开来，把后者称为市民社会。市民社会这个概念一方面表示个人的生活、个人的需要和目的，同时也指个人彼此之间的依存、劳动、分工和财产关系。因此，在市民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现象是任性、偶然性、贫困、压迫以及各种对立和冲突。

① 参阅1843年5月马克思致卢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4—4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7页。

与此相反，国家现实作为共同的政治生活组织，它的本质不是个人和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抗争，而是作为"绝对精神"的最高表现的国家理念。在黑格尔看来，家庭和市民社会的非理性领域不过是国家理念的自然的、有限的领域，由此形成了两者的对立。这种对立表现为私人利益体系和普遍利益体系、人类生存的外在方式和内在目的之间的矛盾。不过，它们最终将达到辩证的统一。因为正是国家理念把自己分裂为家庭和市民社会这两个有限的领域，以便"返回于自身，成为自为的"现实精神。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国家学说的"颠倒"具有双重内容。第一，在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外部关系上，他否定国家是第一性的，是派生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精神力量的观点，认为国家只是第二性的，是由家庭和市民社会派生出来的。他说："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1]第二，在国家的内部关系上，他否定使立法权从属于王权，使人民主权从属于君主主权的观点，坚持人民主权高于君主主权的主张。他说："人民的主权不是从国王的主权中派生出来的，相反地，国王的主权倒是以人民的主权为基础的。""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2]

但是，这种"颠倒"并没有直接导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马克思在这里否定的是任何超自然的本质，任何脱离经验存在的一般。因此，这种批判主要具有反思辨的性质，还没有形成物质的社会关系第一性的思想。事实上，马克思仍然把家庭和市民社会看作"意志所具有的现实的精神实在性"。在他看来，抽象的普遍物只能存在于现实的有限物之中，而脱离有限物的普遍物决不是现实的，而仅仅是抽象的。抽象的普遍物是思辨神秘主义的表现，它必然导致虚幻主体和真实主体并存的二元论。他说："正因为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0—251页。

② 同上，第279、281页。

格尔不是从实在的对象（ὑποκείμενον主体）出发，而是从谓语、从一般规定出发（而这种规定的某一体现者总是应该有的），于是神秘的理念便成了这类体现者。黑格尔不是把普遍物看做一种现实的有限物（即现存的固定物）的现实本质。换句话说，他没有把现实的存在物看做无限物的真正主体，这正是二元论。"[1]但是，在用"颠倒"的方法否定了黑格尔的抽象普遍性以后，在进而解决现实的普遍性和现实的有限物的关系上，如果继续使用"颠倒"的方法就会得出荒谬的结论。因为这样一来，岂不是要从现存的普鲁士国家出发，认为君主立宪制是现实的、合理的了。因此，我们看到，恰恰在同一手稿中，马克思似乎又否定了"颠倒"的方法。他在批判黑格尔的"非批判"观点时指出："黑格尔所说的不是把经验的存在归结为它的真理，而是把真理归结为某种经验的存在，这样一来，随便哪一种经验的存在都可以理解为理念的实在环节了"；"他不应该以现存的东西为尺度来衡量理念，而应该以理念的尺度来衡量现存的东西。"[2]实际上，费尔巴哈的"主宾颠倒"原则用于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是有效的，但对于解决历史辩证发展的问题却丝毫没有用处。因此，它不能成为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有效方法。必须找到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才能完全克服黑格尔哲学。

在发现历史的真正动力以前，马克思只能诉诸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方法。从人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中的普遍合理性的源泉不是现存的有限物，而是人——作为"类"的人，它才是现实的、无限的普遍物。根据这个观点，一切的社会和政治组织，或者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即体现，或者是它的异化。马克思说："如果在考察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时把人的存在这些社会形式看做是人的本质的实现，看做人的本质的客体化，那么家庭等等就是主体内部所固有的质。人永远是这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但是这些组织也表现为人的现实普遍性，因而也就是一切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3页。

② 同上，第292、293、312页。

所共有的。"[1]但是，现存的社会组织并非人的本质的实现，而只是它的异化。这里的尺度是人的"类"本质。因此，在现实生活领域，整体高于部分，人民高于君主。据此，他用真正的民主制来同现存的国家制度相对立，把对法哲学的批判变成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他指出，现有的政治国家是和人民现实生活相脱离的异化领域。"君主制是这种异化的完整的表现，共和制则是这种异化在它自己的领域内的否定。"[2]民主制和现存的政治国家的本质区别在于：它是确立了人民主体地位的国家，国家制度本身成为"人民的自我规定"，"在这里，国家制度不仅就其本质说来是自在的，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说来也日益趋向于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确定为人民自己的事情。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3]虽然马克思这里还没有同唯心主义决裂，而且没有把消灭私有制看成是扬弃异化的重要条件，但他已经突破了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提出了劳动者的社会解放问题。

谈到异化，就不能不涉及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试图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批判改造，是马克思从一开始就超出费尔巴哈的一个重要方面。黑格尔的哲学是以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分离为出发点的，并把它作为矛盾来把握。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这一点。他指出："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看作一种矛盾，这是他较深刻的地方。但错误的是，他满足于只从表面上解决这种矛盾，并把这种表面当做事情的本质。"[4]黑格尔的这种表面性在于：他没有揭示这种矛盾形成的真实过程，而用虚构的精神异化掩盖了现实的矛盾；他也没有指出解决这种矛盾的方法和途径，只是用想象的"中介"调和矛盾并同现实妥协。这一倾向在他论述君主主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93页。
② 同上，第283页。
③ 同上，第281页。
④ 同上，第338页。

官僚机构、长子继承制等的"天然的"必要性上，表现得格外明显。黑格尔硬说：君主作为"人格化的主权"，体现了人民的主权；官僚机构是协调各种特殊利益集团并直接服务于国家的普遍目的机关；长子继承制是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支配权；等级制是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合题，等等。在马克思看来，君主、官僚机构本质上是与人民相对立的，而等级不仅没有消除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矛盾，相反，倒是这种矛盾的必然表现。他断言："黑格尔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现象的矛盾理解为本质中的理念中的统一，而事实上这种矛盾的本质当然是某种更深刻的东西，即本质的矛盾。"[①]这个更深刻的矛盾，当然是阶级矛盾及其由以产生的私有制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马克思当时显然不能达到这一认识。他虽然已经看到了私有财产和政治国家之间的必然联系，认为后者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已经得到实现的本质"，[②]但是，对于私有财产却仍然是从私人利益、等级特权等法权关系的形式上加以理解的。这样，私有财产和政治国家的联系就仍然是从意志关系的意义上去理解。因而，他就仍然只能用普遍国家的本质去反对现存的政治国家，用抽象的人民主权去反对现存私人利益和特权。要揭露市民社会和国家对立的真正原因，必须借助于具体的历史和经济分析，这是马克思行将解决的问题。

三　恩格斯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

和马克思相比，恩格斯转向共产主义立场更为迅速和直接。早在1842年底，受赫斯和魏特林的影响，他已明显地表现出共产主义的倾向。如果说，马克思是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改造和对彻底民主主义的深入探讨曲折地转向共产主义的话，那么，恩格斯则是在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影响以后，通过对英国的经济和社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8页。

② 同上，第369页。

会状况的研究和分析而完成这个转变的。在这一时期恩格斯所受到的费尔巴哈的影响，主要是经过赫斯传播的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同时，欧文、傅立叶等的空想社会主义对他也有重要影响。代表恩格斯这一时期思想发展水平的著作主要有《伦敦来信》和《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

《伦敦来信》(实际上是在曼彻斯特写的)是恩格斯在开始研究了英国政治经济学以后写的。和刊登在《莱茵报》上的短文相比，其突出的进步在于他已看到了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缺陷，并把共产主义理解为无产阶级现实要求的理论表现。在各种社会主义者中，恩格斯对英国社会主义的评价最高。他认为法国社会主义者倾向于宗教唯灵论，而德国激进派只尚空谈不务实际。只有英国社会主义者既有求实态度又有坚定意志。但是，这个学派的主要缺点在于他们企图仅仅通过启蒙和教育来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不像宪章派那样诉诸阶级斗争。因此，社会主义者应当和宪章派联合起来，共同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在英国，一个阶级的社会地位愈低，愈‘没有教养’（就一般的意义说），它就愈进步，愈有远大的前途——这一情况是非常显著的。”社会主义总是从他们那里得到理解和支持。而“有教养、尤其是有学问的人，近三百年来对时代的旗帜是不闻不问的。”① 恩格斯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但是这封信也表明，他此时还把这种状况看作是英国的特殊性。

《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是恩格斯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标志之一。在这里，他虽然还没有明确认识到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历史意义，但已不再把英国看作比德国更落后的封建主义国家。并且，他已把原来认为只受英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所制约的共产主义革命看成是国际任务。他写道：“共产主义并不是英国或其他什么国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以现代文明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61页。

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但是，他还没有把这个“一般情况”和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对抗性矛盾相联系。因此，他认为英、法、德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是不同的。“英国人由于国内贫困和道德败坏的现象的迅速加剧，他们通过实践达到这个学说。法国人是通过政治达到的……；德国人则是通过哲学，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①] 恩格斯把当时德国的共产主义称为哲学共产主义，并自称是这个党的一员。

哲学共产主义的基本特点是：第一，它把共产主义看作德国古典哲学的直接结论，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德国人要不抛弃使本民族感到骄傲的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就得接受共产主义。”第二，它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包括有产者在内的一切人的事业。但是，哲学共产主义并非统一的哲学政治派别，它只是德国激进的反对派表达自己情绪的一种方式。其中赫斯等接近空想共产主义，鲍威尔、卢格和费尔巴哈实际上只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而马克思恩格斯则处在向科学共产主义的过渡中。哲学共产主义在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之后，迅速地分裂了：一部分人走到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鲍威尔、卢格）；一些人发展它的思辨和空想的成分而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赫斯、格律恩）；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在同工人运动的密切结合中，最终成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

第三节　《德法年鉴》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由于知识准备的不足而未能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进行更为具体的分析。这成为他加紧研究历史和政治方面著作的动因。这种研究开始于克罗茨纳赫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5—576页。

期，持续至巴黎时期。它为马克思世界观的进一步转变奠定了基础。写于1843年7—8月的五册题为“历史—政治”读书摘录，就是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研究的记载。它根据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去揭示现代国家的历史起源，以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中具有众多表现形式的国家的真实本质。这一研究成果，部分地反映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但更多的反映在后来发表在《德法年鉴》的文章中，甚至从更晚的著作如《神圣家族》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研究的成果。

克罗茨纳赫笔记包含了对22位作家的24部著作的摘录。在政治学方面，包括了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著作；在历史学方面，包括了德、英、法、瑞典等国作家的著作，其中分析了从公元前6世纪至19世纪30年代各国历史发展的重要事件。根据马克思在第二、第四册笔记中所作的内容提要和索引，可以看出他特别注意的问题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所有制及其结果”，包含它的产生和在不同历史时代的不同形式，财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以及它对国家和整个社会制度的影响等；第二，阶级的产生，阶级和等级特权的形成与性质，以及由封建等级向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的过渡；第三，国家与法，包含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与专制主义相联系的官僚机构的产生及其与王权的关系，王权、代议制和人民主权的关系等等。

克罗茨纳赫笔记表明，通过对世界史，特别是法国革命史的研究，马克思在两个使他困惑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一是关于现代代议制国家的起源和局限性问题。大量资料说明，这种国家形式是在王权反对封建主的斗争，城市的作用和市民阶级的影响日益增长的条件下，由王权同市民联盟推翻封建统治的结果。因此，它不是人民主权的表现，而是新兴的财产所有者实现统治的政治形式。二是阶级利益和所有制的历史联系问题。摘录的资料表明，所有制是阶级利益的实现，它总是通过革命完成的。任何革命，总是由其特殊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普遍利益的阶级领导的．

其结果是废除旧的所有制和确立本阶级的所有制。因此，政治革命不过是私有制的一种形式反对另一种形式的革命。这个进展对于马克思完成世界观的转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他确信资产阶级革命已不能实现人类的自由与平等，因而更加促使他转向共产主义。又由于他进一步看清了所有制和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因而也加速了他向唯物主义的转变。现在的问题是，须要寻找这样一个阶级，其阶级利益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和社会的普遍利益完全一致。一旦发现了这个阶级，共产主义就从理论问题变为实践问题。马克思移居巴黎后不久为《德法年鉴》撰写的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① 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标志着他向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转变的完成。②

一　宗教异化的根源是政治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分离

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是他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一主题的深化。他通过对市民社会和国家分离的具体历史考察，探索消除这种分离，实现对社会的根本改造的道路。但是，这一批判已旁及到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主流的鲍威尔等的唯心主义立场。《论犹太人问题》的写作，就是直接导源于布·鲍威尔的两篇文章。③

由于犹太教宣称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因而遭到基督教的世

① 关于这篇文章的具体写作时间，历来说法不一。这里采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百卷本）第一部分第二卷第648—654页所作的订正。

② 从根本上说，巴黎提供了为当时的德国所缺少的两大因素：觉悟程度较高、人数日益众多的产业工人以及由1789年革命而形成并延续至今的政治革命传统。当马克思发现了这些新要素，并力图对它们给予理论上的说明时，就必然促使自身世界观发生质的飞跃。

③ 布·鲍威尔的两篇文章是：《犹太人问题》（载1842年11月《德意志年鉴》）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1843年收入《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

代仇恨。在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德国，犹太人一直不得享有和基督教徒同等的政治权利。按1812年政府颁布的《关于犹太人市民状况的勒令》，犹太人依然不能担任公职和大学教职。这个问题从40年代初就成为人们批判普鲁士专制制度的重要话题。鲍威尔的观点在青年黑格尔派中有很大的代表性，他从两个方面批判地探讨了这个问题：一方面从基督教国家，另一方面从犹太教本身。就前者来说，“既然特定的宗教是基督教国家的生命攸关的原则，它就永远不会对其他特定的宗教的信徒采取宽大容忍的态度，并使它与自己的各等级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就后者来说，由于其宗教的狭隘性，因而必然地同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国家生活相对立。① 由此他得出结论：国家只有摆脱了基督教才成为真正的国家；犹太人只有放弃了犹太教才能被看成真正的人。这就是犹太人最终获得解放的道路。可见，鲍威尔立足于把宗教看成人的自我异化的根本原因，因而把国家和宗教的分离看作人的解放的主要手段。而这种观点对于此时的马克思来说，已显得过于陈旧，过于唯心主义了。

要考察犹太人的解放问题，必须联系各种不同的政治条件。在德国，由于国家还没有作为人的普遍本质的代表者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来，所以在这里，犹太人问题依然是宗教问题，表现为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同以基督教为基础的国家的对立。但在共和制的美国，由于信教已成为每个公民的私事，而国家则代表全社会管理公民的普遍事务，因而犹太人问题就完全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无关，而是一个纯世俗的问题。由此可见，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并不取决于他们放弃犹太教。相反，在共和制国家里，“宗教不仅存在，而且表现了**生命力和力量**。”② 诚然，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有着自身的狭隘性，它们都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但是，它们却不仅能在现代政治国家中安然无恙地存在，而且还第一次获得了生命

---

① 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第59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5页。

和力量。可见，宗教决不是世俗狭隘性的根源，而只是它的表现。从现代政治国家的情形来看，必须要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桎梏来说明它们的宗教桎梏，而不是相反。

在更深入研究了政治国家的本质之后可以看出，它的狭隘性类似宗教的狭隘性，也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而且，宗教的异化导源于政治国家的异化。这样，对宗教的批判就应该转变为对国家的批判。宗教批判固然是前提，因为这种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使人能够作为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一句话，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的现实的太阳旋转。但是，宗教异化并非人的本质的根本的、唯一的异化。它只是世俗的政治异化的结果。批判宗教只能摘去那装饰在束缚人们的锁链上的虚幻花朵，但真正的解放却在于打碎锁链本身。因此，必须把由费尔巴哈开辟的宗教批判推广到政治领域。马克思写道："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①

和宗教异化一样，政治异化的特征也在于人的本质的二重化，即人的真正本质和他的现实本质分离。人作为国家的公民，他是类存在物，是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但这是没有实在内容的虚幻的普遍性和平等。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他是利己主义的个人，在利益上相互分离，在行为上彼此利用，甚至自己奴役自己。人的这种失去类本质的状况和处境却是具体的、现实的。所以，即使是在宗教以外尘世世界里，人也是过着双重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

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① 如果说，基督教是通过基督这个人神合一的中介物来承认人的神圣本质的话，那么政治国家也是人的现实存在和他的普遍本质之间的中介物。它虽然承认了人的普遍本质，但却使它作为徒具形式的公民权利存在于虚幻的世界，而不具有现实性。结果，就使现代社会的人处于这样的奇特状态中：“只有利己主义的个人才是现实的人，只有抽象的citoyen(公民)才是真正的人。”

然而，政治异化的世俗基础是什么？人们实际生活中的神又是什么？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中利己主义个人的自我异化的实践，必定要造成一个实际的神。这是人的异化本质的实际存在。他指出：“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钱。”“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② 这样，他就合乎逻辑地把消除异化同消灭金钱对人的统治即共产主义革命联系起来。金钱异化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个突破。它同后来的“异化劳动”概念有直接的联系。③

通过上述分析，马克思初步接触到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中三个层次的社会关系：宗教关系，政治关系，金钱和财产关系。产生上述这些关系的是市民社会的工商业实践活动。不过，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8页。

② 同上，第443、448页。

③ 莫泽斯·赫斯曾写过题为《论货币的本质》一文。该文据称是为马克思和卢格主编的《德法年鉴》而写的，且大部分稿子已交编辑部，仅因年鉴停刊，文章于一年半之后才发表在皮特曼主编的《莱茵社会改革年鉴》1845年第1卷上。该文用异化概念分析货币，提出了货币是人们异化的本质等观点。由于这篇文章，在现代史学中出现了究竟是马克思还是赫斯首先把异化概念运用于社会经济领域的争论。《赫斯传》作者埃·济尔伯奈认定马克思是从“赫斯那里得到灵感”才把费尔巴哈异化概念运用于社会。民主德国史学家们则认定是赫斯受马克思的影响才写了《论货币的本质》，因为甚至连赫斯本人也没有否认马克思的观点形成要早些。

对于工商业实践活动的理解，还仍然按费尔巴哈的方式，把它看成是受利己主义需要支配的人的自我异化活动。因此，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不是人们现实的实践活动，而依然是存在于哲学家们头脑中的关于人的理想观念（类本质）。

二 无产阶级的解放不是政治解放而是人类解放

现在要问，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矛盾是如何形成的？这个在《法哲学批判》中已经提出的问题，在这里得到了较为具体的分析。按照费尔巴哈的观点，马克思把历史发展看成是人的“类”本质不断返回自身的过程，其表现形式是“解放”。他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①]但是，由于马克思已不把人的异化简单地归结为宗教，归结为专制主义对个性的奴役，因而他也不把“解放”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革命。为此，他区分了革命的不同历史类型。通过对法国革命史的研究，马克思明确地认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和矛盾，乃是市民阶级革命的产物。而市民阶级亦即资产阶级革命所完成的解放仅仅是“政治解放”，而不是彻底的“人类解放”。鲍威尔的错误就在于把政治解放看作人类解放，把低于历史水平的德国所面临的任务当作历史的最高任务。马克思认为，德国专制制度是中世纪野蛮制度的延续，它虽然也应成为革命的对象，却不具有当代革命的典型性。只有立足于完备的现代国家，才能提出人类解放的任务。

政治解放是促使封建制度解体的市民阶级的革命。旧的市民社会即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具有政治性质，市民社会的要素，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等，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行会的形式同时又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要素。这倒不是因为财产等私人要素已变成了公共生活要素，而是国家（政治）下降为私人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被分割成依附于封建特权阶层的从属因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

而国家则表现为和人民脱离的统治者及其仆从的特殊的职能。①因此，政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摧毁那些使人民脱离自己的政治共同体的各种政治形式：教会、贵族和行会特权等等。其结果，就是使政治生活要素和私人生活要素彻底分离开来，即一方面是作为公共生活领域的政治国家，另一方面是作为私人生活领域的市民社会。由此而形成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矛盾。

可见，政治解放旨在消灭政治上的等级特权，使政治生活领域成为具有普遍性质的公共生活领域。这是迄今为止人类解放所能达到的最后形式。但是，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矛盾中，也暴露出这种解放形式的局限性。因为它消灭了政治特权，却使市民社会中的现实差别更加迅速地发展和扩大起来。例如，国家从政治上废除私有财产，取消了选举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便使私有财产迅速地发展起来；它从政治上废除等级、出身、宗教和职业的差异，宣布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却使实际的财产不平等更加扩大。而且对于现代的政治国家来说，"只有在这些差别存在的条件下，它才能存在，只有同它的这些要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会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实现自己的普遍性。"②这样，政治国家所创造的平等和自由，就成为一种脱离现实个人的生活内容的虚幻的东西。和宗教一样，政治领域中的完美和人性化，不过是对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和非人化的精神慰藉。等级制并没有真正被消灭，不同的只是以社会等级代替了原来的政治等级。不但如此，通过政治解放，也就粉碎了束缚市民利己主义精神的羁绊，个人完全成为脱离社会共同体的利己主义个人，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因而得到了彻底的实现。作为政治国家所保护的"人权"，实际上成了利己主义个人的权利：所谓自由，其实就是狭隘自私的、封闭在自身中的个人权利；所谓财产权，就是根据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1—443页

② 同上，第427页。

私刑而不受社会束缚随意使用和处理财产的权利；所谓平等，无非是把人同等地看作孤独的单子。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在现代政治国家中，公共生活、政治共同体只是手段，利己主义的个人才是目的；公民成为私人的奴仆。这仍然是真正的人的关系的颠倒。

从人类解放的观点看，利己主义的个人不是本来的人、真正的人，而是异化了的人，它只是人向社会存在物复归的环节。因此，人类解放的根本任务是要在实际上消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矛盾，克服人的本质的二重化（异化）。“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① 要做到这点，最重要的不是克服观念中的神，而是消灭世俗生活中的神，这就是导致普遍异化和人类关系物化的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犹太精神恰恰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本质，而犹太人的社会解放恰恰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犹太人若要从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桎梏中彻底解放出来，就不仅仅是同犹太人和基督徒有关的特殊问题，而是要对市民社会进行彻底的革命改造。这意味着，人类解放不仅要使用批判的武器，而且要使用武器的批判。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② 然而，武器的批判需要现实的社会力量，能够成为这种力量的革命群众在哪里呢？

三　关于无产阶级世界历史使命的初步论证

在马克思看来，德国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时代的落伍者，但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460页。

它却由于自己的哲学而成为现代文明民族的同时代人。德国哲学是实现本国历史的观念的形式，是本民族历史的预言。因此，对德国哲学的批判，也就是对现代文明国家的批判。既然政治解放在现代文明国家中已成为历史，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是人类解放，那么德国能否通过一种革命实践，以便不仅能使自己提高到现代各国的现有水平，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即将达到的人的高度呢？实际上，对于德国来说，这已是唯一的出路。和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不同，德国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领导人民进行反封建革命的资产阶级。马克思认为，任何能够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阶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它的特殊利益必须同普遍利益相一致（哪怕是一瞬间的一致），以致被公认为是社会的普遍代表；第二，它反对的敌人必须集社会的全部缺点于一身，以致被看成是整个社会公认的罪恶。而在德国，代表这两个极端的阶级都不存在。"德国的任何一个特殊阶级，不仅缺乏那些把自己标志为社会消极代表的彻底、尖锐、勇敢、无情，同样，任何一个等级也缺乏和人民心胸相同——即使是瞬间的相同——的开阔的胸怀，缺乏鼓舞物质力量实行政治暴力的感悟，缺乏革命的大无畏精神。"①因此，在法国，部分解放是普遍解放的基础；在德国，普遍解放却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那么，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

关键在于形成一个作为人类解放的实际承担者的阶级。这个阶级必须是：第一，它不拥有任何财产却构成市民社会的实际因素，因而是"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第二，它被剥夺了一切做人的权利因而具有普遍性质，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第三，它必须解放一切社会领域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因而是现代社会彻底解体的结果。这个阶级，"作为一个特殊等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②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一开始就把无产阶级的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4、466页。

形成与工业的发展、社会的两极分化联系在一起。这说明，尽管这时对无产阶级还缺乏科学的论证，但他从来没有把无产阶级神化。①

人类解放是无产阶级和新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无产阶级是私有财产的对立面。它的存在表明，以私有财产为核心的现存世界已被自我否定。这个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把无产阶级的原则(被剥夺了私有财产)提升为社会的原则(剥夺私有财产)，使财产复归于社会。无产阶级的这种要求，已经由德国新哲学作了理论上的表达。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理论出发，新哲学作出了只有消灭私有财产才能消除天国生活和世俗生活、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矛盾的结论，以便实现人类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②

根据上面对《德法年鉴》文章的分析表明，马克思的世界观至此已经完成了根本的转变。其最主要的标志是：(1)无产阶级世界历史使命的发现；(2)经济生活中的异化在全部非人化现象中的决定意义的发现。这为马克思打开了通向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门户。但是，马克思所面临的创立新世界观的任务还远未完成。他此时形成的世界观仍具有过渡的性质。在哲学观点上，他的某些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成分还裹在人本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在政治观点上，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论阐述还有着浓厚的思辨性和伦理色彩。在《德法年鉴》的文章中已处处显露出他自身观点的矛盾。例如，他在考察现代社会中的异化现象时，既着眼于市民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的分析，又把它归结为人的真正本质和现实存在的分离，把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人的“类本质”看作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在考察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时，他既把现代社会

① 把无产阶级看作是马克思塑造出来的神，这是当代资产阶级“马克思”学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

的解体看作是其内在矛盾和自行解体的结果，又把无产阶级当作人的"类本质"的实际体现者；在考察共产主义革命时，他既把消灭私有制看成是由无产阶级实现的革命运动，又把它说成是人的"类本质"的复归，因而不恰当地夸大了哲学和教育在其中的作用。[①]马克思思想中的这些矛盾，有待于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以便发现历史发展的真正的动力和一般规律。在这方面，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给了马克思某种启示。

早在1843年春，恩格斯就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认真研究，尤其注重斯密、穆勒、马尔萨斯、李嘉图、萨伊等人的著作。其主要成果反映在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虽说这不过是一篇处女作，但他确已指出了一条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截然不同的研究方向。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私有制是无须论证的当然前提，是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唯一可能的形式。恩格斯则首先提出了私有制本身的合理性问题，并试图从私有制包含的矛盾及其历史发展中论证其灭亡的必然性。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竞争是人类自由的表现，它可以消除垄断和其他经济弊端。恩格斯则把竞争作为考察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主要范畴，指出竞争和垄断相互补充，并且导致商业危机，激化阶级矛盾，证明"它是一个孕育着革命的规律"。恩格斯的批判贯穿了下列原则。(1)革命批判原则。他敢于否定被资产阶级神化了的事物，因而能够超越市民社会的狭隘眼界。(2)历史主义原则。他用历史的眼光考察私有制和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承认自由资产阶级和其学派的历史进步性。(3)矛盾分析的原则。他通过揭示经济范畴的矛盾和转化来阐述经济运动的规律。所有这些，都使马克思受到某种启示。

---

① 例如，我们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可以读到这样的话："假如犹太人承认了自己这个实际本质毫无价值，因而尽力消除它，那他就会摆脱自己以前发展的范围，直接从事于人类解放，为反对人类自我异化的极端实际表现而奋斗。"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6页。

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成就并不重要。[1] 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没有区分政治经济学中的古典学派和庸俗学派，也没有接受劳动价值理论。他同当时其他社会主义者一样，认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症结是政治经济学所宣布的原则(劳动价值学说)在资本主义实践中受到破坏，而没有更深入地揭示这种学说的内在矛盾。这是因为，他仍然受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把主要着眼点放在揭露私有制的反人道性质上。和马克思一样，他的思想发展的下一阶段的任务，将是清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

思考与讨论

1.《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主要影响。
2.《德法年鉴》时期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演变的影响。
3.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最初批判的意义及主要成果。
4.马克思恩格斯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的比较。
5.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世界观的第一次转变时的思想特点。

① 恩格斯本人于1871年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谈到了反对重印该文的理由，认为"这篇文章已经完全过时了"，"只有作为历史文件它才有意义"。

第三章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的第二次转变——向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

《德法年鉴》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上已经从唯心主义转变到唯物主义，在政治上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到共产主义。从这以后开始了他们在哲学世界观上的第二次转变，即向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阶段。如果说第一次转变由于在理论上借助于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所提供的强大推动力还比较容易的话，那么，第二次转变则因前无古人而异常艰难，每前进一步都要进行理论开拓，因而首先需要真正批判的世界观。

在 1844 年和 1845 年这两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关键年头里，马克思恩格斯在通向新世界观的道路上突飞猛进。马克思起初把自己的思想概括为一种独特的以异化劳动为中心的人本主义，但在批判鲍威尔思辨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又逐渐偏离了它，开始另辟蹊径向历史唯物主义接近。在批判李斯特的手稿中，发现了物质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所以他不久就能写下了11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制定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恩格斯的思想基本上是与马克思同步发展的。他与马克思合写了《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共同完成了哲学中的伟大变革。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的最后关键性的几步是很有意思、很有教益的，它将把我们带进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创造的实验室，使我们

得以窥见（辩证）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诞生的秘密。

第一节　《1844年手稿》构成马克思主义完整世界观的最早雏形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1844年手稿》）大约写于6至8月间。它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带有明显的过渡性，既有许多新思想的闪光，又留有不少旧思想的印记。《1844年手稿》集中体现了马克思转向经济学研究之后在理论上获得的一系列进展，是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第一次综合和作为完整体系的最早的雏形，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①

一　异化劳动理论的提出和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胚胎的形成

1．异化劳动理论

《1844年手稿》是马克思在巴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思想结晶。它受到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的明显影响，但在思想深度和内容的广度上却大大超过前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时都已从宗教和哲学领域深入到社会经济领域，开始从经济理论上剖析资本主义社会。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形成的意义是重大的，

---

① 这份遗稿于1927、1929年用俄文发表时编者加了"《神圣家族》的预备著作"的标题，1932年全文以德文原文发表时被冠以现在这个书名，书中有些标题也是编者加的。由于手稿残缺不全(少12页)，所以在它是3篇独立的手稿还是1篇完整的手稿问题上看法不一。由于手稿思想极其丰富复杂，所以它发表后注家蜂起，众说纷纭，成为当代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焦点。评者或褒或贬，评价大体有三：(1)认为它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高峰；(2)认为它是不成熟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作品；(3)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著作，是哲学中革命变革的起源。

因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最牢固的理论基础。

《1844年手稿》是马克思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同时又是一部卓越的哲学著作。马克思运用他当时所掌握的哲学观点来概括其经济研究成果，这使他能够高屋建瓴地从哲学上考察劳动及其结果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从方法论上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使问题远远超出了经济本身的范围。这本书所取得的哲学成就要比经济学成就大得多，但二者在内容上是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的，例如异化劳动就是这样的一个哲学经济学范畴。

异化劳动概念是贯穿《1844年手稿》的基本概念，是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批判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获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它揭示了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反人道性质，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从这一方面说，“异化劳动”起着经济范畴的作用。同时马克思又运用这一概念来剖析资本主义，揭示私有财产的本质、起源和发展规律，论证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从这一方面说，“异化劳动”实际上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理论的中心点，起着哲学范畴的作用。

根据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全面阐发的异化劳动理论，在人类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即私有制阶段上，人的劳动创造物采取了同人相对立的形态，成为统治着人的生命活动的异己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异化达到了顶点，其表现形式有如下四个方面。

（1）劳动产品和工人相异化。工人的劳动生产物成为不依赖于劳动者的独立力量，以至于他们生产得越多，他们占有的产品就越少，而反对他们自身的异己力量就越大。劳动产品的异化表明了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对抗性和剩余劳动资本化的趋势。

（2）劳动本身与工人相异化。产品异化的根源不在于分配，而在于生产活动本身的异化，这是劳动者的自我异化。劳动对于

工人来说完全是外在的东西，他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和精神的力量，而是否定自己，从事着非自愿的、折磨人的、强制性的劳动。

（3）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把自由自觉的活动看作人的类本质，把这种自由劳动所创造的产品看作是人的对象化的类本质或人化的自然界。人的活动和劳动产品都成为人的异己的本质，这就表明人已经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了。

（4）人的产品、活动和类本质的异化所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人同人相异化。产品不属于工人，只因为它属于资本家。劳动给工人带来了痛苦，但给别人带来了享受。人同人的异化表征的是私有制社会中的阶级分化状态，它表明人们之间的各种异化关系在不断地生产出来。异化劳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社会的两极分化：一极是资本家的奢侈，另一极是工人的赤贫。

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呢？它和私有制是什么关系呢？马克思认为，起先是外化劳动产生了私有财产，“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①]马克思指出了私有制度与异化劳动的历史暂时性，指出了二者关系的辩证转化。最初的异化劳动与以雇佣劳动为表现形式的异化劳动在产生根源上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以发达的私有制为基础的，而二者的共同根源则是人类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高度，因此人的本质力量的发挥只能采取异化的形式。既然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二者又都是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的必然的、暂时的形式，因而扬弃异化劳动必然与消灭私有制联系在一起。通过对异化劳动的产生、发展和扬弃的研究，马克思获得了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但这种认识仍然披着人本主义的外衣。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页。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区分了异化劳动与对象化劳动，还区分了现实的经济异化和意识等等其他领域的异化。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是现实劳动的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对象化劳动是指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占有，这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一般的劳动。异化劳动是指私有制下抽象的、创造价值的劳动，这是劳动的特殊社会形式,需要扬弃的正是这种劳动的异己的社会性质。扬弃劳动的异化并不像资产阶级学者所歪曲的那样是要取消一切劳动，劳动异化也不是人类永远摆脱不了的命运。这里实际上已提出了劳动的二重性问题，并隐约地涉及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问题。马克思还指出，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它是意识的异化的基础，并决定了其他一切异化。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正反两方面的分析以及对各种异化形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的分析，从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高度获得了对社会结构的较深刻的认识。

异化劳动理论使马克思得出了革命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①。

2．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胚胎

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和《巴黎笔记》中第一次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古典经济学把劳动提高为唯一原则，揭示了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探讨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如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反比例关系，但正是从这里暴露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矛盾，证明了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资产阶级经济学虽然推崇劳动，却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反而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它从私有制的存在这一事实出发,却没有说明其本质和起源。它把资产阶级社会当作一般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1页。

"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后的根据"。"作为资本家的科学自 白 和科学存在"，这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本质。在方法论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总是让自己处于虚构的原始状态"，"不理解运动的相互联系"，因而不能在偶然的外部情况中发现必然性。①

马克思第一次系统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大阶级的经济生存条件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援用古典经济学的一些范畴来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他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再产生出来的劳动与 资 本 的 矛盾，指出由于劳动与资本的分离和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成了商品，工人的生存被归结为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的存在条件。他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起杠杆作用的竞争规律，认为竞争必然带来生产过剩的弊端，引起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并导致社会生产由竞争走向垄断。他还分析了私有制形式的变化，认为资本家对土地所有制者的胜利是私有制运动的必然的发展，并且为"真正人的和社会的所有制"准备了条件。

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以及阶级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开始了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最初阶段。与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不是从资本而是从劳动出发的。他把劳动看作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把资本看作是同工人相对立的积累起来的别人的劳动。他对收入的三个来源作了平行的分析，用阶级斗争来说明各种收入的确定：工资和利润的分割取决于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地租则取决于租地农场主和地主之间的斗争。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现实的经济过程变成抽象的范畴体系不同，马克思强调要"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即从异化劳动的现实状况出发。他提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现实的经济关系，研究私有制下各种经济现象的规律，例如劳动、资本、地产三者之间的分离，交换与竞争以及竞争与垄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89、90、134页

断之间的本质联系。

然而，马克思是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研究经济学的，因而哲学和伦理的成分更甚于科学的成分。他企图用异化劳动理论来揭示私有制的矛盾，但由于这个理论着重于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关系，要求从人的本质出发说明私有制的不合理性，因而毕竟只能解决对私有制的价值评判，而不能达到对私有制本质的科学阐明。他从哲学人本学的角度看待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因而他看到的仅仅是这一学说的敌视人的性质，其意义仅限于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和批判。后来在《哲学的贫困》中他才明确地肯定它"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这说明马克思这时的经济理论还是不成熟的，重要的是他以此为开端迈出了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步。

二　对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的经济学哲学论证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立场在《1844年手稿》中得到了理论论证。他借助于异化劳动理论，从哲学上证明了消除异化劳动、扬弃私有财产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运用了由他彻底发挥了的人本主义原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人道性质作了批判，并站在人类发展所能达到的理想高度来展望共产主义的远景。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它不是取消而是保存以往人类发展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它不是否定个性，而是由联合起来的个人以社会的方式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它使自然界向人生成，成为真正"人化的自然界"，达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① 马克思在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里为共产主义规定的任务比仅仅消灭私有制要丰富得多，他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向人类理想状态的运动，目的是达到高度完善化的人。这种带有理想的、伦理性质的对共产主义的哲学人本学论证，还不是完全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

不过，马克思已经开始从经济学上来科学地论证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质，肯定它取代封建社会是进步的，同时又指出它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他通过对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发展的分析，证明了共产主义是历史的辩证法运动的必然结果，指出其深刻的根源是在经济中，它将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① 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统一关系，二者必定要经历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二者的对立——二者各自同自身对立的矛盾运动。“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限，就必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因此，“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②

马克思从哲学和经济学上得出了否定私有制、对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结论，他反对用抽象的原则（如平等）去作共产主义的基础。他考察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共产主义学说，着重批判了平均共产主义的思想。平均共产主义虽然否定私有财产，但却把共产主义建立在否定个性和文明、禁欲和普遍贫穷的基础上，这只不过是把私有财产普遍化、平均化而已，并未能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主义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崇高目标，把共产主义建立在个性的丰富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上。马克思对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6、131页。顺便指出，马克思这时对“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的使用与后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两阶段的次序恰好是相反的，他把社会主义看作历史发展的最高形式，而把共产主义看作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然环节。

产主义的阐发尽管是使用人本主义的词句，还带有一定的思辨色彩，但其中有许多思想是相当深刻的，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三　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评价和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初步改造

《1844年手稿》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关系，它提供了改造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重要作用的实例。

1. 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评价

《1844年手稿》对费尔巴哈的学说作了过高的评价。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和《哲学改革纲要》是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著作，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打下基础。他的功绩是：（1）揭示了唯心主义哲学与宗教的本质联系；（2）创立了人本唯物主义；（3）批判了关于否定的否定思辨观点。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斗争中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马克思完全有理由高度肯定他的功绩，但他却常常把自己作出的新贡献也默默地记在费尔巴哈的名下。这是需要加以区分的。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思想作了引伸，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它。例如，他把费尔巴哈的“人类”概念理解为“社会”的概念。这样，类意识就是社会意识，类存在就是社会存在，类生活就是社会生活，类本质就成为社会本质，而社会主义就是使人的社会本质获得全面实现的社会制度，所以他认为人类概念直接“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只要证明了人是类存在物，也就等于证明了社会主义是人的本性所要求的。费尔巴哈以人具有类意识来论证人是类存在物，马克思则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

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① 费尔巴哈直接从人的自然规定中引出人的社会性，马克思则从生产活动中引出人的社会性。不过这里的生产劳动还不是现实的劳动，而是本来意义上的思想化的劳动，现实中存在的是与人的社会本质相脱离的异化劳动。可见他的论证方法仍然受到费尔巴哈思想模式的影响。

根据费尔巴哈的观点，人的本质是多种规定的统一，一切本质关系都是这个统一的各种不同的类型和方式，而宗教异化却破坏了这种统一，那么在其他领域是否也存在背离人的本质的异化现象呢？马克思循着这一思路，从宗教异化进展到政治异化，又进一步进展到经济异化。他正是按照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论的内在逻辑向前推进的。马克思把经济异化作为一切异化的基础，并据此把历史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和自我生成的历史，人类必须经历一个异化及其扬弃的过程才能达到消除一切异化的共产主义。《1844年手稿》中脱胎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方法的异化劳动理论，在内容和结论上都已大大超越了费尔巴哈本身。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理论力图达到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解，寻求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表达。然而由于人本主义方法所固有的局限性，他还未能做到这一点。

《1844年手稿》大大发展了费尔巴哈关于人和自然界、人和人相统一的思想。这种统一的人类学前提在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时自然现象由于进入人的生活也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二者不是异己的，而是统一的整体。例如男女之间的关系就体现了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推而广之，人的感性生活包括人的感觉器官的发展都体现了这种统一。马克思强调指出了上述统一的社会前提在于生产。他说：“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97页。

界”。① 物质生产是历史地发展着的，人和自然界以及人和人的统一也是如此。不断发展着的生产决定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构成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基础。马克思同时揭示了这种统一的矛盾性质。他指出人类学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的发展，而社会发展又取决于物质生产的进步，所以社会生产的协调进行是整个人类和谐发展以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发展的条件。然而在私有制下，异化劳动使自然界也在劳动环境中同人相异化了。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才能使人和自然界以及人和人之间的矛盾获得真正解决。

《1844年手稿》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应用是创造性的。它是从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中一个必然要经历的中间环节。它所具有的双重因素表明了正在形成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复杂性。

2．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初步改造

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克服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和保守倾向，同时又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要素来加深和发展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这使他远远超过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沿着一条独创的崭新的思想路线不停地前进。《1844年手稿》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做了深刻、系统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认为这样做之所以必要，是由于布·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对它完全采取了非批判的态度，而费尔巴哈的批判又没有剥出其中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历来重视黑格尔辩证法中所包含的批判的、革命的要素，为了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更有必要清理和改造它。

马克思首先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批判。他指出，黑格尔不是把自我意识的异化看作人的本质的现实异化的反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在他那里，现实的异化反倒成了自我意识异化的现象，这是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根本颠倒。黑格尔把国家权力、财富等等看成精神性的东西，看成思想本质，这样，国家私有财产等的现实异化仅仅变成了抽象思维的异化。这实际上起了掩饰现实的非人化性质的作用。异化的扬弃在黑格尔那里只不过是扬弃异化的思想，这丝毫也没有触动现实的异化。黑格尔还认为，自我意识在自己的异在本质中也就是在自己身边,认识到异化就等于扬弃了异化。这就完全暴露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要素是虚假的，它与其说是批判现实，不如说是肯定现实。

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同时，马克思十分注意他的辩证法思想。首先，他肯定了精神的能动性原则。黑格尔把概念描绘成思维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这些环节联贯成为概念的逻辑运动的体系。这样，他就从概念的相互联系中来考察概念，用概念在思维中的运动代替了僵化的形而上学的抽象，赋予概念以能动性。马克思认为，如果把这种精神运动贯彻到底，就必须放弃抽象，达到它的对立面的本质即自然界。

其次，他批判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劳动是人的自我创造的过程的思想，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实践原则。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成一个过程，把劳动看着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但他没有看到异化劳动否定人的本质,并且,他所说的劳动只是抽象的精神劳动。马克思把自由自觉的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区分了劳动异化和劳动对象化这两个方面，提出了生产劳动过程主体与客体统一的辩证过程的思想。他把人的生成看作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能动的实践活动把人和自然界联系起来，既改造了客观自然，又创造了主体自身，甚至全部所谓世界史也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自我诞生的历史。

最后,他吸取了黑格尔关于历史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的思想。黑格尔用否定之否定的抽象公式取代现实的历史是唯心主义，但他的关于否定性的辩证法却包含着批判的革命的要素，为历史运

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例如，在《精神现象学》中就隐藏着对宗教、国家、市民生活等整个领域的批判要素。马克思致力于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过程联系起来，把绝对观念的必然的有规律的辩证运动转变为历史辩证法。

四　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初融合

从《1844年手稿》明显地可以看出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这些欧洲最先进的社会科学思想的联系。他把这些思想材料汇合、纯化并综合成为一个新的体系。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人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1844年手稿》作为马克思主义胚胎发育的一个阶段，确实已经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完整世界观的最早的雏形。它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在其形成过程中就是相互作用的，并且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共同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融合突出地表现在第三手稿中。第一手稿剖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的观点，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第二手稿进而深入分析私有财产的关系。第三手稿开始交错论述三个知识领域的各种问题，马克思把问题分成相互关联和综合的七点，它们涉及私有财产的本质、共产主义的三种形式、人的需要、货币、对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的批判、费尔巴哈的功绩、蒲鲁东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生产和分工以及全书的序言。马克思把这些不同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得心应手地从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最后他从异化劳动转到分工中去寻找历史的基础。这表明了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观点的相互影响和综合使他日益接近于自己的发现。

《1844年手稿》作为创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最初尝试还不能算是成熟的，但从其内容的丰富性来看，通过思辨的、人本主义的词句和术语，我们看到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前的阵痛和酝酿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真实思想过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

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的钥匙。

第二节 《神圣家族》接近于发现历史唯物主义

1844年8月底，恩格斯到巴黎拜访了马克思，这次历史性的会晤奠定了他们毕生携手并进的思想基础。《神圣家族》① 是他们合作的一个理论成果。这部批判性的著作是直接针对布·鲍威尔一伙的《文学总汇报》的，目的是帮助人们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它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以及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方法。作为批判武器的是日趋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这使全书在众多分散的具体问题的阐述中仍能保持思想的严整性。

一 对思辨哲学方法及其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

《神圣家族》对思辨哲学的批判是《1844年手稿》的直接继续。在那里，马克思已经宣布要对德国的批判运动同黑格尔的关系作一些说明，指出以鲍威尔为代表的一部分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仍然拘泥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采取了完全非批判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宣告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彻底决裂，并且把思辨唯心主义看作正在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危险的敌人；因为它把现实的一切都消融在自我意识这个范畴之中，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工人群众以及政治激进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广泛传播的情况下，鲍威尔等人也转而宣扬一种唯灵论的、纯精神的社会主义，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和文字游戏。设“社会”为x，那么鲍威尔等人所讲的“社会”就是3x、x^2、$\sqrt{x}$这样的抽象公式。他们的“社会主义”

① 《神圣家族》副标题是“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该书写于1844年8月底至11月，1845年2月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只限于宣扬基督教关于精神自由、理论自由的教义，把社会主义变成了少数批判家的大脑活动。显然，这是与实际地进行变革现实的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它只会鱼目混珠，干扰和破坏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

鲍威尔一伙的所做所为，无论是对福音书的解释，还是对群众、实体、物质的批判，都是以自我意识哲学为依据的。他们认为一切事物都起源于无限的自我意识并在其中找到自己存在的根据。《神圣家族》集中批判了这种唯心主义哲学。首先，自我意识这个范畴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它不过是用“无限的自我意识”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已。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作为二者的矛盾统一的绝对精神，是黑格尔哲学中的三个因素。鲍威尔抽取其中的一个作为自己的哲学出发点，并加以片面地发展。其次，自我意识哲学把黑格尔哲学庸俗化、漫画化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是绝对精神的人格化，并不是纯个人的主观意识。而鲍威尔却一方面保持自我意识创造世界的神性，另一方面又把它与哲学家个人即他本人的意识混为一谈，结果就使一切创造活动和主动精神都归之于鲍威尔及其一伙的有意识的批判活动了。最后，这种自我意识哲学必然导致在现实中把个人和群众、精神和物质绝对对立起来。把自我意识与实体绝对对立的原则贯彻到底，必然要排斥存在、自然和人本身，排斥一切感性活动和物质存在。因为承认自我意识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绝对的存在，就不能承认在它之外的任何实体，而只能把实体看作自我意识的异化的表现。同样，承认自我意识是历史的创造原则，就必定要否认工人、群众的创造作用。由此可见，自我意识哲学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自我意识哲学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变种，其特点是把一切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都纳入纯粹抽象思维的框子来加以考察，并宣称它解决了一切矛盾。它是如何把现实问题变成思辨理性问题的呢？马克思以果实为例揭露了这种思辨方法的秘密。思辨方法

的第一步是把概念实体化，使抽象概念成为脱离感性事物的独立实体，它决定感性事物的本质，而现实的感性事物则是它的样态。这样，现实存在的苹果、梨等就成了果实这个实体的虚幻的本质。思辨方法的第二步是把实体主体化，即把实体看作是主体在自己的生命发展过程中自我设定的对象，不同的实体只是主体生命过程中千差万别的环节。例如“果实”一旦变为绝对主体之后，就把自己确定为苹果或梨，其差别只是“果实”的内在差别的实现。借助于具体概念，抽象概念就实现了从思辨世界向现实世界的过渡。由此看来，思辨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就是承认一切概念的独立存在，把它了解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实体和主体的统一，把一般概念看作是内部过程和绝对的人格，因而它具备从自身创造出整个世界的一切条件。这种方法虽然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把握到真实的情况，包含着辩证法，但却完全是头足倒置的。它把人们认识中的思维现象当成真实事物的产生过程，这无异于宣扬宗教创世说。

神秘的思辨方法必然导致神秘的历史观。思辨哲学把人类历史归结为自我意识的异化和扬弃的历史，归结为绝对精神在自身内的思辨循环。历史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自我发展的过程，人类仅仅是它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人民群众和英雄都不能以历史的创造者自居，即使是体现绝对精神的哲学家也不能干预历史的发展。鲍威尔取消了黑格尔体系中的绝对精神，但又保留了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神性，然后他又宣布他个人就是这种自我意识，这样一来，历史的发展就将是由鲍威尔及其一伙一手促成的了。

二　从异化史观向实践观点的过渡

对思辨方法和唯心史观的批判使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怀疑用异化理论来说明历史的科学性，并最终放弃了异化史观，转而用实践观点来说明历史。

异化理论是德国特有的思想方式，是否定之否定规律在主体与客体关系上的特殊运用。对异化主体和异化客体的不同解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异化理论。黑格尔是绝对精神的异化论，鲍威尔是自我意识的异化论，费尔巴哈是人的本质异化论，马克思则是劳动异化论。这里面尽管有唯物、唯心的分野，但在历史观上都企图用异化和异化的扬弃来阐述历史运动的规律。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以异化劳动来论证私有财产的产生、发展和灭亡以及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一理论探索对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起了桥梁作用，但本身还不是科学的。劳动的对象化为什么在私有制下变成了劳动的异化？异化劳动遵循着怎样的法则走向自己的否定？人类的不变本性能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吗？这些问题都不能从异化理论本身中得到解答，异化的事实倒应该由别的原因来说明。可见，异化理论不能成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

《1844年手稿》通过区分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表达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矛盾的思想，初步阐明了劳动和工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那里强调的是劳动的否定性质。《神圣家族》则着重从肯定方面来研究劳动和实践，由此而接近了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的观点。马克思指责鲍威尔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认为只有认识了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才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同时，实践概念的内容也更丰富了。它不仅包括工人的生产劳动，还包括市民社会中人们经营工商业的活动，以及革命阶级变革社会的革命活动等等。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社会实践的功利性质，考察了实践活动既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又能动地创造历史的双重性质。他们强调指出：思想必须从属于利益，而不能和利益相背离。正是利益推动着人们的社会实践，正义和美德的思想只是装点历史的花环。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历史本身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们的活动。

《神圣家族》放弃了异化史观，但并没有放弃异化概念。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和鲍威尔的异化学说的唯心主义和神秘性，强调“物质的异化”以及群众自我异化的实际后果——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使工人群众不得不以外在的即物质的方式与它们作斗争，用实际的具体步骤和行动来消灭它们。用异化概念来揭露资本主义仍不失为一件方便的武器。这一点直到《资本论》还保留着。《神圣家族》比《1844年手稿》的进步之处在于：实践概念已经取代了异化概念的中心地位，异化概念主要用于现象学的描述，再也不起构造历史的思辨之砖的作用了。

三　从抽象人的观点向现实人的观点转变

人的问题是青年黑格尔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黑格尔用绝对精神代替人，鲍威尔把人看作抽象的自我意识。费尔巴哈坚持以自然为基础的人，否则就是抽象的人。马克思转到唯物主义立场以后接受了这个观点，他把工人、资本家等等现实存在的人看作是抽象的人，而把理想的人看作现实的人。《1844年手稿》就是持这样的观点。不过，与费尔巴哈把人仅仅看作有意识的生物实体、仅仅从两性关系上理解人与人的关系不同，马克思深人考察了社会经济领域和历史领域，从而对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把劳动的产物当作人的对象化了的本质。由于在人对自然的关系上提出了以劳动为中介，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感性受动原则就得到了根本化的改造和扩大，被赋予了主体的能动原则。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然制约性具体地表现为人的社会制约性，人是能动的社会存在物。这个新观点使马克思对于人的理解在内容上更加具体和现实，不过，在形式上暂时还没有摆脱费尔巴哈抽象人道主义的羁绊。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当作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

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在《神圣家族》中开始了。①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现实的人是从事实际活动并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如具体的工人、农民、资本家等等。脱离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的人是抽象的人。费尔巴哈以自然为基础的人是抽象的，《1844年手稿》引进了劳动和社会，但从抽象一般的劳动和社会出发仍然会引出抽象一般的个人，只有对现实的劳动和社会作出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才能把握生活在其中的现实的人。《神圣家族》有时仍然把现实的人即丧失了自己的对象和自己的物质生活内容的工人叫做抽象的人，而把抽象的人即重新争得实物世界、实现了自己本质的人叫做现实的人。这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还没有最后制定出来。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已经逐渐向这个出发点接近，日益摆脱抽象人的观点。

这一转变的突出表现是：（1）他们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马克思指出，所谓自由的人性不过是承认利己的市民个人以及构成这些个人的生活内容；所谓普遍人权不过是承认利己的市民以人权的形式宣布对自己的自然基础即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中的人的确认。（2）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居住在英国地下室的和法国库房阁楼里的经验的人”，并且认为正是他们才是使用实践力量创造活生生的历史的人。（3）他们强调人的“实物本质”，用人对物质生活资料的社会需要来说明人的本质。马克思把人的生存资料的丧失看作是人本身的丧失，而消灭人对自己的“实物本质”的实际异化关系将使人重新占有实物世界，这就把现实的人与其社会生存条件直接联系起来。（4）他们已经接近于制定出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概念，开辟了用生产关系的总和来说明人的本质的道路。在《神圣家族》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已经先于整个理论体系而得到最初的阐明。这些都无疑地促成了马克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4页。

恩格斯抛弃对抽象的人的崇拜而转变到现实的人的分析。

四 对历史唯物主义某些基本原理的最初阐明

《神圣家族》提出了生产资料的物化问题。马克思说："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① 这种仍然带有人本主义色彩的论述，表明了马克思是如何接近生产关系这个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核心概念的。他把人与物质生活资料相联系，看到了隐藏在实物背后的生产的社会关系。当然，这还不是科学的生产关系概念，只有把生产过程中的一切社会关系如私有制、分工、交换价值、竞争、雇佣劳动等都放到现实的历史联系中加以研究，才能制定出科学的生产关系概念。而《神圣家族》已向这个方向起步了。马克思在评价蒲鲁东的经济学观点时基本上肯定了劳动价值论，他赞成蒲鲁东把劳动时间看作人类活动本身的直接定在。这种接近劳动价值论的方式与接近生产关系概念的方式是密切相关的，表现出马克思的思想正在发生质的转变。

《神圣家族》提出了把生产方式作为理解现实历史的基础。马克思指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思维和幻想的天国中，而在尘世粗糙的物质生产中。他把一定的历史时期同一定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这就接近了承认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思想。对物质生产的深入考察，必定会揭示出社会生活的物质结构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建立起全新的历史观。

《神圣家族》继续阐发了早已确立的市民社会（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国家（上层建筑）的思想。马克思指出，现代国家是由于自身的发展而不得不挣脱旧的政治桎梏的市民社会的产物，正是市民生活巩固了国家，只有政治上的迷信才会以为是国家巩固市民生活。马克思初步考察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历史变迁，指出现代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页。

发达的国家的基础是发达的市民社会，它们之间的对立是古代公法团体和奴隶制的典型对立的完成。因此马克思把市民社会和国家等都看作“人的本质的客体化”的提法不见了，这一微妙的变化说明他已不满足于人本主义的肤浅表述。

马克思在评论法国革命时发挥了这样的见解：“思想从来也不能使我们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使我们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①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的有效活动范围，但社会意识也不是消极被动的。例如，法国革命就产生了超出当时的社会存在的共产主义思想。他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已有深刻的理解，但对社会存在概念尚未作出明确规定。

《神圣家族》反复论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这是与鲍威尔论战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在历史活动中重要的是行动着的群众，是他们的实践活动和他们的实际利益，而不是什么神秘抽象的观念，从而肯定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参与历史创造的群众的队伍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步扩大的，这意味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力量和作用日益增强。马克思还对群众作了历史和阶级的分析。群众的概念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从来没有什么抽象不变的群众。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群众，例如参加法国大革命的群众中既有特殊的、有限的资产阶级群众，又有工人、农民和其他阶级的群众。哪一部分群众的活动直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呢？马克思认为，只有得到历史承认的那部分群众的利益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它决定了当前历史发展的性质。在马克思看来，现在创造历史的群众已经不是象 18 世纪法国革命时代那样的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

《神圣家族》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2页。

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作用归之于无产阶级，他坚定地认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他看到英法无产阶级中已有很大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为什么唯有无产阶级才负有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呢？首先，马克思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来论证，而不再从“人的完全丧失”引出“人的完全恢复”来作论证了。无产阶级由于其自身的生活条件而必然在历史上有所作为，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它的目的和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因而无产阶级必然会成为解放全人类的力量。其次，马克思分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构成了统一的整体，由于二者在矛盾中所处地位不同，因而在解决这一矛盾时所起的作用也不同。资产阶级是保守的、肯定的方面，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否定的方面，从私有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无产者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无产阶级的胜利将使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也趋于消灭。最后，马克思还从经济角度论证了这一原理。“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无产阶级执行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① 这是马克思在巴黎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后在理论上取得的新进展。由于他在经济学上还刚刚入门，所以这时还不能像《资本论》那样严格而科学地进行论证。

我们看到，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一些基本原理已经提出来了，对思辨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已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人本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虽然尚持赞同态度，但在实际内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页。

上已经大大超越了它。这一切都表明他们已经接近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革的临界点，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处于诞生的前夜。

第三节　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点的制定

1845年春天，当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再次与马克思会见时，他惊异地发现马克思已经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已经草拟了对他们曾一度崇拜的费尔巴哈的批判提纲，制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从1844年11月完成《神圣家族》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间不过数月。然而就在这短暂的时间内，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终于实现了从人本主义历史观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飞跃。这一重大的理论突破是怎样发生的呢？最近发现的马克思大约写于1845年3月的遗稿《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以下简称《评李斯特手稿》)①给我们提供了思想见证，它表明马克思最终发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从而解决了历史发展的物质动因问题。

一　物质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发现

李斯特是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的先驱。为了论证德国实行保守贸易的必要性，他提出了一个"生产力理论"来取代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这个理论歪曲了生产力概念，使生产力成了一个从基督教、报纸到历法和钟表等等的无所不包的东西，它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追求财富而又否认财富的市侩精神。

李斯特的生产力概念在经济学上混乱不堪，在哲学上则是唯心主义。马克思批判了它，揭示了生产力概念的科学内涵。马克

① 这篇草稿是1971年在马克思长女燕妮·龙格的孙子长期保存的马克思遗稿中发现的。

思批评李斯特把生产力看作人的本性的提法，批评他使生产力表现为独立的精神本质的幽灵，表现为纯粹的人格即上帝，似乎生产力是由人的本性中产生的目的即目的本身，而交换价值、货币等生产关系则总是外在的。马克思指出，为了破除美化生产力的神秘灵光，只要指出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都是生产力就够了。这表明马克思开始把生产力确定为客观的物质力量，与他在《1844年手稿》中把生产力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评李斯特手稿》中，马克思把“交换价值”、“工业”、“劳动”理解为生产关系的表现。他认为，生产不能脱离生产关系而发展，“生产力从一开始就是由交换价值决定的”。废除私有财产只有被理解为废除“劳动”才是现实的，而“这种废除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的活动才有可能”[①]。这里加引号的“劳动”即是前面所说的异化劳动，实际只指劳动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在这里把它与作为生产的物质活动的劳动区别开来。在另一个地方，马克思明确地反对“把工业唤起的力量同工业本身即同工业给这种力量所提供的目前的生存条件混为一谈”[②]，这就明确地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区别开来了。由于作了这样的区别，就预示着表达历史唯物主义内容的新的术语就要应运而生了。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必将突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桎梏，而生产关系则应当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些思想尽管还没有获得定型的表述，然而却发出了新的历史理论即将临产的信息。他说，“工业用符咒招引出来（唤起）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工业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对工业的关系完全一样。今天，这些力量仍然是资产者的奴隶”，明天，它们将砸碎自身的锁链，“炸毁资产者用以把它们同人分开并因此把它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63页、255页。

② 同上，第259页。

们从一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变为（歪曲为）社会桎梏的那种锁链"，从而表明自己是人类发展的承担者。①

马克思在批判李斯特的过程中找到了理解历史进程的钥匙。他把生产力的发展与历史的进步联系起来，这就找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基础。他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发现了物质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冲突决定着历史的发展，从而发现了历史运动的根本规律。这一重要的理论发现使他再次不必求助于人的本质和同它相异化的外部环境之间的冲突的人本学解释了。经济学的研究使他打开了社会历史的大门，他完全可以从经济关系出发来建立自己的科学的历史理论体系了。与此同时，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看法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他认为经济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古典经济学的实际出发点是市民社会。对市民社会的解剖以及对它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分析可以借助于古典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促成了唯物史观的最初形成。《评李斯特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上的地位就在于此。

二 论证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新思路

几乎与马克思加速制定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同时，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也日趋成熟了。他在1845年3月完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写作。这本书的突出之点在于从新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

恩格斯在书中研究了英国工业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的成长过程，得出了差不多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他高度评价了英国工业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产业革命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市民社会结构的全面变革，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而它的最重要的产物是造就了英国无产阶级。从18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8—259页。

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工业革命的发展是英国工人阶级产生、发展并日益陷人贫困状态的决定性原因。工业革命造就了一个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强大的资产阶级，同时也形成了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利害冲突是英国社会革命的深刻根源。从英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可以看到，工人阶级在政治和社会运动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恩格斯异常清晰地洞察到历来被忽视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是阶级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

恩格斯考察了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阐明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客观必然性。他指出，只有工人阶级的现实处境和生活状况才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的基础和出发点。他严厉控诉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带来的悲惨状况和生活的不断贫困化，揭示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必然导致资产主义生产方式走向灭亡。无产阶级由于其客观地位在整体上是一个革命的阶级，它有足够的力量去推翻剥削阶级，并将取代资产阶级而担当起领导历史前进的任务。

恩格斯研究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各种形式，分析了英国的宪章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认为只有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他把工人运动看作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的必然表现。宪章运动虽然比较落后，比较不发展，但却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它反映了道地的无产者的要求。其缺点是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不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而欧文派的英国社会主义者虽然企图超越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之上，但实际却不看到无产阶级的力量，把无产阶级看作愚昧落后的受苦群众，因而他们除了争取社会舆论外，找不到改变现存制度的有效途径。恩格斯认为，克服英国社会主义的局限性的最好办法是使之与工人运动打成一片，通过宪章运动的锻炼来消除自己的资产阶级因素，创立真正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宪章主义者作为工人运动彼此分裂的两派必须

结合起来，但必须在新的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实行这种结合，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任务。

就这样，恩格斯从研究英国工业发展的进程、考察工人阶级状况和总结工人运动入手，论证了工人阶级按照历史本身的辩证法必定要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和社会主义的创造者。和马克思着重于抽象而精深的理论探讨不同，恩格斯用大量的事实材料来证明自己的结论，从而表明了他通过另一条不同于马克思的研究道路也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应当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作为恩格斯向唯物主义理论体系飞跃的界碑仍然是存在着若干问题的，例如该书就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影响。而要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不批判地克服费尔巴哈哲学是不可能的，这艰难的一步是马克思首先迈出的。

三　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着手批判费尔巴哈的内在动因是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已经趋于成熟。由于他通过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已经发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规律，这就确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观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青年黑格尔运动的最高理论成就，批判他就意味着在理论上超越他，而且借此还可以系统地阐明自己迄今所获得的一系列观点。

促使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外在原因有两个，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出版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蔓延。麦克斯·施蒂纳的这本书从反面暴露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理论弱点。它以极左的面目出现，鼓吹一种绝对利己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唯一者”的哲学，把思辨唯心主义发展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但是，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仍然戴着神学光圈的类概念的抽象性的批判，对他把人分为符合本质的人和异化的人二重化方法的批判，以及其他指责，毕竟从反面引起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再思考和重新评价。另一方面，莫泽斯·赫斯和卡尔·格律恩等人在1844

年以后，开始从哲学共产主义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转变，把费尔巴哈的美文学的词句和泛爱的空谈这两个弱点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原则，标榜通过爱来实现以人类内在本性的意识为基础的真正人的社会。这种观点像瘟疫一样危及着共产主义的实际运动，这就从实践上暴露了推广费尔巴哈学说的不良后果，使马克思不得不与它划清界限。于是，他写下了供进一步研究用的11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简称《提纲》)，其中的思想在他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全面的展开。

在认识论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一切旧唯物主义一样，都是直观的唯物主义，缺乏能动性原则，不了解人类实践活动的意义。费尔巴哈自称是从现实的自然界和现实的人类即感性世界的具体出发的，但他对感性世界的理解却是片面的。他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外部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又仅仅局限于人本身的单纯感觉。当他的直观和感觉与现实相矛盾时，他就变得束手无策，只好求助于某种“二重性”，即从对眼前事物的普遍直观跃进到对事实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直观，即哲学的玄想。他把感性世界看作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没有看到它是工业发展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这样感性世界就成为一堆僵死的、被动的客体了。这种直观的唯物主义，对现存世界的革命化改造是无济于事的。

在方法论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是从“人”出发，但不是从现实的在历史中活动的人出发，而是从“人自身”即从哲学所理解的抽象的人出发。他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但他忽略了人是实践活动着的人，结果人就成了仅仅从耳垂或他不同于动物的生理特征中引伸出来的肉体的自然的人，而不是社会的人了。诚然，费尔巴哈也说过社会的人之类的词句，但那仅仅是为了证明人们是相互需要的。他把“类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如饮食、男女、思维等等，这就使人的本质成了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

物。费尔巴哈一方面把人的自然属性绝对化，另一方面又把人的社会属性理想化，这就使人成为非现实的、非历史的一般的人。拿这个抽象的人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在历史观上必然会陷入唯心主义。

在社会历史观上，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同时从抽象的一般人出发，也必然使人脱离现实的社会关系，人被抽象化了，作为个人简单总和的社会也同样成了抽象物。费尔巴哈哲学终究不能解决个体与类的矛盾，因为它只能直观地看到一些表面现象，不能揭示社会运动的根本规律。它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是立足于资产阶级立场之上的，因而最多只能以一种新的人本主义的方法解释世界，而不能用它去改造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费尔巴哈没有批判现存的生活关系，他的人本主义意识在于抬高人的地位，客观上却适得其反，成了对现存事物的绝妙的赞扬。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社会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因为他仅仅希求达到对现存事实的理解。

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并未能超过把“思辨的观念、抽象的观点变成了历史的动力”的“德国哲学的历史观”。他关于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学说为建立新的思辨的历史观提供了一个模式。德国社会主义者曾借助于这个人本主义的理论框架鼓吹货币、雇佣劳动等等同样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结果社会主义就变成了反映人的本质的哲学概念，整个历史就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了。显然，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不能建立在这种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同时又是历史所追求的最终极目的这个沙滩上的，它必须在坚实的基地上建立自己的理论大厦。实践观点就是这座大厦的奠基石。

四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制定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基

本制定出来了。《提纲》以唯物辩证的实践宣告了新唯物主义的诞生，以革命实践的观点批判地克服了费尔巴哈消极、直观的人本唯物主义，使实践范畴进入了历史观，进入了认识论，实现了在历史观和认识论上的革命变革。

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产生以前，实践概念已经被许多哲学探讨过了。例如，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就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看法。但是黑格尔把实践解释为观念（即精神）本身的活动形式，人类实践仅仅表现了理性的机巧，所以他只是抽象地表达了实践的能动方面。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的时候，把其中的能动原则和辩证法也一起取消了，对于实践他只是从卑污的犹太商人的活动去理解和确定，并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忽视了社会实践的作用。这是一切旧唯物主义陷入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的根本原因。克服费尔巴哈的局限性，并不意味着要重新肯定脱离人类精神的思维能动性，而是要把能动性原则赋予物质的自然界和人，使它体现为人的实践活动。因为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认识的本质。

在《提纲》以前马克思就对实践的观点有所阐述。《1844年手稿》曾论述了实践在历史和认识中的作用，但尚未把实践概念作为中心范畴来使用。《神圣家族》也论述了实践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指出了思想的实现要靠使用实践力量的人，但实践概念的决定性地位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只是在《提纲》中，马克思才把对实践观点的理论探讨从局部的、零星的阐述转变为全面的、系统的论述，使这一概念在新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它不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也从人和人的关系方面揭示实践的社会本质。社会实践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以致马克思、恩格斯一度把自己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

实践是标志主体同客体的本质关系的范畴，它所包含的基本要素是主体、客体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手段。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实践主体的不是精神、理念，也不是纯粹自然的个人或抽象一

般的人，而是现实的历史的人。现实的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更是社会历史的存在物，要考察人就离不开他们的物质活动条件即他们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这些物质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才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体是社会本身。这种把主体同社会生活条件紧密相联的方法与从抽象人性出发去理解实践的方法是截然相反的。

在马克思那里，规定客体的方法也与前人迥然不同。客体不是理性的抽象，也不是直观的对象，而是实践的对象。对象首先具有客观实在性，但同时它也是历史地和社会地被规定的。客体在主体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属性实际上是以自然属性为基础的社会属性。人们活动的对象化不仅仅是主体能力的结果，同时也是客体自身的特性及其规律的表现。客观世界成为人们认识和改造的客体是一个历史过程。随着人们的实践能力和认识水平的提高，被人们当作直接改造的对象（客体）那部分世界就会扩大。

在马克思那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以实践为中介的能动的关系。人的能动性是通过实践来实现的，它集中体现在人的实践目的和所使用的物质手段上，这是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主观和客观的条件。

实践范畴揭示了人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本质，它阐明了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辩证转化的基本途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确定思维的真理性。在理论范围内无法解决的问题，都能在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因此，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

实践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的基本形式，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现存的社会环境是人们过去的实践的产物；人们当前的实践活动又能动地改变着这个环境，而环境的改变同时也意味着人本身的改变。"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①

实践范畴是从物质范畴过渡到社会存在范畴的中介，又是把认识论和社会本体论统一起来的关节点。《提纲》制定了基本范畴，并宣布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无产阶级，它的使命不仅是解释世界，而且是要改变世界。这就提纲挈领地勾画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第四节　《德意志意识形态》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1845年冬至1846年夏，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了第二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巨著中，他们阐发了自己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该书第一卷批判了黑格尔以后的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的哲学观点，第二卷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通过这一批判，实际上全面总结了青年黑格尔运动，同时也清算了他们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②贯彻全书的中心思想是探讨唯物主义历史观，论证科学社会主义，并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唯心史观。《德意志意识形态》详尽地发挥了《提纲》的中心思想，第一次系统地、全面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它标志着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的完成。唯物史观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页。

② "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以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页。

由此而诞生了。

一 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

要全面地制定和阐述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必须确定它的前提，以便从这个前提出发建构宏伟的理论大厦。而这个出发点同时又应当是历史本身的前提，它能把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前提是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① 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无疑是全部人类历史的首先前提，因此需要确认人们自身的生理条件及人们所遇到的地质、气候等自然条件。但任何历史记载都不仅应当描述所有这些人的自然基础，而且应当研究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改变。因此，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应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因和基础，也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本身，所以，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从事创造活动的现实的个人是唯物史观的前提。这就与那些表面上不谈前提而实际上却把“自我意识”、“类”、“唯一者”等抽象范畴作为不证自明的前提的德国哲学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唯物主义历史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必须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为了深化对这个前提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从生产实践的角度考察了历史关系的四个同时存在并一直在历史上起作用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生产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历史活动，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矛盾，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天去完成它，任何历史观都必须首先重视这个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第二方面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页。

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即物质生活的再生产。正是这种连续不断的生产和再生产构成了历史运动的永恒基础。第三个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伴随着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这两种生产的是社会生活的第四方面，即社会关系的生产。“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活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① 如果把人类的历史与生产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就会发现，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一样长久。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呈现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般地把现实的人、他们的活动及其物质生活条件规定为唯物史观的前提之后，又进一步从横断面上揭示了生产实践的四个方面，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再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生产。他们把这几方面作为全部历史的最基本的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唯物史观的系统阐述。

二　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

在考察了社会生产实践的物质活动和物质联系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接着考察了意识的生产。他们把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概括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的原理，对社会意识的产生、发展和本质作了深刻的揭示。

像考察物质生产时直接从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的生产出发一样，他们在考察意识的生产时，不是从“纯粹意识”出发，而是从实践的、对别人也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开始。语言和意识一样都是由于和人交往的需要才产生的，都是社会的产物，社会性是他们最重要的特性。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页。

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等产物这时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后来，随着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发展，社会意识也日益发达起来，具有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发生以后，社会意识便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外观，它与社会物质生活的关系被弄得模糊不清了。但是，"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意识和精神的生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关于自然的意识，它与生产力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是关于社会的意识，它与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紧密相联。一般唯物主义都正确地把意识看作存在的反映，历史唯物主义则进一步把社会意识看作社会存在的反映。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人们头脑中的模糊的东西无非是他们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即使是对现实的虚幻的反映（如宗教），也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它的客观基础。如果在全部意识形式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揭示了把现实存在和意识对立起来的认识论根源，现在他们又进一步探讨了这种对立的社会根源：如果神学、哲学、道德等等社会意识形式和现存的关系发生了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在现存社会分工的条件下，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这三者之间必然会发生矛盾。要使它们彼此不发生矛盾，只有消灭分工。

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马克思、恩格斯证明了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每一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必然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为什么呢？因为统治阶级是社会中占统治地位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页。

的物质力量，既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必须要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反映出使统治阶级得以维护其统治的各种关系。统治阶级要在物质生产中进行物质统治并决定着整个社会的面貌，他们就必定要把这种统治扩展到思想领域中去，以便调节自己时代的精神的生产和分配。统治阶级虚伪地把本阶级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利益，赋予本阶级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实际上这种意识形态反映的只是虚幻的关系。另一方面，由于革命阶级的存在，也必然存在着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例如，无产阶级在产生和发展中必然会产生共产主义意识。

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起来很简单，然而它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最隐蔽的唯心主义者当头一棒。它的方法不是在每个时代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的历史的基础上；它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它不是靠鼓吹精神的批判来消灭虚假的意识形态，而是主张实际地推翻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即通过革命来改造社会现实，同时也改变那些关于现实的无稽之谈。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握历史规律。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探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问题。

三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生产关系）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生产关系，科学地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

首先，他们确定了生产力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基础。生产力是一种客观的、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力量，每一代人都面对着前人留下来的既定的生产力状况来继续从事生产力的创造。生产力不仅包括人本身的劳动、“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它还包括人们在相互交往和共同活

动中产生的社会力量。人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大小，同时又决定着社会的状况。历史的发展总是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力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基础，也构成了个人能力发展的历史基础。

其次，他们系统地探讨了最能显示出历史唯物主义特征的生产关系概念。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包括人对自然的关系和人们之间的关系，这两方面是互为条件并相互转化的。生产本身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而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人们必然要结成一定的相互关系，他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和需要的基础上相互发生交往的。这种交往又决定着生产和需要，并每天都在重新创造着现存的关系。

这种生产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关系，同时又是历史地变动着的关系。根据生产关系在历史中变化的类型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形态，它们构成了一个依次更替的所有制形式的演进序列，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第二种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第三种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第四种是资本主义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将是与一切旧的生产和交往关系的基础都完全不同的共产主义制度。

生产关系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基本形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用生产关系、生产和交往关系、交往关系、交往形式、交往方式、所有制关系、所有制形式等不同的术语来表述它。这一方面说明了生产关系概念的丰富内容，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他们正在琢磨和选择如何用最合适的字眼来表述。

最后，他们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机制，从而最终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因。交往形式在其产生之初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是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合理的社会形式，也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即使这种交往的形式有片面性，那也是与人们现实的局限性和片面存在相适应的，是与生产力不发达状况相适应的。然而，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的交往

形式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也就是说，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二者不相适应了。这仅仅是由于社会生产的持续发展，使人们突破了自身原有的局限，这时他们便要求创造出一种新的交往形式来适应较发达的生产力。这种新的交往形式当然又会重新变为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这样，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就形成了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历史的过程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应和不适应的矛盾运动，第一次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在人们面前显得如此简单明了和有规律性。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运动最后被归结为生产关系的依次更新和发展，而生产关系的变化又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和个人本身力量的发展。当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状况和性质的时候，历史就前进，就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时，二者就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并引起连锁反应，造成社会冲突。它表现为冲突的总和，表现为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等等。总之，“一切历史发展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①]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爆发为社会革命，通过社会革命来解决矛盾并推动矛盾在新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的统一体中继续发展，由此推动着整个人类历史的进步。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规律就这样得到了阐明。

四 社会进步的机制及其实现的形式

对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的分析，特别是生产关系概念的制定，使马克思、恩格斯能够更科学地阐述市民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他们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这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3页。

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上的上层建筑的基础”。① 据此，他们一一探讨了经济基础对于国家、政治、法权和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观念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以及上层建筑各因素的相对独立的发展。

市民社会即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范畴的制定，使马克思、恩格斯能够用这个现实的基础来说明国家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现象，并由此建立起完整的社会结构理论。整个社会在结构上被剖析为四个相互联系的层次，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或者简要地概括为“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这三个基本因素。这就有助于揭示社会运动的内部机制。建立在上述社会结构理论上的历史观能够展示社会运动过程的全貌。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②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表明了社会结构各层次之间的制约关系，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的变化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后者又引起了上层建筑的变化以及其他更复杂的社会现象的变化。人们在历史的每一阶段上都遇到既定的生产力总和和历史地形成的关系，但他们的能动的实践活动又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页。

② 同上，第42—43页。

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旧的生产关系不断地为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而新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又迟早要引起上层建筑的相应的发展。这样，人类历史进步的机制就像自然历史过程一样清楚明了。这种关于历史过程的唯物主义学说是以对社会结构的洞察为前提的，否则只能看到世代的更替和历史的演变，而不能说明其内部的原因。

社会历史的进步是如何实现的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通过人们的活动来体现的，在阶级社会中则表现为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最后，以政治上推翻旧的国家政权，经济上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思想上提倡新的思潮为契机，通过全面的、总体性的社会革命来实现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社会革命不是某些阴谋家、煽动家制定的，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群众斗争的结果。如果还没有具备实行全面改革的物质条件——更发达的生产力和反抗旧社会的革命群众，那么，尽管社会革命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相反，如果生产关系已经成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障碍，那么，无论旧的社会联系多么牢固，它终究会被革命所推翻。

为什么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社会的进步呢？因为迄今为止的社会大都是在阶级对立的范围内发展的，在古代是由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在中世纪是贵族和农奴之间的对立，在近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在经济基础中占统治地位的一定阶级通过国家、法和意识形态等手段来实现其利益，这时的上层建筑是整个统治阶级利益的集中表现。这种上层建筑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它的变化往往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变化，非用革命的手段不能加以扫除。正如两位作者所指出的："较早时期的利益，在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形式已经为适用于较晚时期的利益的交往形式所排挤之后，仍然在长时间内拥有一种表现为与人隔离的虚幻共同体（国家、法）的传统权力，这种权力归根结底只有通过革

命才能打倒。"[1] 同时，"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2]

五 个人和社会、主体和客体、自由和必然在历史中的关系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继续探讨了社会异化问题，并由此论述了个人和社会、自由和必然、主体和客体在历史中的关系问题。

在这里，异化被解释成是社会分工的对抗形式对人们的奴役。马克思、恩格斯抛弃了从人的本质出发说明异化的方法，转而用生产力的历史发展来说明它。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个人完全依赖于社会，人们对自然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人们相互之间的狭隘关系，社会关系的狭隘性又制约着人们对自然关系的狭隘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个人开始从群体中分离出来，依靠社会分工来建立社会联系，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造成了扩大的生产力。随着私有制的交换和阶级的出现，人们为分工所制约的社会活动固定化，于是，被分工所分离的人们本身的产物便聚合为一种统治着人们、不受人们控制的物质力量。这些个人力量的总和不仅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反而支配着他们的意志。这种自发的社会力量对人们的统治，乃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只要人们还处在自发的形成的社会中，只要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还是分离的，个人本身的活动对于他们来说就始终是一种异己的、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它。只有当生产力获得高度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世界性的交往才能建立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1页。

② 同上，第78页。

起来，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才会真正成为普遍的个人。这时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的个人，就能利用人类全面生产的一切积极成果，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对人们在相互作用中生产的异己力量实行自觉的控制和驾驭。

因此，“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① 个人解放必须以社会解放为前提，个人只有顺应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才能在推动历史前进的总合力中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没有集体，就不能实现对异己力量的控制。“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集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② 个人不是在社会之外生活，社会也不是脱离个人的抽象物，个人与社会的对立是历史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并且经过共产主义革命，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发展才不再是一句空话。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把自由和必然、个性发展与社会物质条件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条件过去一直是受偶然性支配的。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个人自由不过是滥用偶然性的权利。实际上，自由决不等于随心所欲，自由乃是建立在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基础上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的能动的活动。人们所能获得的自由的大小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状况所决定的。他们说：“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③ 当人们还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页。

② 同上，第84页。

③ 同上，第507页。

能使自己的吃喝穿住在质和量方面都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自由和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即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在阶级社会的条件下，一部分人的自由是建立在大部分人的不自由的基础上的。随着人对自然的控制的进步，人们自己却日益受到社会中的自发力量的奴役。资本主义制度下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人的压抑，已经具有了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历史业已提出了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物的关系的统治的任务，以便实现每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而这就意味着要实现共产主义革命。

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人不是消极的自然的客体，而是能动的历史的主体。人通过实践活动来认识和改造世界，使自己的目的客体化，使历史中的客体受主体活动的自觉控制和支配。但在私有制度下主体改造世界的能动活动却不是对主体自身的肯定，反倒是对主体自身的否定。为此，个人应该联合起来占有全部生产力总和。这种共产主义的联合，将“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① 共产主义将克服一切异化现象，带来主体和客体的和谐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这样解决了在历史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的。

思考与讨论

1．马克思1844年的哲学思想发展。

2．马克思是怎样借助于费尔巴哈又超过了费尔巴哈的？

3．《神圣家族》怎样批判了思辨哲学？初步阐明了哪些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5页。

4. 物质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如何发现的？有何重大意义？

5.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怎样阐述唯物史观的？

6. 唯物史观"基本前提"、出发点和方法论原则。

7. 唯物史观和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区别与界限。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开问世及其和工人运动的结合

在1846年5月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后他们就致力于把这一理论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结合，他们开展了对工人运动中各种错误思想的批判，其中主要的是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通过批判，一方面使工人运动摆脱错误思想的影响，以便在坚实的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健康地、顺利地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又通过工人运动的广泛实践发展和检验理论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公开问世的，它的标志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第一节　反对工人运动中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斗争

一　同魏特林空想共产主义的论战

威廉·魏特林（1808—1871），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他出身贫苦，14岁当裁缝学徒，后来流浪各地，到26岁时差不多已跑遍了大半个德国。由于极其低下的社会地位和十分广泛的社会阅历，他很早就思考和探求着实现人间平等的道路。

1835年10月，魏特林来到欧洲的政治中心——巴黎，结识

并加入了德国工人的秘密组织"流亡者同盟"。在这里他受到法国巴贝夫、傅立叶、卡贝思想的影响，成为空想共产主义者。1838年，魏特林写作和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实现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宣传平等思想。1839年，他来到瑞士，这期间他的共有共享的平等思想又有所发展。1842年，他出版了《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在这本书中，他提出财产公有、人人劳动、平均分配、和谐自由的"共有共享的社会制度"。他说："所有的人都同甘共苦，那末我们就会感到快乐和满足。"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对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有一定的影响。魏特林的历史功绩在于他尖锐地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指出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罪恶、一切不平等现象的根源。要消灭私有制，只有依靠工人自己的斗争。他本能地预见到无产阶级将成为社会未来的主人，发挥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魏特林作为德国工人运动的启蒙理论家，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理解，不是建立在像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抽象的平等观念的基础上，即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他不相信群众的力量，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少数人物的密谋和自发的起义上。这种观点反映了小手工业者的情绪，是资本主义有所发展而又很不充分的表现。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魏特林的空想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就过时了。它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障碍。

1845年底，魏特林来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和马克思、恩格斯有了来往。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满腔热情说服他放弃以往的信念，接受唯物主义历史观。但魏特林这时"已经不再是一个天真年轻的帮工裁缝"，他自诩为救世主，认为自己"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① 他丝毫不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劝告，坚持己见。这样，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1846年3月30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召集特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9—250页。

会议，讨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出版的有关事宜。魏特林参加了会议。会上他反对出版这部著作，而主张出版他自已的书，并要求立即发表阐述他的思想观点的其他一些著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魏特林的著作所阐述的乃是一种落后的平均主义空想体系。这种空想体系已经成为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如果继续出版这类著作，必将使工人运动走上邪路。会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魏特林认为在他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他的《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中，已经向工人指明了建立平等的“千年王国”的道路，指责马克思提出的工人应当首先参加资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策略是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叛逆”。为此，马克思极其气愤，在桌上猛击一掌，并说：“无知从来不会使人得到教益。”第二天魏特林给梅林写信，把马克思、恩格斯对他的批评说成是对他的“嫉忌”，是“企图扼杀他的天才”等。显然，这次争论不是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而是两种世界观、两种斗争策略的斗争。

魏特林从狭隘的宗派观点出发，不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正确意见，继续坚持自已的错误理论，并加紧同“真正的社会主义”相勾结。1846 年 5 月 11 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开始讨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克利盖在英国所进行的宣传活动和实际活动，认为克利盖的言行完全违背了科学共产主义原则，与会者通过了《反克利盖的通告》。魏特林参加了会议，但他为克利盖辩护，并拒绝在通告上签字。不仅如此，他还给克利盖写信，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阴谋家”。马克思、恩格斯看到魏特林已不可挽救，便坚决同他决裂，并要求各地通讯委员会同魏特林划清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对魏特林的批判，得到“正义者同盟”的支持。在 1947 年 6 月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魏特林被开除出同盟，从此他便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二　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论战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 19 世纪 40 年代产生于德国的一个小

资产阶级的思想派别。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赫斯、格律恩、克利盖等人。他们从濒临灭亡的小资产阶级利益出发，反对德国发展资本主义，呼吁无产阶级不要参加政治斗争。这种思潮从1844年起就像瘟疫一样在德国蔓延开来，成为当时相当流行的有影响的运动，在德国工人中产生了极坏的作用，阻碍着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阻碍着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这股思潮的危害性，运用正在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给予了有力的批判。

1845年，恩格斯写了《〈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一文，就此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作了批判。文中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自己是德国的最科学的"哲学社会主义"，其实他们只是把法国社会主义理论中已经陈腐的观点翻译成黑格尔的语言，给予德国哲学的思辨性。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超过了目光短浅的法国人。恩格斯指出，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有合理的因素，那就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尖锐的、生动的、明睿的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法国社会主义理论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诬之为"粗糙的"、"不学无术"和"不文明"的东西，十足地表现了他们的狭隘的民族性和目空一切的狂妄性。

1845至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进一步从理论上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有两个方面：其一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其二是被他们歪曲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他们企图用德国的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来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思想。"① 本来英、法两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只是它们的现实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是英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表现。可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并不这样认为，由于受德国唯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6页。

主义思辨哲学的影响，他们把这些文献看成是脱离当时的现实运动，从“纯粹的思想”中产生的。他们把英法社会主义文献中所揭露的现实社会关系及其对立，看作是理性中的关系和对立的表现。总之，理性是事物的根本，现实是理性的表现，这完全是黑格尔的说教。此外，由于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唯一合乎人性的社会，是人的本质的真正体现。而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现实关系，如宗教、货币、雇佣劳动等等都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阶级斗争则是最坏的异化。只有克服这些异化，使人性复归，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他们要用人道主义的说教，用普遍的爱去代替阶级斗争。他们指责法国的社会主义是“不文明的”，就是因为它把人“引导到对粗暴的物质的依赖”，而没有帮助“人”意识到“自己的本质”。他们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真正的”，就是因为他们最关心“人”，把实现人的本质看作历史的真正目的。

由此可见，“真正的社会主义”仅仅是把英、法的社会主义理论机械地搬到德国，并加以思辨的改造。它是一种以抽象的、超阶级的人为核心，以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泛爱说教为基本内容的反动思潮。这种思潮是小资产阶级心理在理论上的表现。它反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现实的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极大的义愤批判了这种有害的思潮，强调指出：“如果无产者的理论代表们还想通过自己的写作活动达到某种结果，那么他们首先应当尽量抛弃所有那些削弱对于这个对立的尖锐性的认识的词句（指“真正的社会主义”——编者注），这些词句会使这种对立模糊起来，甚至会使资产者为了保全自己而根据博爱的空想去取媚共产主义。”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作一般的理论批判的同时，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内部，马克思和恩格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3—554页。

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作了直接的面对面的斗争。这一斗争首先从反对克利盖开始。

海尔曼·克利盖（1820—1850），是德国年轻的新闻工作者，长期在美国从事理论宣传工作。他的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原则和马克思对他的期望，马克思不得不以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名义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

1846年5月11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反克利盖的通告》。《通告》揭露了克利盖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以及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都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的。克利盖把资本主义说成是一种利己主义，认为这种利己主义产生的结果是"恨"，而共产主义是和利己主义相反的东西，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宣扬普遍的人类之爱，要向财主们呼吁，把多余的土地让出来，分配给大家；只要人们平分到一块土地，他们就有劳动的机会，可以养活自己和家庭，变成对人类社会有用的成员。社会的贫困现象也就会一举而消灭。他认为，只要用爱把人类联合起来，最终将导致共产主义，将会在"大地上建设起……充满天国的爱的村镇"。由此可以看出克利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本质。

克利盖的错误的实质在于用抽象的人类普遍的爱来冲淡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掩盖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的实质，调和阶级斗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克利盖认为平分土地就可以导致共产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共产主义者应当怎样看待平分土地的问题。他们指出美国在40年代掀起的"平分土地"的运动，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其作用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它客观上却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其结果必然会导向共产主义"。这里马克思强调的是运动的结果，而不是运动本身，是指运动的将来，而不是运动的现在。克利盖的错误则在于把平分土地这一"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的初步形态"绝对化、理想化，看成是无产阶级

解放的最终和最高的目的，以为一旦平分了土地，共产主义就实现了。这种共产主义绝不是工人的共产主义，而只是小私有者幻想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对待像平分土地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看法，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又有所发展，在那里它被明确地规定为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

为了扩大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通告》分发给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并没有被人们所理解，就连“正义者同盟”伦敦支部的领导人沙佩尔和巴黎支部的领导人艾韦贝克都不懂得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意义。尽管如此，《通告》还是起了作用的，它使克利盖从同盟舞台上消失了。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它还表现在对格律恩的批判上。

卡尔·格律恩(1817——1887)，是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第一个提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人。1845年2月，马克思离开巴黎前往布鲁塞尔，格律恩便以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在巴黎大肆活动。1846年蒲鲁东写成《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请格律恩替他翻译成德文出版。格律恩利用这个机会，把蒲鲁东的协作社计划抽出来，稍加修饰，贴上“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标签，在工人中到处宣传。

被格律恩当作救世良方的协作社计划的内容是：工人只要用积蓄的小额储金组织起协作社，实行产品直接交换，就可以免除商人的中间剥削，废除资本，消灭贫困，建立社会主义。这个计划的实质是工人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轻而易举地战胜资本主义，而不必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

这样一个空想的计划，由于格律恩到处兜售，在当时的工人中引起了一阵狂热，起着一种松懈斗志的作用。为了尽快改变巴黎工人的这种思想混乱状态，恩格斯亲自前往巴黎。他本想当面揭露格律恩的错误，但是做贼心虚的格律恩总是躲着恩格斯，直接出面和恩格斯斗争的是格律恩的亲信艾泽曼。

艾泽曼秉承格律恩的意志，把协作社计划交给工人讨论。在工人集会上，恩格斯为了坚决反对这个空想计划，不怕和许多“善人君子、激烈的革命者然而是坏的共产主义者决裂”。在论战中，他用简洁明快的语言给共产主义下了定义：“(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① 这个定义使工人们耳目一新，立即得到与会者绝大多数的承认，协作社计划遭到了彻底破产。格律恩也从此声誉扫地。恩格斯提出的以上三条原则，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同各种冒牌社会主义的界限，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确定了基本内容。

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上的荒谬性和实践上的危险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作了最后的总结。《宣言》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是坚持真实的要求，而是坚持对真理的要求，不是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是代表人性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是不属于任何阶级，并且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哲学冥想的渺茫太空”。“这种社会主义就成为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一班随从——僧侣、学监、顽固守旧的容克和官僚顺手抓来吓唬那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一个稻草人。”②

三　同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论战

在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取得胜利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和蒲鲁东主义展开了论战。

蒲鲁东（1809—1865），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出身工人家庭，1836年去巴黎求学，1840年因发表了第一部理论著作《什么是财产?》而颇具声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7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6—497页。

1844—1845 年马克思住在巴黎时，和蒲鲁东有过密切的交往。他们曾彻夜争论过经济学问题。蒲鲁东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对私有制作了批判性的考察，认为私有财产是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对于这一观点，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曾予以充分肯定。直到后来马克思还认为"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也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① 但蒲鲁东对私有制的批判是不彻底的。他不主张彻底消灭私有制，而只想改变私有制的形式。马克思批评了蒲鲁东的这种不彻底性，但仍把他作为团结争取的对象，希望他能转变成无产阶级的理论战士。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起组织世界性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曾写信给蒲鲁东，请他担任驻法国的通讯员，但遭到了蒲鲁东的拒绝。

这时蒲鲁东正在写作一部名为《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的新著。该书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观点在他给马克思的回信中有所透露，那就是他主张"用一种经济的组合，把那些因另一种经济组合而从社会剥夺去的财产归还给社会。"1846年底这部著作出版了。在书中蒲鲁东用动听的言语劝说无产阶级不要搞政治斗争，而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用和平方法改造社会。这种改良主义思想后来流传很广，成为当时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

1846 年 12月，马克思刚从书商那里拿到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就写信给安年柯夫说："它整个说来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② 于是立即着手进行批判。1847 年 7月，马克思就发表了不仅内容和方法，就连题目也是针锋相对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在这本书中，他对蒲鲁东进行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6页。

了严厉的批判。

第一，揭露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幻想，论述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必要性。

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他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使得商品交换中价值规律经常受到破坏，造成工人的贫困化。为了消灭贫困现象，只须改变一下私有制的形式，即消灭大私有制，保存小私有制；因为私人占有是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在私人占有的前提下，劳动者建立一种互助组织，即许许多多的作坊，工人以小额积蓄作为股份加入作坊，成为股东并亲自参加生产。产品一部分以原料加劳动的价格卖给股东，这样就不付给他们利润；另一部分产品则用来与别的作坊进行直接交换，而不借助于货币这个媒介。这样资本家手中的资本就失去支配劳动和获得利润的权力，因而就被“废除”了。而工人们也因为有工做，不会再陷入贫困。如此，社会各个成员的利益就得到了平衡。蒲鲁东认为这种以互相交换产品为基础的自然经济，不应受国家权力的干扰，因此政府的存在是不必要的。

蒲鲁东这个改革社会的“药方”，就是他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社会。很明显，他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理论家，在理论上必然为小资产阶级在实践中所追求的东西辩护。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决定了蒲鲁东对资本主义社会所采取的改良主义态度。列宁说：“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它的基础——商品生产，而是使这个基础免除各种弊病和赘瘤等等；不是消灭交换和交换价值，而相反地，是使它‘确立’，使它成为普遍的、绝对的、公允的、没有波动、没有危机、没有弊病的东西。——这就是蒲鲁东的思想。”① 蒲鲁东认为用他的方法对社会进行变革，资本主义就能和平地发展为社会主义，因此极力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道：“我宁肯用文火烧毁私有制，也不愿为有产者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17页。

安排一个巴托罗谬之夜。"①

针对蒲鲁东的上述改良主义思想，马克思指出，并不是货币产生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矛盾的，产生这些固有矛盾的原因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对劳动者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是无产阶级苦难的根源。无产阶级为了获得解放，必须消灭私有制，因而必须采取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治统治。马克思引用乔治·桑的小说《杨·瑞日卡》上的一句名言，说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因此，要不要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就成为马克思和蒲鲁东在政治观点上的根本分歧。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掌握未来的阶级"，它的利益和社会发展进程相一致。无产阶级在自己政党的指导下，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

第二，批判蒲鲁东的唯心史观，进一步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是以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形而上学思维方法为依据的。为了深入批判蒲鲁东，彻底肃清他在工人中的恶劣影响，马克思批判了他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方法。

和一切资产阶级学者一样，蒲鲁东不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懂得为什么社会发展的结果和个人预期的不一样，于是他就假定有一种神秘的观念或理性支配着历史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② 人的一

---

① "巴托罗谬之夜"是法国宗教史上的一次流血事件。1572年8月24日，在巴托罗谬诞生节之夜，发生了天主教徒屠杀异教徒的事件，在巴黎杀死异教徒3000人，在全国杀死3万人。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22页。

切社会活动、一切社会关系，都是理性的自我表现，社会本身是按照“理性中的观念顺序”发展的。这种神秘古怪的历史观，其实不过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拙劣翻版。蒲鲁东的理性实际上就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

蒲鲁东把历史看成是理性的自我表现，因此理性也就成了决定历史演变和发展的动力。但理性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是通过杰出人物的活动来实现的。这样他就又把自己说成是历史运动的真正推动者。马克思以讽刺的口吻指出，在蒲鲁东看来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并且他把自己看成就是这样的伟人。马克思批评了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指出理性、观念不过是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历史发展的动因不应到观念中去寻找，而应到物质关系即物质生活条件中去寻找，这样就会发现社会生产力是全部人类历史的基础。但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因为它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这种能力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程度，必然会引起一定的交换形式与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与消费的一定形式的基础上便产生相应的社会制度。“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气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总之，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从而就构成什么样的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交换、分配和消费关系，都随之发生变化，于是社会变革的时代也就到来。可见，生产力是整个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生产力这一概念的内涵，不仅包括生产工具，而且包括生产者本身。马克思说：“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① 由于把革命阶级作为生产力的主要因素，这就肯定了劳动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创造作用，有力地批判了认为只有少数杰出人物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心史观。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也不再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0页。

样，把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关系叫“交往形式”，而称为“生产关系”，从而最后形成了“生产关系”这个科学概念。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生产、交换、分配等方面。这些方面都是由生产力决定的，而生产力又取决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种相互决定作用所产生的矛盾运动，正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表述为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

第三，批判蒲鲁东的形而上学，阐明了辩证思维的方法。

蒲鲁东自以为学会了辩证法，其实在他的经济学和哲学思想中，处处露出了形而上学的马脚。作为他的“和平药方”的互助理论，就是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产物。首先，蒲鲁东把交换看成是人的先天的不变的本性。他认为人生来就有各种需要，但不能都靠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这些需要，只好和别人交换劳动产品，通过交换达到各自需要的满足。他紧紧抓住交换这一环节，以为只要找到一种合理的交换形式，做到人人都能满足自己的需要，这就是美好的社会。他所提出的改革社会的方案就是从交换开始的。后来他接触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便以为找到了答案。原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曾早已提出过劳动价值理论，认为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同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相等。蒲鲁东把这个理论当作绝对正确、到处运用的真理。他根据这一理论，认为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就可以根据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组织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在他看来，这种交换是最公平的，如果做到了这一点，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一切矛盾就可以得到解决。马克思批判了这种形而上学观点，指出蒲鲁东把交换看成是人的不变本性是不对的。交换是由生产决定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人们没有交换的需要；只有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有了交换的需要和交换活动。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的需要在不断变化，人们之间的交换也在不断变化。同时马克思还

认为，蒲鲁东只是从交换的角度来研究价值也是不对的，应该从生产的角度即从生产关系方面来加以研究。如果这样，那么我们就会明白，劳动价值实际是劳动力价值，同劳动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是不相等的。蒲鲁东的错误在于"把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的商品价值和用'劳动价值'来衡量的商品价值混为一谈"。① 把李嘉图的理论凝固化，不顾生产条件到处应用，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结果他就企图用简单的商品生产来代替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以此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

在蒲鲁东看来，不仅价值规律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且所有经济学上的范畴，像分工、货币、垄断、竞争等等，都是先天存在的纯粹理性的表现，都是永恒的、永远不变的。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不过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人们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创造了他们的社会关系，同时也创造了同这些关系相适应的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② 如果蒲鲁东是一个懂得辩证法的人，他就应该去探讨经济范畴的产生和发展，探讨它们的历史运动。但蒲鲁东和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把经济范畴固定化，并要求人们去适应这些范畴，这实际上就是为资本主义的存在作辩护。"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来说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③

蒲鲁东在为他的"和平药方"作哲学论证时，更加明显地暴露了他对辩证法的一窍不通。在蒲鲁东看来，辩证法就是要承认任何经济关系都有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就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98页。

构成了一对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就在于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因此他断言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只要消除其坏的方面和保存其好的方面，就可以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确立永恒的正义和真正的平等。

针对蒲鲁东对辩证法的曲解，马克思阐明了辩证法的本质，指出辩证法决不是机械地把事物划分为好、坏两个方面，事物的发展也决不简单地只是消除坏的方面和保存好的方面。"辩证运动的实质"在于"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在辩证法看来，矛盾着的双方是既统一又斗争的：不承认矛盾双方的统一性(即相互依赖)，就会"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不承认矛盾双方的斗争性，事物也就不能发展。蒲鲁东的错误在于，他只允许资本主义社会发生量的变化(即所谓消除坏的方面)，而不主张根本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即不承认社会发展中的质变，不承认斗争的结果是"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即新事物的出现。蒲鲁东只是在黑格尔那里借用了辩证法的术语，实际上却不懂辩证法，因此仍然是一个形而上学者。普列汉诺夫后来也正确地指出："在这个论争中，马克思对于蒲鲁东的胜利就是善于辩证地思想的人对于不善于弄清楚辩证法的性质但却企图应用辩证方法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胜利。"①

马克思运用辩证法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得出了与蒲鲁东完全不同的结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困和富有是两个彼此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方面，"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断积累，就同时带来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化。但也恰恰是这个"坏"的方面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革命力量。他还指出，正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趋势，使他们的力量日益增强，觉悟日益提高，由自在的阶级逐渐变为自为的阶级，斗争形式也由经济斗争变为政治斗争，以至最后推翻资产阶级统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出版，第3卷，第159页。

治，实现自身的解放。而蒲鲁东所主张的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来消除贫困，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暴露了他的平等的社会主义的空想性质。

马克思还指出蒲鲁东不懂辩证法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立场。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反映在哲学中，就是特别强调用调和的方法来解决矛盾。他说："蒲鲁东先生想调和矛盾，因而完全避开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他只是寻求一个新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来。"①蒲鲁东想用保存资本主义社会的办法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所以他力图调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抹杀对立面的斗争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强调通过斗争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这里马克思的思想已经比《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大大前进了。他不再把辩证法的中心看作否定之否定规律，而是看作对立统一规律。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有决定意义的文献。这一著作证明马克思"已经彻底明确了自己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点"。② 马克思本人也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③ 这里所说的"有决定意义的论点"，指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制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由于各种原因，这本书在当时未能公开出版，因而也就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为此，恩格斯才说："我们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④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0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页。

第二节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一 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伟大纲领《共产党宣言》的诞生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魏特林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的批判，一方面使自己的思想日趋成熟，另一方面也使"正义者同盟"的绝大多数盟员改变了原来的观点，表示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他们越来越明白，过去的共产主义观点，无论是法国原始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还是魏特林共产主义，都是不够的。"因而愈来愈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理论是正确的。

"正义者同盟"的前身是"流亡者同盟"。这是一个在1834年由流亡在巴黎的德国手工业工人为主建立起来的密谋组织。它的宗旨是实现社会的平等和自由，实现德国的统一和繁荣。1837年，"流亡者同盟"中的激进分子(大部分是无产阶级)组成"正义者同盟"，作为法国工人运动的德国分支。同盟的最高目标是"财产共同制"，同盟的理论纲领是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

1839年5月，"正义者同盟"参加了由"四季社"发动的巴黎起义，失败后同盟实际处于瘫痪状态。经过一段时期的消沉，同盟领导人沙佩尔又在伦敦把同盟恢复起来，接着在巴黎、瑞士、德国都建立了支部。这时同盟已经成了国际性的工人组织。1843年同盟者曾邀请恩格斯加入该组织，由于他不同意同盟当时的指导思想和密谋性质而拒绝了。他和马克思后来仍一直关注着同盟的发展并积极影响同盟盟员的观点，特别是通过对魏特林、克利盖、格律恩、蒲鲁东等人的批判，极大地提高了同盟成员的思想水平，使他们认识到原有理论的错误，转而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正确的。

1847年1月20日，"正义者同盟"伦敦支部派莫尔为代表前往布鲁塞尔和巴黎，拜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再三邀请他们加入同

盟，表示他们可以在同盟代表大会上阐述自己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并作为同盟的纲领发表。同时，他们还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同盟进行改组。马克思和恩格斯鉴于同盟的诚意，就同意加入同盟。这标志着他们在组织上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了。作为工人阶级最早政治组织的"正义者同盟"，经过多年的摸索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也经过先进工人组织的媒介，开始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事业结合起来。

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原则对同盟进行了改组，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口号由过去的"人人皆兄弟"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由恩格斯起草的同盟章程草案(这一章程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明确规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① 同盟名称和口号的改变以及同盟章程的制定，说明同盟的性质已经不是一般的工人组织，而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了。

恩格斯接受大会委托起草了同盟纲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它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阐明了无产阶级的特点、历史使命和斗争策略。但是考虑到当时盟员的思想水平和接受能力，《草案》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没有达到应有的理论高度，有些提法还是妥协性的。对此恩格斯本人也不甚满意。所以第一次代表大会没有以决议的形式通过这个文件，只是把它作为草稿，提交各支部讨论。

在讨论《草案》的过程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赫斯在巴黎的同盟的支部中大肆活动。他起草了一个新的共产主义信条问答来代替《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将它作为巴黎支部的提案交即将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期根据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面貌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51页。

来改造共产主义者同盟。如果赫斯的修正稿被通过，那就意味着"真正的社会主义"又将控制同盟。因此恩格斯不得不坚决反对赫斯的修正稿，在巴黎区部委员会会议上，恩格斯对这个修正稿逐条批驳，获得了委员们的同意。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又写成了《共产主义原理》。它是共产主义同盟纲领的第二稿。

第二稿较之第一稿有重大改进，许多问题都作了修订。在第二稿中，恩格斯把共产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完全建立在现实斗争的基础上，彻底抛弃了第一稿中保留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因素。虽然第二稿更加成熟了，但恩格斯对其教义问答的形式并不满意，所以没有把它送交委员会。

1847 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和修改党的理论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会上他们阐述了自己的理论，经过长时期的辩论，终于赢得了胜利。大会委托他们起草宣言。1848 年 1月，马克思完成了《宣言》的写作，2月在伦敦以《共产党宣言》的名义发表。这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的第三稿，无论从内容或形式上看，它都达到了完全成熟的程度，标志了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最高成就。正如列宁指出的：《共产党宣言》"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的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① 它的发表标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公开问世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开端。

二　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证

恩格斯指出："《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578页。

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①

恩格斯所指出的《宣言》的基本思想，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所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思想，在《宣言》中得到彻底的贯彻和发挥，得到第一次系统的、科学的表述。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这些基本原理，考察了人类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阐明了贯穿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中的阶级斗争的规律，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为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作了全面的、有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证。

1．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客观必然性

《宣言》回顾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各个社会中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情况，指出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由于存在着经济利益的根本冲突，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必然要进行不断地、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因此，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在奴隶社会有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的斗争，在封建社会有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的斗争；从封建制度解体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而是用新的斗争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代替了旧的斗争。所以，“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页。

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于以往的阶级社会，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内部逐渐产生的。

在10—11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商品交换有了较大的发展，逐渐兴起了集市，从集市又发展为城市。农奴由于不堪忍受封建主的剥削和压迫，不断起来斗争，纷纷逃离领地，进入城市。这样就形成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到了14世纪，随着商品生产进一步发展，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城关市民中，少数富裕的行会师傅，由于采用新技术，增加帮工和学徒，扩大生产规模，逐步变成了资产阶级。而帮工、学徒以及在竞争中破产的行会师傅、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由于生活不断贫困而变成无产阶级。可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无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从而也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决定了他们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进行着斗争。《宣言》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一天，这两个阶级的斗争就存在一天，直到资产阶级被消灭为止。

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虽然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但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于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从18世纪60年代英国产业革命开始到《宣言》的发表，在短短的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超过了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的总和。比起封建制度来，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在这种进步的后面却孕育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生产力，却“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加深了劳动人民的贫困；它开拓了世界市场，但却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加深了与殖民地人民的矛盾；它创立了城市，却使“乡村屈服于

城市的统治”，加剧了城乡的对立。这些矛盾和斗争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逐渐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了，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尖锐化了，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正像封建制度因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地被消灭一样，“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资本主义制度也必然灭亡。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还产生了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表现。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表现出来。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客观基础。

2．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种所有制是永存的，一切私有制关系都经历了历史的更替，处在不断变革之中。消灭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这是每个历史时代社会革命的普遍规律。奴隶制度的建立消灭了原始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封建制度的建立消灭了奴隶社会的所有制关系，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消灭了封建社会的所有制关系。

在这些革命中，除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是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外，其他的革命都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都是以不同的形式来维护和发展私有制。

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以往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所要废除的并不是任何其他的所有制，而是资产阶级所有制。资产阶级所有制是私有制的最后和最完备的形式，也是私有制发展的最高阶段，因

此，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就是消灭了人类社会的最后一种私有制，或者换句话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就必须要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

共产党的这个理论纲领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它同空想社会主义根本不同，它不是以某个空想家主观臆想的原则为根据，而是以历史中的阶级斗争及其发展的规律为依据。

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用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代替它，才能使生产力得以继续顺利地发展，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平等互助、共同繁荣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将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3．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科学表述

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规律，而实现这一规律的则是无产阶级。《宣言》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这就是：用革命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执行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是由它的阶级特性所决定的。《宣言》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一切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① 无产阶级是现代化大生产的直接体现者，由于它和大机器工业相联系，所以最富有组织性、纪律性和团结性。由于它是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所以也最有远见和前途。无产阶级是一无所有的，它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保护。它大公无私，而且最富有革命的彻底性；因为它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下层，只有"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

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要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1页。

争。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不占有任何财产，只占有可以出卖的劳动力。无产阶级的这种占有方式，完全是由资产阶级占有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造成的。因此，无产阶级要消灭自己的这种占有方式，就必须要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即消灭整个资本主义制度。

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也决定了他必须要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自己的最终奋斗目标。以前一切运动的结果，都是少数人统治绝大多数人，少数剥削者奴役绝大多数劳动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是为少数剥削者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运动则相反，它必须首先解放全人类，才能使自己获得最后解放。因为无产阶级生活在社会的最下层，是被资本主义社会踩在脚下的奴隶，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人剥削人的制度，无产阶级就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可见，“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①

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首先要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按其内容来说，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各国无产阶级共同奋斗的目标。但是，就其形式来说，各国无产阶级首先面临的敌人是本国的资产阶级，它直接斗争的舞台是在本国。不过，资产阶级是拥有国际联系的，一国的资产阶级是国际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打倒了本国资产阶级，也就削弱了国际资产阶级的力量，打击了共同的敌人。

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要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自己的统治——无产阶级专政。《宣言》中虽然还没有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很清楚的。无产阶级之所以要采取暴力革命形式，是因为资产阶级在斗争中总是首先动用武力来镇压无产阶级，这样无产阶级也只有拿起武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

器，组织起自己的武装力量，用革命暴力来反对和消灭反革命暴力，以便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这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第一步。紧接着就要“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

4．无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

要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要有正确的战略和策略。

第一，共产党人必须把长远目标和当前斗争结合起来。《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它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斗争战略和策略的“一个基本原理”。

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是要彻底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在为实现最终目的的斗争中，不能忽视当前的斗争，而是要积极参加当前一切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斗争。但是，共产党人要永远牢记，当前的斗争不是最终目的，只是走向最终目的的一个阶梯。不参加当前的斗争，实现最终目的当然只是一句空话，但如果忘记了最终目的，就会使当前的斗争迷失方向。总之，要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把完成当前的斗争任务当作实现最终目的的条件。

第二，共产党人必须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宣言》分析了法国、瑞士、波兰、德国等国家的不同历史情况，制定了共产党人在上述国家中所采取的灵活的策略。

在法国，当时反对“七月王朝”的斗争日益高涨，资产阶级想实行一些小的改革来满足自己经济上的要求。小资产阶级则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出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主张普选。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有一致的一面，所以应该联合小资产阶级共同战斗。但是小资产阶级又喜欢空谈和幻想，为此，无产阶级在联合小资产阶级时，要同时批判它的错误，肃清它对工人运动的影响。

当时的瑞士，是一个僧侣和封建贵族占优势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共产党人要联合资产阶级激进党进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是资产阶级激进党的成分非常复杂，其中有进步的，也有保守的。共产党人在联合他们时，要采取不同的态度，支持进步力量，反对保守力量。

波兰原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经过俄、普、奥三国瓜分，沦为殖民地。因此争取民族解放，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波兰人民的首要任务。在波兰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中，共产党人要支持以邓波夫斯基为首的民族同盟的左翼，因为只有他们把土地革命当作民族解放的条件。

德国是一个封建割据的君主专制国家，革命的基本任务是推翻封建统治。这时的无产阶级只能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首先完成民主革命任务，为下一步的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在反对封建的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是动摇的、不彻底的，它想同封建势力妥协。从斗争的策略观点看，只要资产阶级愿意革命，哪怕是暂时的、不彻底的，无产阶级也要利用它，同它一起反对封建制度。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显然，当时欧洲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运动，不论是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还是民族解放运动，其性质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之所以支持这些革命，一方面是因为所有这些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权以前就和资产阶级决战”。但是，《宣言》也指出，任何时候都不应放弃党的原则，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长远的根本利益，

都要有原则的坚定性。

第三，共产党人既要同其他革命党派联合，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共产党人要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孤立和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视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因此，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持独立性。例如，在法国，共产党人联合小资产阶级时，应不放弃对他们批判的权利。在德国，共产党人利用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时，要同它的妥协性作斗争，要特别教育工人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

以上就是《宣言》所阐明的党的主要斗争策略。对于它的意义，恩格斯在1884年写的《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中指出："从来没有一个策略纲领是像这个策略纲领一样得到证实的。它在革命前夜被提出后，已经受了这次革命的考验，并且从那时起，任何一个工人政党要背离了这个策略纲领，每次都因此受到了惩罚。而现在，差不多过了40年以后，它已成为欧洲——从马德里到彼得堡所有一切坚定而有觉悟的工人政党的准则。"①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世界历史性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著作《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党纲，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开问世。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作了科学的阐述，"它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这个新世界观是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高度统一，是自然观和历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卷177页。

观的高度统一。它不仅继承了过去一切哲学的优秀传统，而且根据最新科学成就和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从内容到形式都实现了根本性的突破。它的产生标志着哲学史上的最深刻的革命变革。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创造了新的世界观，而且运用这个世界观去指导工人运动，给各国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资本主义奴役、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道路。列宁说："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① 列宁对《宣言》的评价，无疑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评价，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最好说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当时工人运动的开展，还是后来法国的巴黎公社、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崭新的世界观的指导下进行并取得胜利的。斯大林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②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在人类历史上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其世界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思考与讨论

1．蒲鲁东主义的主要错误和马克思对他的批判。
2．空想社会主义的几种类型和马克思恩格斯对它们的批判。
3．《共产党宣言》起草和发表的经过，它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
4．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一切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它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意义。

---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91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22页。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848年欧洲革命风暴时期的验证和发展

第一节　革命事变进程对唯物史观的验证

无论相对于近代欧洲的历史进程，还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发展，1848 年革命都是个重要的里程碑。就前一方面而言，它是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由革命变为反动的转折，是这个阶级对于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之领导作用终结的标志，也是工人阶级带着独立的革命要求去推进民主革命的开端。就后一方面而言，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后所经受的第一次重大的实践检验，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亲自参加的最重大的社会变革活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策略的理论基础而实际发挥作用的开端。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同革命实践的直接联系和相互作用中得到了有效的验证和巨大的深化。它不但通过对革命过程的各种政治事件的科学评价而获得了成功的运用，而且通过对新的历史经验的创造性总结而丰富和发展了自身。革命事变的全部进程充分证实，唯物主义历史观是观察和评价历史事件的唯一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争取解放斗争的唯一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时期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对于特定历史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典范，它有效地推翻了现代资产阶级强加给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的所谓“逻辑主义”、“经济主义”、“公式主义”等指责。

一　1848年欧洲革命的客观基础及其发展规律

1848—1849年,革命风暴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① 对于这一重大的历史事变，唯心史观作了种种的曲解。归结起来，就是否认这个革命的客观必然性，用主观构想代替对于现实历史事件的具体分析。② 马克思、恩格斯则通过对所有政治事件的内在因果关系的揭示，令人信服地证明："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③

1．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指导和总结1848年革命的基本立场是：革命的

① 从1848年初开始，意大利、法国、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国相继爆发了革命，而英国、爱尔兰等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这次革命中，尽管各国都有自己所要达到的特殊目的，但总的说来，还是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

② 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法国历史学家基佐（弗兰斯瓦·比埃尔·吉约姆）、德国作家道梅尔（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和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托玛斯）的观点。基佐用宗教冲突、政治斗争等原因解释革命风暴的实质，而道梅尔则把阶级斗争归结为"粗野"反对"文明"的斗争。他们都把革命的原因归咎于少数人的"恶意"挑动，即对于民众的卑鄙本能的蓄意利用和挑唆。卡莱尔从泛神论的观点出发，把历史过程归结为神秘的自然规律的作用，从而归结为少数天才的发现和统治，用虚构的"贤人"和"贱人"的对立代替了现实的阶级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深刻批判了上述错误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36—253页，第300—31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1页。

爆发及其全部过程为两大社会基本矛盾所制约，一方面是随着资本主义而发展起来的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同历史上业已过时的封建关系(包括封建性的民族分裂)的矛盾，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本身内部日益尖锐化的新矛盾。因此，虽然从革命的直接任务和基本性质看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而它已具有以往的民主革命所不曾具有的许多特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是基本的政治力量，它们间的相互关系是制定革命战略策略的最基本依据。贯彻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方法论原则，使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例如，资产阶级何以背叛符合自身利益的革命、农民何以拥护并不代表他们利益的路易·波拿巴、工人何以不能单纯依靠本阶级的力量取得革命胜利等等）可以迎刃而解，并透过扑朔迷离、纷繁多变的斗争格局发现其规律。1848 年革命充分证明了这个方法论原则的有效性。

革命事变表明，尽管引起各国爆发革命的直接原因各异，左右革命局势的众多事件也各具特色，然而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封建主义这一基本矛盾所制约，它们总是这样或那样地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从而表现出各国革命的共同发展规律。同时，由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从而也表现出各自的不同特点。在德国，革命的目标是革除君主专制制度，结束民族分裂，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在法国，主要是推翻金融贵族的统治、铲除封建残余，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而在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则主要是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因此，“这里所发生的不是在一个社会基础上的两个派别之间的政治冲突——这是两个社会之间的冲突，具有政治形式的社会冲突，——这是旧的封建官僚社会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斗争……”①既然这是一场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那么它就必须遵循以下法则：(1)它必须同旧的法权关系决裂，建立同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01页。

社会基础相适应的法制。革命不可能指望得到旧的立法的批准，相反，它要摧毁的恰恰是这些立法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只有通过充分发展的人民主权，即通过工人阶级和民主派资产阶级间的联盟，建立民主的共和国，革命才能完成。同资产阶级“协商论”所主张的保存旧“法制基础”相反，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必须在革命中创建体现人民主权的新立法，并对国家管理实行彻底改造，否则，一切民主成果都会丧失。(2)它必须同一切模糊阶级阵线和取消革命发展的妥协路线决裂。革命是各阶级及其内部各派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特别尖锐和紧张的斗争时期。阶级关系的迅速变化、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不断导致革命和反革命的两极分化，这是革命时期的基本特点之一。否认这种分化，企图通过各种政治力量的“协商”去调和冲突，只能导致反动势力的胜利。马克思指出：“早在反革命开始向我们猛扑的第一天，我们就说过，从现在起仅仅存在着两个党：‘革命者’和‘反革命者’；仅仅存在着两个口号：‘民主共和国’或‘专制君主国’。一切处在中间的已经不是党，而仅仅是派。”①革命的进程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随着1848年革命的失败，反动势力占据了上风。它们力图恢复革命前的状况，到处建立了反动专制政权：奥地利、普鲁士等恢复了封建专制的黑暗统治，并继续维持了德意志民族的分裂局面；法国建立了波拿巴的军事官僚专制政权，中断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进程；匈牙利等弱小民族重新陷入了被大国奴役的境地。革命中所取得的民主成果的丧失，宣告了资产阶级妥协路线的破产。

2．革命沿下降路线进行及其原因

1848年革命显著区别于以往民主革命之处，就是它并非沿上升路线而逐渐深入发展，而是沿下降路线而不断开倒车。以法国为例，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44页。

统治；吉伦特派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路线行进。”① 1848 年革命则相反，一些越来越温和的以至最后完全反动的集团掌握了政权，同时其中的每一个集团都是在保护“私有制、家庭、宗教、秩序”的口号下进行活动的。它们先是镇压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将其置于血泊和贫困之中；然后是剥夺了小资产阶级保卫自己“财产”的权利，将其置于破产和拍卖的境地；而最后，温和的共和派本身、工业资产阶级的许多集团的代表，也被以维持“秩序”的名义从政权中清除了出去，从而为波拿巴的反动军事独裁开辟了道路。

1848 年革命沿下降路线行进，是由于这一时期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不断地发生了有利于反革命路线的变化。其中最为引人瞩目而又令人困惑的，是资产阶级各党派转向反革命。这样，反动势力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变革命而占据了上风，而各革命阶层又缺乏足够的力量来推动革命沿着上升路线发展，革命的失败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似乎矛盾的是，一方面革命沿下降路线进行，固然要归咎于资产阶级的叛变，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则是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在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空前革命积极性。他们不再仅仅作为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而是坚持了本阶级的独立革命要求。这就使得革命在一开始便超出了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范围，从而把资产阶级从革命方面吓退了。另一方面，革命沿下降路线进行，又要归咎于工人阶级没有足够的政治积极性，没有更坚决、更有力地担负起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他们缺乏在民主革命的复杂环境中开辟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政治远见和革命坚韧性，缺乏把正视历史现实和发挥革命主动性结合起来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5页。

战略策略。这就使得工人阶级不能有效地团结农民和其他革命阶层以壮大自身的力量，不能通过持续不断的革命斗争去打败反动势力。因此，问题不在于无产阶级坚持本阶级的独立的要求而使革命超出了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范围，而在于能否正确地规定本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战略策略。①

毫无疑问，在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远远没有成熟到足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程度。1847 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到 1849 年便转变为全盛的工业繁荣，说明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不仅如此，在欧洲大陆，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不充分，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发展的不充分和不成熟。一般说来，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所制约的。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工业无产阶级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地位，使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并创造出它用以达到革命解放的现代物质条件。革命前，大陆各国实际上还没有经历过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们所直接面临的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在资产阶级宁愿违背自身利益而同反动势力一道镇压人民革命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民主革命避免失败的命运、沿上升路线发展的可能性在哪里呢？

3.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1848 年革命尽管失败了，然而它完全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即历史的重大进步总是通过深刻变革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而实现的。革命所以是“历史的火车头”，不仅在

---

① 普列汉诺夫过于机械地看待1848年革命的教训。他正确地看到了革命发展中某些超越历史条件的跳跃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强调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联合自由资产阶级的原则。但是，他看不到资产阶级已经无力领导民主革命，看不到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密切联系，因此，他否认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经过民主革命不间断地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

于它是摧毁一切业已过时的社会关系、推翻腐朽阶级的统治的必由之路，还在于它是锻炼建设新社会力量的熔炉。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提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① 从前者看，只要引起革命的那些社会矛盾没有解决，革命就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而它的失败就必然是暂时的——"革命死了，革命万岁"。1848年革命证实了革命和危机之间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因此而断言："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② 从后者看，革命的失败打破了人民的幻想，不仅无产阶级、而且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也日益革命化了。在革命初期，工人支持资产阶级运动，把它看成是解放社会的一切阶层的革命。例如，法国工人曾天真地要求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实行一系列社会主义的措施。由于革命事件发展的结果，工人对于资产阶级的口号、纲领和种种许诺的信念彻底破灭了，对于小资产阶级提出的社会改造方案的虚幻性、该阶级革命的局限性也有了清醒的认识。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始终充满幻想并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而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他们则帮助资产阶级击败了起义的工人。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使自己的财产和地位获得更多的安全和保障。相反，他们把自己推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只能毫无抵抗地接受资产阶级的盘剥和宰割。失败的教训终于使他们换来了对于自身利益的较为清醒的认识。因此，革命的失败中孕育着革命沿上升路线发展的新的可能性。"看起来彷佛社会现在忽然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还只是在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为保证现代革命能具有严重性质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4页。

绝对必需的形势、关系和条件。"①

二　资产阶级及其历史作用的演变

1848年革命完全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对于资产阶级及其历史作用的分析。在革命前夜写成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便强调尽管即将到来的德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然而它是在更加进步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下(与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相比)，在具有更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发生。因此，"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封建阶级之间的政治关系，决定了其中每个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表现，制约了整个革命的进程。乍看起来，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切民主成果成为资产阶级背叛行为的牺牲品，革命的失败竟然是希望革命胜利的那个阶级活动的结果，真是不可思议。其实，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这种令人吃惊的表现，乃是其阶级本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1. 资产阶级由革命转向反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从根本上说，资产阶级是个自相矛盾的阶级：作为新生产关系的代表，它必须团结人民通过革命去为自身的发展开辟道路，而作为私有制的维护者和剥削者，它又本能地害怕革命，害怕人民；作为新政治制度的代表，它只能用民主制才能战胜封建专制，而作为压迫者和统治者，它又极力地限制民主，维持其虚假的性质。因此，即使在资产阶级仅仅面对着封建阶级这一个敌人时，它同人民的联盟也是暂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总是"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然后便停下脚来，努力维持现状。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无产阶级的迅速崛起，资产阶级的矛盾本性发展得更为充分。一些后起的资产阶级(如德国)，在它同封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4—125页。

制度展开政治斗争的时候，后面却已经出现了另一个强大的对手——无产阶级，因而它天生怯懦并随时准备同封建阶级相妥协。在一些需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扫清道路的国家(如法国)，大资产阶级甚至也一开始便把消除无产阶级的威胁摆在首位。这样，和以往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在1848年革命中，当共同的敌人还未被完全打败、革命还刚刚开始时，资产阶级就转到了反革命方面。

资产阶级的矛盾本性表现为革命中行动上的自相矛盾——他们亲手建立起的民主共和国又由他们亲手葬送。本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该阶级无疑负有最终建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使命。然而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恰恰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了它在政治关系中的破产，造成了资产阶级民主及其一切属性的危机。(1)共和国本来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外壳，是资产阶级统治最强有力的和最完备的形式。但是，在阶级斗争最尖锐时期，恰恰是这种形式的民主主义在资产阶级看来是最大的危险，因为一切形式的民主对于它都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同义语。“甚至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教育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财政改革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2)议会制度本来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专制中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的实施方法，无论其局限性如何，它毕竟扩大了政治参与的范围。然而，当资产阶级面临着同无产阶级的斗争时，议会制度的演变方向就不是扩大民主，而是麻痹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并为专制权力的建立提供方便。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议会在自己的立法活动中，使立法和行政分权到“矛盾重重的地步”。宪法在它的不断完备过程中把实际权力授给了总统，从而为波拿巴的政变创造了条件。实际上，“宪法本身是在号召以暴力来消灭自己”。①(3)普选权本来是资产阶级政治的力量源泉，也是它掩盖阶级专政实质的“装饰”，因而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唯一的可能形式”。然而，面对着保皇党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36页。

的以暴力相威胁，国民议会交出了一个又一个阵地，并最终废除了普选权。这样，资产阶级就以自己的行动宣布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同资产阶级的安全和生存是不相容的……"它"不得不亲手把自己用来对付专制制度的一切防御手段尽行毁坏"。因此，波拿巴的政变是1848年革命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这个政权是资产阶级的反动阶层专政的特殊形式，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危机条件下的产物。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的政治自杀行为根源于其阶级本性，并受社会发展进程本身、阶级斗争的规律以及阶级力量的变化所制约。它是资产阶级在软弱无力的处境中所作的必然选择。既然1848年民主革命表现出了较之以往革命的许多不同特点，那么显然有必要对它们作个比较研究。

2.资产阶级革命的类型及其社会经济根源

1848年革命和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民主革命。虽然就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反对封建社会关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来说，两者是共同的，但它们之间具有重大的区别。(1)革命动力的变化。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是作为一个确实领导了反封建运动的先进的革命阶级而出现的，而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阶层只是作为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共同利益的唯一代表，"无产阶级和那些不属于资产阶级的城市居民阶层，不是还没有组成与资产阶级不同的任何单独的利益，就是还没有组成为一些独立发展的阶级或一个阶级的几个部分。"① 1848年革命则相反，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乃是卷入革命风暴各国的共同现象。它到处显示了资产阶级和革命的共同利益相对立、和革命的共同敌人相勾结。革命的主要推动力是无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农民阶级)，他们不仅积极参加革命，而且把推进革命和保卫自身的利益结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妥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4—125页。

(2)革命前途的变化。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尽管结局并非都能彻底消灭一切封建制度，然而革命所取得的民主成果却不可逆转，因而总是以胜利而告终。这类革命总是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1848年革命则相反，革命总是沿下降路线行进，革命一开始所取得的成果总是一点一点地丢失，以至逃脱不了失败的厄运。这类革命的意义并不在于其所取得的实际成果，而在于为下次革命作铺垫，因而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3)革命意识的变化。无论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还是1848年革命，参加革命的资产阶级都借助于其意识形态的虚幻特性影响革命进程。但是，其早期意识形态的虚幻和颠倒的方式，却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历史过程，即为消灭封建制度和建立资产阶级社会而进行斗争。它把自己虚幻地装扮为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却有助于动员人民去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而在1848年革命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的虚幻方式中丧失了反映真实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丧失了动员和团结人民进行斗争的进步作用，从而完全转变为否认历史发展和社会矛盾、麻痹人民斗志的辩护意识形态。① 因此，革命不能再在资产阶级的思想旗帜下进行，相反，它每向前跨进一步，都必须打破资产阶级的幻想。

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两种不同类型，根源于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19世纪以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唯一进步的

---

① 基佐和卡莱尔的转变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一转变的典型例证。基佐曾以他对阶级斗争的深刻阐述和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一定承认而对历史辩证法作出了贡献。但是，在革命的重压之下，他从以前正确的认识上退步了。他不再从历史过程和阶级冲突出发，而是先验地从"历史的理性"出发，并把君主立宪制看成历史理性的最终实现。资产阶级的天才人物就这样变成了保皇党的辩护士。卡莱尔曾站在封建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猛烈地抨击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在1848年革命中，"卡莱尔对资产阶级关系和思想的一切攻击"都转化为"对资产者个人的歌颂"。封建主义的思想家就这样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辩护士。这是耐人寻味的。

经济关系，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是唯一的社会主要矛盾，而资产阶级则是唯一有能力领导进行反封建斗争的革命阶级。这就是说，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在两种生产关系、两种社会制度尖锐对立的基础上，是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革命一方和以封建主义为代表的反动一方进行较量的结果。其实质是两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因此，“当时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民族对地方主义的胜利，竞争对行会制度的胜利，财产分配制对长子继承制的胜利，土地所有者支配土地制对土地所有者隶属于土地制的胜利，教育对迷信的胜利，家庭对宗教的胜利，进取精神对游侠怠懒风气的胜利，资产阶级法权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①

1848年革命则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是完全进步的社会现象。相对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它仍然是进步的、并在大多数国家仍具有继续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然而相对于其内部已经暴露出来的尖锐的社会对抗，它又是开始过时并逐步走下坡路的社会经济形态。一方面，它还能促进生产力较快地发展，因而还不具备马上被消灭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威胁其生存的新的社会力量确实又已成长起来，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使原来的两大阶级间的对抗变成了三大阶级间的较量，使资产阶级由原来革命一方的代表变成了具有两重性（革命性和妥协性）的中间力量。于是，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类型：由于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主义并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因而革命的性质仍然是争取资本主义制度的民主革命；又由于资产阶级已无力完成（甚至极力反对）这一革命，其主要推动力已是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阶层，因而它必然要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范围。正是这种类型的民主革命，和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发生了直接的联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5页。

三 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及其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原则

1848年革命完全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世界历史使命的科学论断，即：(1)“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它以大工业的普遍发展、以打破民族和民族间的狭隘地域性及普遍交往的建立作为存在和发展的前提；(2)无产阶级是阶级社会中唯一的没有本阶级私利、因而代表了全人类普遍利益的阶级，因此，它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3)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各国同时进行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它需要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普遍激化。无产阶级在1848年革命中作为社会民主运动的最彻底的革命力量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它提出了最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在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开倒车时坚决举行了武装起义。通过革命，无产阶级开始上升到作为现代社会中革命利益汇集中心的历史地位。同时，革命的失败也充分证实，无产阶级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它所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如何把消灭一切私有制的使命同消灭封建所有制的斗争结合起来，把争取民主改造和争取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汇合在一起。

1.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和联系

粗看起来，无论是比较这两类革命的区别还是寻找它们间的联系都十分简单明了。从区别上看，无产阶级革命的使命是消灭一切私有制和一切剥削制度。因此，它不仅要夺取政权，而且要运用政权作为改造旧经济和组织新经济的杠杆。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看，它都是以往任何革命所不能比拟的。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毕竟要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先驱。不经过民主改造，不彻底消灭封建制度，无产阶级革命就无从谈起。所以，从时间上看，

资产阶级革命在先，无产阶级革命在后，它们分属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现在要问，这两类革命能不能汇合到一个革命过程中呢？如果可能，它的客观基础又是什么呢？

1848年革命显露了这种可能性，从而揭示了这两类革命间某种更为深刻的联系。革命提供了以下经验事实：(1)在资本主义关系已有了相当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民主革命过程中必然会发生某些超出资产阶级革命任务范围的变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和其他一些革命阶级已经开始在政治组织上成为一个阶级。它们带着本阶级的独立要求参加民主革命，必然使革命不限于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范围。例如，法国工人阶级在二月革命中打出了"社会共和国"的旗帜，并要求国家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因而断言："在德国不可能发生纯粹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可能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资产阶级政权，可能发生的不是封建专制的的反革命，就是社会共和的革命"。①(2)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公开暴露并日趋尖锐的历史条件下，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不可能是资产阶级，而只能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普遍背叛革命的事实证明，在劳资矛盾公开化以后，资产阶级宁愿站在旧社会一边。剥削阶级的共同利益往往超过了它们间的对立。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已逐渐转变到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手上。这一重大变化决定了革命已不可能再按传统的资产阶级革命模式进行。(3)在资产阶级公开转向反革命的斗争形势下，革命要避免失败的命运，必须把各个很不相同的社会革命运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争取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造的斗争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运动)汇合在一起。资产阶级转向反革命，极大地加强了反动势力。革命人民中的任何部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或城市小资产阶级)仅依靠自身的力量都不能制止革命走向失败。他们只有坚强地团结在一起，才能形成足够强大的力量战胜反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46页。

势力，推动革命沿上升路线发展。而只有把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汇合在一起，才能使直接利益各不相同、革命坚定性和彻底性差别很大的各革命阶级，在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下团结战斗。因此，把两类革命汇合起来不仅可能，而且是无产阶级推进革命的唯一出路。这里，关键是正确地制定自己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原则。

2.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原则

革命事变为无产阶级正确地制定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原则提供了充分的教训。它们是：

(1)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当领导群众进行反封建的民主斗争。事实证明，无产阶级必须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民主制度为发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创造着最好的可能性。①但是，在革命的领导权开始从资产阶级向其他革命阶级转移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应当更坚决更自觉地担负起民主革命的领导使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无产阶级还缺乏领导民主革命的自觉意识。

(2)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当同农民阶级结成巩固的革命同盟。马克思在总结革命的教训时指出，只要得到农民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②虽然革命中也暴露了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地位的两重性，但革命失败的教训却使他们终于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因此，无产阶级只要策略对头，就可能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

---

① 在资产阶级转向反革命并血腥镇压了法国工人的六月起义后，某些革命活动家对工人阶级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之必要产生了怀疑。马克思断然反驳了这种怀疑，认为“只有意志薄弱的胆怯的思想家才会这样提出问题”。参阅《六月革命》一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53—1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665页。

(3)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应当又联合又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指出，共产主义者应当支持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应当同他们合作，前提是他们必须具有革命性，进行反封建的斗争。1848年革命证明：在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时，无产阶级既要反对脱离同盟者的宗派主义，又要在民主派阵营中强调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而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向反革命时，就要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策略原则作了如下概括："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想要巩固本身地位来谋私利的时候，就要加以反对。"①

(4)无产阶级应当建立自己独立的政党组织。革命失败的教训向人们表明，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有效地反抗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应当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这个党要以科学的世界观武装自己，并教育工人群众"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②

总之，唯物史观在被运用于对革命风暴中错综复杂的政治事件的分析、说明和预测中，证实了自身的科学性。它经受了历史和革命实践的检验，正如恩格斯所概括的："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③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和革命学说的发展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发展，时而把问题的这方面、时而把问题的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91页。

② 同上。第293—29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1页。

方面提到首位。1848年风暴直接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卷进了旋涡的中心，在激烈的震荡中加以筛选、取舍。其中，关于国家和革命的规律性问题、尤其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问题，处于理论发展的中心位置。马克思、恩格斯根据革命的经验，填补、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关于国家和革命的学说。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提出并制定了不断革命的理论，补充和完善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以及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理论。

一　不断革命理论的形成及其实践意义

上面提到的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原则，其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不断革命的思想。他们首先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中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初步设想，而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提供了不断革命思想的明确定义。他们的基本结论是，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够逐渐把劳动人民的民主斗争转变到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上来，能够通过自己的主导作用，把消灭封建阶级的斗争，同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结合起来，从而使革命不间断。应该说，这个思想在当时基本上是一种预言，一种设想，但是，它同时也是运用唯物史观对革命进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政治形势进行冷静的、科学的考察的结果。

1．不断革命理论的客观依据

在1848年革命中，各国(尤其是法国)所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事件，提供了揭示这一时期阶级斗争本质的大量的、丰富的实际材料。马克思恩格斯据此揭示了革命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即：今天，在那些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但仍落后的国家的革命进程中，一般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相互接近的不可避免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它奠定了不断革命理论的基础。

革命失败后，工人阶级面临着如何吸取革命教训、如何选择未来斗争的严重考验。马克思、恩格斯从1850年4月起，同工人运动中密谋派(其代表是维利希-沙佩尔宗派冒险集团）的理论和实践展开了斗争。初看起来，双方的分歧集中在当前的斗争策略上：是马上发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还是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进行充分的宣传组织工作？马克思指出：“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而你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①] 实际上，策略的分歧反映了世界观的分歧。密谋派的世界观是主观主义和唯心论的，他们以为革命可以不受任何客观情况的制约而人为地加以制造，以为个别人的活动可以根本改变历史发展进程；他们的世界观又是形而上学的，看不到长期积蓄革命力量同夺取政权的内在联系，尤其看不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在联系，不懂得革命主体的能动性和历史必然性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则客观地分析了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一方面确认无产阶级不具备马上夺取政权的条件，另一方面又确信它有可能通过自己的持续斗争为夺取政权创造必要的条件。不断革命的理论充分地体现了他们的这种立场。

那么，1848年革命提供了哪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实际材料呢？(1)革命从资本主义落后的国家向先进国家扩展。自法国二月革命后，革命迅速在德国、匈牙利等落后国家展开，并逐渐波及英国等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也相继掀起了争取普选权、要求改革选举制度的斗争。尽管当时英国还没有直接卷入革命风暴，但已经预示了这样一种可能：各国民主运动的普遍开展，必将激化国际矛盾并使英国卷入革命斗争；而英国的加入，又将使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65页。

欧洲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2)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转变。法国最为典型。如果说，二月革命就其任务、动力和实际结果而言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打着"社会共和国"旗帜的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其性质已经属于无产阶级革命。尽管工人起义被血腥镇压下去了，但它同样预示了这样一种趋势：变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3)最具意义的事实是民主革命领导权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移。革命已充分证明资产阶级没有力量团结人民去进行民主革命，而无产阶级作为唯一具有革命彻底性的阶级已经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尽管由于指导思想和策略上的失误，无产阶级未能在这个革命中把自己的领导作用完全变成现实，然而实现这种领导作用的道路已经开辟。既然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那么这一革命的前途就可能不停留在民主革命范围，而是直接推向社会主义革命。因此，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理论，既充分考虑了主体创造活动的客观制约性(既受客观历史进程的制约，又受自己具体历史本质的制约)，又充分肯定了历史主体所作出的选择对于历史发展过程的重大意义。

2.革命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所制定的不断革命的社会政治纲领中，突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对所有社会关系实行共产主义改造的要求，但这些要求只是不断革命的最终目的。他们反覆强调了在实现这些最终目的之前，欧洲无产阶级需要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并首先要实现一系列的较为彻底的民主改造。只有经过革命民主专政，才可能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不断革命必然包括两个相互衔接的阶段——民主改造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革命的第一阶段虽然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但却要保证革命的领导权和革命所建立的政权掌握在工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然后，由工人阶级夺得国家政权，对资本主义关系实行革命的变革，建立共产主

义社会。这其中的每一阶段还又可以区分为若干小阶段。① 同时，这些阶段的区分又是相对的，相互渗透的。在民主革命阶段，由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等因素，就已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若干萌芽；而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由于资本主义关系不很充分这一前提，又必须采取民主革命的若干策略。革命的总趋势是上升的、前进的，然而又是曲折反覆的。马克思作了这样的概括："像19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② 革命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相统一的原则，反映了历史过程的渐进性和跳跃性、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历史发展阶段不能随意超越，然而历史进程在革命的震荡中又必然异常迅猛，发展总是不平衡的。不断革命的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可以直接开辟通向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样一个革命规律，从而为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提供了争取解放的思想武器。它的科学性和重大实践意义，在后来的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和其他各国革命中得到了光辉的证明。固然，1895年恩格斯在再版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时承认，他们对1848—1849年和其后的欧洲革命会很快发展并且不断发展的估计，并没有得到证

① 据科伦共产主义同盟的一个领导人彼·格·勒泽尔提供的证明，马克思具体地区分了不断革命过程中五个相互辩证过渡的阶段："（1）结果由民主的小资产者掌握政权的当前革命之前的阶段；（2）民主共和国；（3）社会共和国；（4）社会—共产主义共和国；（5）纯粹的共产主义共和国。"参见（苏）纳尔斯基等编著的《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第30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5页。

实，因为历史发展表明资本主义还具有未耗尽的潜力。同时他强调，把关于未来革命期限观念的确切化是需要作的“唯一重大修改”。然而恩格斯的观点却被第二国际的许多理论家曲解为对不断革命理论的否定，尤其曲解为对用以指导1848年的策略思想的否定。[1]实际上，即使在1848年，不断革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现实的历史总是由多种可能性构成的，这就给历史的主体留下了创造活动的余地。用作为主体选择和实践结果的、已经成为现实的单一可能性，否定人们在创造历史时有多种可能的选择，这不是唯物史观，而是机械论和宿命论。

二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完善和具体化

在1848年革命的前夜，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思想”。他们考察了消灭资产阶级专政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之间的密切联系，大致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但是，他们尚未形成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概念，还“没有提出究竟应当（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怎样以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2]在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的基础上，马克思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包括这一术语）的科学概念，第一次得出了打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客观必然性的结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重大进展。

① 最早和最全面地否定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理论的，是爱德华·伯恩施坦。他于1898年写了《布朗基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一文，把马克思的不断革命思想归结为崇拜暴力的布朗基主义的影响。他认为1848年革命只能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只能尽力帮助资产阶级巩固其统治。因此，他无保留地歌颂法国二月革命后所成立的资产阶级政府，批评法国工人的六月起义不是严肃的阶级斗争，而是本应竭力避免的不幸，极力推崇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的路易·勃朗派。普列汉诺夫1905年在对马克思恩格斯1848—1852年期间著作的研究中，也根本否定不断革命思想。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190、194页。

1.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在直接参加1848年革命的过程中，马克思把他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逐步具体化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他们在从事《新莱茵报》的革命新闻活动中，就得出了废除全部的政权(行政、军队和法院)乃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必要条件这个结论；在总结法国革命的经验、尤其是对波拿巴政变现象的研究中，明确提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①] 革命为马克思形成这一思想所提供的主要根据是：

(1) 受资本主义本性制约的政治集中过程的实质是军事官僚集中的过程。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必然需要消灭封建割据、形成统一民族国家的政治集中过程。这个过程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适应了现代社会生产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因而是进步的；然而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低级形式的集中，即以行政权力的完备和独立化的形式实现。最能表现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两种机构，就是官吏和常备军。以法兰西第二帝国为例，“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军队”。这是由资产阶级的物质和政治利益所决定的。如果不经常地使用直接的粗暴的暴力，如果没有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支配社会的特殊机构(军队、警察、官僚)的经常工作，资产阶级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专政。因此，《共产党宣言》中“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这一思想，便合乎逻辑地具体化为：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而必须摧毁这个国家机器。

(2)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之一，就在于它保存并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6页。

不断加强了国家机器。以官吏和常备军为特征的军事官僚机器的形成，并非开始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它是封建君主专制时代的产物。然而，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漫长过程中，“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①在法国革命的进程中，先是共和派资产阶级用武力镇压了无产阶级的起义，然后是保皇派大资产阶级用高压手段镇压了小资产阶级的反抗，因而就一步一步地加强了行政权力并使之集中化。资产阶级不仅保留而且要不断加强军事官僚机器，是其剥削阶级本性的需要。它不仅要靠专制的暴力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而且要通过庞大的、臃肿的国家机体来增加自己的收入。资产阶级国家已经成为社会的肿瘤和寄生虫，成为榨取劳动人民血汗的重要剥削集团。既然无产阶级革命旨在消灭一切剥削制度，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必须包括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3)资产阶级官僚机器的完备和加强，是革命沿下降路线行进的重要原因。波拿巴的热月政变是革命中资产阶级转向反革命的极端表现，也是沿下降路线行进的革命的终点。热月反革命政变的先决条件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独立存在，它对社会的超越和支配。这种国家权力，不仅不受人民的支配和制约，而且凌驾于人民之上并对群众的任何历史首创精神进行镇压。它把阶级斗争变成了单纯的争取行政权力的斗争，从而为各式各样冒险家的上台提供了可能。正是不断强化了的官吏和常备军这两种机构，才使波拿巴政变成为现实。“和市民社会比起来，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现在竟能以……一个从外国来的、被喝醉了的士兵拥为领袖的冒险家做首脑，而这些士兵是他用烧酒和腊肠收买过来的，并且他还要不断地用腊肠来讨好他们”。②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6页。

这种从社会外化出来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异己权力，是人民主权的对立物。既然无产阶级专政要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上升为统治阶级，那么显然，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这种异化的社会权力。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列宁把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称作"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由于历史材料的限制，马克思此时还没有具体提出用什么东西去代替这个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问题。

2.无产阶级专政科学概念的形成

由于具体解决了如何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道路，从而为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50年代初期，马克思开始形成了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其要点是：

(1)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地位。1855年3月5日，马克思在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把自己的理论成果概述为："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 在这里，马克思简要而突出地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地位。从实践方面看，它是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必然趋势，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和全人类的必由之路；从理论方面看，它是马克思的主要理论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资产阶级国家观的根本区别。无论在当时或今天，它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②

(2)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和任务。作为走向消灭一切国家和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09页。

② 因此，第二国际的某些理论家（如考茨基），借口无产阶级专政只是马克思"偶尔使用的一个词"而断言其过于偏激时，显然是错误的。不仅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地实践了这一思想，而且就是在今天，如果考虑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主要不在于使用暴力，那么，它也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在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

切阶级的过渡阶段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质。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建立无阶级社会的必要手段。因此，它不仅包括粉碎剥削阶级反抗的镇压职能，更主要的是执行创造性的建设职能，即在创造新型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的过程中，创造全面发展的个人；它是行政权力和社会公共权力逐渐向社会复归的过程，是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新型民主类型、真正实现人民主权的过程，也是它所建立的新型国家逐渐消亡的过程；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是生动的、不断变化的，它不仅必然有多种政治模式，而且每一种模式本身也是变化发展的，不能把它看作僵死的、永恒的。

(3)无产阶级专政和不断革命。为了区别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提出了革命社会主义的概念："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① 这里把"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共同作为革命社会主义的特点，也就揭示了两者的内在联系。"无产阶级专政"既是"不断革命"的目标，又是它的较高发展阶段；而"不断革命"既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又是它的基本精神。用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去把握"不断革命"，就不会使之成为空话；用"不断革命"思想去把握无产阶级专政，就不会使之凝固和僵化。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中关于国家和革命问题的这两个主要发现，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

三　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奠基

1848年革命把军事问题提到了突出的地位。不仅在革命过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04页。

中始终贯穿着革命武装同反革命武装之间的激烈较量，而且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更把如何正确组织军事活动问题尖锐地提到了无产阶级政党面前。在马克思、恩格斯对于革命经验的总结中，作为他们的主要结论的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已经内在地包含了暴力革命的原则。因此，军事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发现转化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它"在最近的运动中将具有重大的意义"。① 同时，革命也提供了研究军事问题的机会。革命导师不仅从中获得了关于战争问题的大量第一手材料，而且恩格斯本人就直接经受了战火的锻炼。②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对1848年革命的科学总结，同时奠定了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基础。恩格斯对此作出了主要贡献，他的《1855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1851年4月)、《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5年8月)等著作，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军事和战争问题的最早尝试。③

1.战争和军队的本质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战争和其他一切社会历史现象一样，都应当"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76页。

② 1849年5月，恩格斯亲身参加德国群众武装起义的行列，在爱北斐特组织工兵连，参加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的安全委员会的军事会议。6月13日，他在普法尔茨担任了共产主义同盟盟员奥古斯特·维利希(1810—1878)所领导的志愿部队的副官，并先后参加了拉施塔特会战等四次战役。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95页。

③ 根据和马克思在具体研究上的某种分工，从1850年11月底起，恩格斯开始系统地研究军事问题。他除了密切注视世界各地的战争，还认真研究了军事学术史，广泛阅读了包括克劳塞维茨(1780—1830)著作在内的许多军事著作。这种研究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其间写下了约150万字的军事著作(连同书信共计300余篇)，并形成了较系统的军事思想体系。这里介绍的，只是他以1848年革命为依托的最初研究阶段。

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恩格斯吸收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观点的合理成分，把战争看作是一定阶级和国家的政治产物和继续，看作为实现特定的阶级利益而采用的暴力行为。他的这个结论，是在充分研究和比较各类战争现象的基础上作出的。例如16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似乎纯粹是异教和教会之间的斗争。实际上，由于教会是一切封建特权的集中代表，"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另外，所谓异教，又可分城市异教和农民平民异教。它们在反对教会的态度、方式和根本要求上差别很大，皆因两者的阶级利益不同。可见，"16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也根本是为着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同稍后时期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①至于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战争，它的经济根源和阶级属性更为明显。"它的前提是资产阶级和小农的社会和政治的解放。资产阶级出钱，农民当兵；两个阶级解除封建的与行会的枷锁，是产生现今的庞大的军队所必需的条件；而与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相联系的财富和文化的水平，同样是保证现代军队有必要数量的武器、弹药、粮食等，培养必要数量的有素养的军官，以及士兵本身智力发展所必需的条件。"②

这样，恩格斯就拨开了唯心史观罩在战争问题上的层层迷雾，把唯物史观成功地运用于说明这一社会现象。诚然，由于历史材料的缺乏，恩格斯在这里还没有严格区分原始社会的战争现象和阶级社会的战争现象，还没有具体提出(以及解决)战争的起源问题(这些是后来根据人类学的最新成果而对原始社会作专门研究后才逐渐揭示的)。但是，由于论证了战争是阶级和国家的政治的产物和继续，确定了它对于经济发展、阶级斗争的依赖性和历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0页。

② 同上，第557—558页。

作用，也就为解决上述问题奠定了基础。

军队作为战争的主体和实际承担者，和战争属于同一序列的社会现象。它同样为社会的经济条件和政治变革所决定并为之服务。恩格斯对军队所下的定义是："国家为了进攻或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① 对于它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国家的政治，人们一般是承认的。问题在对于经济发展的依赖性。恩格斯认为，实际上，军队的类型总是同社会制度的类型、从而同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相一致的。经济状况不仅决定了军队的武器装备、军官和士兵的素质以及军队的士气，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军事体系和作战方式的变革。他指出，"现代的作战体系是法国革命的必然产物"，"现代的作战方法是以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解放为前提的，它是这个解放的军事上的表现"。② 他从军事方面分析了资产阶级军队区别于封建军队的特点：一是运动性，即军队(包括单个士兵)及其装备的机动和运动的较大灵活性。这是经济、文化、交通和军队素质等多种因素的综合，"革命前的军队的不灵活，正是封建制度的反映"。二是众多性，即能够征召入伍和参加作战的人数在全体居民中占的比例较大。它"和运动性一样，也是现代化文明军队的特征"。③ 经济越发达、科学技术越进步、能够生产和使用进攻性的武器越多，其军队的众多性就越强。由于军队对于经济和阶级政治的依从关系，恩格斯因此而预言："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这是很明显的。"④ 他在这方面同样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和探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57、561页。

③ 同上，第560页。

④ 同上，第562页。

2.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规律

1848年革命证明，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离不开使用革命暴力和进行革命战争。“不断革命”的重要环节是武装斗争，而“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只能是用革命的暴力消灭反革命的暴力。但是，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所必须使用的暴力将采用什么形式呢？恩格斯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肯定并论证了群众起义、游击战争和人民战争的形式与战法。

(1)武装起义。这是革命过程中最常见而且对于人民解放必不可少的战争形式，然而“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么忽视它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恩格斯总结出的主要规则有：第一，不要玩弄起义，轻率地发动起义，一定要作好充分的准备。起义本身是带有若干极不确定的数的方程式，加之敌人的战斗力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据优势。如果起义者不能经过充分准备并集中起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必然招致失败。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人尚未集中起来就战胜他们，分化他们，迫使他们退却。①此外，恩格斯指出：在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而在决定性的关头，不计成败地进行最后的斗争也十分必要。没有遵守上述规则，也是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

(2)游击战争。对于弱小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来说，群众起义必然伴随着游击战争。恩格斯指出：“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只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02页。

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的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①对于起义民族来说，它的力量不在于进行决定性的会战，而在于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因此，伏击、骚扰、奔袭等是主要的作战方法，其主要目标也非敌军主力，而是其要害而薄弱的部分（交通线、给养、首脑机关等）。

(3)人民战争。恩格斯在研究1848年革命中的民族解放斗争经验时，提出和发挥了人民战争的思想，认为这是反对外国奴役者的广泛全民运动所特有的战争形式。在评述意大利军队反抗奥军的战争时，他首次提出要把"军队的普通战争"变为"人民的战争"。②这在当时是他对于群众起义和游击战争的一个总称。他认为，这种战争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易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革命勇气，能够较好地战胜强大的敌人。但是，人民战争并不排斥正规军作战。他指出："在我们今天，要胜利地进行任何起义或非正规的军事行动以对抗强大的正规军，就必须有正规军的支援。"③所有这些，都以对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历史主动性的充分信赖为基础。

3.军事中的战略、战术和各种因素的辩证关系

恩格斯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具体地分析军事活动中战略、战术和各种基本因素的辩证关系，初步形成了军事辩证法思想。

(1)战略和战术。他认为，作为一个军事统帅，关键"要善于正确地估计政治形势，擅长战略、战术"。战略目标是衡量战争成败的主要标准，"如果这个目的没有达到，那就是说不管他们如何重创敌人，他们也是遭到了真正的失败。"④战略的表现形式是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61页。

② 同上，第46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48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244页。

战争计划。它并非单纯的军事计划，而是政治计划和军事计划的辩证的统一。因此，它绝非军事统帅的"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对敌我双方的历史、政治、文化诸因素综合比较的客观反映。再伟大的统帅，如果仅凭自己的战略想象力制定计划，就必然要招致失败。拿破仑的"克里木远征计划"的破产便是一例。但是，这并不否认决策者本身的素质(包括其性格、气质)的作用。恩格斯认为，过分谨慎和过分的大胆都会给决策带来失误，需要的是谨慎和大胆的有机结合。① 在战术理论方面，恩格斯十分强调因时因地灵活作战的原则，并初步探索了战争中的集中优势兵力、进攻和防御、山地战、攻防战等问题。

(2)人和武器。在战争中，人和武器的辩证统一构成军队的战斗力。因此，恩格斯反对片面地夸大人的作用或武器的作用。他认为，人的因素包括官兵的军事素养(知识和技能)、文化素养、身体素质、勇敢精神以及组织纪律性等，这些是首先要强调的。因为"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人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的"，"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② 但是，对人的因素的强调内在地包含着对武器因素的强调，因为"每个在战史上因采用新的办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将领，不是新的物质器材的发明者，便是以正确的方法运用他以前所发明的新器材的第一个人"。③ 而这些伟大将领的造就，又依赖于特定的主客观条件。这就是战争中的主客观辩证法。

(3)士兵和将帅。恩格斯认为，将帅在战争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他们的军事素质和指挥才能往往对战争的胜负产生重大的影响。例如，几乎相同的法国军队，在拿破仑统帅下和在其侄子路易·波拿巴的统帅下遭到完全相反的命运，就充分说明了统帅的作用。但是，"拿破仑在军事科学上卓越的改革不能视为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5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23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65页。

迹；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就如像革命和拿破仑所创造的军事科学是革命所产生的新关系的必然结果一样。”“生产力的增长是拿破仑作战方法的前提；新的生产力同样是军事上每一种新的成就的前提。”① 因此，拿破仑的成功，同时也证明了同生产力发展相联系的新式武器和同生产关系变革相联系的新的士兵的力量。“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② 恩格斯在50年代对军事问题所作的开创性研究，简单说来就是这些。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

1848年革命突出了意识形态问题的地位。革命过程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十分巨大，以至于对无产阶级说来，不能及时和完全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幻想的影响，成为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革命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前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即它对于特定阶级物质利益的从属性；然而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并提供了较丰富的有关实际材料。这些问题大致有：意识形态和历史主体的活动及其主体地位形成的关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性及其演变规律，科学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必要性和条件性，等等。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

一 意识形态和历史主体的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侧重从发生学的角度，揭示了意识形态从社会存在中分化并异化的过程。但是，革命的过程特别明显地表露：意识形态不仅仅是观念、传统的信仰体系，而且是人们创造历史活动的有机部分，是主体创造历史的重要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6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82页。

式，它并非是每个阶级都具有的一般思想、观点，而是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阶级所特有的自觉意识，因而是历史主体地位确定的重要标志。这就提出了从结构和功能方面进一步研究意识形态的课题。

1.主体活动的思想形式和物质形式间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在确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的同时，确定了人们在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这意味着，历史规律不能置于主体的活动之外，相反，它本身就是主体活动的规律，因而既具客观必然性，又具主观自觉性。马克思在总结革命经验时重申了这个规律："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 由此产生了主体活动的物质形式和思想形式、历史前提和创新变革间的辩证关系。毫无疑问，物质生产形式是主体活动的最基本形式，也是具体历史主体形成的决定性基础。在革命过程中，主体活动的物质形式表现为现实的物质的阶级利益，它构成一切政治形式和思想形式斗争的基础。革命的实质在于各个阶级为实现自己的物质生活利益而进行斗争。但是，革命也突出了思想对事变的发展过程所起的能动作用，突出了意识形态和阶级的经济利益间的复杂联系。

(1)阶级经济利益转化为意识形态形式的必然性。尽管物质利益是阶级斗争的根源，然而物质利益的实现即得到历史的承认却不能由经济本身自动开辟道路。相反，它必须取得人们的理解，为群众所拥护和接受，而这只有经过意识形态的中介。借助确立理想、提出口号、制定纲领等手段，激发群众的热情和历史创造性，使他们为共同的利益(其实是某个阶级的利益)而战斗，这就是意识形态的特殊功能。因此，从表面上看，革命的根本动力似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页。

乎是思想和动机，革命成败的关键似乎在于意识形态的力量，即革命意识能否最终支配群众。这个事实表明，既不能把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绝对化(如唯心史观)，也不能否认意识形态的巨大能动作用(如经济决定论)。从意识形态方面恰当地表达自身的根本利益，对于革命和争取解放的阶级具有重大的意义。

(2)意识形态和主体历史活动的选择性。对于某一时代的人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总是其历史活动的出发点。这种客观制约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随意创造历史，由此而形成了历史发展的统一趋势。然而，开创未来、实现历史任务的具体途径又是多样的，正在从事创造历史活动的人们总是面临着多种可能性的选择。革命时期使这种选择空前活跃和激化，它逼迫人们在多种可能中作出决断。一般说来，各种可能是通过意识形态形式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越是进步的意识形态，就越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吸引群众，调动他们的历史主动性，因而就越能体现主体的历史选择性。相反，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只能面向过去、力图维持现状甚至开倒车，当然也就谈不上选择性。因为过去只存在着已经变成现实的单一可能性，只有创造未来的人们，才面临着多种可能的选择。

(3)思想活动形式的主体和物质活动形式的主体间的某种分离。由于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着的劳动分工，意识形态基本上不是由劳动群众、而是由职业思想家所创造和深入研究的。虽然群众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为思想家们的活动创造了历史的范围，使他们的思想超不出特定阶级的生活界限，然而这种决定作用并非直接的。一方面，只有拥有自己思想家的阶级才可能形成本阶级的独立意识形态，而其他阶级虽然也存在着本阶级的一些本能的要求，却不能在意识形态上独立。这种依从性使得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变得模糊了。另一方面，思想家们创造意识形态的直接依据是精神文化传统，而不是现实的物质利益。相反，群众形成任何新的关于利益的观念，都离不开思想家的“启蒙”。这类

似乎颠倒的现象，恰好表现了意识形态和物质利益的某种复杂联系。总之，主体活动的物质形式和思想形式在具体历史进程中是相互作用的。物质形式的决定作用只能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去把握。

2.意识形态过程中的主客观辩证法

意识形态是由人们在其历史活动进程中创造出来并加以改变的，因此，是人们活动的产物。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意识形态一经产生，意识形态的观念、形象等等便成为群众的历史活动的客观条件之一。可见，存在着意识形态过程中客观与主观的辩证法：具体的历史主体创造意识形态，而这些意识形态则不仅是主体的创造物，还是主体活动的客观条件。要弄清这个辩证过程，必须进一步分析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

(1)思想的客观化和客观化的思想。意识形态是具体的历史主体主观状态的表达，是它的客观化。它不仅是思想观念等等的体系，它还具有一整套制定、表达、宣传、传播这些思想、观念的物质设施，因而能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这就使它能在一般的思想、观念所无法比拟的广泛范围内持久地发生作用。不仅如此，它还作为人类的主要精神传统代代相传，直接制约着意识形态的一般结构，使之取得了独立发展的外观。这意味着，作为每一时代的人们从事历史活动的前提，不仅有他们从上一代人中继承下来的生产力和经济关系，还有特定的意识形态。正是这种“客观化的观念”，使人们(例如在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那里)有可能把自身隶属于某种“人格化的精神”。

(2)客观的知识和主观的价值的融合。在意识形态上理解社会生活的过程，一方面包括对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和规律的反映，另一方面则包括对它们的评价，对各社会集团的目的和意图的表达。这两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中具有不同的性质。但是，一般说来，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在意识形态中是通过

各特定社会集团的目的、利益的三棱镜来实现的。因此，意识形态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取决于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在多大程度上和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由于剥削阶级的利益同历史发展的一致总是相对的、短暂的，因而它们的意识形态中知识和价值的关系最终必然转化为尖锐的对立，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也只能采取幻想的形式。① 虽然如此，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却不取决于它的自我评价，而是取决于它反映客观现实的深刻程度。这是能否支配群众及支配持续长短的基础。

(3)抽象的理论形式和实际的行动纲领的汇合。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前就分析过，意识形态的特点之一是其抽象性，即远离社会经济生活过程。但是，这种抽象的理论形式，不仅把它对经济关系的依赖性隐蔽起来，还造成了"超越"现实并积极作用于现实历史进程的条件。它以"理想"、"历史传统"、"思想权威"等为中介，构造人们的活动动机和行动的纲领，直接参与人们的实践活动，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变化。因此，在这方面，意识形态的主客观的辩证法表现为抽象的理论形式转化为现实的行动纲领以及反过来的双向运动过程。这一过程在革命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和强烈，从而暴露出社会的变动和意识形态变动的一致性。可见，意识形态之所以能成为主体活动的客观条件，并作为创造历史过程的重要因素发挥能动作用，应当归因于其本身的主客观矛盾结构及其功能发挥过程的主客观辩证法。

二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演变规律

1848年革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发生根本转变的标志。随着该阶级从革命转向反革命，其意识形态也从动员群众参加民主革命转变为使人民群众偏离这个任务。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

① 因此，当代资产阶级的流行观点之一，是断言科学和意识形态的绝对不相容，从而根本否定科学意识形态存在的可能性。

响，使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彻底认清自己的根本利益，已经成为争取革命胜利的首要问题。以至于马克思认为："1848年革命运动的主要成果不是人民赢得了东西，而是他们失去了东西，——他们丢掉了幻想。"①遗憾的是，这是以革命的失败为代价的。为了从世界观上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必须结合革命的经验，对该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再认识。

1.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形成的基础及其矛盾本性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依赖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发展条件，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舆论准备和思想先导。这个革命自身是矛盾的：它本来不过是以一种社会对抗的形式去代替另一种社会对抗的形式，因而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然而另一方面，它又只有通过广泛地动员群众，组织他们进行革命斗争，才能实现历史发展所必需的反封建变革，因而又需要广泛的群众性。在这一矛盾的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形态，必然具有矛盾的本性。

(1)以虚幻的形式反映客观现实。在反映和论证反封建的社会变革的客观历史必然性的过程中，由于要把资产阶级特有的、本质上是自私狭隘的阶级利益表达为人民的普遍利益，因而使资产阶级意识在一开始便具有幻想的特征。它使资产阶级革命理想化，把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社会宣布为"理性的千年王国"，把资产阶级的胜利宣布为全人类的共同胜利；它使抽象的理性原则作为社会生活的本质，把伟大的发现、热烈的想象、思想的启蒙看作历史的根本动力，把英雄和天才看作社会的真正主宰。它始终沉浸在自我陶醉中而缺乏真正的自我批评。但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尽管是以唯心主义的颠倒和幻想的方式，却仍然反映了真实的历史过程，即消灭封建制度和建立资产阶级社会的必然性。这种历史必然性中蕴含了下述事实：谁最明确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62页。

表达出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谁就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普遍要求。因此，在当时，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同整个第三等级的利益以及普遍的历史进步一致。可见，幻想的方式中仍然包含了部分真理性的内容。同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幻想，在实现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革命转变中，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刺激作用。它给充满了英雄行为的革命群众提供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①

(2)从历史传统中寻找现实斗争的旗帜。为了模糊现实斗争的阶级实质和真实内容，资产阶级必须从历史传统中寻找精神支柱。“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②例如，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中，克伦威尔及其追随者所借用的旧约全书中的先知形象；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者所借用的古罗马共和国的形式和观念等等。尽管对传统的意识形态形象的利用都根据现时代的需要进行了选择，并以新的内容进行了改造，然而它本身却是引导人们向后看。这种形式同样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矛盾性：为了消灭强大的封建势力，它需要面对现实和开创未来，而为了掩盖本阶级私利和群众根本利益的对立，它又需要逃避现实和面向过去。

(3)内部结构的矛盾性。上述功能作用机制的矛盾性，不外是这种意识形态内部结构矛盾性的作用过程。意识形态的各种要素(知识和价值、抽象理论和实际策略、思想家和阶级等)都以矛盾的形式组合在一起。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尚未公开暴露、资产阶级还作为一个革命阶级时，其意识形态结构的矛盾也暂时掩盖着。然而正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2页。

② 同上，第121页。

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内部的矛盾性也不可避免地趋向尖锐。与此相一致，其功能作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2.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演变规律

随着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转向反革命，其意识形态必然要发生重大的变化。主要有：

(1)结构的多元化倾向。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矛盾的加剧，使得公开掩盖这个矛盾已不可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便从公开的自我美化转变为制造其内部思想派别的斗争的假象，以转移和掩盖社会阶级矛盾。同时，由于资产阶级利益和群众利益相吻合这一共同性的丧失，其意识形态内部所潜藏的矛盾也必然显露出来。如果说，“科学”和“民主”曾经是资产阶级战胜封建势力的强大武器，那么，当它的利益和社会进步趋势相违背时，其意识形态内部的知识和价值就再也难以统一了。从自身的价值观出发，意识形态愈益排斥科学知识，信仰和非理论因素逐渐占了上风。如果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制定的关于一切人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和口号，尽管在一开始就具有虚幻的性质，然而它毕竟曾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出发点而被有条件地实行，那么，当它的利益直接受到人民革命的威胁时，它就要转过来反对自己所提出的口号了。理论同实践、理想和口号同实际政策之间产生了严重的脱节。如果说，在资产阶级革命的上升时期，其意识形态的主体(思想家和阶级)还基本一致的话，那么，当它转向反革命时，这个主体自身也发生了分裂。“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资产阶级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①] 这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必然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其中，最基本的是两极对立：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功利主义和人道主义，等等。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因此而被转移和掩盖。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98页。

(2)幻想作用的转变。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其意识形态的幻想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掩盖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内容，同时也给人民完成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以必要的思想动力。但是，1848年革命表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幻想，已经丧失了革命的思想动力的作用而转变为纯粹的辩护意识。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斗争已经提到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相同内容的虚幻观念，也不再反映任何历史的真实进程。相反，它只能迷惑和束缚人民群众的革命主动性，阻碍和扼杀无产阶级的觉醒。而实际上，幻想的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其主要攻击目标已经不是封建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它不得不抛弃传统意识形态中的民主性精华。“资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弃了它。它了解到，一切所谓的市民自由和进步机关，都侵犯它的阶级统治，并且既威胁它的社会基础，又威胁它的政治上层，因此这些东西就成了‘社会主义的’了。”① 在这种情况下，当它继续制造美化资本主义的幻想时，就是美化落后、腐朽、反动的事物，因而丧失了任何推动历史的思想动力的作用。

三 科学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

对1848年革命中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使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确立了下述信念：科学意识形态同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的结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革命证明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正在增长，它正在成为革命群众反对封建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的中坚力量和领导者。但是，革命也证明工人阶级并不能自发地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不能轻而易举地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幻想的影响，从而证明了科学的意识形态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65页。

意义。阐明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是促使科学意识形态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之必需。

1.无产阶级意识的一般特点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形成独立的阶级意识的劳动阶级。这固然要归因于它的阶级本性：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代表，它不仅是唯一能打破私有制基础上狭隘的社会关系而开创新型社会关系的阶级，而且是唯一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开始拥有本阶级的思想家、因而能超出剥削阶级狭隘眼界的劳动阶级。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自觉性，是无产阶级革命区别于其他劳动人民革命斗争的显著特点。由于资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代表了私有制发展的最高水平，因此，在论述无产阶级意识的特点时，必须同它的意识形态做个比较。

(1)依靠科学和知识，不需要任何幻想。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同，无产阶级由于没有特殊的阶级利益，没有任何需要隐瞒的意图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它的阶级意识就不需要任何幻想。它只有彻底消灭全部现存社会关系，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在空前艰巨、十分现实的社会革命任务面前，需要的显然不是空话、幻想，而只能是科学态度和实际行动。因此，无产阶级意识的根本要求是：力求最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各种趋向，以及作为各阶级物质利益的冲突的社会斗争的本质和特点，就是说，它以科学地认识历史过程为前提。一切幻想(即使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作用的幻想)，都不可能达到对于历史必然性的认识，都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靠幻想来对共产主义所作的预见，在实际上只能成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预见。”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高度评价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六月革命和过去一切革命不同的地方，就是根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5页。

没有幻想，没有冲动。”①

(2)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吸取前进的力量。无产阶级革命是和整个旧世界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它所要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自己的根据。因此，无产阶级的意识不需要借助历史传统来提出和实现自己的革命任务。相反，它处处要克服对于过去事物的迷信，以免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致使革命停顿。马克思对这一特点作了以下的概括：“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② 总之，无产阶级意识是科学性和阶级性、理论和行动纲领等的有机统一。

2.无产阶级自觉意识的形成过程

无产阶级并非一开始就形成了自己的阶级意识。在资产阶级开始进行反封建的革命时，无产阶级只是作为民主革命的追随者。它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和资产者利益的根本对立，相反，它确信资产者是全体人民(包括自己)利益的代表。直到1848年革命，虽然工人阶级的自觉意识已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却仍没有根本脱离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这说明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形成，并非一个自发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革命的经验时，特别强调通过以下途径提高无产阶级的自觉性。

(1)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对工人群众进行广泛持久的宣传教育。尽管在革命前夕，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已经公开问世，然而在自发的工人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3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4页。

级思想。尤其是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转向反革命后，工人群众尽管仍坚持了革命的立场，然而在政治思想方面还难以同它们完全分离。只有建立起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用科学的世界观武装这个党，并通过它去教育广大工人群众，才能有效地促使工人阶级的自觉意识的形成。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革命经验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之一。①

(2)在批判和改造旧世界的同时"自己批评自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制造的最主要幻想，就是绝对地美化自身。因此，它的批判锋芒只针对外部世界。与此相反，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回过头去批评自己，是无产阶级最优秀的品格之一。这是它所以能不断地脱离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并最终接受科学意识形态的内在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表明，每经过一次重大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都有所增长，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深入了一步。这显然不是偶然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的一个规律，就是它能够不断地清除其中的不切实际的成分，使自己和实践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丰富和发展，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参加1848年的群众革命斗争，是他们生平事业中突出的中心点。他们对这次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不朽财富。

思考与讨论

1.1848年革命如何验证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2."不断革命"理论的历史根据和实践意义。

3.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1848年革命时期的补充和发展。

4.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主体思想和意识形态理论在1848年

---

① 参阅《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88—299页。

革命時期的发展。

5.资产阶級意歉形态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区别及各自的发展規律。

第六章 《资本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资本论》的创作过程

一 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发展及其成熟的标志

1．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前科学时期

青年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国家和法的过程中，认识到必须进一步解剖这种政治体系的尘世发源地即市民社会，因而从1844年起便集中精力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其直接目的是要从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入手，探讨私有制的本质、起源及其发展问题，证明私有财产的消灭和共产主义的出现是历史运动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他看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唯一肯定的进步是探讨了私有制经济运动的各种规律，但是却没有提出私有制本身的合理性问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私有制被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私有财产被看成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事实，而资本主义则似乎是由人类本性决定的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这种反历史主义的、无批判的实证主义观点自然要遭到当时已转变到共产主义立场的马克思的坚决批判。但是，由于马克思当时的共产主义立场带有浓厚人本主义色彩，这种批判还只是限于揭露私有制的反人道性质。因而，他就不能不把政治经济学同私有制一

起加以否定和摒弃。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局限性，使马克思在1845年以前的经济学研究中，未能充分地估价和利用古典经济学家发现和阐明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而是把它的科学成就和阶级狭隘性一同抛弃。马克思不仅抛弃劳动价值论这一古典经济学的优秀思想成果，而且从总体上对古典经济学作出了完全否定性的评价。

2．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时期

进一步的研究，使马克思发现了用人本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虚弱和无力。不是别人，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力求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他们把利润、利息和地租这些具体的财富形式归结为工人的无偿劳动，从而为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内部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前提。

标志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发生根本转变的是他写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不仅系统地制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批判构筑了坚实的理论支点，而且同先前用哲学人本主义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唯心主义方法彻底决裂，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出发点上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劳动价值论的态度上。在此之前，在《巴黎笔记》和《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竞争中的商品价格是偶然决定的，它与生产费用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稍后，在同布鲁诺·鲍威尔等人的论战中，马克思提出价值主要由劳动时间决定，但竞争也是决定价值的一个要素。而在这里，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承认，“在竞争的领域中面包的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而不是由面包师任意决定的。”① 货币这种交换手段是“以劳动为基础”的，至于金属货币“则完全是由生产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0页。

本即劳动所决定的”。①

马克思在肯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也改变了先前对古典经济学从根本上加以否定的片面评价。他已不再把古典政治经济学仅仅看成是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一门“敌视人”的抽象理论，而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部门，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来看待了。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只是通过重农学派才变成一门特殊的科学，并且从那时起它才被作为一门科学加以探讨”。②

肯定劳动价值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古典经济学看法的转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劳动价值论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生理机制的基础和出发点。只有承认劳动价值论，才能在劳动的异化形式中发现劳动的肯定性的内容，揭示劳动的二重性，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从而奠定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也只有改变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从根本上否定的片面态度，才能在摒弃其狭隘阶级立场的同时吸取其合理的科学成份，建立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新型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科学批判时期的最初成果，体现在40年代末的《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在这两部著作中，他批判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反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和蒲鲁东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拙劣模仿，开始把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化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这个“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③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为创立无产阶级的经济科学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6页。

② 同上，第48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9页。

3．重新研究政治经济学

1848年的欧洲革命迫使马克思完全中断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大约在1850年夏，这一工作才在伦敦得以恢复。

从1850年9月至1853年8月，马克思利用伦敦的各种有利条件广泛阅读和研究了英、法、德、意等国经济学家的著作、官方文件和各种期刊，并作了大量摘录和批判性评论，这就是总数超过一百印张的24本《伦敦笔记》。研究货币（货币流通、信用及银行)、地租和经济危机等具体经济问题，是这一时期马克思理论活动的中心。马克思推翻了李嘉图的货币理论。他指出，货币流通以及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并不像从事财政银行业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由贵金属量的人为增加或减少来调节，而是进行交换的商品的价格运动即由工商业的状况调节的。① "只有在业务迅速发展，需要更多的流通手段来进行这些业务的情况下，货币流通才会增加。货币流通的增加归根到底是投资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相反。"②

马克思还批判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他指出：第一，农产品价格虽然下跌，地租却能提高，而不像李嘉图所坚持的，只有谷物价格上涨时，地租方能提高，反之则必定降低；第二，地租规律仅仅是以土壤肥力各不相同或连续使用于同一土地上的资本所产生的结果各不相同为前提，决不是同什么"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相联系；第三，土地的改良进行得愈普遍，被改良的土地的种类就愈多，虽然谷物的价格普遍下跌，全国的地租总额能够增加。③

最后，经济危机问题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又一课题。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萨伊、李嘉图等人否认发生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

① 参见马雷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中译本，第2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94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79页。

危机的可能性，而蒲鲁东和蒲鲁东主义者虽然承认危机，但却把它仅仅归罪于资本主义的流通制度。马克思在《反思》手稿中，对此作了尖锐的批判。

4．马克思经济思想成熟的标志

1857年秋爆发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马克思当时认为，随着危机"革命临近了"。① 为此，他发狂似地通宵工作，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② 以便为无产阶级在即将来临的阶级决战中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从1857年7月到1858年6月，他写下了长达50印张的庞大手稿。③ 这部经济学手稿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熟。

这部手稿的第一部分，是写于1857年7月的批判庸俗经济学家巴师夏和凯里的未完成的手稿。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十分精确地描绘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从17世纪末配第和布阿吉尔培尔的著作开始到19世纪30年代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的著作为止的整个发展线索和轮廓，阐述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指出古典学派以后的庸俗经济学著作不是对古典学派的摹仿，便是对古典学派的反动批判。④

手稿的第二部分是马克思在1857年8月为将要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著名《导言》。在《导言》中，马克思把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加以具体化，科学地解决并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他第一次系统地阐发了社会生产关系总体系中各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问题，指出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马克思强调任何生产总是"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一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145页。

② 同上，第21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4页。

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① 同时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因而是唯一科学的方法。

这部手稿的主体部分是1857年10月至1858年5月马克思所写《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资本论》的第一稿。它表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在纲要上已经完成，而且在最重要的细节上也已经完成。首先，马克思发现并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细胞”。他不仅分析了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规定相统一的商品本身，而且指出生产商品的劳动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的统一。劳动二重性的揭示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科学发现，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它在劳动二重性的基础上建立了完备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其次，马克思把价值理论运用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研究了“劳动能力”这种特殊商品，确定了资本自身内部的区别（资本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解决了资本主义的剥削现实和劳动价值论的矛盾，从而建立起完备的剩余价值理论。再次，马克思把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同它的特殊形式区分开来。在考察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基础上，研究了地租、利息、利润等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从而解决了价值理论同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矛盾。

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创立无产阶级经济学，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作出了科学的批判，最终制定了无产阶级经济学的对象、方法和基本原理，因而它毋庸置疑地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熟的标志。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8、22、24页。

二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到《资本论》

1．最初的研究纲领

1857年8月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详细叙述了政治经济学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之后，首次说明了他的经济学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计划和篇章结构。它由五篇构成。第一篇考察交换价值、货币和价格这些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的“一般的抽象规律”。这时马克思还没有把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第二篇解剖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研究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这些基本范畴为基础的资本家、工人和土地所有者这三大阶级之间的关系。第三篇是在对这些基本关系和基本范畴研究的基础上，探讨“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非生产阶级、捐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等等)，从经济结构的分析上升到政治上层建筑。第四篇考察生产的国际关系，包括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和资本的国际流通(输入和输出、汇率)。最后即第五篇考察“世界市场和危机”。“在末篇中，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表现为总体，但是同时一切矛盾都展开了。于是世界市场又构成总体的前提和承担者。于是，危机就是普遍表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的历史形式”。①

马克思在创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不断修改经济学著作的篇章结构。1858年2月22日他给拉萨尔的信中谈到这部经济学巨著时，已由五篇结构修改为六册结构：(1)资本；(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② 马克思之所以首先研究资本是基于下述考虑：资本概念是“现代经济学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77—178页，参见第219—2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24页。

基本概念，正如资本本身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一样"。[①] "资本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②] 第一册"资本"最初只包括三章：(1)价值；(2)货币；(3)资本一般（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③] 随后不久便将这三章合并为第一篇，篇名与第三章相同，另外增加了新的三篇，共为四篇：（a)资本一般；（b)竞争或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c)信用；（d)股份资本。[④]

新的六册结构和原来的五篇结构并无本质的差别，只是将五篇结构中的第二篇分成三册专门论述并将原来的开篇列入第一册中。正是依据这一设想，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于1859年6月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在该书序言中他又明确重申了这六册结构，唯一的差别只在于第一册、第一篇第一章标题由"价值"改为"商品"，这是因为马克思大约于1858年5月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⑤]

根据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第一阶段(1857—1859)的手稿、著作和大量通信中所提供的材料，可以将马克思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计划详细地复制如下：

第一册：资本。

第一篇：资本一般
- 1.商品
- 2.货币
- 3.资本一般
  - 资本的生产过程。
  - 资本的流通过程。
  - 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95页。

② 同上，第4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30页。

④ 同上，第13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7页，第46卷下册，第411页。

第二篇：资本的竞争。

第三篇：信用。

第四篇：股份资本。

第二册：土地所有权。

第三册：雇佣劳动。

第四册：国家。

第五册：对外贸易。

第六册：世界市场。①

从上面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制定的经济学研究计划是极其庞大的，它几乎囊括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马克思不仅要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要研究资本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且越出了民族国家的界限，把资本主义关系放大到世界经济体系（国际分工、国家交换、资本的国际流动以及作为这些要素总体的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危机）去加以研究。但是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马克思改变了原先设想的著作计划和结构。

2、研究计划的改变

在整理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过程中，马克思又将第一册"资本"分成了若干分册。第一分册包括"商品"和"货币"两章，于1859年6月出版。接着马克思立即着手整理第二分册（第三章：资本一般），准备用两个分册的篇幅先完成第一册的第一篇。从1861年8月到1863年7月，马克思为准备出版第二分册写了长达1472页的23本笔记。这部手稿是《资本论》的第二稿。手稿的前五本笔记反映了马克思创作第二分册的研究成果，主要分析"货币转化为资本"、"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以及两者的综合——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这五本笔记

① 参见巴加图利亚和维戈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中译本，第13页。

是《资本论》第一卷的最早文稿。

大约从1862年1月开始，马克思转入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批判。按照他当时的设想，"剩余价值理论"这一部分应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前五本笔记)的历史插论，如同第一分册中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有关商品和货币理论的历史评述来结束他对商品和货币的正面理论阐发一样。

但是，这一工作大大超出了原定计划。历史插论变成了批判性的理论探讨，构成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主要部分。在这一部分手稿（这是《资本论》第四卷的唯一稿本）中，马克思创立了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地租理论、生产劳动理论、再生产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这标志着马克思在1857—1858年创立的经济理论获得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历史的批判带来了理论的新成果，而新的理论成果的获得又引起了马克思经济学创作计划的重大变化。他在1862年12月28日给库格曼的信中说："第二部分终于已经脱稿……。这部分大约有三十印张。它是第一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其实，它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内容，即《资本一般》。这样，这里没有包括资本的竞争和信用。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这是精髓(同第一部分合起来)，至于余下的问题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①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马克思虽然这时仍旧没有放弃六册计划，但已经形成了新的《资本论》结构，并且于1863年1月拟定了《资本论》三部分的最初纲要。②

3.《资本论》结构的最后形成

马克思在1862年底将他的著作的名称由《政治经济学批判》改

①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7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446页。

为《资本论》，从而突出了他的批判研究的中心——“资本”。接着，他从 1863 年下半年开始写作《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为出版《资本论》作最后的准备工作。这部手稿是《资本论》的第三稿。在这部手稿中，构成《资本论》第一卷的大部分内容未能保存下来，只保留了原稿第六章《资本论》第二卷八份手稿中的第一份手稿。此外，它还包括了构成《资本论》第三卷的唯一手稿，恩格斯正是在此基础上于1894年出版了第三卷。马克思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系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总过程，并且对资本主义的流通过程作了初步的分析。

在写作《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于1865年年中最终形成了《资本论》的四卷结构。他在1865年 7 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道：“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① 1866年10月13日，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提到《资本论》的最后成熟的结构形式：“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

第四册：理论史”。②

《资本论》四卷结构的形成，使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写作计划有所缩小：不再专门写作六册计划中的后三册（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而第二和第三册（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并入了第一册(资本)。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一般”的研究范围却得到扩展，不仅地租和工资问题被包容进去，而且原定为第一册后第三篇的内容“竞争”、“信用制度”和“股份资本”也被囊括进“资本一般”的框架结构中去了，甚至原定最后三册的有关内容，在《资本论》中也往往随时随地得到探讨。《资本论》四卷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96、204页。

结构的形式不仅标志着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获得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而且也使它获得了理想的、完美的表达形式。

三 《资本论》的主题和结构

1.《资本论》的主题

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是马克思毕生的理论研究课题。如果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运动规律，那么《资本论》的产生则标志着马克思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的规律”。①

毫无疑问，《资本论》首先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因而其“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②它要研究社会财富的生产、交换、分配等问题。这一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是承认的，他们的教科书也把这确定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有的还由此出发，提出经济学要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样三个基本问题。③但是，问题在于，他们完全不理解“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助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④而是从非历史主义甚至反历史主义的立场出发，把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形式及条件消化、融合在整个人类社会生产的共同特征中，用抽象的“一般财富生产”来代替对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具体研究。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一般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

与此相反，马克思认为，“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8页。

③ 参见萨缪尔森《经济学》，中文版上册，第23、5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4页。

展阶段上的生产”。[①] 他在《资本论》中一开始就声明，本书的任务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②] 这就使《资本论》的主题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容有了本质的区别。它既不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抽象的“一般物质生产”，也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某个方面的片面内容，而是作为人类历史特定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总体系。正是由此出发，马克思一方面坚持从生产关系的总体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他不仅主要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第一级的即基本的、原生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雇佣劳动同产业资本之间的关系），而且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即派生的、转形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土地所有制）。另一方面，马克思坚持在历史的联系、运动和发展过程中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他不仅研究了“已经形成的、在自身基础上运动的资产阶级社会”（资本的现代史），[③] 还探讨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和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资本的演化史），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全过程。

但是，要完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的理论批判，仅仅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和条件是显然不够的，还必须把它放到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考察，因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分析就远远超出了它自身的范围。为此，马克思不仅概括地研究了包括亚细亚的、古代的和封建的所有制形式在内的各种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资本的史前史），而且还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作了最一般的科学预测。尽管十分简略，但却异常深刻地阐明了这一社会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和实践原则。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06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他并不仅仅局限于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此来说明该社会经济形态的结构和发展，还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他不但研究了以“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为主要特征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且研究了法律观念、政治观念、宗教、艺术、哲学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正如列宁所说：“这一著作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活生生的东西向读者表明出来，将它的生活习惯，将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社会具体表现，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将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和盘托出。”①

2.《资本论》的结构

《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在这一卷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既作为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过程又作为资本本身的直接生产过程来分析。他首先分析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般前提（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和特殊前提（一定数量的货币积累和劳动力成为商品），然后分析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工资”），最后从再生产过程的角度来分析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即资本本身的生产（“资本的积累过程”），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作出了无情的科学判决。

但是，第一卷所分析的生产过程并没有结束资本的整个生活过程。在现实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它还要由流通过程来补足，而资本的流通过程则是《资本论》第二卷的研究对象。马克思首先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121页。

从质上考察资本的一般流通形式（资本的循环）；然后从质进到量，研究个别资本的具体流通方式（资本的周转）；最后第三篇是在个别资本流通过程的基础上，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过程。在第二卷尤其是在第三篇中，当把流通过程作为再生产的媒介来考察时就已经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全过程）就其整体来说，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

因此，作为《资本论》第三卷的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就不能是对于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统一的一般考察，而是要揭示资本运动总过程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它包括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等）和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资本主义地租等)。这种对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的考察，既结束了资本的全部生活过程和剩余价值的整个活动生涯，也“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①

从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系统分析，标志着马克思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批判。但是，它还必须由对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批判作为补充。这是《资本论》第四卷的任务。它是“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即剩余价值理论的详细的批判史”，②“属于历史文献部分”，最初由第二国际著名理论家考茨基于1905—1910年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为标题分三册整理出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中确定了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的分析目标：“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自行批判，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③就第一方面来说，重农主义者和斯密对重商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367页。

的批判，李嘉图对斯密的批判和庸俗经济学家对李嘉图学派的批判，表现了政治经济学本身通过其自行批判过程中的演化和发展，也是不断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经济思想领域中的反映和再现。就第二方面来说，马克思再现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和解体的历史过程。重商主义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前科学时期的理论体系，反映了封建生产方式变革时期正在成长起来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实践要求。它刚刚接触到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呈现出的经济事实的表象上，尚未进入科学之门。“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① 配第和布阿吉尔培尔奠定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开创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时期。从配第和布阿吉尔培尔开始，经过魁奈和斯密到李嘉图和西斯蒙第，表现出资产阶级经济科学从产生到顶峰的演化过程。然而，古典经济学家无法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科学地解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以及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等问题，终于在19世纪30年代发生了科学危机。古典经济学派的解体和庸俗经济学派的产生，标志着存在于整个一个历史阶段上的科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终结。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优秀思想成果，透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成了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第二节　《资本论》中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

一　对生产力概念的深入研究和精确表述

生产力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最基本范畴。因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并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6页。

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的过程。所以40年代中期唯物史观创立以后，马克思十分注意生产力问题的研究。他既不同于黑格尔把劳动只是归结为“抽象的精神的劳动”的唯心主义哲学思辨，也不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仅仅把生产力的发展看作是富国裕民、增长物质财富的手段，而是明确地把生产力规定为整个社会生活和“全部历史的基础”。特别是5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对生产力的研究更加具体化，虽然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资本论》的直接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但是，生产关系决不能离开生产力而存在，“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①] 因此，马克思在能够引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关系的变化的限度内深入研究了生产力问题。他不仅从微观的角度考察了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力，而且还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力。

1.生产力的微观考察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首先给生产力下了一个涵蕴深刻的科学定义，指出在任何社会形态中，生产力始终都是有用的具体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劳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这种“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②] 在制约生产力性质以及发展水平的各种因素中，生产资料尤其是劳动资料起着支配性的决定作用。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资料的创造和使用，虽然就其萌芽形态来说已为某些高等动物所具有，但它却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劳动资料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73页。

② 《资本论》第1卷，第53页。

仅是生产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也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正如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具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手工磨产生的是以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以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进行生产。根据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可以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将人类的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正如蒙昧人和野蛮人的工具同他们的生产不能分开并制约着他们的社会一样，蒸汽机和动力织机等现代生产工具同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分开并制约着该社会形态的存在和发展。①

劳动对象是构成生产资料的重要部分，马克思从两方面来分析劳动对象。第一，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例如，在采掘工业中，从地下矿藏中开采的矿石（采矿业），还有在农业中未经开垦的处女地，这些劳动对象都是天然给定的。第二类是已经被以前的劳动加工处理过的劳动对象，马克思称之为原料，②如纺织厂所要加工的棉纱，钢铁厂所要加工的矿石等。一切原料都是劳动对象，但并非任何劳动对象都是原料。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天然的劳动对象日益被各种合成的、人工材料所代替，因而原料在劳动对象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谈，劳动生产率又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人的生理特性，人口的数量、密度和构成等）和人周围的外部自然（土地、阳光、水文、气候以及包括土壤肥力、风力和水力在内的各种自然力）。外部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和劳动资料的自然富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

② 同上，第203页。

源（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矿床等）。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人类文化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①]因此，人本身的自然和外部自然是"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②]当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各种自然条件日益退缩为生产力的自然基础，而不是决定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了。但即使在今天，这种原始要素"像生产的第一天一样"仍然起作用[③]。

仅仅有生产的客观要素，还不能使现实的生产过程正常地进行，生产力离不开主体因素，任何生产过程本身都需要"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④]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同，它是生产力中积极的能动因素。人之所以是生产力中的能动因素，不仅因为他在活动中同生产资料接触，使它们复活，赋予它们活力，使它们成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并使它们转化为产品；而且因为人在生产活动中执行着智力的职能。"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⑤]随着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在工人队伍的结构中，不仅包括站在机器体系旁边的直接操作人员，还包括了工程技术人员和生产管理人员，并且后两部分人员的比例会不断上升。

2.管理和科学是生产力

在生产力的微观考察中，马克思对管理和科学同生产力关系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0、663、662页。

④ 同上，第209页。

⑤ 同上，第202页。

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认为，劳动的社会结合是影响劳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任何有多数劳动者和大量生产资料集中在同一生产场所的地方，劳动者之间的协作形式和生产资料的合理使用，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协作不仅可以提高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新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质上是集体生产力。它“是由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形式引起，由许多人为达到共同结果而形成的结合和协作引起”。①正是这种社会结合产生了管理的需要。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既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又是一般劳动过程的原理出发，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作为管理的社会形式来说，它是为了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是专制的；而就管理的物质内容来说，它又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需的，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一种重要因素。把管理也看作是一种生产力，这是从其物质内容来讲的。正像一个小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而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指挥一样。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性质，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要求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现代社会化的大生产不仅把自然科学而且把社会科学也应用于生产过程。

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使科学转化为生产力成为可能。“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就是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②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对直接劳动者的培养和训练，发展他们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发挥沉睡在人的机体中的巨大生产潜力。第二，通过协调生产过程中人和物及人和人的活动过程，即通过生产过程向科学的应用过程的转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05页。

驱使自然力服务于生产，并使各种生产条件得到进一步合理的使用。①

3.生产力的宏观研究

在马克思看来，对生产力的研究不仅要从直接生产过程进行微观的考察，而且必须从宏观的角度研究再生产过程，尤其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力。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并没有转化为社会生产过程，生产活动只是在地方的狭隘界限和孤立的地点进行，生产还不是在全社会范围内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同时，再生产活动往往又是停留在简单再生产的规模上，因而那时还没有形成社会生产力。但是在考察社会化了的生产力如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时，就必须联系到影响再生产过程的一切因素，因为这时生产过程已经转化为社会过程。当把社会当作一切生产部门的总体来看时，生产力的发展要受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程度的制约，一个生产部门的生产力“同时取决于一切其他生产部门生产力的发展”。②

生产力还受到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制约，受到作为社会各个部门联系中介的交通运输手段和信息传递手段发展的影响，受到影响生产主体素质的教育状况和医疗卫生状况的制约。最后它又“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③总之，“文明的一切进步”，“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学校教师的服务、医生的服务”等等，都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增长。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68页。

二 生产关系总体系的各个环节及其相互关系

生产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核心范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不懂得生产和消费的相互关系，提出了生产决定消费的论点；在《哲学的贫困》中，他反驳蒲鲁东将生产关系总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的错误做法，指出了生产对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决定作用，而在50至60年代，马克思通过系统的经济学研究，全面地揭示了生产关系总体系的各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可以说，《资本论》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最完备的关于生产关系的理论。

1.生产关系的各个环节

马克思指出：“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他们的相互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过程。”① 因此，在社会生产机体中，不仅包含着反映人和自然的关系即生产力，而且包含着生产主体本质之间的关系即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也就是“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②

在任何社会经济形态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一切生产关系的基础，它赋予一定的生产活动“以特殊的社会性质”，“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其他各种关系都是由这一关系所规定和派生出来的。首先，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一定的分配形式和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雇佣劳动的分配形式是工资，而生产要素的大地产的分配形式只能是地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5页。

② 同上，第993页。

所以，“分配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①] 其次，生产关系也决定交换关系，交换过程只是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的延续和必要补充。“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②] 城乡之间的交换，乡村中的交换，城市中的交换都是由生产的发展来决定的。最后，生产创造出消费的材料，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并且生产通过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生产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这样，生产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并在消费中完成了。

2.生产关系的总体系

任何社会生产都总是有着连续性的，因而它总是一种再生产。从再生产过程来说，分配、交换和消费又对生产发生积极的反作用，构成一个生产关系的总体系。孤立地从单个过程来说，“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因此它离开生产很远，似乎对生产是独立的”。[③] 但是，从再生产过程来看，生产结果经过分配又重新转化为生产的前提，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这种生产条件的重新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③]。因此，这种分配关系“是在生产关系本身范围内的”。[④] 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就孤立过程看，也是由生产关系决定并外在于生产关系的，只是生产关系的表现和补充。但是就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来说，“只要产品交换是用来制造供直接消费的成品的手段，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2—33页。

② 同上，第36页。

③ 同上，第3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84页。

这个限度内交换本身是包含在生产之中的行为"。作为生产资料的产品由于只能在生产中消费，因此这种消费关系本身就是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的对立规定上的自身"。即使是生活资料的消费关系，它也"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①]因此，分配、交换和消费从再生产过程来看，它们都只有通过生产关系才起作用，由于它们参与了生产，便变成了生产关系本身的构成因素。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于他们的非历史主义立场，不可能正确揭示社会生产关系的总体系。其中一小部分富有学识、具有批判意识的经济学家如约·穆勒，"虽然承认分配关系的历史发展性质，但同时却更加固执地认为，生产关系本身具有不变的、从人类本性中产生出来的、因而与一切历史发展无关的性质。"[②]这样一来，反而更加破坏了生产关系总体系的整体性质。在马克思看来，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每一种分配形式，都会同它由此产生并且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形式一道消失"。

在生产关系总体系问题上，马克思不仅提出了一般原则——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③]而且以自己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过程中的错综复杂关系的系统阐述，为我们提供了如何贯彻这一原则的具体范例。

3.原生的生产关系和派生的生产关系

要正确认识生产关系总体系的各个环节及其相互关系，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区分第一级的、原生的和第二级、第三级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6、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6页。

即各种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这两类生产关系。原生形态的生产关系决定了派生形态的生产关系的存在和发展，同时，派生形态的生产关系又强化并扩大了原生形态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 由于原生形态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的社会中处于支配一切的地位，因而对它的正确分析是批判地理解这一社会生产关系总体系的关键。

雇佣劳动和产业资本之间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经济总体系中最原始和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它是全部资本主义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是一种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因而它决定了由它所派生的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和资本主义地租。虽说土地所有权在历史上先于资本而存在，但是，"不论是按照资本的本性，还是从历史上来看，资本都是现代土地所有权的创造者，地租的创造者"。② 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尽管曾以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古老形式，出现在极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但是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只有资本的剥削方式，而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 。"只有支配生产的资本才是历史上特殊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③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根本不同于它们的前资本主义形态，并且是作为它们的对立物出现的，它们都是从产业资本的运动中衍化独立而来的，因而表现为"派生的形式"。④

区分原生形态的生产关系和派生形态的生产关系，是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理论前提。对现代生产方式最早进行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4、233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30—31页。

理论探讨的重商主义从商业资本运动的现象出发，庸俗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蒲鲁东)则在借贷资本的形式上认识资本。他们都没有看到产业资本才是原生资本形式。“这样一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的认识就完全错了”。① 从重农学派到斯密、李嘉图所以能使政治经济学变成真正的科学，就在于他们考察了资本的基本形式（产业资本)。②

国际生产关系是一国生产关系在国界以外运动的延续和补充，因而也属于派生形态的生产关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计划中，马克思曾打算用专册加以探讨，后来由于计划和结构上的变动，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只是零星地谈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趋势是在一切地方使别的生产方式服从自己的统治。资本并不满足于在一国的经济空间中活动，它还要向外寻求更为广阔的天地。资本的活动总是从中心向外层扩展，从一国扩展到整个世界。无限制地追逐利润的内在冲动和竞争的外在压力，驱使资本家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把商品倾销到世界各地而冲破一切地域的、宗教的、政治的和种族的界限。正如基督教是世界性的宗教一样，资本主义本质上也是世界主义的。“对外贸易的扩大，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③ 马克思还说：经过工业革命，“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

三 社会的经济结构及其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

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发生第一次转变的时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88、362页。

③ 同上，第264页。

候，他就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重要哲学结论。在40年代中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在与“经济基础”大致相同的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一词了。他们认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因而也包括该历史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①] 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系统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基础上，不仅完整地制定了“经济基础”这一科学概念，而且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40年代提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理论。

1.经济基础范畴的科学含义

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是存在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之中、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人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和”。[②] 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它是一定社会的“现实基础”。[③] 在《资本论》第四卷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④] 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概念中不仅包括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而且还蕴涵了生产力即人们对自然的一定关系。它同“生产方式”范畴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偏重于静态的社会结构方面，后者则偏重于动态的社会过程方面。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③ 同上，第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296页。

同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没有把经济基础仅仅归结为某一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是把它理解为该社会中存在的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在任何一个现实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往往同时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它们不仅存在于某种生产方式的幼年和衰亡时期，甚至也存在于这种生产方式的成熟时期即取得了统治地位的常规发展时期。这些经济成份依据性质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旧的经济关系的残存物。马克思在分析19世纪中叶德国陈旧的经济关系残余阻碍资本主义发展时指出："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①二是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或征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和工人的合作工厂，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扬弃的"。②三是从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中派生出来，仅仅与自身性质有所区别的经济成份。如资本主义的家内劳动与现代手工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一种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各种非主导成份的生产关系都要受到基本的、原生形态的生产关系的制约。"在封建社会中，连那些同封建主义的实质相距很远的关系，也具有封建的外貌"。③在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完全被改造成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权，地租则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甚至在工人的合作工厂的实际组织中，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缺点，④所以，承认经济基础是由复杂的多种生产关系构成的，并不否定经济基础的质的同一性，更不会否定由它产生的上层建筑的质的同一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439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页。

2.国家和法的起源、本质和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直接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出发，探讨了国家和法怎样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又怎样决定性地反作用于经济生活的交互作用。其中对法权关系的研究尤为深入精辟。

马克思首先从内部结构上分析了法权关系的内容和形式，指出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它是由体现当事人意志的契约形式固定下来；就其实质内容来说，它是由产生它的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创造这种权利的，是生产关系”。①同时，他还从历史过程的角度揭示了法权关系的起源和发生的内部机制。任何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要能正常地进行，总是需要某种“规则和秩序”，即需要取得某种“社会地固定的形式”。“一种生产方式所以能取得这个形式，只是由于它本身的反复的再生产。如果一种生产方式持续一个时期，那末，它就会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②

既然法律关系是再生产过程产生的生产方式的固定社会形式的“神圣化”，因此它对生产关系就有着相对的独立性。这常常表现在法律形式同经济内容的不相适应，同一种所有权形式往往可以具有完全不同的经济内容。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能变为资本主义的无偿占有规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最初，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占有别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由劳动创造的。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74页。

② 同上，第894页。

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实际占有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但却丝毫没有触动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所有权。“同一所有权，在产品归生产者所有，生产者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只能靠自己劳动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在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成为那些不断地占有别人无酬劳动的人的财产的资本主义时期，也是有效的。”

法权关系是一种历史现象，随着产生它的一定生产关系丧失了存在的权利，这种法权关系的消灭正如它当初历史地产生一样不可避免。“土地所有权的正当性，和一定生产方式下的一切其他所有权的适当性一样，要由生产方式本身具有的历史的暂时的必然性来说明，因而也要由那些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具有的历史的暂时的必然性来说明。”① 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整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应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父亲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

马克思对国家问题的考察也是循着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这两方面进行的，一方面，他指出国家权力的性质由一定的生产关系决定，是统治阶级手中的工具，是一种“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它运用司法、警察等等对私有制实行保护。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为社会生产过程创造一般物质条件是国家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他特别强调水利工程的组织和管理在东方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认为“计算尼罗河水涨落期的需要使祭司等级作为农业领导者进行统治”，“在印度，供水的管理是国家权力对互不联系的小生产组织进行统治的物质基础之一”。② 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些周转期间长，占有资本量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2页。

的风险较大的部门仍然由国家来承担。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国家和法是适应一定的社会生产需要而产生的，它们只能执行经济生活本身所赋予的职能。但他又与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和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者完全不同，认为国家和法不是经济生活消极被动的执行者，它们通过干预经济生活对一定生产方式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国家和法不仅巩固和保护一定生产方式的存在和发展，而且往往被用来补充经济力量的不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初产生于小商品生产者的自发分化。这是一个犹如蜗牛爬行的漫长历史过程；原始积累的不同要素如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都是为了利用国家权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因此，“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① 在资本主义初期，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迫使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习惯于雇佣劳动所必需的纪律，为了延长工作日并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就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② 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熟时期，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已转变为实际隶属以后，国家和法也仍然起着经济关系本身所不能起的某种作用。工厂法的制定不仅限制了个别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的过度贪欲，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正常地进行，而且也迫使资本家改进生产技术和工艺过程，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为主转入以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为主，从而加速了现代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向大工业的革命过渡。所以，工厂法的制定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式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19 页。

② 同上，第806页。

3.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生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从社会经济结构出发考察了国家和法这一政治上层建筑，而且从物质生产方式出发，深入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精神生产。他说：“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否则，“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①

社会意识形态是由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它在内容上是表现了一定社会中人们的利益、意志、愿望和要求，它的基本职能是直接参与社会生活，从意识上巩固一定的社会关系，因而构成了人的特定的思想关系和特定的精神生活本身。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也是直接受生产关系的变革制约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由于社会生产机体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关系为基础，因此自然宗教表现为对具体共同体的直观和人们的自然关系的崇拜，带有狭隘的地方性和民族性。而当社会建立在商品生产特别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基础上以后，由于人的劳动丧失了特殊的具体性变成抽象一般的人类劳动，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② 在道德领域中，资产阶级一方面提倡所谓天赋人权，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即对抽象人的崇拜，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却信奉最粗俗的拜物教和最卑劣的个人主义。他们鼓吹的“勤劳”、“节欲”的美德，是仅仅针对劳动者的，实际上不过反映了资本对剩余劳动的狼一样的贪欲。资产阶级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29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6页。

各种法权观念，不过来自流通领域的表象，“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① 但是，只要进入生产领域就可以发现，所谓“自由”、“平等”不过意味着剥削的自由和资本的专制，而“所有权”和“边沁”则恰好是对工人劳动的无偿占有，对社会文明和个人生命的窃夺！

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和特点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但它同时又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因为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概念中，包含着生产力的一定性质和发展水平，他不仅引用实例说明“大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如何通过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使人的头脑发生变革”，② 而且认为，“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③以宗教为例，它也不仅是社会压迫的产物，而且是“建立在对自然界的关系上的”，只有全面考察人们在生产过程“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才能完整地揭示宗教的起源、本质及其最终消亡的必然性。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研究了作为精神生产一种特殊类型的艺术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性问题。他说：“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他以希腊艺术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这是同希腊社会的不发达状况相适应的。在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上，随着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被扬弃了，在排斥一切神话地对待自然和一切把自然神话的社会里，不能企图再度出现希腊艺术，而只能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话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9页。

② 同上，第530页。

③ 同上，第410页。

无关的幻想。

但是，这里的困难不在于希腊艺术“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而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他解释道：儿童的天真令成人感到愉快，历史上的人类的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也会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因此，希腊艺术对我们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从这里我们应当得到的启示是，艺术的永恒性正是来源于它的永不复返性，艺术的真谛就在于：以自己的独特个性表达出自己独特时代的时代精神。

第三节 《资本论》中关于历史过程的学说

一 社会结构学说和历史过程学说在马克思不同时期著作中的地位

关于社会内部结构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的学说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历史唯物主义的制定、完善和发展正是循着这两个方面同时进行的。不过，社会内部结构学说和历史发展过程学说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又不是处于同等的地位。

1.社会结构的分析是科学地划分人类历史阶段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无可辩驳地证明：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认识制约着他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解。对社会内部结构的认识，是理解历史发展过程的前提和基础，而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解，则是把关于社会内部结构的理论应用和推广到历史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中去。因此，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开始只是表现为社会结构理论的运用和推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

同先前的哲学人道主义理论立场彻底决裂，科学地解剖了社会有机体的内部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并揭示了这种结构的各个层次之间的相互联系，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质生活同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完备的社会结构学说，从而把历史唯心主义从最后一个避难所(社会历史领域)中驱逐出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把科学的社会结构理论运用于历史过程的研究，指出一切历史首先是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的生产活动的历史即经济史，其次才是由此派生的政治史、宗教史和思想文化史。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马克思依据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提出了科学的历史分期学说。他把人类全部以往的历史划分为四种社会形态：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或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以及资本主义所有制。科学的社会结构学说为划分人类的历史提供了科学的、客观的标准和尺度。他不像先前那样，将人类历史划分成非理性时期和理性时期(《莱茵报》时期的著作)，或非异化时期、异化时期和扬弃异化时期(《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

2.历史过程的研究是批判地理解特定社会结构的前提

如果说，40年代马克思是在对社会内部结构认识的基础上理解历史发展过程的，那么，50—60年代他在经济学研究中则是从历史发展过程的角度来进一步具体揭示社会的内部结构，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我们在第一节中说明《资本论》主题时曾经指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时的根本出发点，就是把资本主义看作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特定生产方式。马克思与现代西方时髦的结构主义哲学家不同，他不是单纯地从静态的结构分析出发的。在他看来，人类社会不存在凝固不变的永恒结构。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结构都是历史的，它孕育于前一个社会机体之中，并随着前一社会结构的解体而得到确立。当这种社会结构

确立在自身基础上以后，它又必然会在自身再生产的一定阶段上，产生出某种更高级形态的要素。这种过程达到一定点，便是自身结构的扬弃。① 因此，要批判地理解一个特定的社会结构，就必须在研究过程中超出对象本身的狭隘范围，将它放到人类历史的长河和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加以考察。马克思在《资本论》创作过程中对资本主义以前各社会形态的研究，以及全部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探讨，正是为了批判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特殊本质和历史性质。

二 全部历史的分期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透视社会历史，提出了系统完备的科学的历史分期理论，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他在40年代中期提出的科学的历史过程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锐利的理论武器和伟大的认识工具。它把这一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予了全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教导人们从整体上系统地把握世界和透视历史。因此，它要求多视角、多方面、多层次地观察事物，从而排斥了任何单一的观察视角和单一的历史分期方法的绝对有效性。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物质生产方式、主体活动的性质、主体之间关系的演变和个性发展这样三个相互区别又内在统一的角度透视社会历史，相应地提出了四种经济形态、两大历史时期、三大社会形态的历史分期学说。

1.四种经济形态的学说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96页。

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①] 在这里，马克思既没有把在历史上存在过的漫长原始社会称为第一种经济形态，也没有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称做最后一种经济形态。他只是指出，这四种社会经济形态是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并依次更替的四种生产方式。这种历史分期方法强调的是社会形态划分的客观基础及其演进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②] 某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自然发展过程。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因此陷入历史宿命论的泥坑，他强调：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同时，通过历史主体的积极活动能够缩短和减轻社会分娩的痛苦。

马克思并没有把关于四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变为一成不变的抽象的历史哲学公式，变成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必须遵循的绝对规律。这也是马克思在历史哲学方面同黑格尔的根本区别所在。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时充分考虑到，"世界历史的发展是按着总规律进行的，这不仅丝毫不排斥在形式或顺序上有所不同的个别发展阶段，反而预定了要有这样的发展阶段"。[③] 由于四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既不能用来概括一切民族和国家的一般发展进程，也不能用来说明全部人类历史的分期（因为它不包括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它必须要由从其他视角透视历史得到的分期理论来补充和说明。

2.两大历史时期的思想

马克思不仅从"自然历史过程"的角度揭示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而且从主体活动的性质和特点出发，进一步将全部历史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

③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2页。

划分成“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1]和“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前者包括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后者是指共产主义社会。

从人类产生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人们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逐渐学会了估计他们生产行为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人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了。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关系的彻底物化，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都表现为对历史活动主体的外在强制和统治，成为人们不能驾驭和控制的东西。虽然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但是，今天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还被不可控制的自发力量所左右。这表明人类还没有最终脱离动物界的状态，没有进入真正的自由王国。

因此，“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2]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3]在那里，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共产主义社会标志着人类社会史前时期的结束和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开始。

3.三大社会形态的理论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还从人们之间社会联系的演变和个性发展史的角度把全部人类历史划分成三大形态。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45页

第一种社会形态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各个历史阶段，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人对人的直接依赖关系（自然、血缘联系和直接的统治服从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作“自然的共同体”。马克思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① “个人表现为不独立”，② “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③

商品经济的发展，瓦解了人们的直接依赖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人们之间普遍的物化关系，这个典型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作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能力的体系”。④

第三大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社会即“自由人的联合体”。“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⑤

总之，马克思是从三种不同的角度来透视历史并对它作出科学的分期。它们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既不是相互并列也不能相互替代，而是从经济基础通过人的活动到主体内部关系这样依次上升的三个层次，内在统一地构成了历史发展过程理论的完备体系。如果把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其中的任何一种加以绝对化，就会误入歧途，或者重蹈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和“历史宿命论”的覆辙，或者陷入“主观社会学”和“哲学人本主义”的泥坑。

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

马克思关于全部历史分期的科学理论，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就四种经济形态说，它

①②③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1、18、104页。

“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①]就两大历史时期说，“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②]而从三大形态说，它构成了“自然的共同体”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过渡阶段，它破坏了“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并“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③]

1.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

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直接的历史前提是简单商品生产，而后者又是封建的、宗法式的自然经济解体的结果。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经济不仅是后期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经济要素赖以发生的土壤。虽然它们在奴隶制和农奴制度下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封建社会解体的过程中，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与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因此它的发展很快就达到了自己的极限，“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④]这种生产方式的消灭一方面造成生产资料和货币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积聚，另一方面造成广大劳动群众同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分离，这一过程最初是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结果，后来则由于生产力的作用得到了加速。“对直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② 同上，第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0页。

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1] 这样，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

所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不仅是简单商品生产发展的结果，而且是它的直接否定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既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更看不到两者间的根本区别，"它忘记了，后者不仅与前者直接对立，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2]

资本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的经济运动中，最初到处都是以货币的形式出现在舞台上。"资本是从流通中来的，是作为流通的产物出现的"。但是，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只是资本的一般前提，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才是资本的特定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能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产生后，它就不仅保持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彻底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18世纪最后30年来，欧洲最先进的国家开始了产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从工场手工业阶段发展到机器大工业的新时期，从而获得了彻底战胜封建生产方式的物质技术基础。

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

发展社会生产力，并随之创造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性，从而为向新的更高历史类型的社会形态的过渡提供必要条件，这就是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0、233页。

③ 同上，第193页。

资本存在的历史价值。

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彻底分离为条件的，也就是说，是以一切自然形成的、狭隘的社会共同体的解体为条件的。劳动者和劳动条件之间的原始统一有两种主要形式："亚洲村社（原始共产主义）和这种或那种类型的小家庭农业（与此相结合的是家庭工业）"。[①] 这两种形式都是社会生产的幼稚形式，不适于把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不适于提高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力这时只是在各个孤立的地点上缓慢地发展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联系也极少超出共同体的狭隘界限。因此，劳动和所有权之间的分离、破坏和对立就成为必要了。这种分裂的最极端的形式就是资本主义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以交换价值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使人们第一次冲破了由自然和历史造成的狭隘共同体的界限，使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第一次在社会范围内（甚至是国际范围内）进行。同时，也第一次创造了各个孤立化的个人之间的普遍的、全面的社会交往和关系。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价值增殖，因而人和自然之间的联系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并不表现为由他们自觉建立、合理调节的关系，而是表现为同人相异化的物的关系。"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②]

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所带来的一切异化现象，一切社会关系方面的颠倒和混乱，是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过渡阶段所产生的暂时的现象。而在资本内部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的社会性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4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520页。

必定能够脱离这种资本主义的异化形式，离开它的各种要素互相对立互相矛盾的形式，而走向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资本主义不仅创造了实现这种过渡的客观物质条件，即“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而且还创造了实现这种过渡的主观条件，“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① 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发展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想重复旧生活的现状。它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但是，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消灭资本，以便在新的、更高的基础上恢复和重建生产者同生产条件之间的统一。

四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切陈旧古老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否定。它随着自身的发展和日益成熟，也必然要碰到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历史界限，为新的、更高类型的社会形态所代替。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在于资本本身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包含着绝对地发展生产力的趋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92页。

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这种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上又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就只能在一定的矛盾、对立和冲突中运动。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末，它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①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生产技术的日益进步，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从而同被推动的总资本相比不断地相对减少，社会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不断地提高，从而产生了平均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趋势。尽管有多种因素（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相对过剩人口，对外贸易、股份资本的增加）发生作用来阻挠和抵消这种下降的趋势，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证明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般的平均剩余价值率必然表现为不断下降的利润率。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实际趋势，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特有的表现，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局限性的证明。因为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推动力，只有那种生产出来能够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产出来，否则，使资本主义生产活跃的火焰就会熄灭，生产就会进入睡眠状态。然而，利润率的下降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刺激积累的条件和原动力，会受到生产本身发展的威胁。“像李嘉图那样把资本主义方式看作绝对生产方式的经济学家，在这里也感觉到，这种生产方式为它自己造成了一种限制，因此他们不是把这种限制归咎于生产，而是把它归咎于自然……。但是在他们对利润率的下降所感到的恐惧中，重要的是这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9页。

样一种感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①

资本不仅在生产上遇到自己的历史界限，而且在实现上也碰到自己设定的限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另一不可克服的矛盾是生产力和购买力之间的矛盾。无限制地追求利润的不可遏制的内在冲动和残酷竞争的外在压力，对各个资本家来说成了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不断提高机器的生产能力，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强制性法令。但是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巨大扩张，这就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利润率的下降说明资本主义的“直接剥削的条件”受到了限制，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则说明“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也同样受到限制。社会的消费力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资本主义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有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种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② 当然，资本可以通过扩大生产的消费来为自己开辟市场。但是，固定资本的更新本身最终又将造成比自身所提供的购买力更大的生产力。因此，资本用来对付危机的手段，归根结底只不过是危机在更大规模上的再生产。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0页。

② 同上，第548页。

2.“剥夺者被剥夺”是资本主义无法逃脱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科学分析，证明了这种生产方式不是绝对永恒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自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被认为是历史的以来，那种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看作它们的自然规律的谬论就宣告破灭了，并且开辟了新社会的伟大历史远景，开辟了新的经济社会形态的远景，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只构成向这个形态的过渡。马克思指出，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今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被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

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思考与讨论

1.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怎样阐述生产力范畴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
2. 简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诸方面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
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
4. 简述《资本论》中关于社会形态的论述。
5. 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阶级和社会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6.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和异化问题。

第七章 《资本论》中的科学方法论

从哲学的角度看，《资本论》的首要意义在于它的方法。《资本论》的科学方法是马克思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产生的伟大成果。根据恩格斯的看法，它的意义不亚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发现。

在马克思之前，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历史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都是形而上学的方法。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那里，传统的、庸俗经验主义的方法始终占据优势，它本质上是一种缺乏联系、自相矛盾和现象复制的方法。只有黑格尔才发展了一种与此相反的辩证的方法。这种方法把自然界和历史看成是有内在差别同时又普遍地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按照一定的规律变化和发展着。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思辨的、神秘的，决不能在其现成的形式上加以应用。要使黑格尔所发现的辩证方法成为能够对经验材料进行加工的科学方法，必须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资本论》的方法就是经过马克思彻底改造并充分发展了的辩证方法。

第一节 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再改造

一 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批判和改造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

马克思根据唯物主义观点批判和改造黑格尔辩证法，开始于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至1867年《资本论》第一

卷出版而告完成。在长达 25 年的时间里，马克思批判地研究了资产阶级的历史、政治、法、经济以及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有关的各种思想理论问题，其中研究得最多的是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不仅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发展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密切相关，而且作为完整形态的科学方法论的制定，也是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分不开的。所以，《资本论》的出版，不仅宣告了马克思从 1843 年开始的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已告完成，而且标志了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也获得了最大的成功。

自从马克思转变到唯物主义立场之后，他就以极其严肃的态度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同时也不断揭露他的辩证法的不彻底性和神秘性。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同他的唯心主义体系融为一体的，在他那里辩证法被称为“绝对方法”，即绝对精神自我运动、自我实现的方法，因此，要完整地认识和把握黑格尔辩证法的全部合理性，并把它从唯心主义的神秘外壳下完全剥离出来，这在一开始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实上，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的充分发掘并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是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地批判和摒弃黑格尔，但又不断地回到黑格尔，在开始阶段被他当作神秘主义抛弃了的东西，往往在后来又被他重新肯定，并得到认真的发掘和应用。

概括起来说，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改造经历了下列几个主要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 1843 年马克思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起到 1844 年完成《神圣家族》时止。在这个时期内，马克思主要是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泛逻辑主义的神秘性，揭露他的方法的纯思辨的性质。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特别分析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秘密，指出他的方法的基本特征就是把实体（绝对精神）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在普通人的理智看来，从千差万别的事物中可以抽象出关于事物的一般概念，但黑格尔却不认为一般概念是从许多现实的具体事物中抽象

出来的，反而认为是它创造了千差万别的具体事物。其方法就是不仅把一般概念看作脱离个别事物的独立存在的实体，而且把它看作能动的主体，它通过自己的能动活动，一步一步地展现自己的丰富性，创造出现实世界的千差万别的事物。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其原有的唯心主义形式上，是基督教创世说的重演，具有极其离奇的神秘性质。这就决定了马克思在转向唯物主义的第一阶段首先要清除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立场，并且为了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作斗争不得不时时借助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用现实的人和人类的活动来代替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活动。因此，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马克思主要是在异化理论的形式下吸取和改造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思想。继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之后，他提出了政治异化理论和劳动异化理论，突出了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革命批判功能。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指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状况的愤慨，这个阶级之所以必然产生这种愤慨，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①

第二个时期，从1845年马克思拟定《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起，到1857年着手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手稿)时止。在这个时期内，由于马克思确立了研究历史运动的新起点(实践)，彻底摆脱了费尔巴哈抽象人道主义观点的影响，因而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主要表现于对于历史运动规律的深入揭示和科学表达。在这一时期内，马克思作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页。

个伟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前者表达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后者表达了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特殊规律。无产阶级必须运用这两个规律来组织和积蓄力量，以便一步一步地战胜资产阶级并获得最后的解放。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扼要地叙述了他的历史理论的主要之点。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①

第三个时期，从1857年底开始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止。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又重新研究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以便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制定出能够对他迄今所搜集到的大量经济学材料进行加工的科学方法。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② 1868年他在给狄慈根的信中，又提到了这一点："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0页。

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自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① 马克思的约言后来虽未实现，但辩证法作为一种得到彻底运用的科学方法已在《资本论》中充分地体现出来了。正如列宁指出的，虽说马克思没有留下逻辑（辩证法），但是他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应用于同一门科学（政治经济学）。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时所借鉴于黑格尔的方法，正是他在前两个阶段中着重批判过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个方法在黑格尔那里最有神秘性，但同时又最有价值、最有合理性。马克思再次肯定黑格尔《逻辑学》的内在价值，实际上就是重新评价了他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并认为正是这一方法应当成为他正在创作中的经济学著作的方法论基础。但是这个方法不能在其现成的形式上加以应用，必须进行唯物主义的改造。这个改造工作贯穿在整个《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

二　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和《资本论》中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对立

要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成功地改造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系统表述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诚然是一件难事。在马克思之前，无论是黑格尔的学生还是他的敌人，"都没有能够在这个方法的巍然大厦上打开缺口；它被遗忘，是因为黑格尔学派不知道可以用它干些什么。"② 只有马克思才出色地完成了对黑格尔方法的改造。他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黑格尔这一方法的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剥取出来，以便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使辩证法成为唯一正确的思维发展方式。这个经过改造了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成了马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

思批判地研究和叙述资产阶级社会全部经济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内在规律的方法论基础。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中，马克思一方面公开承认他作为黑格尔的学生，甚至在某些地方卖弄黑格尔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他又严正地指出，他的方法和黑格尔的方法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他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

在《逻辑学》中，黑格尔对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曾作过一段概括的描述。他说："认识是从内容到内容向前转动的。首先，这种前进是这样规定自身的，即：它从单纯的规定性开始，而后继的总是愈加丰富和愈加具体。因为结果包含了它的开端，而开端的过程以新的规定性丰富了结果。普遍的东西构成基础；因此不应当把进程看作是从一个他物到一个他物的流动。绝对方法中的概念在它的他有中保持自身；普遍的东西在它的特殊化中、在判断和实在中，保持自身；普遍的东西在以后规定的每一阶段，都提高了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它的辩证的前进而丧失什么，丢下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和自己一起，使自身更丰富、更密实。"② 被黑格尔叫做"绝对方法"的辩证法，究竟怎样使纯粹理性的简单范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对此，马克思曾在《哲学的贫困》中作过通俗的解释。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所谓辩证法的运动只是纯粹理性（绝对精神）的运动。而纯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它自我安置（设定），自我对置（异化），自我结合（综合）。这就是说，纯粹理性把自己规定为正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② 黑格尔《逻辑学》下卷，第549页。

反题，合题，或者说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这种经过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而实现的否定的否定运动，形成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的思想发展过程。

黑格尔在绝对精神的名义下，把现实世界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说成是纯思维的过程。因此，在他那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不是人的头脑用来反映具体事物，使现实中的具体在人的思维中更全面、更深刻地再现出来的认识方法，而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仿佛纯粹理性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不仅创造了具体概念，而且创造了具体事物本身。这是他的辩证法的神秘之处。和黑格尔不同，马克思是在彻底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理解和运用这一方法的。他认为，必须这样来理解黑格尔的方法才是正确的："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① 这就是说，黑格尔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思维过程看成是现实事物的创造过程，而马克思则把它看成是人的头脑运用一种独特的反映方式(抽象思维)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的过程。这种反映方式不是唯一的，它不能代替对同一事物的艺术的、宗教的或道德伦理的反映，而且现实事物作为被反映的对象来说，独立于所有这些反映形式而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外。正如在上面已经指出的："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然而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对立还有另一个方面。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形式上是批判的、革命的，但实际上却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9页。

是非常保守的。因为黑格尔站在绝对唯心主义的立场上，用纯粹思想的运动来代替现实的运动，在他那里，辩证的发展仅仅表现为一种概念向另一种更高的概念的转化和发展，而不是事物本身的转化和发展。所以，黑格尔虽然把辩证的发展确立为思想的原则，但他却没有确立为事物的原则，对他来说，转化和发展仅仅是言辞上和字面上的，事物本身却依然如故。而在马克思看来，思维辩证法是事物辩证法的反映，真正的辩证运动是在事物本身中完成的，辩证法的任务就在于深人揭示和正确反映事物本身自我转化、自我发展的规律，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把它仅仅理解为纯思想的运动。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辩证法在其原有形式上，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因此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而在其合理的形式上，则引起了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它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它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既成的形式都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它不崇拜任何东西，从本质上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①

三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辩证逻辑学"

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以前，形式逻辑是唯一得到普遍承认和广泛应用的思维科学，几乎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符合形式逻辑的规则，否则它的正确性就要受到怀疑。然而形式逻辑的规则本质上只反映事物的稳定状态和静止关系，而不能反映事物的动态和变化，不能揭示事物的自身运动、发展和转化。它是关于事物的科学，而不是关于运动和过程的科学。所以当人们一旦把事物当作变化着的过程来研究，而不是当作孤立静止的对象来研究的时候，形式逻辑的有效性就要成为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它必须让位于辩证逻辑。辩证逻辑是同辩证法一起产生的，在古代和近代哲学中已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经有了它的萌芽。但正像黑格尔是第一个建立了自觉的辩证法一样，他也是第一个建立了辩证逻辑学。当然，也正如他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一样，他的辩证逻辑也完全是思辨的，唯心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依据唯心主义的原则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同时也改造了黑格尔的思辨逻辑，把辩证逻辑变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辩证逻辑学”。

在《资本论》中，辩证法、逻辑学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三者是不可分离的，辩证逻辑是把辩证法应用于唯物主义认识论（反映论）的必然产物。在现实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从来如此、一成不变的，它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胚胎到成熟状态的发展过程，而反映这种现实发展过程的思维运动，也必须沿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路线进行。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认识对象是现实存在的具体总体，是许多规定性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这个具体总体既是以往一系列发展阶段的产物，又是经历着不断的自身运动的过程。因此，人的认识如果不是停留在现象表面，而是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内部的生理过程，它就必须在思维中再现这一社会从萌芽到成熟状态的全部发展过程，以便使现实中的具体总体在思维中复制出来。

辩证逻辑不同于形式逻辑的特征是，它不是把概念和范畴看作凝固的和僵死不变的，而是看作生动的、可变的，概念之间不仅存在着复杂的相互联系和关系，而且在不停的运动中变化着和流动着，从一种概念向另一种概念转化。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不是可以塞进任何内容的空洞形式，而是事物本身的联系及其变化发展的反映。辩证逻辑重在揭示概念的辩证本性，研究一个概念因何和如何按一定规律转化为另一个概念，并且通过相互联系和转化的概念系列和范畴体系来完整地描述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在辩证逻辑的概念系统中，各个概念和范畴不是任意地排列的，而是安排得像台阶一样，一个范畴立于另一个范畴之上，同时又成为另一个更高范畴的基础。较高序列的范畴必须是由较低

序列的范畴转化而来，因此也必须依靠较低的范畴来加以说明。从低级范畴向高级范畴的转化愈升愈高，其内容也愈加丰富和具体。整个范畴的推移演化过程是沿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路线进行的。

正是辩证逻辑的上述特征，使它成为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时所必定要采用的方法。因为只有这种方法才能以适当的逻辑形式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史、它的内部结构和生理过程完整地叙述和展现出来。事实上，整部《资本论》的结构就是一个庞大的被严格规定了的经济范畴体系，各个范畴之间的逻辑顺序不能有任何颠倒和错乱，抽去其中的任何一环，以后的范畴就是不可理解的。各个范畴之间的逻辑顺序看起来好像是先验的，但其实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及其内部结构的客观逻辑的反映。譬如《资本论》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在分析商品之后方能进展到"货币"，在分析货币之后方能进展到"资本"。商品、货币、资本之间的这种逻辑顺序不是任意安排的，而是在逻辑上再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资本论》是辩证逻辑在政治经济学这个特殊领域内的具体运用，如果抽去了它的特殊的经济学的内容，留下的就是一部完整的辩证逻辑学。

第二节　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方法的批判

一　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一般特征的揭示

在马克思以前，统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是流行于 18 世纪的经验主义形而上学方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自从黑格尔逝世之后，把一门科学在其固有的内部联系中来加以说明的尝试，几乎未曾有过。""陈腐的旧科学由于在实证知识方面较强而保持着

它的地盘，……旧的形而上学及其固定不变的范畴似乎在科学中又重新开始了它的统治。"①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在自然科学获得飞速发展，而实证的自然科学知识与日俱增的时候，人们自然会厌弃黑格尔学派的思辨的空谈，于是科学的实证内容就轻而易举地胜过了它的思想的形式方面。结果，一种新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又重新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除了拥有较丰富的自然科学材料以外，在理论思维方法上几乎同 18 世纪的唯物主义没有什么区别。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无论在理论观点还是在方法上，都是同18世纪的唯物主义传统密切相关的。18世纪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点本质上都是唯心主义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某些社会生活领域运用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譬如，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是如此。应当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所有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中唯一系统运用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的一门科学。正是这个缘故，马克思才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称为真正的科学。但是，正像整个 18 世纪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和有重大缺陷的一样，应用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唯物主义方法也是不彻底的和有重大缺陷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一般地都停留在对现象的经验描述，而不能深入经济生活关系的本质，在划分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的鸿沟面前一筹莫展。其原因是不能正确地运用抽象思维。例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普遍地不能理解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不理解经济现象背后的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在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价值仿佛是商品的物的自然属性，而不是物和社会劳动的关系，不是物化在商品中的社会劳动。这样，他们就把全部经济生活关系都当作物的关系来研究，资本、利润、工资和地租似乎都是物的关系和属性，而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的人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9页。

的社会关系。这种观点恰恰是把资产阶级的日常意识当作事情的本质，把假象视为真实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劳动的特征是，劳动的社会性质以歪曲的形式'表现'为物的'属性'，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产品、使用价值、商品)互相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位拜物教徒把这个假象看成是真实的东西，并且事实上相信物的交换价值是由它们作为物的属性决定的，完全是物的自然属性。"① 诚然，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已经揭示了交换价值的本质是包含在商品中的社会劳动。但即使如此，他们也仍然没有对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作出进一步的分析，没有把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和决定其交换价值的劳动区分开来，因而同样地把商品的价值视为一切劳动生产物的固有属性。因此，像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也只局限于对商品的交换价值作量的分析，而并不真正了解价值的本质，不了解隐藏在商品价值背后的社会关系的本质。与此相联系，李嘉图在一系列经济范畴上不是表现得过分抽象，而是抽象得不够。例如，他把交换价值和价值混为一谈，把利润和剩余价值混为一谈，等等。

第二，由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不能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现象的背后，当然也就不能揭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内部联系。他们所用的方法本质上是孤立、静止、缺乏联系的方法。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些经济范畴都是从来就有、一成不变的，各自孤立、缺乏联系的，即使认为它们也有相同的本质，那末这种统一性也只能通过归纳和还原来加以把握。斯密和李嘉图都企图用商品的价值来说明资本、工资和利润等的本质，但却又找不到用来证明这一点的内在联系，因为他们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不懂得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和转化。

第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生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139页。

方式的本质和内在联系，是由于他们缺乏历史主义的观点。他们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现象(私有制、交换、价值、资本、利润等等)看成超历史的东西，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唯一合理的、永恒的社会生产形式。他们根本没有打算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范畴作起源上的研究，因而既不了解商品经济关系怎样在封建制度的废墟上萌芽和产生，又不了解它怎样按照自身的规律变化和发展。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不批判和克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经验实证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搜集了大量材料开始创作《资本论》的时候，他首先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对待政治经济学。一方面，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其唯心主义的形式上不能现成地加以运用；另一方面，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盛行的又是一种平庸的、形而上学的、缺乏联系的方法。必须对这两者都加以批判和改造，以便发展出一种既从顽强的经济事实出发，而又不停留于事物表面的唯物主义辩证方法。

二 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批评

在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古典经济学家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力图透过经济生活现象的表面，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联系。它把价值理解为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并且以此为基础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财富形成的源泉及其相互关系。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联系和生理过程的基础和起点，却没有能够深入理解这个基础，没有揭示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因而也就不能从包含在商品中的这个最基本的矛盾出发，一步一步地分析和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有机整体的各个部分，直到这个社会的现象表面。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运用了分析和抽象的方法，把握到了商品价值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基本的经济形式。但是它在科学上所作出的功绩也就到此为止了。它

不知道应当怎样利用这个发现，怎样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以便沿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道路一步一步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经济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因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缺乏历史观点，不懂得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作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来研究，而是错误地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形式当作现成的、不变的事实来对待。他们只限于把这些经济形式互相并列起来，以便从中寻找统一的基础，完全不懂得这些经济形式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其中较复杂、较具体的形式是从较简单、较抽象的形式中发展和转化而来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经济形式都按一定的序列互相联系、互为中介、连成一体，一种经济形式从另一种经济形式中发展出来，同时又成为别的更高的经济形式的基础。

古典政治经济学仅仅通过分析和还原的方法来说明各种经济关系和范畴之间的联系是不够的，必须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方法才能加以说明。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力求通过分析，把各种固定的和彼此异化的财富形式还原为它们的内在的统一性，并从它们身上剥去那种使它们漠不相关地互相并存的形式；它想了解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不同的内在联系。"① 然而，它一方面由于分析和抽象得不够，混淆了价值和价值的表现形态（交换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和利润，因而不得不陷人自相矛盾；另一方面，又由于它不懂得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尽力找出各种经济形式彼此过渡、互相转化的中介环节，因而最终不能排除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矛盾。如斯密不能解释资本和劳动（力）的交换，李嘉图不能说明平均利润的形成。究其根源，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囿于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把资本主义方式当作超历史的、自然的形式。它感兴趣的不是说明各种不同的经济形式的起源，而只是通过分析把它们还原为某种统一的东西，因为它把这些经济形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555页。

不加思索地视为已知的前提。马克思写道："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①

三 对庸俗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批判

马克思认为，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粗俗的经验主义和鄙陋的形而上学。庸俗经济学无论在观念上和动机上都囿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外在表现的意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意识中，利润是资本的产物，工资是劳动的产物，地租是土地的产物，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物化在商品中的社会劳动量，而是上述三种收入形式的总和。庸俗政治经济学正是这些资产阶级的日常意识的理论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表面的经济生活现象的简单复制，是对现存制度的赤裸裸的辩护。马克思说："收入的形式和收入的源泉以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外表上表现出来的存在，它同潜在的联系以及中介环节是分离的。于是，土地成了地租的源泉，资本成了利润的源泉，劳动成了工资的源泉。现实的颠倒借以表现的歪曲形式，自然会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当事人的观念中再现出来。庸俗经济学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8页。

……实际上只是〔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翻译了受资本主义生产束缚的资本主义生产承担者的观念、动机等等，在这些观念和动机中，资本主义生产仅仅在其外观上反映出来。"①

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一方面是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因无力克服其自身的矛盾而使自己的前提（劳动价值理论）发生了动摇，另一方面是由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社会主义开始以经济的、空想的等等形式发动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从自身中产生出来的对立面——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社会矛盾以及阶级斗争的现实发展齐头并进的，因而庸俗经济学的最大特点便是尽量地掩盖和调和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各种矛盾。例如，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和对抗，集中暴露在市场危机中，这种危机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存在于商品的简单流通中。因为买和卖代表着经历两个对立阶段的同一过程，因而既存在着分离和对立，也存在着联系和统一。并且正是在危机中，它们的统一才以破坏性的强制的形式显示出来。没有买和卖这些表面无关的各个因素的内在统一，也就不会有危机。这就等于说，各个对立因素的统一，排斥了它们的对立。②可见，庸俗经济学家不去研究导致危机爆发的对抗因素在哪里，却一味地否认危机本身。在他们看来，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按照他们开出来的药方去发展，就决不会发生危机。正如马克思在批判穆勒时指出的："在经济关系——因而表示经济关系的范畴——包含着对立的地方，在它是矛盾的，也就是矛盾统一的地方，他就强调对立的统一因素，而否定对立。他把对立的统一变成了这些对立的直接等同。"③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499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57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91页。

第三节 《资本论》的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一 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论原则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在现实中是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①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认识的目的在于把握具体的对象，因此必须把对象当作具体的整体来认识。但对象作为具体整体首先是现实的、感性的，对于这种现实的、感性的具体整体，人们首先要通过直观和表象来把握。然而反映在直观和表象中的具体整体仅涉及事物的现象和外表，所以只能是混沌的和模糊的。因此，认识的任务是必须把直观和表象中的具体变为思维中的具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按照马克思的解释，就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法"。

但是，要把直观和表象中的混沌的具体，变为在精神上再现事物的内部结构的思维中的具体，首先要经过分析的道路，即通过分析和抽象把在感性中把握到的具体分解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和要素，直到作为其构成要素的最简单形态。马克思把这条分析的道路叫做认识过程中的"第一条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但是，对于整个的认识过程和认识目的来说，"第一条道路"只是为"第二条道路"作准备的。"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至此，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1页。

体整体还是具体整体，但已不是停留在直观和表象中的混沌的具体，而是经过人的头脑加工和改造过的精神上的具体。

在马克思看来，认识中的这两条道路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前一条道路主要表现为分析的过程，后一条道路主要表现为综合的过程。没有分析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综合，但没有综合，单纯的分析将导致片面的、抽象的认识。因此，马克思在谈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时，实际上是把从完整表象到抽象规定的认识过程作为自然前提包含在其中的。马克思之所以突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因为他看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不能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他们执着于从实在和具体开始，经过分析得出抽象一般的结论。但在马克思看来，这至多也只是认识行程的一半，若到此为止，就是半途而废，其结果是极不可靠的。他说，"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因为，抛开了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只是一个抽象。要知道什么是阶级，就必须研究阶级赖以形成的各种因素，如雇佣劳动和资本；而要知道什么是资本，又必须先研究价值、货币和价格等等。因此，科学认识的进程并不是从具体整体开始。因为从具体整体开始的认识，只能是一种混沌表象，只有经过更确切的规定（分析和抽象），人们才会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但是这种从感性具体到抽象规定的认识道路，在马克思看来仍然属于前科学认识的阶段。真正的科学认识必须从这里回过头来，从最简单的抽象规定一步一步地上升到最丰富的具体。这时所获得的具体，"已不是一个整体的混沌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①

正是基于这个道理，马克思才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视

① 《马克思恩斯格全集》第12卷，第750页。

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并以这个方法为基础，建立整个《资本论》的结构。

二 《资本论》中经济范畴的运动

政治经济学在它刚刚产生的时期走的是从具体到抽象的道路。例如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等等开始，经过分析，逐步从这些整体中找出了一些有决定意义的一般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在这些一般关系被抽象和确定下来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就多少沿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即从分工、货币、价值这些简单的规定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等具体整体。从这里产生出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不过在马克思以前，这条认识道路的形成始终具有很大的自发性。甚至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最杰出的代表斯密和李嘉图，也未能正确地运用这个方法。他们虽然都正确地把握住了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体系的基础和起点——劳动价值，却不知道怎样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建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例如，亚·斯密起初曾根据劳动价值理论来说明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性质以及三者的关系，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他无法解释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不等价”交换，因而陷入了矛盾和困境，于是又一反初衷，走上了相反的道路：把工资、利润、地租假定为某种既定的东西，规定为独立的量，以便从它们的总和中得出商品的价格。这样一来，他所建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就被严重地破坏了。李嘉图较斯密更为一贯地坚持价值理论。他力图证明资本、利润、利息、地租等各种经济范畴同价值理论并不矛盾。但他所用方法却不是“上升”法，而是还原和归结。这就是说，他用强制的、形式的抽象，把利润、利息、地租等不同的经济范畴勉强地还原和归结为价值，而不是从对价值的分析出发，一步一步地找出由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息、地租等不同收入形式的一切中介环节。这种情况决定了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具有非常奇特的、必然

谬误的结构。例如，他在论价值的一章中，不仅假定了商品的存在，而且把工资、资本、利润甚至一般利润率都当作预先的存在和已知的前提。他把所有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与其相适应的范畴，都一古脑儿地罗列出来，然后一一地把它们和价值规律对照，以便说明它们是同价值规律相一致而不是相抵触的。这就使他和斯密一样，把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弄成颠倒错乱、充满矛盾。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所以，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和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李嘉图的错误恰好是，他在论价值的第一章里就把尚待阐明的所有一切范畴都预定为已知的，以便证明它们和价值规律的一致性。"①

在马克思看来，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过程，最初是由包含在商品内部的矛盾所推动起来的自然历史过程。包含在商品内部的矛盾是一种简单矛盾，不过在这种简单矛盾中却孕育着全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矛盾的胚芽。从最初出现的商品中所包含的简单矛盾，发展为呈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的复杂矛盾，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矛盾运动和转化过程。这个过程要以适当的逻辑形式表现出来，就必须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原则，把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商品当作起点，把握其本身的运动规律，一步一步地向着更为复杂，更为具体的范畴推演、转化。因此，《资本论》必须这样来展开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所有各个经济范畴的先后次序和相互关系必须符合它们在历史上和逻辑上的内在因果联系。其中历史上和逻辑上在先的范畴属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因而也相对地简单和抽象，但它们却是继之而起的较高发展阶段的范畴的基础，后者作为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比前者要更丰富，更具体。所以，从整部《资本论》的体系结构中，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各个经济范畴的任意排列，而是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369页。

简单到复杂的前进运动。

如上所述，《资本论》中经济范畴的运动是从商品开始的。包含在商品中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胚芽。所以全部分析必须从这里开始。马克思说："商品隐藏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这种对立进一步发展，就表现为、实现为商品的二重化即分为商品和货币。"①从商品概念进展到货币概念，是经济范畴运动的第一个历程。货币的出现使隐藏在商品中的矛盾外在化了，产生了商品与货币的分离与对立，商品借助于货币实现其形态变化，它包含着比商品更丰富、更多样化的规定和联系。只是在货币作为必要的手段和媒介出现之后，商品的交换和流通才得以充分发展起来，买和卖开始分裂为两个独立的因素，为买而卖和为卖而买都是同样合理的过程。正是从这种为卖而买的过程中，萌发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资本是从货币转化而来的，但资本概念却包含了比货币更丰富更具体得多的内容。因为货币只与商品、价值、价格这些经济现象相联系，而资本除了包括上述联系之外，还包括着同雇佣劳动以及工资、剩余价值等等的联系。资本的本质在于通过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不断使自己增殖，因此它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资本积累这个概念又较之资本本身具有丰富得多、具体得多的内容和规定。然而，资本积累是通过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来实现的，而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又必须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实现。所以《资本论》第二卷的结构就必须这样来安排：从资本的形态变化和循环到资本的周转，再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而《资本论》第三卷所揭示的，则是"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只是在这一卷中，才能逐一讨论生产价格、平均利润、利息、地租这些浮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的经济关系和与其相适应的范畴。

在《资本论》中，各种经济范畴之间的逻辑顺序看起来像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91页。

先验的，其实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及其内部结构的客观逻辑的反映。《资本论》中所运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自觉而忠实地符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客观逻辑，它是马克思经过了长达数十年艰苦卓绝的研究而获得的。正如他自己所指出的："只有这项研究工作完成之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①

第四节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环节

一　逻辑体系的开端——"细胞"或"元素"范畴的确定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方法要求从最简单的规定开始。因此，在运用这一方法时，应首先确定逻辑分析的起点。应当怎样确定一门科学的逻辑起点呢？这要由这门科学本身的性质来决定。一般说来，在科学上作为开端和起点的东西，必须是这门科学由以建立起来的最基本的前提和出发点。它的全部概念和范畴、规则和原理都应该能够从这个基本前提中发展和引导出来。科学体系中的任何概念和范畴都不能在科学之前作为现成的、已知的东西被假定出来，而必须在科学认识的进程中，合乎逻辑地从最基本、最简单的存在中推演转化而来，否则就是把科学之外的东西，把头脑中的先入之见强加于科学。这就是说，科学认识的进展，概念和范畴体系的展开，必须适应对象本身的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历史进程。假如在分析商品之前就假定货币为已知的，在分析货币之前就假定资本为已知的，这就跟商品运动的实际历史不相一致，因而也不能揭示货币等等的真正本质。实际上，科学认识的任务正是要研究货币、资本等经济关系究竟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24页。

可见，科学上作为开端的东西，必须是所研究的对象的萌芽，是它的"细胞"和"元素"，它或者是对象所由发展起来的历史起点，或者是对象的复杂机体由以构成的细胞，或者同时是这两者。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是把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细胞或元素的。

《资本论》所以把商品作为全书的逻辑起点，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和结构决定的。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也是它的最基本的特征。在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就是从商品交换中发展起来的。虽然在一切社会形态中，人类都要生产自己的使用对象，但是只有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发展时期，人类才把他们所创造的劳动生产物不是用于使用，而是用于交换，从而除具有使用价值的属性之外，还具有交换价值的属性。马克思说："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① 正因为商品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因此，把商品确定为逻辑分析的起点，就能准确地发现资产阶级社会一切矛盾的胚芽，把握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的基本线索。

马克思把商品确定为全部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的起点，无疑是一项极重要的发现，就像道尔顿发现化学原子，施旺和施莱登发现了细胞一样。马克思写道："以货币形式为其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8页。

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①

二　科学抽象的作用。科学抽象和非科学抽象

要确定逻辑分析的起点，必须运用科学的抽象。科学抽象的结果不是远离事物，而是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中去。只有深入对象的本质，以便在最纯粹的形态上抽象出对象的细胞或元素，才能使科学立于坚实的基础之上。科学的抽象不是要从事物的现象表面析取一般的东西，而是要深入事物的内部抽象出本质的一般。黑格尔说：“一般乃是一个贫乏的规定，每个人都知道一般，但却不知道作为本质的一般。”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对价值进行抽象时，先把与此无关的使用价值抽去，集中研究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一种商品的价值当它表现为交换价值时，必须把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分开来，把和价值本身无关的东西抽象掉。最后就能发现，所谓价值不是别的，它只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一般的人类劳动。由于发现了隐藏在交换价值背后的价值实体，即发现了包含在商品中的抽象一般的人类劳动，马克思便进而发现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根据他的看法，“这一点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的枢纽点”。

作为科学的抽象，并不是要把标志历史发展中不同质的阶段的经济关系的特殊性抽去，人为地制造它们的同一性。例如，把资本、利润等等都简单地归结为价值，而把它们的质的差别和特殊性抽掉。恰恰相反，科学的抽象决不取消对象的特殊规定性，只要它们是反映了事物的质的差异和特殊本质。例如，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在历史上有其独特性的特殊的社会形态，科学抽象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出标志这个社会的历史独特性的那些本质的经济关系和范畴，如资本、工资、利润等等。如果把这些经济形式都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页。

② 参看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373页。

一概归结为交换价值，就抹煞了资本主义生产和一般商品生产的区别。

因此，必须区别科学的抽象和非科学的抽象。科学的抽象显然不像庸俗经济学家所做的那样，依靠经验归纳的方法制造现象的同一性。庸俗经济学家根据商品有交换价值这个一般事实，把价值看成商品的物的属性。此外，他们还抽去资本的历史独特性，把资本等同于生产资料，认为是积累的物化劳动。这样一来，资本就成为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这种抽象得到的是非科学的假象，它导致把假象当作真实的东西。

马克思认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抽象。一种是科学的但还不够纯粹的抽象，如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抽象。在价值的抽象上，他们把价值混同于交换价值；在剩余价值的抽象上，他们把剩余价值混同于利润。另一种则是强制的错误的抽象，这种抽象表现为把由竞争造成的表面现象强制地还原为一般规律。如李嘉图就企图越过一切中介环节，把利润、利息、地租等等直接还原为价值。马克思指出，这种抽象本身是形式的、虚假的。

三　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是以历史的辩证发展为基础的，二者必须保持辩证的统一。第一个提出逻辑和历史必须互相一致的是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他说："我认为，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1] 不过黑格尔是根据唯心主义的"思维和存在同一"的原则得出这种认识的。在他那里，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是历史必须符合逻辑，而不是相反。在马克思看来，事情必须这样颠倒过来：逻辑推演的次序必须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逻辑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34页。

的东西只能被理解为移置到人的头脑中并经过改造了的历史的东西。

马克思把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论原则运用于整个《资本论》的体系结构。这在它的范畴顺序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资本论》的一至三卷中，马克思依次研究了四大经济范畴，这就是商品、货币、资本、土地所有制。这个排列正是依照了它们在历史上出现的先后顺序。在历史上，最先出现的是商品，然后是货币，货币之后是资本。土地所有制虽然早于资本，但当资本出现之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便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因此仍然要放在资本主义之后来考察。《资本论》各卷的逻辑顺序也都是根据这个原则安排的。例如第一卷中的逻辑顺序是：商品与货币——资本与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的一般趋势。这个顺序是同资本主义发生、发展以至消亡的历史规律相吻合的。

不过历史并不直接等于逻辑，思维的逻辑进程也不能仅仅是对历史的复述。历史必须经过思维的加工方能在其逻辑的必然性中表现出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以现实历史的发展为依据，但却又不完全是追踪历史的足迹。“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要常常打断思想进程。”① 事实上，实现逻辑和历史的一致必须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逻辑必须以历史为原本；另一方面，历史又必须在逻辑中获得加工和改造。在对历史进行逻辑加工的过程中，必须舍去那些偶然的，无关紧要的东西，抛开历史中的纷扰和曲折，以便在前后一贯的理论形式中表现历史。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

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①

运用逻辑和历史一致的原则，必须从所研究对象的整体结构出发，范畴的逻辑体系和序列不仅要符合对象的历史，而且要符合对象的整体结构。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被表述为"资本"范畴的形式与展开，在这个展开过程中生动地再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整结构。逻辑既不是历史的简单复制，也不是某种先验的结构，它不能在研究之前就提供出来，而只能是研究的结果。所以，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总是从这种形式已经发展成熟才开始的。因此，对一种社会形式作历史的研究和结构的研究可以而且必须同时进行，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是互为补充的。

四　分析和综合的统一。归纳和演绎的统一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要求把分析的方法和综合的方法结合起来。具体之所以具体，是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然而综合必须以分析为前提，没有在先的分析，综合便无从进行。人的认识总是从表象中的具体开始，经过分析达到抽象的简单规定，然后再回过头来，在思维中进行综合，达到具体的再现。这时的具体已不是表象中的具体，而是思维中的理性的具体了。这是就对象全体的整个认识过程来说的。其实，就认识运动的每一步来说也都是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运动中，既贯穿着不断的分析，也贯穿着不断的综合，它们互为前提，互相补充。

形而上学者和经验论者都是片面地强调分析，同时把对分析方法的运用表面化。洛克和整个英国经验论者都片面地主张分析的观点，认为认识的作用仅限于分析。这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

俗政治经济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古典政治经济学尚能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而庸俗政治经济学则仅仅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现象和外部特征分析出非本质的、假象的东西。

黑格尔十分强调把分析的方法和综合的方法结合起来。他认为，分析的认识是达到抽象的同一，综合的认识是达到多样性的统一。前者通过提出分类的尺度和标准而“抓住现有的东西”，后者则根据现象自身的内在联系在思维中再现具体的事物，从而达到“理解现有的东西”。这个见解是颇为深刻的。

马克思对商品的认识是从分析开始的。他不仅分析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而且进一步分析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借助于这一分析，他不仅对价值本身作了最抽象、最纯粹的考察，而且从中揭示出隐藏在商品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基本的矛盾。然后，他又回到了价值的表现形态即交换价值上作综合考察，说明价值和使用价值在价值表现上的关系。在作了这个综合之后，他又分析价值表现的二极：相对价值形态与等价形态。最后，二者又在货币形态上统一起来。然而，货币的产生并没有消除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只不过使隐蔽在商品内部的矛盾外在化了，变成了商品与货币的矛盾。通过这种分析，进一步发现了商品流通的两极买和卖的矛盾。把这个分析综合起来，就得出了下述结论：必定会有一定数量的货币从流通中溢出，作为贮藏货币积累起来，这就创造了资本产生的前提。

可见，认识运动的每一步都是由分析开始，通过分析揭露出对象内部的矛盾，同时分别对矛盾的各个方面作单独的考察。在这之后，认识便由分析过渡到综合，过渡到考察矛盾双方的相互关系，以便把握住矛盾的性质和获得解决的方式。随着旧的矛盾的解决，又发生了新的矛盾，于是又开始了新的分析和综合。整部《资本论》的结构，就是由分析和综合的循环交替所构成的大小圆圈组成的，其中分析的方法和综合的方法互相补充，彼此交

替，辩证地结合在一起。

在《资本论》的方法中，不仅分析和综合是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归纳和演绎也是如此。

在政治经济学中，归纳法是庸俗经验论者所惯用的方法。他们反对抽象，强调经验的归纳，认为价值等等的抽象同现实生活相矛盾，而从社会表面归纳出来的所谓"事实"倒是极其符合自然的。例如把资本归结为生产工具，把资本、利润、利息等等归结为交换价值的简单规定。这样他们就抹煞了这些事物的本质差别，把不同质的事物硬结在贫乏的抽象概念中。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只要我把具体事物不同于它的抽象概念的一切方面抽掉，那末具体事物当然就成了抽象概念……。这样，一切经济范畴就总只是同一关系的各种不同的名称，从而这种无法理解现实差别的彻底无能就被认为是纯粹的常识本身。"①

归纳方法的特点是把包含着差别的个别和特殊事物置于某种普遍性的形式之下，据此给事物以概念和定义。然而任何事物都是多种规定性和关系的总和，因而它们的概念和定义必然有许多。正如黑格尔指出的，被下定义的对象愈丰富，它可被考察的方面愈多，那么把握这些方面所下的定义就愈会有很大的区别。因此，正确的认识方法不应局限于对事物下定义，而应当加以证明和推论。

要证明和推论就必须演绎。演绎的方法就是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它通过揭示简单的东西和复杂的东西之间、低级的东西和高级的东西之间的必然联系和过渡环节，证明前者如何转化为后者，后者如何从前者中发展出来。例如，在逻辑上从商品推移到货币，从货币推移到资本，从剩余价值推移到利润、利息和地租，都必须通过演绎证明。演绎证明揭示了商品、货币、资本等等的特殊本质，也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证明了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02页。

们之间的转化和发展。

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方法中，必须把演绎和归纳结合起来使用。由经验归纳的事实是演绎的起点。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的堆积，每个商品都以元素形态代表着资产者的财富。这就是由经验归纳得出的事实。这个事实成了马克思运用演绎推理的出发点。可见，只有把归纳和演绎结合起来，才能变成有效的认识工具。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这种结合的范例。

五　从本质到现象的转化过程中中介范畴的作用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方法是一个用揭示事物的本质来说明其现象形态的方法。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和它呈现在社会表面的现象并不直接合而为一，因此不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便不能透过这些现象的表面认识它们的本质。在认识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关系上，有两种方法可供选用：一种是还原或归纳的方法；另一种是从抽象（本质）上升到具体（现象）的方法。前一种方法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采用，后一种方法为马克思所采用。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斯密和李嘉图发现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这是他们的功绩。但是他们却不能根据商品生产的这个本质科学地说明呈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的各种经济现象。因为他们所用的方法不是“上升”法，而是归纳法。这就是说，他们往往把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经济现象（资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当作现成的和已知的事实一起罗列起来，逐一地和价值规律对质，看它们是否符合和符合到什么程度。这就是说，他们企图使上述各种经济现象和价值规律直接相符，以此来证明劳动价值理论的有效性，结果陷入了矛盾之中。其原因是他们不懂得从本质到其现象形态的转化必须经过各种中介环节，跳过这些中介环节而使本质和现象直接相符，这是不可能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如果现象和本

质直接相符，科学就是多余的了。因此，正确的方法必须是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一一地找出由本质转化为它的各种现象形态的中介环节。

在《资本论》的范畴序列中，各个相邻的经济范畴都互为中介，互相过渡和转化。如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货币就是商品向资本转化的中介范畴。有了资本范畴，一方面就能说明工资，另一方面就能说明剩余价值。可见，资本范畴也起着中介环节的作用。剩余价值会进一步转化为利润，但这种转化又必须通过中介范畴，就是生产价格。生产价格是成本加平均利润，它是由竞争造成的。因此，从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要经过竞争的均衡作用。从剩余价值到利息和地租的转化要经过更多的中介环节，如从流通领域中产生的各种资本形式以及农业资本和它取得的超额利润等等。李嘉图不懂得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是经过了从商品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这个中介环节的，因而使他的体系最后陷于破产。这说明在理解从本质转化为现象的过程中决不能忽视中介范畴的作用。

第五节　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同一

一　如何理解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同一

列宁说："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而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①] 对于列宁的这段话，历来有着不同的理解。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究竟是同一个东西呢，还是三者应当统一和一致？

逻辑、辩证法、认识论三者同一的思想是黑格尔首先提出并

① 《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

加以表述的。他的《逻辑学》一书，既是逻辑学，也是辩证法和认识论。这在黑格尔那里是很自然的。因为黑格尔从绝对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他不可能把思维规律(逻辑)和存在规律(辩证法)在原则上区别开来。在黑格尔看来，所谓存在的辩证法也只是思维史的概括，它本质上是内在地符合于逻辑的。所以，实际上，对黑格尔来说，除了概念自身的辩证法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辩证法。而概念的辩证法无非是理性思维发展的规律，因而就是逻辑学。同时，在黑格尔那里，认识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是思维着的精神对精神本身的把握，这种精神对精神的认识过程同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过程，是完全同一的。所以逻辑学也就是认识论。这个思想确实是黑格尔哲学中最有价值的东西，问题在于它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要使这个思想具有完全合理的形式，必须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是根据唯物主义的要求改造并推进了黑格尔的这个思想的。

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存在和思维不是同一的，客观辩证法(物质规律)和主观逻辑(思维规律)显然不能是同一个东西。人的认识是思维对存在的反映，它要求思维运动符合存在的规律。但是认识运动总是在它所认识的对象按一定规律完成其发展之后才开始的，所以，认识运动的规律和对象自身的规律也决不能是同一的。那末，为什么列宁说，对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不必用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这是因为列宁这里所说的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是就它们本身而言的，而是指这三者在《资本论》中的"应用"，在同一门科学中的"应用"。显而易见，作为应用在一门科学中的辩证法，自然不是指存在的辩证法即客观辩证法，而是指主观辩证法即思维辩证法。作为主观辩证法它和逻辑是同一的。同时，列宁这里所说的认识论，也主要是指思维如何反映存在，精神如何再现具体对象的理论，在这一点上它同时就是逻辑学。他说："逻辑学是关于认识的学说。

是认识的理论。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事实上，列宁所以提出逻辑、辩证法、认识论的同一，是为了强调用辩证法来改造逻辑学，同时也应用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这两点正好在《资本论》中都完完全全地做到了。

二 《资本论》对黑格尔“三同一”思想的改造和运用

马克思怎样在《资本论》中改造和运用了黑格尔的“三同一”思想呢？

《资本论》不同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它不是一般的哲学著作，而是专门的科学著作。《资本论》中的辩证法不是对辩证法的一般叙述，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特定对象的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因此，它不能像《逻辑学》那样只就思想和概念的抽象规定性作思辨的考察，而必须准确地把握住对象本身的现实规定性作客观考察。例如，《逻辑学》的开端是纯粹的思想即“纯有”，《资本论》的开端是现实的存在即“商品”。对此，马克思曾特别强调地指出：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所以没有任何必要把价值概念分割开来。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这样，从一开始就使《资本论》的体系和《逻辑学》的体系在性质上区别开来了。

在确定了逻辑分析的开端之后，《逻辑学》和《资本论》都是沿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路线来展开其范畴体系的。因为只有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原则，才能把逻辑、辩证法、认识论融为一体，变成同一个东西。然而在具体运用上马克思又和黑格尔不同。在黑格尔那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过程，从抽象概念向具体概念的推移、转化，完全是先验地设定的，是纯思辨的产物。而《资本论》则不同，它是在搜集和占有了堆积如山

的材料，经过长期深入的研究，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发展形式，探讨了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之后，才根据逻辑、辩证法、认识论相统一的原则，再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辩证法和结构辩证法。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在对大量的实际材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才能以适当的形式叙述出来。“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①

为了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统一起来，不仅要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且要改造他的逻辑学，根据唯物主义的原则建立辩证逻辑。正如列宁所说的：辩证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②《资本论》的逻辑正是体现了这个要求的。《资本论》的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的学说。整个《资本论》的逻辑是围绕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展开的。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胚芽。这个矛盾的发展、两极化及其解决，是商品向货币转化的内在根源，决定了从商品概念向货币概念的逻辑推演。从商品到货币的转化，是商品价值表现的两极化的必然结果，是商品内部矛盾的解决。但是，随着这个旧矛盾的解决，又有新的矛盾产生出来。这就是买和卖的矛盾。由于买和卖这两个对立过程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它们的任何分离和独立都孕育着危机的可能性。这就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危机及其灭亡的必然性，已经以萌芽的形式隐藏在商品的简单流通中了。往后的叙述使我们看到，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继续发展、扩大和深化，另一方面是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的循序展开，二者合而为一，浑然一体。可见在《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89—90页。

本论》中，逻辑学也就是辩证法，它们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一个东西。

不但如此，《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既是一个严密推论和证明的体系，也是一个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思维和理解的认识过程。它从这个社会的简单规定(商品)出发，开始只是极抽象、极表浅的认识，然后一步一步地深入对象的本质，沿着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道路，达到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的认识。当思维一旦上升到逻辑的最高点(思维中的具体整体)，它同时也就上升到认识和理解的最高点。可见，逻辑的进程和认识的进展也是融为一体、完全同一的。

事实上，把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完全结合起来加以应用，不仅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必要的，对一切科学的研究都是必要的。列宁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所以《资本论》的叙述方法对一般辩证法来说也是适用的。① 为此，他提出，应当充分利用《资本论》的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② 不过我们应当注意，任何把辩证法和逻辑统一起来的努力，都必须是在本门科学有了充分发展并大量地占有了有关材料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成功。马克思花了不下25年的时间完成了《资本论》这一科学巨著，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思考与讨论

1．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改造经历了哪几个主要阶段？

2．马克思是怎样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古典的和庸俗的）的方法的？

---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

② 同上，第357页。

3.《资本论》中的方法是什么？试简述其内容。
4.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必须把握哪些逻辑环节？
5.逻辑和历史的一致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有何关系？
6.为什么说在《资本论》中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三者是同一的？

第八章　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公社时期和70年代前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1871年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以及19世纪70年代反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和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斗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鲜经验。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总结这一革命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和现实阶级斗争的回顾与分析，写下了《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和《论权威》等重要著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和完善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国家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基础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的解放，就不能不解决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探讨了国家的起源和实质，第一次说明了国家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的，是一定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产物，其实质是从政治上确证和保障统治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①] 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0页。

此，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首先夺取政权。这里已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主要之点。正因为如此，1883 年 4 月恩格斯在回顾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时指出："马克思和我从 1845 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消亡和最后消失。……但是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①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通过对蒲鲁东经济思想的批判，科学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对抗性和历史暂时性，提出要用"一个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取代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明确地阐述了关于国家消亡的思想。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提法又前进了一步，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首先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两位作者写道："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总量"。②

但直到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未明确提出如何对待旧的国家机器问题。

1848年的欧洲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一次革命。在这次革命中，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开创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战斗历程，从而把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应当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问题变成了一个现实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这次革命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提出并力图解决这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8页。

②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页。

问题。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产生和演变的整个过程，指出历次革命都是使这个机器得到加强，而不是使它削弱。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每次都是把国家当作他们的独占战利品和主要俘获物，并且一经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就要运用国家政权来迫使无产阶级就范，而不许有任何违背和反抗。无产阶级想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内稍稍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都会成为遭到惩罚的罪行。所以，无产阶级不能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抱有任何幻想，它必须集中一切革命手段来把它打碎。但是，无产阶级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之后究竟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它，这是有待于进一步的革命实践来解决的问题。

1848年革命失败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高涨时期。从40年代末开始，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俄国都确立了真正的大工业，而德国则变成了第一流的工业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都开始走上了社会发展的前台。1857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使整个欧洲又出现了新的革命高涨。1864年第一国际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促进了各国工人的革命团结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巴黎公社。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这个富有历史首创精神的伟大革命实践，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一 打碎和摧毁旧的国家机器

还在巴黎公社成立不久，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以极为振奋和赞赏的心情关注着巴黎工人在对待资产阶级国家问题上的首创精神和英勇创举。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说道，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①在起义失败以后，马克思在总结这次革命经验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认为，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是巴黎公社最主要的经验之一。他强调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②

马克思在提出上述这个著名论断之后，又以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为例，作了充分的历史论证。这是因为，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而奋起向上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所以马克思在分析和解决国家问题时总是把法国当作在政治上获得典型发展的范例来研究。

首先，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最初是作为封建制度的对立物而产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和等级分工的原则建立的），起源于17世纪法国君主专政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封建领主和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特殊利益以及各省的法规等中世纪的垃圾，阻碍了它的发展。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旧时代的垃圾都扫除干净，清除了建立资产阶级完备国家的一切障碍。法国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5页。

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在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法国反对欧洲封建主义的反动同盟的战争中产生的。

其次，资产阶级的统治一经确立，其国家机器就愈来愈具有压迫的性质。马克思指出，在第一帝国统治的各个时期，政府便被置于议会的监督之下，服从于组织在议会中的资产阶级的直接监督。一方面，它是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它变成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和冒险家彼此争夺的对象；另一方面，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国家政权因而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

再次，在每一次标志着阶级斗争的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愈益公开显露出来。马克思举例说：1830 年 7 月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过来交给了资本家；在 1848年 2 月革命中，共和派资产阶级又从金融集团手里夺得了政权，并且正是利用这个政权对巴黎工人进行了血腥镇压，从而说明了共和国的实质不过是用国家对工人进行社会奴役。六月起义以后，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已是公开而残酷地把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为了不断地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他们不得不赋予国家机器以愈来愈大的权力，结果也就同时剥夺了议会机关防范和监督行政权力的一切手段，从而最终导致了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的出现。

由此可见，工人阶级是决不能把镇压和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当作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利用的。为了争取自身的解放，无产阶级必须打碎和摧毁现成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在马克思看来，这一结论并不仅仅适用于法国，而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在1872年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不管“宣言”发表以来情况有多大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原理整

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唯一需要修改的就是，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特别是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已经表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①]列宁也极端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思想，他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摧毁官僚军事国家机器"这几个字，已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对国家的任务问题的主要教训，简要地表明了。

二　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形式

无产阶级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之后，应当用什么东西来作为自己解放的政治形式呢？在1871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凭空去臆造无产阶级的这个新型政权应当是什么样子，而是等待着革命的实践。巴黎公社作为人类历史上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宝贵经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认真地研究了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研究了革命本身是如何发现这个新型政权的最初萌芽的。马克思指出：作为帝国直接对立物的公社，它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②]如果说，在二月革命期间，巴黎工人所提出的"社会共和国"的口号还不过是关于无产阶级新型国家的"模糊意向"，那么，巴黎公社就已经是这种国家的"一定形式"了。

但是，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命形式的因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而摧毁现代国家政权的巴黎公社，在当时也一度被误认为是在现代国家政权产生以前存在过的中世纪公社的复活。公社制度甚至被误认为是企图用孟德斯鸠和吉伦特派所幻想的那种许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5页。

② 同上，第361页。

多小邦的联盟，去代替在各个巨大民族那里虽然最初是用政治强力造成的，可是目前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强大因素的统一。公社与现代国家政权之间的对抗状态被误认为是反对过分集权的古老斗争的扩大形式。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通过对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总结，有力地说明了巴黎公社之所以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形式，其原因就在于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说明了它与旧的国家机器的本质区别。

首先，公社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形式。公社的第一个法令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代替它。军队是国家的主要成分，资产阶级正是依靠军队对反抗的无产阶级实行镇压才能够维持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必须摧毁旧的军队，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的几个月后，马克思在伦敦纪念共产国际成立七周年的庆祝大会上，进一步指出：公社的任务，是要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以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的解放的权利。"①可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就使巴黎公社与旧式的国家机器有了本质的区别。

实现国家机关的完全民主化，也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主要政治前提。巴黎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出来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可以随时撤换，并仅仅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这样，社会公职就不再是资产阶级政客和利禄之徒竞相争夺的对象，因而公社也不再是脱离社会、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少数剥削者垄断的特殊权力。它已把这种权力归还给人民，使之成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68页。

为社会大多数成员直接行使的权力。公社和人民合为一体，并受人民的监督，从这个意义上讲，公社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了，它是从国家向非国家的过渡。

公社既然体现了无产者对资产者的专政，因而它无疑还具有镇压职能。但由于这已经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镇压，而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镇压，因此，它无须凭借特别的暴力工具，而可以由人民自动的武装组织来执行。正因为如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巴黎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选举和撤换制。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一次大更替，即用一些根本不同的机构来代替另一些机构。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量转化为质"的实际例子：实行得像一般所能想象的那样极其完全极其彻底的民主，由资产阶级民主变成了无产阶级民主，即由国家变成了一种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的东西。

不仅如此，公社还废除了议会制而代之以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马克思指出："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① 代议机构和选举制是民主制的必要形式。无产阶级民主不是要废除代议制和普选制本身，而是要抛弃它的资产阶级的虚伪形式，赋予它以无产阶级的真正民主的内容。在资产阶级国家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总是在后台决定，而由政府各部执行的，议会只不过是为了专门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就已揭露了资产阶级议会的徒具形式和软弱无力，无情地指出了那么迷信议会势力的党派和个人实际上是幻想世界的俘虏。他说："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别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只有这种议会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秩序党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8页。

在它已亲手消灭了议会势力的一切条件并在它反对其他阶级的斗争中不得不消灭了这些条件之后，仍然把它的议会胜利看作胜利，并且以为打击了总统的内阁阁员也就是打击了总统本人。"[1]而巴黎公社废除了议会式的虚伪民主并代之以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这就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变资产阶级民主为无产阶级民主。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公社的这一变革，并不意味着取消普选制，而是改变了普选制的阶级内容。马克思说："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另一方面，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2]

其次，公社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形式必须获得经济的内容。马克思指出：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因此，公社应当成为根除阶级以及阶级统治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这就是说，公社若不从经济上解放劳动人民，它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且会成为一种骗局。在巴黎公社存在的短短的七十二天时间内，它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劳动者的经济政策。3月20日，公社取消了从1870年10月到1871年4月的一切房租，规定把已经付出的房金转作以后的预付房金，并且制止拍卖城市当铺里所有的典押物品。4月16日，公社命令登记工厂主停工的工厂，拟定了把这些工厂的原有工人联合成一些合作社来开工生产的计划，并打算把所有这些合作社结成一个大的联盟。4月20日，公社废止了面包工人的夜工。4月30日，公社下令封闭当铺，因为这些当铺是专供私人用来剥削工人并与工人获取劳动工具和信用借款的权利相抵触的。公社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来说，虽然还仅仅是初步的，但已经萌发了共产主义的幼芽。例如：公社所提出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187—188页。

② 同上，第360页。

把一切合作社结成一个大联盟的计划就具有共产主义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① 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证明，共产主义决不是什么凭空想象、不可实现的东西，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本身的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要达到这个更高形式，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经过一系列将把人和环境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公社是可以使无产阶级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三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时期的国家

在巴黎公社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时，曾得出了"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专政！"的结论，指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将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但是，关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时期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样的，他们没有作出过具体回答。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尤其是它失败的惨痛教训，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研究并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最直接最宝贵的经验。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指出，为了争得工人阶级的解放，达到现代社会由于其本身的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社会形式，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果断地镇压反革命。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以后，一方面要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为非作歹活动，杜绝把大宗国民产品浪费在供养国家恶魔上的根源，而仅以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支出来完成地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2页。

性和全国性的实际行政职能，另一方面，它必须以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奴役劳动的经济条件，从而使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的各种社会生产形式摆脱奴役的锁链和阶级的性质。并在全国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和合作。所有这一切，不能不遭到资产阶级的猛烈反抗以至暴动。与此同时，“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也只有经过新生产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作用所代替。所以，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通过致力于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斗争，只有它才能使阶级斗争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最后阶段。马克思在随后不久的《哥达纲领批判》中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批判无政府主义关于立即废除一切国家的谬论时，也对此作了精彩的论述。他说：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代的组织正是国家。这个国家可能需要作很大的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获得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就一定会重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

在马克思看来，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时期的国家，还必须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民族统一的国家。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关于全国政权组织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的村落的政治形式，常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该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当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那时还会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的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像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被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① 马克思的上述论述包括了三方面的意思。（1）必须维护民族统一和体现这种统一的集中制（而不是集权制），即中央政府及其所保留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没有这，统一是不可思议的。（2）这种集中制又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它不排斥广泛的地方自治。（3）这个集中制还必须保留旧政权中对工人阶级有用的某些机构，需要否定的只是旧政权中的压迫和镇压的机构，而不是执行社会职能的机构。

在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十分强调民族的统一集中并坚决反对联邦制，认为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是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开展最有利的国家形式，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而联邦制国家则把地方自私主义和分散主义固定下来并且丝毫也不能消除官僚政治弊病的国家形式。因此，他们在1848年3月制定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这个具体的纲领中，第二条就是："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② 在同一个月，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强调指出："也如1793年在法国那样，目前德国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是真正革命党的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9—36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页。

务。”① 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后一个提法是出于历史的误会。因为，法国严格的中央集权制不是建立于1793年雅各宾专政时期，而是建立于1799年拿破仑专政以后。在整个大革命时期，法国实行的是一种和美国类似的地方和省区自治制，各地方由人民选举出管理机构，它可以在全国统一的法律范围内自由活动。这种政权组织形式成为革命最强有力的杠杆。而拿破仑在雾月18日政变以后，就立即把这种自治制取消，代之以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使之成为反动势力的工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弄清了这个历史真相之后，抛弃了他们关于“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的观念，认为无产阶级未来国家的形式应当是民主集中制的，即地方自治和集中统一相结合。巴黎公社的经验从实践上证明了这个思想的正确性，说明了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时期的国家，应当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民族统一的国家。恩格斯直到晚年还仍然坚持这一思想。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他说：“应当用什么东西来代替现在的德国呢？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形式。”“需要单一的共和国，但不是像现在法兰西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现在的法兰西共和国同1798年建立的没有皇帝的帝国没有什么不同。从1792年到1798年，法国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市镇，都有美国式的完全的自治，这是我们也应该有的。”②

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说明，没有获得巴黎以外的广大的劳动者，特别是农民的支持，是它遭到失败的重要原因。所以，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时期的国家，应当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同盟军的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根据1848年欧洲各国特别是法国革命的经验，阐明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9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5—276页。

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说明了在一切农民国度中，无产阶级如果建立了工农联盟，就会使无产阶级革命得到一种“合唱”，否则就不免要成为孤鸿哀鸣。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又深化了一步。

在马克思看来，在城市生产者和农村生产者之间、在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劳动，生产资料的集中，这是无产阶级追求的希望，也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物质基础，尽管目前的劳动组织是专制式的，生产资料不仅作为生产手段，而且作为剥削和奴役生产者的手段集中在资产者手中。无产阶级要做的事就是改变这种有组织的劳动和集中的生产资料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把它们由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手段变为自由的联合劳动形式和社会生产资料。而农民的劳动则是孤立的，他们的生产资料是零星分散的。在这种经济差别的基础上，作为它的上层建筑，也产生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政治观点。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农民所有制早已越过了自己发展的正常阶段，进入了没落时期。不仅从它里面已经成长起了一支巨大的、与城市无产阶级利益一致的农村无产阶级，而且由于农艺学的新发展，这种分散的农业生产方式本身也变得老朽了。事实上，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农业的渗透，所谓农民所有权早已成为徒有其名。他们的劳动果实已被夺走，留给他们的不过是所有权的幻觉。大农场主的竞争、国家捐税、城市商人的高利盘剥以及缠绕在他们身上的司法制度的种种巧取豪夺，把他们降到了赤贫者的地位。因此，造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矛盾的东西已不是农民的实际利益，而是他们的错误和偏见。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能保证改变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才能一方面拯救他们免遭地主的剥夺，另一方面使他们不至于为了所有权的名义而遭受榨取、苦役和贫困的煎熬；才能把他们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变成他们对自己劳动果实的实际所有权；才能使他们享受到应社会需要而产

生但目前则只是作为一种敌对因素损害他们的权益的现代农艺学的利益。既然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才能拯救农民的命运，因此农民也必定会很快就能欣然接受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所以，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时期的国家，必定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第二节 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预测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生产和资本集中的速度大大加快，大批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纷纷涌入无产阶级的队伍，把他们的绝望情绪和落后意识也带了进来。与此同时，各国资产阶级反动政府也从巴黎公社的革命中体验到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因而在思想上大力宣扬反科学、反理性的唯心主义思想，而无产阶级成份的新变化，又为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土壤。于是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思潮在工人队伍中重新泛滥了起来。所有这些思潮的共同点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这些反动思潮的斗争中，先后写了《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政治冷淡主义》、《论权威》、《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哥达纲领批判》、《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等著作，进一步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作出科学预测，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从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一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

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府，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在公社失败以后，围绕着如何对待

国家、对待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展开了激烈的论战。通过这一论战，他们科学地阐明了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

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国家观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的。他的这一理论的中心点是"废除一切国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巴枯宁用宗教意识来说明国家的起源。他认为，国家是通过神的万能威力的直接影响建立起来的，是产生人间一切罪恶和苦难的根源，甚至连资本也是国家创造的。所以，无产阶级应当消除的既不是资本，也不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是国家。他认为废除国家的根本道路是废除继承权，这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在他看来，不是私有制产生了继承权和阶级的不平等，而是继承权造成了私有制的存在和阶级的不平等。他主张在废除国家之后，用所谓的"自由和无政府状态"来代替国家，以便实现各个阶级和个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平等。在巴枯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沉重、最令人难堪和屈辱的管理，因而也是最反动的。

针对巴枯宁的这些错误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国家的起源和实质的剖析，说明了废除资本、实行社会变革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国家消亡的必要条件。

恩格斯指出："巴枯宁有一种独特的理论——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其中最主要东西就是：他认为应消除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就是说，不是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对立，而是国家。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和我们抱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而巴枯宁却硬说是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首先必须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而我们的说法恰巧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

台。"[①]恩格斯的这段话，指出了巴枯宁国家观的唯心主义实质，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巴枯宁的国家观的本质界限，说明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某种社会变革是荒谬的。而废除资本，实行对全部生产方式的改造，正是为了实现这种社会变革。

马克思在1869年8月2—3日写的《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中，指出巴枯宁关于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是废除国家的第一个要求，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②]因为这不是在反对原因，而是在反对结果。马克思针对巴枯宁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恶毒攻击，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摘录)》中，明确地指出："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么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③]他还指出："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各个阶层的阶级统治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④]

二　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及其基本特征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开始从法国移到了德国。然而，由于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影响，德国工人运动陷于分裂状态。1875年，拉萨尔派因处境困难而被迫同埃森纳赫派实行合并，但与此同时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观点也被塞进了新党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85页。

③ 同上，第634页。

④ 同上，第639页。

纲领草案。埃森纳赫派的领袖李卜克内西对此作了不应有的让步。对于这种不应有的妥协，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提出了最尖锐的批评。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就是这一批评的产物。

前面已经谈到，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法兰西内战》，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系统地制定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先后提出并解决了关于武装斗争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问题，以及关于用什么样的国家去代替被打碎了的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等等。但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它的主要经济、政治和社会特征是什么，以及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将经历哪些主要发展阶段，还没有作过明确的论述。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马克思通过对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批判，第一次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将经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即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并且阐明了这两个阶段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基本特征。

众所周知，庸俗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分配决定论，即把分配看成是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因而局限在分配问题里兜圈子。《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未来社会"劳动所得应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的一切成员"的条文，就是拉萨尔的庸俗社会主义观点的具体表现，其实质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仅仅通过改革分配来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的批判首先就从这个问题开始。

拉萨尔为了论证自己关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援引了当时经济学上似乎是公认的原理，即"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既然劳动是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因此工人就应当不折不扣地得到自己劳动的全部收入；既然劳动只有通过社会才能进行，所以劳动所得就应当按照平等的权利在社会一切成员中公平地分配。

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公式。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商

品。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财富的数量是由商品的交换价值来表现的。由于衡量商品的交换价值能根据物质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于是人们便得出一种看法，认为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但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在认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时，却没有真正弄明白他们所说的"劳动"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所以，他们虽然发现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但却始终不能理解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是两种不同的劳动。只有当马克思发现了劳动二重性的学说之后，才科学地阐明了商品生产中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区别于创造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因而说明了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社会中，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必然要以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但是要使各种劳动都能根据同一尺度进行交换，就必须使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可见，抽象劳动只是在商品生产社会中人们相互交换其活动的一种尺度，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产物。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和商品生产的废除，抽象劳动连同作为其表现的交换价值就不再存在了，但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则是一切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混为一谈，这就不仅把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而且把创造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都看作是一切社会所必需的。这实际上是把私有制和商品交换看作存在于一切社会的永恒现象，把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看作永恒的自然法则。因此，他们总是笼统地谈论"劳动"和社会，而不具体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特殊性质以及资本剥削劳动的本质。

当拉萨尔站在上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立场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问题，得出所谓"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这个结论时，他仍然停留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范围内。因为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财富才体现为交换价值，才由交换价值来衡量，因而包

含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才是创造一切财富的唯一源泉。一旦资本主义被消灭，商品生产被废除，财富就要恢复其本来面目，即纯粹由使用价值来构成。因此当拉萨尔派的领袖们硬把这个观点塞进德国工人党的纲领中时，就在理论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马克思指出：如果人们不是戴着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有色眼镜看问题，那么就会看到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而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从这个意义来讲，就不能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源泉，劳动只有和自然界一起才能创造使用价值从而成为一切财富的源泉。

接着马克思指出，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来看，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公式也是荒谬的。马克思从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资料是公共财产，总劳动是由集体调节的"这一拉萨尔派也同意的前提出发，指出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显然是不能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的。因此，拉萨尔所说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只能是指集体劳动的社会总产品。但这一总产品在进入消费以前，必须从中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在作了这些扣除之后，社会总产品中剩下的部分就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但即使是消费资料，也不能全部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其中还必须扣除：第一，一般的行政管理费用；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的基金。只有经过这一切扣除之后，最后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个别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然而在这里，"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变成"有折有扣"的了。

不仅如此，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搬到社会主义也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个用语是指在商品生产社会中，单个生产者所创造的那部分价值。而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是共同占有，生产是集体进行的，产品也不归个人所有，因而生产者之间

不互相交换自己的产品，每个生产者只是根据他参加社会总劳动的多少，在经过上述种种扣除之后，从社会总产品中领取相应的一部分消费资料。这部分生活资料只是和他所付出的劳动量成比例，但不和他所创造的价值成比例。而一旦产品不再用价值来衡量，所谓“劳动所得”就失去任何意义了。

马克思在揭露了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之后，接着又批判了他的“平等权利”和“公平分配”。

所谓“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这些都是法的观念，属于上层建筑；而分配方式则是一种经济关系，属于经济基础。如果把拉萨尔所鼓吹的“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作为规定社会主义社会分配的原则，其实质就是把这些抽象的法的观念当作调节经济关系的先验的原则。其实“公平”和“平等”等法的观念都是经济关系的产物，是在历史中产生和变化的。马克思说：“难道资产者不是断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地由经济关系产生法权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有各种极为不同的观念吗？”①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②

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说明了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规定着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即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和劳动以什么形式同生产资料相结合。生产条件的分配方式不同，社会各阶级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就不相同，产品的分配方式也就不同。所以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页。

② 同上，第12页。

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资本主义的分配；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就要产生一种与之不同的消费资料分配。所以，要改变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必须首先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代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而拉萨尔的庸俗社会主义的分配决定论，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分配看成是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因而是根本错误的。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通过对拉萨尔的庸俗社会主义分配决定论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分配方式的分析，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共产主义的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及其基本特征的理论。

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低级阶段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指出：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在于："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的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社会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 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还不可能一下子把"资产阶级的法权"都消灭掉。在消费资料的分配中，它仍然要表现出来，即表现为按劳分配的原则。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原则和商品生产社会中等价交换的原则实质上是"同一原则"：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等量劳动相交换。不过从内容和形式来说，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又有着重大的区别：(1)按劳分配是生产者根据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的多少，在作了如前所述的各种扣除之后，从社会总产品中领得一份消费资料，这份消费资料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但不相等。这就是说，社会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予生产者的报酬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成比例，但不是完全相等。这显然是和等价交换不同的。(2)按劳分配虽然体现了等量劳动相交换这一原则，但这种交换却不是在生产者个人之间自发进行的，也不是由价值规律和市场法则所调节的，而是以工资的形式由国家统一进行调节。这和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等价交换也是不相同的。可见，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由于已经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因而就第一次消灭了千百年来存在的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劳动的剥削现象，实现了劳动平等和分配平等。但是，马克思指出："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正比例的；平等就是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1]实际上，各个生产者的体力和脑力是不相等的。一些人比另一些人在同一时间内能提供较多的劳动或劳动较长的时间，因而每个人所得到的消费品必然是不相等的。这说明，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但却默认了不同等的个人的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了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另一方面，有的劳动者已经结婚，有的则没有；有的劳动者子女较多，有的则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些人在事实上得到的比另一些人多些，因此也就富些，如此等等。所以"这件平等的权利对于不同的劳动者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2]。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与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相比，则还是一种弊病。"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及由此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3]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页。

② 同上，第11页。

③ 同上，第12页。

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才能最后克服这一弊端，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里，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

在马克思看来，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这两个阶段，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区别在于：第一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因而还留有旧社会的痕迹。例如，旧式的社会分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劳动还仅仅是谋生的手段，以及由此决定的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等等。而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们的精神文化素质的极大提高，旧社会的痕迹已完全消除，因而人们也已完全超出了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这才有可能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当作调节相互关系的准则。

从第一阶段发展到第二阶段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清除旧社会痕迹的过程。这既依赖于生产力的不断增长，又依赖于整个社会精神文明水平的持续提高。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造就出完全的共产主义新人。

第三节　捍卫科学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论战

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在这当中，唯物史观又是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学说的哲学基础。马克思正是在把唯物史观应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发现了剩余价值，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从而使社会主义者早先像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因此，一切机会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歪曲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借以从根本上修正、推倒以至摧毁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前期，正是为了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既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又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一　关于国家的本质。驳“自由国家”

“自由的人民国家”是拉萨尔所向往和追求的国家理想。拉萨尔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认为国家具有超阶级和超历史的独立本质，是一种发展人类自由的道德统一体，其目的是把人的本性导向积极的成长和进步，教育人民，使人类发展并获得自由。在拉萨尔看来，只要通过争取普选权，建立由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就可以变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国家为“自由的人民国家”。拉萨尔的这种唯心主义国家观掩盖了国家的本质。《哥达纲

领》从拉萨尔的这种唯心主义国家观出发，把拉萨尔的“自由的人民国家”改成为“自由国家”，把争取所谓“自由国家”作为德国工人党的奋斗目标。

对于这种“自由国家”的谬论，马克思、恩格斯给予了彻底的批驳。他们指出：国家就其实质来说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任何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是凭借和依靠“国家”来维护和保障其自由的，为此目的它不能不同时剥夺和取消被统治阶级的自由。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他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① 这就是说，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其实质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至于拉萨尔所崇拜的普鲁士国家，则更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②

在马克思看来，所谓“自由国家”实际上是指专制国家。因为只有一个驾于社会之上、不受任何民主代议制机构约束的专制国家才能称为“自由国家”。所以，“自由国家”一词，即便在字面上也是讲不通的。产生这一错误的根源，从认识论上来说，是因为颠倒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指出：《哥达纲领》“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的社会也是一样）当做现存国家的基础（或者不把未来社会当做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本质。”③

由于把国家看成一种脱离社会经济基础的超阶级的精神实体，拉萨尔等人就混淆了“国家形式”和“国家制度”这两个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页。

② 同上，第21—22页。

③ 同上，第20页。

同的概念，抹杀了“政体”和“国体”的区别。在他们心目中，只存在“民主制国家”和“非自由人民国家”的区别，而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一方面保持着“对国家的忠顺信仰”，另一方面又迷信“民主的奇迹”，以为只要在现存国家制度的范围内实现了民主，无产阶级在国家问题上的目的就达到了。因此，他们根本不提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在马克思看来，国家制度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的，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消亡，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也一定要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建立在不同经济基础之上的不同国家制度，同建立在同一的资产阶级社会之上的不同的国家形式，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所以问题就不应该这样提出，在未来的社会中是否应争取一个“自由人民国家”，而应该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①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的国家制度”是指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这时的国家既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也不是过渡时期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关于这样的国家当然还是一个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未曾解决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要对这一问题作出科学的解答，必须根据实践经验来回答，而不能靠“人民国家”一词来加以解决。虽然马克思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具体回答，但仅仅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已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实际上，他在《法兰西内战》中对此已作了某些考察。1875年3月18—28日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也曾就社会主义社会中新型国家的性质提出了原则性的看法。他说：“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页。

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Gemeinwesen》['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①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充分估计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理论。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列宁十分重视马克思的这个提法，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发展。他说："从前，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应当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现在，问题的提法有些不同了：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②

二 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规律。驳"铁的工资规律"

在《哥达纲领批判》第二部分，马克思主要驳斥了拉萨尔关于"铁的工资规律"的谬论。

所谓"铁的工资规律"，是拉萨尔心爱的理论。马克思首先提出他的这个理论是从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那里抄来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铁的工资规律"的主要理论依据。在马尔萨斯看来，人口是以几何级数增加，而消费资料是以算术级数增加的，所以人口增长速度总是要大大超过食物增长的速度。李嘉图从这个理论中引出了一条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平均工资必然限制在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最低限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46页。

的生活资料的水平上。如果工人工资长期高出这个水平，人口就要迅速增长，工人之间的竞争就必然日趋激烈，结果就使工资重新下降到这个水平上来。如果工人工资长期低于这个水平，人口增长速度就会下降，工人之间的竞争就会日趋于停息，结果又使工资回升到这一水平。拉萨尔在抄袭李嘉图这个规律的同时，也照抄了马尔萨斯，把上述人口规律说成是自然规律。而如果这是正确的，那末，以这种人口理论为论据的“铁的工资规律”就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且也将适用于一切社会。这样，任何企图废除这种规律的企图都会是徒劳的。

马尔萨斯以及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根本错误，是力图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工资规律说成是自然规律，以此来证明这种工资制度的天然合理性。而其实，在社会生活领域内，不可能有什么永恒起作用的毫无弹性的铁的规律，因为社会规律不同于自然规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们起作用的方式和时间长短是不同的。社会规律无不具有历史性，因而普遍要比自然规律起作用的时间短暂得多。而尤其是经济规律，其中大多数都只能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即社会经济形态下起作用。所以资本主义的工资规律也只能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下发生作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援引马尔萨斯理论，硬把这种规律当作自然规律，说什么即使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无法消灭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似乎这种贫困状况是由自然界本身造成的，如果人为地改变它，就只能使它普遍化，使贫困同时分配在社会的整个表面上。《哥达纲领》接受了拉萨尔派的建议，把“废除工资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写进自己的正式条文里，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

马克思还指出，把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说成是废除工资制度是不对的，应当说是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因为分配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而不是相反。只要无产阶级消灭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的工资制度也必然同时被消灭。

实际上，即便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下，“铁的工资规律”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捏造出来的错误理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规律也是有弹性的。保证资本增殖的需要是工资规律作用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在不致饿死的条件下所能忍受的贫困程度则是其作用的最低限度。换句话说，工资增加的最高限度是资本家仍然感到有利可图，工资下降的最低限额是工人所能忍受的最大的贫困程度。在这两个限度中间，决定工资高低的不是人口的自然变动，而是工人对资本家所进行的反抗和斗争。否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切都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问题是拉萨尔及其信徒根本不懂工资的本质，却企图把他们对工资所作的资产阶级解释强加于工人党，以便在理论上制造混乱，在实践上开历史的倒车。根据拉萨尔的逻辑，废除所谓“铁的工资规律”，无非就是要改变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获得最低限度工资的那种状况，使它不再被限制在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水平上，这是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的主张。针对这种机会主义理论，马克思进行了坚决的驳斥。他说：拉萨尔并不懂得什么是工资，而是跟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外表当做事物的本质，实际上工资并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工人为整个资本家阶级所做的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就是事实上的奴隶制。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高或是较低，都不能改变这种制度的本质。

三 自治和权威。驳无政府主义

反对拉萨尔的改良主义和反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差不多是

同时进行的，如果拉萨尔在国家问题上表现为一个偶像崇拜者，巴枯宁则站在另一个极端。他从反对国家出发，进而反对一切权威；主张绝对自治和无政府主义。在他看来，权威＝国家＝绝对的祸害。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前，必须反对一切政治国家和权威；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后，每一个人、每一个乡镇都应当是自治的。

为了驳斥这种错误观点，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科学地阐明了自治与权威的关系。

恩格斯指出，尽管权威意味着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并且又是以服从为前提，因而对于一切怀有自由思想的人来说肯定会感到难堪，但它却不能在现代社会中很快地归于消失。不仅如此，权威的确立还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一个客观存在，是现代大生产中的联合行动和社会协调机制得以正常实现所必需的。这种联合行动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说："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即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发现，它们有一种使各个分散的活动愈来愈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① 联合活动就意味着组织起来，但如果没有权威，就不能组织起来。

这是不是说到了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权威原则就可以完全为自治原则所代替？或者说，那时就不再需要任何权威呢？事实上，情形也不是如此。因为即使在公有制社会中，社会革命推翻了以自己的权威支配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资本家，土地和劳动工具都成了工人的集体财产，权威仍然不会被完全取消，正如在火车的运行和轮船的航行中，人们不能完全没有权威一样。

至于在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进行的革命过程中，权威的确立就尤其是不可缺少的了。在这里，革命本身就是权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1页。

而且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① 虽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实现而消失，那时国家的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变为维护社会全体利益的管理职能，但若要在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就轻而易举地把权威的政治国家一举消灭，这只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幻想。在阶级社会中，政治权威永远表现一定阶级的利益和意志。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威表现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无产阶级要使自己获得解放，就必须打破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威，确立自己的政治权威。

在恩格斯看来，权威和国家是有区别的。在未来社会中，国家将会消亡，而权威则是一切社会中永远存在的，它不会完全消失，而只能改变自己的形式。他说："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② 他反对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因为这两者都是相对的。需要研究的是它们各自的应用范围将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发生怎样的变化。1872 年1 月 24 日恩格斯在给泰·库诺的信中指出："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又闭口不谈。"③

总之，恩格斯通过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驳斥，得出了国家将消亡、权威还存在的科学结论，批评巴枯宁想把国家和权威一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3页。

② 同上，第34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1页。

起消灭，说明他既不懂得国家的本质，也不懂得现代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这一切都是由于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所以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权威主义者，同其他任何机会主义者一样，都是顽固地要用他们的历史唯心主义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以此来动摇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的。

思考与讨论

1.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内容。

2.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学说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

3.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和基本原则。

4.国家、权威、自由三者之间的关系。

5.拉萨尔思想的主要错误和马克思对他的批判。

第九章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系统阐发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19世纪40年代中期创立以后，经历了两个时期：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主要是在总结革命经验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验证、丰富、发展了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而从70年代开始，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主要任务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果，系统地确立和阐述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科学观，从而进一步把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领域上自始就存在着分工，这后一任务便主要由恩格斯来完成。他的最主要的成果集中反映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两本书中。前者虽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但其中包含了关于自然观、认识论和逻辑学等各方面的极为丰富的思想和观点，历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的奠基作品；而后者虽属于论战性的著作，但却起到了完整系统地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百科全书”的作用。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最新自然科学成就的哲学概括和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系统确立

一　从新自然观的出发点的制定到自然辩证法体系的确立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系统确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40年

代开始制定新自然观的出发点；50—60年代以新自然观为出发点为基础着手概括和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材料；70—80年代系统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完整体系。

1、新世界观的形成和新自然观的出发点的制定

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关心自然科学的哲学意义。早在1839年到1840年初他在准备写作《博士论文》时，就曾三次阅读过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并写下了《黑格尔自然哲学概略》。但是，当时马克思的自然观同他的整个世界观一样，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他研究"自然哲学"，选定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在自然哲学上的差别作为论文题目，只是为了通过这个例证揭示"自我意识哲学"的辩证法。他承认自然界"不受自觉理性的约束"，也只是表明了他不同意鲍威尔等人把"自我意识"绝对地主观化，而认为能动的自我意识本身只是客观的世界理性的主观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转变，同他们整个世界观的转变是同步发生的。随着他们在世界观上完成了第一次转变，他们就不再把自然界看做精神的产物，把自然科学仅仅当成哲学的附庸。1844年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文中肯定了18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同时也指出了它在方法论上的根本缺陷是把各门科学看成相互外在的"并列"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自然界是一种自我创造的感性存在，高度评价了自然科学在人的自我创造和自我解放中的革命作用，主张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结合"，并预言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将统一成为"一门科学"。①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他们又进一步指出："在物质的固有的特性中，运动是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② 此外，他们还具体地阐述了18世纪英、法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1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页。

物主义哲学同近代自然科学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不仅标志着历史观的根本变革，而且也标志着从根本上克服了旧唯物论在自然观上的不彻底性，标志着开始制定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认识论的基本出发点。马克思拟定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以是“包含有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就在于它不仅把实践确定为理解社会生活和人的本质的基础和出发点，而且确定为整个世界观（包括自然观）和认识论（包括自然科学认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在专门阐述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们一方面强调指出，人的外部自然和人自身的自然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始终是彼此相互制约的，因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是同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的两个不同的部分。

但是，尽管在40年代已开始制定新自然观的出发点，却并不等于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在那时就已系统确立起来。这一点，只有依靠自然科学的实际发展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才能做到。而在40年代中期，自然科学本身还正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一系列重大发现正是在30—60年代才相继完成的。20年代武勤完成人工合成尿素，30年代施莱登、施旺提出细胞学说，40年代迈尔、焦耳等人发现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50年代末达尔文发表生物进化论，60年代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律。这就从客观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系统确立不可能完成于40年代。

2. 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科学新成就的专题研究和初步概括

50—60年代，在研究自然科学新成就的基础上阐述唯物辩证法自然观的条件已初步具备。这不仅因为自然科学已取得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而且也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进入了一个必须在革命实践和科学研究中经受检验以便加以丰富和发展的新时期。

就在马克思完成了《1857—1858年经济学草稿》，着手整理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时候，恩格斯开始投入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1858年7月14日他写给马克思的信①，标志着恩格斯已开始系统地搜集和研究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材料，并加以哲学的概括和总结。这一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科学新材料的研究，主要包括了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学说以及达尔文的进化学说这三大发现。其成果主要反映在他们的通信中。

首先是细胞学说。为了充分认识这一学说的革命意义，恩格斯深入钻研了生理学和比较解剖学。他认为，"这两门科学中包含着许多从哲学的观点来看非常重要的东西"，为辩证地理解自然界提供了大量"论据"。在1858年7月14日致马克思的信中，他指出："使全部生理学发生革命并且首先使比较生理学成为可能的主要事实，是细胞的发现"。② 因为细胞学说从科学上揭示了各种生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了人和其他哺乳动物在机体结构上的吻合，说明了从低级的纤毛虫身上发现的独立细胞无论和低等植物还是高等动物的胚芽以至人的卵子和精子都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就从客观上动摇了宗教和神学的基础，并且在理论上证明了唯心主义的全部荒谬性。

其次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恩格斯在同一封信中指出："会使老头子黑格尔感到很高兴的另一个结果就是物理学中各种力的相互关系，或这样一种规律：在一定条件下，机械运动，即机械力(譬如经过摩擦)转化为热，热转化为光，光转化为化学亲合力，化学亲合力转化为电(譬如在伏特电堆中)，电转化为磁。这些转化也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回地进行。"③ 这一定律的发现，表明了整个自然界的运动的统一已不再是哲学的论断，而是自然科学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6页。

② 同上，第337页。

③ 同上，第337页。

事实了。1864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也对能量转化学说给予了高度的哲学评价，他把格罗夫说成是当时最富有哲学精神的自然科学家。

再次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这一划时代发现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极大兴趣，他们对《物种起源》一书进行了反覆研究，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859年11月24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出版，两个多星期之后(12月11—12日)，恩格斯就在信中告诉马克思说："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此外，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① 后来，马克思也两次阅读了这本书，认为"进化论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② 不过，从一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对达尔文著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主要是指他的经验主义方法论和盲目地把马尔萨斯的理论搬进动植物界的做法。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不同意把繁殖过剩和片面的生存斗争说成是有机界发展的根本动力，特别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把这一概念作为解释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马克思在1870年6月给库格曼的信中，讽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全套戏法是：先把资产阶级的竞争学说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从社会搬进生物界，然后又把它当作永恒的自然规律从自然界重新搬回到社会。

此外，马克思还利用写作《资本论》的空余时间研究了数学，写下了近千页的《数学手稿》。在化学的研究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友人——化学家肖莱马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他们及时地了解到化学领域里的所有进步。60年代，恩格斯在肖莱马的帮助下研究了霍夫曼的化学分子理论。他认为这一理论和先前的原子

---

① 《马克思恩格格全集》第29卷，第50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31页。

理论相比是一大进步，它表明“从前被描写成可分性的极限的原子，现在只不过是一种关系”。①

50—60年代，由于马克思、恩格斯还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具有直接革命意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上，因而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只是“零星的、时断时续的、片断的”。② 但是，对于当时自然科学中的一切有重大意义的进展和突破，他们都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了。这就为下一阶段的全面研究作好了准备。而马克思对《资本论》的创作，也为恩格斯系统地制定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和科学方法论提供了历史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

3. 恩格斯对自然科学新材料的全面研究和自然辩证法体系的确立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欧洲进入了资本主义“和平”发展和建立群众性工人政党的新时期。在辩证法的历史观已经系统地建立起来的基础上，迫切需要把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也上升到系统化理论的高度，这样才能用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武装工人，教育大批新转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抵制和批判正在泛滥起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新康德主义思潮。

1869 年 7月，恩格斯退出商界，次年 2 月迁居伦敦。从此他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全面研究。在这段时期里，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方面”，以便“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个彻底的……‘脱毛’”。③ 1873年1月，恩格斯曾准备用已经取得的成果写一本批判毕希纳的庸俗唯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战性著作，后来不久，他决定改变计划，准备写出一部正面地系统阐述他和马克思的新自然观的庞大著作。1873 年 5月30日，他在写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页。

③ 同上，第13页。

马克思的信中说道："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接着，他简要地阐述了关于自然界中的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和化学运动的辩证关系的思想。同时指出："自然科学只有在物体的相互关系中，在物体的运动中观察物体，才能认识物体。对运动的各种形式的认识，就是对物体的认识。所以，对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就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① 这是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第一个全面的构思。

《自然辩证法》的创作时间是1873—1883年(1885—1886年只补充了个别材料)，其中由于写作《反杜林论》(1876.9—1878.6)而中断了一个时期。

从1873年5月到1876年6月，是《自然辩证法》创作的第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恩格斯搜集了大量材料，写下了《导言》、《论辩证法》(即《"反杜林论"旧序》)、《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三篇论文和大部分札记及片断94篇，形成了《自然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和主要轮廓。1876年5月28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概括地谈到了这个时期的研究工作：通过这一阶段的研究，他对自然科学已"非常熟悉"，并有相当的自由和把握可以在这方面进行活动了。他说："这部著作的最终的全貌也已经开始呈现在我的面前。这部著作的清晰的轮廓开始在我的头脑中形成。"②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写于1876年的自然辩证法《导言》，是马克思主义的新自然观基本确立的标志。

对杜林的批判虽然打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但在《反杜林论》中却充分利用了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对新自然观作了第一次系统的概述。同时，原为准备写作《反杜林论》而搜集整理的某些材料，后来又放进了《自然辩证法》的手稿之中。因此，《反杜林论》的写作也并非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完全中断。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7页。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2—33[illegible]页。

从1878年7月到1883年3月，是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的第二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他拟定了“总计划草案”和“局部计划草案”，继续写成了几乎所有现存的论文和许多片断及札记。在这些论文和札记中，他以展开的形式阐述了自然界的辩证法，探讨了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同时还探讨了各门具体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尽管后来由于马克思逝世，恩格斯忙于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和《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整理出版，不得不最后中断《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但经过长达十年之久的艰苦研究和辛勤劳动，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和珍贵的精神遗产。其中包括两个计划草案，169个札记和片断，以及10篇论文。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恩格斯原打算系统地阐发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的宏观构想，基本上已经实现了。

二 自然辩证法体系的确立是恩格斯批判地研究自然科学和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辉煌成果

自然辩证法体系的确立，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智慧的结晶，特别是恩格斯的批判性研究的硕果。和《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一样，《自然辩证法》的创作过程也是把严格的科学研究和革命的批判精神高度地统一起来的典范。

1.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系统确立是对自然科学的全部历史和最新成果的哲学总结

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本质上不同于古希腊哲学和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它既不是建立在哲学家们的天才直觉的基础上，也不是凭理性的思辨来逻辑地推演出世界统一的图景，而是必须由科学事实建立起来的真理。所以，它的确立、验证、发展和系统化，必须以严格的科学研究为前提。为此，恩格斯不仅在70年代以前就同马克思一起进行了长期的研究，而且在70至80年代还放下所有其他工作，作了专门的考察和研究。他细心地搜集和研

究了有关自然科学的大量文献资料，其范围几乎包括了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过程。对当时获得不同程度发展的所有自然科学学科，他都一一地进行了研究、评价和综合概括。

在综合考察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全部发展历史之后，恩格斯认为，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

在古代，自然科学尚未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只有天文学、数学和力学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远未形成系统的自然科学。和这种状况相适应的是古代朴素的辩证自然观，其特点是以整体的直观和天才的猜测，把自然界看成是一个运动和变化着的统一整体。这种自然观在总体上虽然是正确的，但由于尚缺乏严格科学的论证和对于细节的分析，因而后来必然为实证的但却是形而上学的自然观所取代。在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统治下，自然科学的研究曾一度被扼杀。但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封建制度逐渐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在工业生产和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下，近代自然科学迅速产生并不可遏制地发展起来了。哥白尼《天体运行》的出版，是近代自然科学宣告从神学的束缚下彻底解放出来的标志。但是，从15世纪到18世纪，大部分自然科学的发展还处在收集和整理材料的阶段，首先获得发展并臻于完备的只是天体和地球上的力学，以及为它服务的数学。当时，物理学中除光学外还处在研究的最初阶段，化学刚从炼金术中解放出来，并普遍地信奉燃素说，地质学还未超出矿物学的胚胎阶段，古生物学还不存在，生物学还处在襁褓之中。当时的人们还热衷于把自然界分解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和过程按照其外部特征和标志分成一定的种类和部门来分别地加以研究。这样就渐渐地形成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各种不同的事物和过程互相隔绝开来，撇开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去孤立地进行考察。这就产生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后来，培根和洛克又把这种方法从自然科学领域移植到哲学领域，由此便形成了一整套形而上学的自然观。这种形而上学的自然观的中心点，是把整个

自然界当做永恒的和绝对不变的这样一种见解。这种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在细节上，在经验材料和实证知识的把握上，远远地超过了古代朴素的辩证自然观。然而在总体上，在对整个自然界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解上，却又远远地落在古代朴素自然观的后面。而随着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孤立、片面、僵化的自然观，就必定要严重地阻碍科学的进步，并且最后导向唯心主义。从哥白尼宣布向宗教和神学开战，到牛顿提出“第一推动力”，绕了一个圈子，最后又投入上帝的怀抱。

从18世纪末叶开始，近代自然科学发展到综合其研究成果的阶段。作为这种综合的最初成就，康德提出了星云假说，它打开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第一个缺口。接着赖尔发表了他的《地质学原理》，他坚持从地球本身来说明它的发展。19世纪中叶发现的细胞理论、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给了这种自然观以决定性的打击。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说明一切在无机界中起作用的力，是普遍存在着的物质运动的不同表现形式。所有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都按照一定的量的比例而相互转化。自然界永远处在从一些运动形式向另一些运动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之中。细胞学说揭示了一切生物个体，无论植物或动物，都是由于细胞的繁殖和分化而发育起来的。不仅一切高等生物的发育、生长有着共同规律，而且通过细胞的变异能力还预示了物种进化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生物进化论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生物有机体如何从最初的简单形态，按照一定的规律逐渐地进化到复杂形态，直至高等动物和人类为止的整个过程。这样，整个动物世界的辩证统一性，就在一切基本点上初步得到了证明。

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稳固地确立起来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向辩证自然观的复归，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自然观的历史发展、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把人们重新带回到希腊哲学的伟大创立者的观点：“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

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①但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科学基础上的回归，这里存在着"一个本质的差别：在希腊人那里是天才的直觉的东西，在我们这里是严格科学的以实验为依据的研究的结果，因而也就具有确定得多和明白得多的形式。"②

这样，恩格斯便从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全部历史、最新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和自然界的辩证本性三个方面论证了新自然观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客观性，雄辩地说明了它是适合现代自然科学的唯一正确的自然观。

2.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系统确立是批判旧自然科学方法论和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成果

正像《资本论》的创作过程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批判过程一样，自然辩证法作为自然科学的正确的方法论原则，也是在对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进行批判的过程中系统地确立起来的。

当时的自然科学界同资产阶级经济学界一样，盛行着一种狭隘的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认识方法。人们把感觉经验看作是自然科学理论的唯一可靠的基础，把形而上学看作唯一可能的思维方式。恩格斯揭穿了这种神话。他以无可辩驳的论据指明了，这一方法只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在17和18世纪，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是适应于当时搜集材料和建立分类科学的历史任务的。但是，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进入了深入分析和综合研究的阶段，"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③由于形而上学方法不再适应揭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4页。

② 同上，第45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2页。

现象内部联系的任务，致使许多最杰出的自然科学家也不能不陷入深刻的危机和混乱。

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混乱的根源："现在统治于理论自然科学中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都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达到的成果（自然科学成果——引者注）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① 他指出，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就在于承认辩证法是现代自然科学所必需的认识方法。这里有两条可能的道路。一条是通过自然科学自身的研究而自发地达到辩证思维。这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小路。在这条崎岖小路上，人们往往不得不在自己犯过许多错误之后重新发现那些早已碰到鼻子尖上的真理，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最荒唐的哲学流派的影响。另一条是通过对哲学的研究达到自觉的辩证思维。这条康庄大道却为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所不耻。他们相信，只有忽视哲学或侮辱哲学，才能从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物极必反"，"两极相通"，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恰恰是那些侮辱哲学最厉害的人成了最坏哲学即极端唯灵论和不可知论的奴隶。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像与达尔文几乎同时提出进化论的华莱士这样"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降神术中去了。"② 还有一些经验主义者如耐格里，则由于固执其狭隘的经验主义立场而走到了不可知论，做了新康德主义的俘虏。

同那些狭隘经验主义的科学家相反，恩格斯十分重视哲学思维和辩证法对自然科学发展的意义。他认为："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6页。

② 同上，第399页。

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① 自然科学用经验的证明代替自然哲学的臆想的联系和思辨的联想，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绝不能简单地抛弃哲学，而只能"扬弃"它。"自然科学家们，本来可以从哲学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就看到：哲学具有某种即使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中也比他们高明的东西。"② 哥白尼的日心说可以在毕达哥拉斯那里找到思想渊源，道尔顿的原子论得益于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笛卡儿早在迈尔、焦耳以前200多年就谈到了运动守恒，康德比拉普拉斯早50年提出了星云假说。特别是哲学史中从古希腊人到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更具有巨大的方法论意义。自然科学家没有意识到，正因为他们抛弃了哲学，所以哲学才报复了他们。正是由于他们满足于狭隘的经验主义，才使旧的自然哲学得以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验科学中消失掉。"③

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恩格斯在创立自然辩证法体系的过程中，始终注意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再研究和再改造。早在1858年7月刚刚开始研究自然科学的时候，他就要求马克思"把已经答应给我的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寄来"。④ 1874年9月，他又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谈到对《逻辑学》的研究，认为自然科学家必须研究《逻辑学》，因为"这里是真正的宝藏"。⑤ 他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过程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再改造。他说："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和'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2页。

② 同上，第546页。

③ 同上，第55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26—127页。

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相反，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别重新提到了显著的地位，并且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的事实，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① 《自然辩证法》正是按照《资本论》的同一方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以后者为范例），既深入批判了狭隘庸俗的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又进一步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使唯物辩证法作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的地位得到了最终的确立。二者的差别仅仅在于：《资本论》把辩证法运用于一门具体的历史科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因而主要是发展了它的历史基础和作为具体科学研究的方向方面；而《自然辩证法》则并不是关于一门具体科学的科学著作，其对象是整个自然界和全部自然科学，因而它阐述的重点是辩证法在整个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一般认识功能和方法论原则。然而，正是这种差别，使二者互为补充，共同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系统化和完备化。

第二节 恩格斯对自然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系统阐述

一 物质及其存在的形式

物质及其存在形式的问题，是自然观发展史上长期争论的问题，也是确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历史上，一切唯心主义的自然观都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虽有正确的世界观，却不具备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前提。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为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充分的条件。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7页。

而，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却阻碍着这一任务的实现。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自然辩证法体系确立以后，这一问题才得到了真正科学的解决。

1．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范畴

恩格斯针对当时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第一次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范畴。

首先，恩格斯运用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的原理，说明对哲学的物质概念不能作狭隘经验主义的了解。他说："作为物质的物质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当我们把各种有形体地存在着的事物概括在物质这一概念下的时候，我们是把事物的质的差异撇开了。因此，和特定的、存在着的物质不同的作为物质的物质不是感性存在着的东西。"① 狭隘经验主义者不懂得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他们虽然也承认各种感性存在物的客观实在性，但是却拒绝哲学的物质概念。并且声称："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物质和运动。"恩格斯回答道："当然不知道，因为抽象的物质和运动还没有人看到和体验到；只有各种不同的、现实地存在的实物和运动形式才能看到和体验到。实物、物质无非是各种实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② 把个别和一般、有限的东西和无限的东西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是从经验主义导向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重要根源。

其次，恩格斯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批判了把物质归结为某种不可分割的最小微粒的形而上学观点。他提出，"物质在质上绝对同一的理论"是一种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理论。他根据霍夫曼的化学分子理论推出了原子的可分性，并且进一步认为物质是无限可分的。但他同时指出，这种可分性绝对不是形而上学的机械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新版，第233页。

② 同上，第214页。

分割，物质的结构层次是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构成物质分割的各个不同阶段的非连续的部分是各种不同的关节点，这些关节点决定物质的各种不同质的存在形式。因此，任何具体物质的分割总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引起质的变化。这不仅阐明了哲学物质范畴同自然科学物质结构理论的区别，而且对后者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2．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

针对机械唯物论割裂物质和运动、把运动归因于外力作用的观点，恩格斯强调指出："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因而不单纯是物质的特性。"① 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象的。"作为物质的本质表现，作为物质的存在形式的运动本身，和物质自身一样，是不灭的"。② 恩格斯反对把运动归结为运动的某种具体形式，如机械运动，因为运动和物质一样是不可能被归结为某种绝对单纯的形式的。他说："运动就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就它被理解为存在的方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来说，它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移动起直到思维。"③

恩格斯不仅提出了"运动一般"的范畴，而且研究了物质运动的具体形式。他认为，如果离开了物质运动的各种具体形式，物质和运动就是不可思议的了。根据当时科学发展所提供的材料和前人（如圣西门）的研究成果，他把物质运动概括为五种基本运动形式：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命运动和社会运动。这五种运动形式不仅相互区别，而且相互联系、相互转化，体现为一种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辩证发展过程，高级运动形式以扬弃的形式包含着低级运动形式，但却不能归结为低级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4页。

② 同上，第58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1页。

动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对物质运动形式的分析贯穿着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对运动形式从低级到高级的理论分析，既是和自然发展史上物质分化的历史过程相一致的，也是和科学史上科学发展的历史顺序相一致的。他说：研究运动性质，当然应当从这种运动的最低级、最简单的形式开始。……然后才能对更高级和更复杂的形式有所阐明。所以我们看到：在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中，最先形成的是关于简单的位置变动的理论，即天体的和地上的物体的力学，随后是关于分子运动的理论，即物理学，以及紧跟着物理学，几乎和物理学同时而且有些地方还先于物理学发展起来的，是关于原子运动的科学，即化学。只有在这些关于统治着无生命的自然界的运动形式的各知识部门达到了一个高度的发展以后，才能有成效地去着手阐明显示生命过程的各运动进程。在阐明这些运动进程方面前进的步伐，是与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进步成比例的。① 物质运动形式的划分为科学分类提供了客观依据。既然“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彼此相属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② 不仅如此，由于这一分类同时包含了各门科学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从而突破了长期以来把各门科学看成是彼此孤立、互相隔绝的学科的形而上学观点，指明了各门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必然出现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趋势。在揭示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之间都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基础上，恩格斯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运动的质的不灭性原理。如果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从自然科学上揭示了运动的量的不灭性，那么恩格斯则从哲学上进一步提出：“运动的不可灭性不能仅仅从量上，而且还必须从质上去理解。”③ 这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1页。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9—150页。

③ 同上，第21页。

就是说，任何一种具体的运动形式虽然有生有灭，但它总是从某种别的运动形式转化而来，并且注定要转化为别的运动形式，不仅永远不会失掉转化的可能性，而且就整个宇宙来说，这种可能性还必定要转化为现实性。“物质在它的一切变化中永远还是物质，它的任何一个属性都不会丧失。因此，物质虽然在某个时候一定以铁的必然性在地球上毁灭自己最高的精华——思维着的精神，而在另外的某个地方和另外的某个时候一定又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①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运动无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是不灭的。这说明了运动的绝对性。但运动的绝对性并不排斥相对的静止和平衡，相反，它以后者为条件。恩格斯认为，运动和静止是辩证统一的，平衡和运动是分不开的。“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本质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本质条件。”② 当然，运动是绝对的，静止和平衡是相对的，但是，绝对和相对的界限也是相对的。

3．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

物质存在于永恒的运动之中，而物质运动又以时间和空间作为自已的形式。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把时空和物质运动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错误时指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③ 同时，他指出，必须把现实的时空和时空概念区别开来。时空概念和物质以及运动的概念一样，是人们通过思维进行抽象的产物。因此，它们不同于一切现实存在的事物所固有的具体的时空特性，而是以抽象的纯粹形式表现出来的。经验论者不懂这种区别，他们总是

---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② 同上，第14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1页。

幻想能体验到纯粹的时间和空间，其结果就是把时空想象成存在于运动着的物质以外的绝对不变的框架和容器。恩格斯指出："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没有了物质，当然都是无、都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存在的空洞的观念、抽象。"①

恩格斯还根据辩证法的观点阐述了时间与空间的无限性问题。他提出无限性本身是一种矛盾，要想避开矛盾而承认时空的无限性是不可能的。形而上学者杜林的错误就在于要求没有矛盾的无限性，结果只得出时间有开端、空间有界限的荒谬结论。恩格斯在反驳杜林时指出："杜林先生永远做不到没有矛盾地思考现实的无限性。无限性是一个矛盾，而且充满种种矛盾，无限纯粹是由有限组成的，这已经是矛盾，可是事情就是这样。"②而为了逃避矛盾把世界看成是有限的，那末由此所引起的矛盾，并不比承认它的无限性要少。无限不存在于有限之外，而存在于有限之中，通过有限而存在。有限之为有限，就在于它不能结束过程的系列，而只构成系列中的一环。所以，从有限到有限的过程，乃是一个无限进展的过程。没有有限性，便无从思考无限性。

二　自然界的辩证本性

自然科学中的自发唯物主义，在承认自然界客观性的同时，大都抱有自然界绝对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而黑格尔的自觉辩证法，则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把自然界看成是绝对观念的外化，是它在辩证的逻辑演进中获得的多样性在空间中的展示，因而自然界本身没有时间上的发展。这在实际上也否认了自然界的辩证本性。

同上述观点相反，恩格斯认为，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③因而，"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页。

③ 同上，第25页。

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观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①

1.自然界中的两极对立及其相互作用

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是辩证法的两个基本观点，而从联系和运动的观点出发，就必然要承认自然界的矛盾。“当我们把事物看做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相互并列或先后相继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确实碰不到任何矛盾。”“但是一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和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矛盾“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②“没有矛盾就没有客观自然界。”对立统一观律是“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

恩格斯进一步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在整个自然界中的客观普遍性，及其在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特殊表现。他指出：“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着对立中的运动”，“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化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变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③恩格斯首先研究了非生物界的矛盾运动。他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关于物质的本质是吸引和排斥的对立统一的合理思想，④在概括自然科学提供的大量事实的基础上，提出吸引和排斥是生物界的基本矛盾，在这里，“一切运动都存在于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之中。”⑤就天体运动说：“任何太阳系的生存过程，都表现为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⑥而地球上的各种非生命运动，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和化学运动也是如此。接近和分离，收缩和膨胀，辐射和吸收，凝聚和扩散，南极和北极，阴电和阳电，化合和分解等等，都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2—13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4页。
④ 参看黑格尔《小逻辑》第213—217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3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12页。

吸引和排斥这一古老的两极对立的具体表现。

生物界同样充满了矛盾。恩格斯指出："在有机生命中，细胞核的形成同样必须看作活的蛋白质的极化"。① 生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证明，首先出现的是无核的原核细胞，后来细胞内部发生分化，形成细胞核和细胞质的两极对立。生物个体的生长发育也充满着矛盾。吸收和排泄，同化和异化，生长和死亡，这些都是包含在生物机体中的两极对立的相互作用。如果没有遗传和适应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生物的进化是不可能的。恩格斯正是依据了海克尔的这一发现，阐明了"从简单的细胞开始，怎样由于遗传和适应的不断起作用的斗争而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方面进化到最复杂的植物，另一方面进化到人"的整个过程。他还进一步指出：这种演化过程本身也具有二重性："每一个进化同时又是一个退化，因为它巩固一个方面的发展，排除其他许多方面的发展的可能性。"②

恩格斯在阐述普遍地存在于自然界中两极对立的相互作用时，既揭示了这些对立的普遍意义，也揭示了它们各自的特殊的作用范围，揭示了每一矛盾的各个侧面的特殊性，从而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一系列重要范畴及其相互关系，如同一性和差别性，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内容和形式，有限与无限，部分与整体，简单与复合等等。

恩格斯把原因和结果概念放在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中加以考察。他说："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就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且在这里不断更替的运动就显现出来，一个为原因，另一个为结果。"③ 这两个概念只有在应用到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只要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联系中考察，这两个对立的概念就流动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4页。

② 恩斯格《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29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5页。

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的相互作用的概念之中。在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此地是结果的东西，在彼时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在偶然性和必然性问题上，恩格斯批判了把偶然性和必然性绝对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他认为，这只能导致机械决定论和不可知论的“二律背反”。机械决定论基本否认偶然性的存在，企图把偶然性提高到必然性，但结果适得其反，只能“把必然性降低为纯粹的偶然性”。恩格斯指出：和这两种形而上学观点相对立，“黑格尔提出了前所未闻的命题：偶然的东西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种根据，而且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没有根据；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己规定自己为偶然性，而另一方面，这种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①他特别反对那种把必然的东西说成是唯一在科学上值得注意的东西，而偶然性则对科学无足轻重的说法。因为，这等于说：“凡是可以纳入规律、因而是我们知道的东西，都是值得注意的；凡是不能纳入规律、因而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都是无足轻重的，都是可以不加理睬的。这样一来，一切科学都完结了，因为科学正是要研究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②科学正是通过从偶然性中揭示必然性的道路，实现由不知到知、从旧观念到新观念的转化的。进化论就是明证。“达尔文在他的划时代的著作中，是从最广泛地存在着的偶然性基础出发的。……正是这样一些偶然的差异使达尔文不得不怀疑生物学中一切规律性的原有基础，不得不怀疑原有的形而上学地固定不变的种的概念。”③

形式和内容也是如此。在自然界中，生物有机体的形态发展和它的生理机能密切相关和相互制约。“形态（细胞）的分化决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3页。

② 同上，第541页。

③ 同上，第543页。

物料分化为肌肉、皮肤、骨骼、表皮等等，而物料的分化又决定分化了的形态。”①

2.自然界中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转化

恩格斯指出，质量互变这一普遍规律在自然界中也是起作用的，但是它作为自然界的规律又有其自身的特点。他说："自然界中一切质的差别，或者基于不同的化学成分，或者基于运动（能）的不同的量或不同的形式，或是——差不多总是这样——同时基于这两者。所以，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即没有所考察的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②根据恩格斯的论断，可以把由量变引起质变分为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由运动量（或能量）的变化而引起的质变。如化学中的同素异性体，由于它们具有的能量不同，导致其分子或原子的空间位置和结构方式不同，从而使它们产生了质的差异。另一种是由于物质量的变化所引起的质变。

质变以量变为前提，但不能把质变归结为量变。机械论的物质观企图把物质的质的差异归结为单纯的量的差异，这必然会导致"任何物质都是由同一的最小粒子所组成"的形而上学的结论。实际上任何"纯粹量的分割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这个极限它就转化为质的差别"。③物体由分子构成，但具有不同于分子的质；分子由原子组成，其质也不同于原子。同样，渐进论的发展观否认自然界有飞跃，把发展理解为纯粹连续的渐进过程也是不对的。这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庸俗化。实际上旧物种到新物种的进化本身就是一种质变。各种不同质的东西之间存在中间环节并不意味着质的差别的消除，恰恰相反，由于中间环节本身即是质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8页。

② 同上，第7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6页。

量关节线，因而“这些中间环节只是证明：自然界中没有飞跃，正是因为自然界自身完全由飞跃所组成。”①

3.否定之否定是整个辩证运动过程的核心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从理论上论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同对立统一规律的关系。他认为，从《资本论》的思想进程“可以看到马克思所使用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② 所谓“整个过程”，是指一个独立的矛盾运动过程的展开和完成，是对立运动的全体；所谓“核心”，是指贯穿于整个矛盾运动过程的一般规律和必然结局。

恩格斯强调否定之否定规律在自然界中的客观普遍性。他认为否定之否定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的过程。它真实地发生在有机界的两大界中：植物和动物生长和繁殖的过程无不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无机界中也存在否定之否定，如地质演化过程就是如此。

恩格斯特别强调确立辩证的否定观的意义。他指出：形而上学把否定看成是外力强加的，是单纯的、绝对的否定。但是“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③ 辩证的否定，必须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引出的“自我否定”，它是事物联系和发展的环节。研究事物的“自我否定”是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上把握辩证否定观的关键。“否定的方式在这里首先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质，其次取决于过程的特殊性质。”④ “因此，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每一种观念和概念也是如此。”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15页，并参见第72页。

② 同上，第153页。

③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0—182页。

第三节 自然科学的逻辑方法

作为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统一，自然辩证法不仅应当揭示自然界的辩证本性，而且必须为自然科学研究奠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

一 自然科学的发展和逻辑方法的革命

恩格斯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一致的观点出发，全面地考察了自然哲学、自然科学和逻辑学的全部历史和现状，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①

1.自然科学研究离不开逻辑方法

在恩格斯的时代，大多数自然科学家都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传统中接受了这样一个命题：凡是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即不存在于理智中。②针对这种狭隘经验主义的科学观，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强调指出：任何自然科学，都不能仅仅以经验归纳为基础，而必须有理论思维和逻辑推演。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科学不能仅仅被当作经验科学，它同时必须是同一科学方法的不同方面。

首先，就科学的基础和出发点来说，不存在任何丝毫未渗入理性和观念的“纯粹经验”。恩格斯说：“那顶多也不过是允许自己用数学计算的形式来思维的地道的经验论，却自以为自己所运用的纯粹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可是实际上，它所运用的主要是些因袭的观念，都是其先辈的思维的大部分已过时的产品。”③那些现象（经验）只是作为有关的研究者“应当看到的或希望看到的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3页。

②③ 同上，第610页、497页。

西"，"才能显现出来"。①

其次，对经验的描述也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因为在它的描写中，那些传统的解释也一块混进去了"。②"甚至用实验确定了的事实，在经验论那里也渐渐和这些事实相应的传统解释不可分离地联系起来"。③

最后，自然科学绝不像狭隘的经验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仅仅局限于经验现象的描述，它必须揭示现象的内部联系，上升为理论。"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④"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⑤就必须运用逻辑方法。"纯粹"的经验主义方法是建立不起科学殿堂的，它只能造成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泥潭。⑥

2.逻辑方法的具体历史性

当然，经验主义者并非完全否认逻辑的存在和逻辑方法的作用，在自然科学家那里，尽管存在着轻视理论思维的倾向，"可是没有人从这里得出结论说，例如，形式逻辑是没有意思的东西。"⑦他们的根本缺陷在于，从经验主义的立场出发，把逻辑看成一种与理论的具体内容毫无关系的抽象形式，一种与认识的历史进步毫无关系的永恒工具，正是这种形式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逻辑观，使他们在逻辑方法问题上采取了实质上的虚无主义态度。

恩格斯批判了这种形式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逻辑观，他指出思维规律的理论决不像庸人的头脑关于"逻辑"一词所想像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也不是康德所说的是人的认识的先验形式，更不是杜林所认为的是"悟性的自由创造"。恰恰相反，

①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0、477、477、39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1页。

⑥ "这种观点的最后形式——'自在之物'"。（同上书，第584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4页。

它同人的认识内容和认识成果一样，是一定时代人们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产物，是一种人类所特有的“获得性遗传”。①“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而这对于思维的实际应用于经验领域也是非常重要的。”②

即使就形式逻辑来说，它也不是什么绝对的、抽象的思维形式。它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本身又随着人类认识内容的进步而演变。形式逻辑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反映了人类从前逻辑思维发展到逻辑思维，而后者又是在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过程中，从无所不包的知识总汇（哲学和自然科学）中分离出来的，它使稳定的范畴从流动的混沌表象中结晶出来，并形成为独立的体系。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式演绎逻辑发展到近代以经验归纳为特点的分析方法，也是与“实验自然科学”的产生分不开的。离开了对自然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和注重经验材料的搜集整理，就谈不上归纳逻辑和分析方法的产生和发展。正因为如此，形式逻辑所研究的思维形式并不是与认识对象和思维内容毫无关系的。它作为“关于事物的科学”，反映了思维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一面，是知性思维的形式。形式逻辑的活动范围，仅仅着眼于形式推理的有效性，是以认识对象的相对不变性、思维内容的相对同一性为基础的。一旦超出这一范围，“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它之所以被看作自然科学的唯一逻辑方法，仅仅是由于当时自然科学的认识内容本身具有狭隘性（搜集材料和分类研究）。经验主义者不了解这种局限性，把形式逻辑绝对化，特别是当它“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illegible]83、42、610页。

② 同上，第382页。

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①

3·辩证法是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方法

这也是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发展所决定的。尽管“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② 但是，直到18世纪为止，从总体上揭示自然界的运动尚未成为自然科学的直接任务，经验材料的积累也未达到系统进行理论概括的地步。因而，不仅自然科学没有产生对辩证的逻辑方法的需要，而且辩证法本身也还没有上升到自觉的程度。

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自然科学逐渐进入整理材料的阶段，理论思维的重要性日益显示出来，这就促使辩证法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发展起来，并通过黑格尔发展成为第一个自觉的形态。黑格尔的巨大功绩就在于系统地研究了辩证逻辑的基本形式，但是由于自然界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辩证本性尚未从自然科学成果中充分显露出来，因此，他仍旧是把自然界看作绝对精神的辩证发展的自我异化的表现，不承认自然界本身是辩证地运动和发展着的。在《自然哲学》中，他依然是“把旧的牛顿-林耐学派的整个自然科学作百科全书式的概括（外在的并列——引者注）”，③ 不仅出发点上是唯心主义，而且在方法上还直接背叛了自已，变成了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和浅薄的形而上学。

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30到60年代的重大突破，为逻辑方法的革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一方面，“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1页。

② 同上，第5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3页。

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①]经验自然科学要上升为理论自然科学，孤立静止的研究要上升为总体、过程的研究，原有的经验主义方法和形式逻辑就完全不够了。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洲'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态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②]这样，黑格尔"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的唯心主义就必然要破产了，关于总联系的"科学之科学"即"自然哲学"就成为多余的了。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

这一切表明了，由自然辩证法体系的确立所实现的自然科学逻辑方法的革命是双重的：既是自然科学方法的革命，又是辩证法本身的革命。

二　怎样在自然科学中应用辩证逻辑

1.辩证逻辑的基本原则

辩证逻辑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的科学。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区别在于：辩证逻辑不仅研究思维形式，而且要研究思维内容，即研究自然界的辩证发展。辩证逻辑不仅承认思维形式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而且在此基础上注重思维形式的灵活性和流动性，以及思维发展规律的辩证性。形式逻辑是对知性思维的研究，它主要适用于日常生活范围和事物的相对稳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9—340。页

状态，而辩证逻辑超越了形式逻辑思维的狭隘界限和日常生活范围，它是辩证的理性思维，包含着广大世界观的萌芽。因此辩证逻辑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反映论基础上的主客观辩证法的统一，是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的一致。辩证逻辑的三条基本原则就是这一根本特征的具体体现。

(1) 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这对于古希腊人是不言而喻的。但狭隘的经验主义者由于只相信经验，不相信理性，因而不得不从经验上来一点一滴地证明自然界不能没有理性。这就使他们自己陷于自相矛盾的可悲境地，甚至滑入不可知论和神秘主义的泥坑。恩格斯指出："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① 没有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没有主客观辩证法的一致，辩证逻辑就失去了它的前提和基础。这样就在唯物论反映论的基础上突出了理性思维的能动性。

(2) 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逻辑和事物本身的历史的一致，其二是在思维发展历史中一切重要范畴的历史发展和它在个别思想家的头脑中的发展的一致。"正如某一有机体在古生物学中的发展和它在胚胎学中（或者不如说在历史中和在个别胚胎中）的发展的关系一样"②，二者是一致的，但又有区别："在历史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而它在辩证的思维中，就像在胚胎的发展中一样包括在必然性中。"③

(3) 抽象和具体的统一。"具体"可分为感性具体和思维具体。前者是人对实在的具体事物的混沌的表象，后者则是具体事物在思维中的再现，是对象的所有抽象规定性的统一。马克思认为，尽管认识的全过程是"感性具体——抽象规定——思维具体"，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64页。

②③ 同上，第544、545页。

就辩证逻辑的方法来说，从具体到抽象作为科学抽象的过程，只是懂得逻辑认识的起点，真正科学的认识道路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辩证逻辑同经验主义的归纳法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不把抽象的规定看作思维的终结，而仅仅看作思维的起点，认为只有作为诸规定综合的具体概念才是理性思维的结果。① 恩格斯对此持有同样的看法，他针对经验主义者把规律看成是抽象的这一错误观点，以人类对自然界运动形式变换的识认为例，强调指出："运动形式变换的一般规律，比运动形式变换的任何个别'具体'例证更具体得多。"②

2.辩证逻辑的思维形式和逻辑方法

在这里，恩格斯分析了概念、判断、推理的辩证本性，阐述了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的辩证关系。

概念是逻辑的细胞。辩证思维"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③ 客观对象本身的辩证性质决定了概念在本性上就是辩证的。这种辩证性主要表现为概念的矛盾性、流动性和相对性。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以抽象同一性的观点来看待概念，否认概念的矛盾性和流动性，在概念之间设置绝对分明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恩格斯指出，"正是那些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和不能解决的两极对立，正是那些强制规定的分界线和类的区别，使现代的理论自然科学带上狭隘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些对立和区别，虽然存在于自然界中，可是只具有相对的意义，相反地，它们那些被设想的固定性和绝对意义，则只不过是被我们人的反思带进自然界的。"④ 达尔文的进化论充分地表明了生物学概念的流动性和相对性。恩格斯说：

---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0—75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5页。

③ 同上，第565页。

④ 同上，第16页。

"自从我们接受了进化论的那个时刻起，我们关于有机体的生命的一切概念都只是近似地和现实相适应。否则就不会有任何变化；哪一天有机界的概念和现实绝对符合了，发展的终结也就到来了。鱼这个概念的内涵是在水中生活和用鳃呼吸；如果不突破这个概念，您想怎么能从鱼转到两栖动物呢？而这个概念已经被突破了，我们知道一系列的鱼，它们的鳔已经发展成肺并且可以呼吸空气。如果不让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这两个概念中的一个或两个都和现实冲突，您想怎么能从卵生的爬行动物转到能生育活生生的幼儿的哺乳动物呢？"①

判断是概念的联系和展开。恩格斯对判断的辩证法的研究，集中地表现在对判断分类的问题上。形式逻辑只是把"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推理的形式列举出来和毫无关联地排列起来"。② 黑格尔第一次自觉地运用辩证法研究判断分类。他把判断分成四类，并且和他的《逻辑学》体系相对应。第一类是实在判断，与"存在论"相对应；第二、三类是反省判断和必然判断，与"本质论"相对应；第四种是概念判断，与"概念论"相对应。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合理思想，以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发展为基础，把判断分为个别判断、特殊判断和普遍判断，并阐明了判断的辩证发展。他举例说：史前人已经知道摩擦生热，但经过无数反覆，不知经过若干千年，终于形成一个"个别的判断"："摩擦是热的一个源泉"；然后又经过几千年，到1842年，迈尔、焦耳、柯尔丁才上升到一个"特殊的判断"："一切机械运动都借摩擦转化为热"；此后才三年(1845年)，迈尔就把上述特殊判断提高到"普遍的判断"："在每一情况的特定条件下，任何一种运动形式都能够而且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转变为其他任何运动形式"。这样，"表现在黑格尔那里的是判断这一思维形式本身的发展，而在我们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7—5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6页。

里就成了对运动性质的立足于经验基础的理论认识的发展。"①

推理是判断的联系和展开，是人类思维中更为复杂的思维形式。人类思维从个别到特殊、再到普遍的认识上升运动，必须通过推理的思维形式来实现。恩格斯认为要实现人类认识的上升运动，要求把各种推理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他说："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② 经验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把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对立起来，片面夸大归纳和分析的作用，贬低演绎和综合。他们认为，只有从经验材料出发经过归纳和分析，才能从个别中找到一般，从部分上升到全体。其次，在推理过程中二者是互相贯通的。演绎和综合固然要以归纳和分析为前提和基础，但归纳和分析同样要以演绎和综合为指导。在归纳和分析的过程中就已经包含着演绎和综合。因为要对经验材料进行归纳，必须从一定的分类标准和原则出发，而后者本身就已经是既成的一般前提。黑格尔也曾认为归纳推理是从 A(普遍)—E(个别)—B（特殊）开始的。要对具体事物进行分析解剖，必须以不破坏原有的整体性为前提。如果把有机体各个部分机械地加以肢解，就"不再是活的身体，而是尸体了"。③ 恩格斯针对经验主义的观点，强调归纳法无权要求成为科学发现的唯一的或统治的形式。蒸汽机加热可以获得机械运动，但10万部蒸汽机并不比一部蒸汽机能更多地证明这一点。卡诺是第一个认真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但是他没有用归纳法，而是依靠分析和类比。进化论也是如此。"单纯用归纳法来证明进化论是不可能的，因为进化论是完全反归纳法的"。④ 单纯的归纳只能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7、548页。

③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8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0页。

发现物种之间的差异和并存，不能揭示物种之间的联系和转化。它不能得出生物特征相对性和可变性的结论，因此，就更不可能形成物种不断进化的思想。

三　辩证逻辑是探求真理的方法。真理与假说

恩格斯指出，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不同，它不是证明的工具，而是探求新知识的方法。[①]辩证逻辑不仅要从思维形式方面揭示概念、判断和推理的辩证本性，而且要从理论内部方面，揭示真理的辩证本性；不仅要从微观角度阐明个别科学结论的形成过程，而且要从宏观角度阐明科学理论体系的确立过程。

1.科学理论内容的辩证本性。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割裂认识过程中经验和理性、理论内容和思维形式的统一，必然导致真理观上的两种互相对立又互为补充的片面观点：或者把逻辑学和数学看成是先验的"永恒真理"，从中引出人的思维能力的纯粹至上性，夸大认识成果的绝对性而陷入形而上学的独断论，或者把科学仅仅看成是纯粹的"经验归纳"，夸大认识成果的相对性，从中得出"人不能认识无限的东西"的结论，因而导致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在哲学上杜林是前一种观点的信奉者，而后一种倾向则在一些自然科学家如耐格里、赫尔姆霍兹、赫胥黎等人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正是在抵制这种错误观点的过程中，恩格斯第一次全面地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

首先，恩格斯从思维本性和认识主体的角度考察了人类认识能力的内在矛盾。他认为，人是否"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抑或人的思维无条件地具有"至上意义"和绝对的"真理权"？这既不能像耐格里那样简单地加以否定，也不能像杜林那样独断地凭空假设，而只能立足于对实际认识过程的具体分析。只要进入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6—577页。

我们认识领域的仅仅是有限的对象，我们认识的当然是有限的东西，这不过是同义反覆。然而思维的本性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性提高到普遍性，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使之确定起来。这样一来，"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这个命题就必须同时作如下的补充："我们在根本上只能认识无限的东西"。①同时，人的思维只是作为无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人类绝对地进行认识的思维的无限性，是由无限多的有限的人脑所组成的。这里同样包含着矛盾：从全人类来看，"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但这种绝对性"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认识过程中，在无止境的人类进化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因而，"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非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②

不仅人的认识能力存在着矛盾，而且认识对象也存在着矛盾。一方面，自然界是客观的，自然规律有永恒性，因而作为对自然规律正确反映的科学知识是有绝对意义的。因为"对我们说来，只要知道，在相同的情况下……，都有同样的事情发生，那就够了。"③另一方面，自然界又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变化着的，自然规律也是具体历史的，它以一定的条件为转移，只能在自然界的一定发展阶段和一定范围内起作用。要完全认识一个对象，就必须在世界的统一整体和全部过程中加以把握。"但是要认识这个体系，必须先认识整个自然界和历史，这种认识人们永远不会达到。"④因而对自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6—577页。

② 同上，第95页。

③ 同上，第582—583页。

④ 同上，第663页。

然规律的反映总是近似的。就我们已获得的自然科学知识来说，它所反映的就主要是地球上的各种自然现象，是以地球为中心的。如果想绝对地排除这种相对性而"要求一种无中心的科学，那就会使一切科学都停顿下来"。①

由此可见，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矛盾"存在于世界和人这两个因素的本性中"②，植根于人类认识过程的矛盾中。真理的辩证法就在于：任何相对的知识都具有绝对的意义，而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③。这一矛盾不但不是人类的不幸，相反正是人类智力进步的主要杠杆，"它在人类的无限的前进发展中每天地、不断地得到解决"。④

明确了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辩证关系，就可以避免把真理和谬误绝对对立起来的错误。"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只要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狭窄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因而对精确的科学的表达方式来说是无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作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⑤正因为如此，在一切真正科学的著作中，就应当避免把有限的认识成果绝对化，避免使用像杜林所标榜的那种"永恒的终极真理"的独断主义说法，而实事求是地把它看作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

2.科学理论的形成。假说是理论自然科学的发展形式

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不仅考察了科

①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2、40、585、40页。
⑤ 同上，第99页。

学成果的辩证性质，而且深入研究了科学形成的辩证过程。

在当时的科学界，人们普遍接受从惠威尔到穆勒所提出的科学分类原则，把科学分为两类，认为数学是纯粹演绎的科学，而其他自然科学则是归纳的科学。这不仅造成了归纳和演绎两种逻辑方法的绝对对立，而且导致了对科学理论形成过程的错误看法。他们认为，数学是先验的，是不依赖任何经验地“从那些按照纯粹逻辑的观点既不可能也不需要论证的数学公理”中演绎出来的永恒真理；而其他自然科学则与它截然相反，是纯粹经验的，通过归纳而逐步积累起来的，并且归根结底只能靠经验来保证其意义和正确性。

恩格斯根本反对这两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他强调，“人的全部认识是沿着一条错综复杂的曲线发展的”。[1] 在科学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不仅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互相渗透，实验手段和逻辑方法协同并用，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交织在一起，而且包含着种种非智力因素的作用，例如需要幻想——当然是“合理的幻想”。如果说《自然辩证法》的主旨是反对自然科学中的狭隘经验主义倾向，强调理性思维和逻辑方法对于经验自然科学形成的重要意义，那末，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数学先验主义”的观点中，进一步揭示了数学的形成过程。他指出，数学和其他科学一样，也是从现实世界中得出来的。数学的对象，是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数学上各种数量的明显的相互导出，也并不证明它们的先验的来源，而只是证明客观事物在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方面的合理的相互关系。数学“公理的自明性是承继下来的”，[3] 是前人经验的结晶。同时，数学公理的内容也是贫乏的，要使数学本身真正有所前进，就必须总结新的经验，吸取来自现实事物的关系和空间形式。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4、663页。

③ 同上，第601页。

在阐述科学理论的形成问题时，恩格斯特别重视假说的作用。无论是狭隘的经验论者，还是形而上学的先验论者，都根本否认假说的作用。牛顿就说过："假说这个东西我是不考虑的"，"凡是假说，不管它是形而上学的或是物理学的，力学的或性质不明的都不能用于实验哲学之中。在这种哲学中，一切定理都由现象推论而来，并用归纳法概括。"①而杜林则认为，任何知识不是永恒的终极真理，便是纯粹的谬误，也不承认假说的科学地位。

与此相反，恩格斯认为，许多自然科学理论，在被确证以前都是以假说的形式存在的。"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个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使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的事实的方式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新的说明方式——它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取消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纯粹地构成定律。如果要等待构成定律的材料纯粹化起来，那末这就是在此以前要把运用思维的研究停下来，而定律也就永远不会出现。"②在这里恩格斯不仅深刻地阐明了假说的必要性，而且全面地揭示了假说产生的前提，假说同科学理论的区别，从假说到理论的发展过程。

不仅如此，恩格斯还根据当时的传统划分，研究了假说在三类科学中的应用。他指出，在以非生物运动为对象的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方面，假说就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生物学中，由于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和因果联系，为了对此作系统的了解，"总是一再迫使我们在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周围造起茂密的假说之林"；而在第三类科学即历史科学中，由于其规律按其本性都是暂时的，"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因而假说在科学理论

---

① 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2版第3册结尾"总识"。文中的"形而上学"系指哲学，而"实验哲学"则是指经验科学。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3—584页。

的形成中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①

不能正确认识假说和科学理论的关系，也是一些自然科学家陷人不可知论的认识根源之一。"对缺乏逻辑和辩证法修养的自然科学家来说，互相排挤的假说的数目之多和替换之快，很容易引起这样一种观念，我们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②而那些把科学理论看成纯粹假说的人，则完全走到否认因果性的不可知论立场上去。在他们看来，"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连用三棱镜的光谱得到的天体的化学分析也同样是假说"。③

3.科学理论的确立。实践是科学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

辩证逻辑之所以能把经验与理性、认识内容与思维形式统一起来，能把各种逻辑方法综合在一起，从而成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自觉地植根于实践之中。

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和法国唯物主义者虽然也承认实验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有的人甚至提出过实验是检验科学结论的标准，但是，他们至多只是从实验是搜集经验的手段这一点来理解这一命题的。归根结底，他们只是把感觉经验当作科学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

相反，在恩格斯看来，实践不仅是经验的来源，而且是理性范畴和逻辑方法的基础。例如，在自然科学中具有根本意义的因果观念就来源于实践。在实践中，"我们不仅发现某一个运动后面跟随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发现：只要我们造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中发生的条件，我们就能引起这个运动；甚至我们还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运动；我们能给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规模。因此，由于人的活动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6—98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4，575页。

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这个观念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①

就科学理论的确立过程来说，实践的验证是假说转化为科学理论的关键性环节，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恩格斯认为，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三百年之中一直是一种假说，只有当勒维烈依据这一学说推算出海王星的位置，而加勒确实发现了这颗行星时，哥白尼的学说才被证实为真理。“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Post hoc〔在这以后〕，但不是 propter hoc〔由于这〕。”“必然性的证明是在人类活动中，在实验中，在劳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 Post hoc，那么它便和 propter hoc 等同了。”② “人类的活动对因果性作出验证”。③同样，单纯的逻辑证明也不能代替实践，成为科学理论真理的标准。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恩格斯不仅把实践作为认识的范畴引进了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更重要的是他同时把自然科学研究作为实践的一种形式，纳入了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从社会生活总体和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考察了自然科学与生产技术、社会需要以及社会革命等方面的关系，从而全面揭示了自然科学的源泉、动力和社会功能，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完整科学观的基础，指明了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他精辟地指出：“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维。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的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3页。

②③ 同上，第572、573页。

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①] 这一段话充分显示了自然辩证法同历史唯物论的内在统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恩格斯对整个自然辩证法体系所作的结论。

第四节　在统一世界观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系统阐述

新自然观体系的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化创造了条件。正是在写作《自然辩证法》的过程中，恩格斯发表了《反杜林论》，第一次对包括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这一巨著以无可辩驳的论据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是以一种严格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辩证唯物论或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离开了这个基础，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在统一，就不可能有作为整体来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一　《反杜林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

1.杜林的挑战及其在德国党内的影响

《反杜林论》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其直接目的是批判杜林主义，消除它在党内的影响。

杜林(1833—1921)，是当时德国的一个折衷主义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856年毕业于柏林大学法律系，开始从事法律事务工作。186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864年起在柏林大学任历史、哲学和国民经济学私人讲师，出版了一系列有关自然哲学、伦理哲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著作。1877年因公开揭露大学中的学阀统治而被解聘，后来从事私人著述活动，至死为止。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3—574页。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杜林曾发表题为《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书评，打破了官方经济学界对该书的“沉默抵制”。这一点为马克思所肯定。但他在书评中攻击《资本论》没有“显著的独特性”，充其量不过是李嘉图的老生常谈；认为“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并非无可非议”，还把马克思的辩证法与施泰因的死板的“三分法”相提并论。[①]

进入70年代以后，杜林连续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1873)、《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1875)三大部著作。他以“社会主义的行家，同时兼社会主义的改革家”的身份，吹嘘自己在上述著作中对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实行了“全面的变革”，提供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公开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妄图取代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指导作用。

杜林主义的崭露头角，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当时德国通过王朝战争，实现了统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迅速，工人队伍日益壮大，工人运动向广度发展，大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纷纷转向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杜林作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再加上他抨击过德国的专制制度，发表过维护巴黎公社活动家的言论，获得了民主斗士的声誉，因而博得了进步青年的拥戴，一些政治上不成熟的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甚至把他奉为“精神领袖”。

杜林主义的蔓延，也在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内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1875年5月，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在哥达大会上合并为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后改名为社会民主党)。由于爱森纳赫派领导人无原则的妥协，助长了党内机会主义思潮的泛滥。就在哥达大会前后，杜林主义在党内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不仅伯恩施坦、莫斯特、恩斯特等人都成了杜林的狂热崇拜者，一部分党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8—10页。

的出版物极力鼓吹杜林主义，甚至连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著名领导人也一度受其影响。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也刊登了不少宣扬杜林主义的文章。例如，倍倍尔就在《一个新的"共产党人"》一文中，赞扬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一书，是"继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经济学的领域最近出现的优秀著作"。[1]还有些人竟准备以通俗的形式在工人中散布这个学说。年轻的、刚刚不久才最终统一起来的德国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着重新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严重威胁。

2.《反杜林论》的写作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

为了制止杜林主义在党内的蔓延，捍卫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征得李卜克内西的支持后，决定接过杜林扔来的手套，"彻底收拾他"。

1876年2月底至3月初，恩格斯首先在刊登于《人民国家报》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文中，公开表明了对杜林主义的立场。5月，他毅然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并于5月28日致马克思的信中确定了《反杜林论》的总计划。从此时起至1878年7月初，用两年多时间完成了这一著作。

《反杜林论》的写作得到了马克思的支持和帮助。在付印之前，恩格斯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马克思写的。

《反杜林论》的直接现实意义，就在于它给杜林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从理论上武装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教育和挽救了大部分原来追随杜林的党员，彻底结束了其在党内的影响。到1885年准备再版该书时，杜林已几乎被人遗忘了。

但是，这一巨著并未因其论战对象销声匿迹而丧失其理论价值。由于对杜林的批判涉及到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涉及到马克

① 倍倍尔《我的一生》第2卷，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41页。

思主义所有三个组成部分的历史和现状，因此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①，“百科全书式地概述了我们在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问题上的观点。”②马克思也曾指出：“不仅普通工人……，而且真正有科学知识的人，都能够从恩格斯的正面阐述中汲取许多东西。”③因此，不仅该书本身一再重版，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者，而且1880年恩格斯又应拉法格的请求，将其中的“概论”和第三编的“历史”、“理论”这三章改写为单独的小册子出版，这就是著名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它也被翻译为多种文字，并广泛传播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著作。

《反杜林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也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不仅因为该书第一次全面概述了新的自然观、历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切方面，更重要的在于：深刻地揭示了辩证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世界观基础，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方法论本质，并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历史观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二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基础

1.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主义同杜林主义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科学社会主义同企图复活空想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潮的斗争。而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首先在于二者由以出发的世界观基础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所以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因为它建立在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3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42页。

的、严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之上，它不把社会主义看作某种应当确立的状况，某种应当使现实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看作由现实的矛盾所产生的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与之相反，任何空想社会主义，不管主观上如何激进，由于其世界观都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因而它总是离开现实的基地，诉诸某种先验的“永恒原则”和抽象的人道主义的伦理要求，对现状表示道义上的愤怒，对未来陷入非科学的幻想。杜林向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挑战，对社会主义实行的所谓“最新改革”，正是“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①

《反杜林论》正是围绕这一中心问题来同杜林论战并展开正面阐述的。在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杜林的“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必须联系这个体系来研究这一理论，从而研究这一体系本身”。② 在全书的“引论”中，他再一次强调他所要批判的杜林三部著作中最使他感兴趣的，主要是第一部著作，即《哲学教程》。③ 就全书的实际内容看也是如此：“哲学”编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篇幅；“政治经济学”编的十章中，前四章都用于批判杜林庸俗经济学的前提——反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而“社会主义”编（共五章）的前两章则同引论的第一章首尾呼应，集中阐明了空想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区别。④

恩格斯从历史和理论两个方面，全面考察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特别是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7—8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1页。

④ 正是这三章后来构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独立小册子，而且最初题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理论同科学社会主义的联系和区别。与杜林狂妄自大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截然相反，恩格斯充分肯定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功绩，指出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来源之一。同时，恩格斯强调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世界观基础同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其理论出发点仍然是18世纪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和启蒙学派的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①] 这就造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两个致命弱点：一方面，它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历史性质，其批判“与其说是针对着事物发展本身，不如说是针对着所产生的恶果”，不能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能简单地把它当作坏东西抛弃掉；另一方面，找不到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社会力量。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严整世界观的创立，特别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才使社会主义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能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发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也正是因为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应用造成了其对象和方法的根本变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2页。

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强调，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从某个天才头脑中引出来的，而是从资本主义的现实矛盾和冲突中必然产生出来的。资来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它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这些矛盾又导致生产的扩张超过市场的扩张，引起了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的“恶性循环”。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超过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便是这一矛盾的必然产物和解决方式。

这样，恩格斯便完整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同其唯物主义基础的关系，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的原则对立。他作出了下述结论：“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①

2.杜林的空想主义实质上是“特殊普鲁士的社会主义”

明确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联系和区别，杜林主义的反动实质就一目了然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思出新社会的轮廓，因为这些轮廓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在构想未来社会特征时，之所以只限于向理性求助，正是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但是，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后，杜林仍要从他的至高无上的头脑中，从他的孕育着“最后真理”的理性中，构思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标准”体系，而不根据现有的历史地发展起来的材料和作为这些材料的必然结果来阐述这个体系，那末，他就不仅是一个“最新的空想主义者”，是空想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页。

会主义者的庸俗和拙劣的“模仿者”，而且“只能是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①] 恩格斯辛辣地讽刺道：“他把伟大的空想主义者称为‘社会炼金术士’。就算是这样吧，炼金术在当时还是必要的。”但是，在伟大空想主义者“出现以后差不多 80 年的今天”，杜林的行为“倒像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在现代化学的规律被发现和确立以后，还想恢复旧的炼金术，并且所以要利用原子量、分子式、原子价、结晶学、光谱分析，唯一的是为了要发现——哲人之石。”[②]

恩格斯具体分析了杜林按照“永恒原则”从“社会的自然规律”推演出来的所谓“共同社会”的设计方案，指出他不仅从科学社会主义倒退，而且在许多方面比起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也大大倒退了。后者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消灭旧式分工和城乡分离对于社会解放的重要性，认为随着人们自由结成社会、家务劳动和教育的社会化，家庭成员间真正自由的相互关系也就直接产生了。傅立叶并且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可是在杜林的“未来社会”中，仍然保存旧的社会分工，而城乡分离“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设想家庭仍然是“继承财产”的单位，保留着资产阶级家庭的全部形式。不仅如此，杜林甚至为未来社会保留了军队、警察、宪兵等等全部国家机器存在的权利，甚至主张用强制的行政手段消灭宗教，主张严禁优等人和劣等人结合，不准劣等人结婚的种族主义政策。这一切说明，杜林不仅把社会主义庸俗化了，而且完全堕落成为“特殊普鲁士的社会主义”。“无论我们向什么地方看，总是看到特殊普鲁士的社会主义”。[③] 阉割科学社会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基础，由科学社会主义倒退到空想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1页。

③ 同上，第343页。

只能导致反动的"普鲁士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恩格斯对杜林主义所作的历史结论。

三 唯物辩证法同先验形而上学方法的对立及其在各个领域中的表现

1.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杜林"新哲学体系"在方法论上的根本对立

杜林的倒退行为是双重的：正像他的"新社会主义"不过是企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活空想社会主义一样，他用来作为自己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新哲学体系"也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体系"哲学的翻版。如果说恩格斯在前一方面是联系杜林的"新哲学体系"来揭露批判其"特殊普鲁士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内容的话，那么在"研究这一体系本身"时，则着重揭露批判了杜林构造体系的先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

恩格斯指出："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领教了杜林先生的方法。他的方法就是：把每一类认识对象分解成它们的所谓最简单的要素，把同样简单的所谓不言而喻的公理应用于这些要素，然后再进一步运用这样得出的结论"。① 由于杜林自己认为，分解得到的所谓"最简单的要素"即是"原则"，② 因此他的思维方法可以概括为从原则出发，按公理解决。

恩格斯首先揭露了杜林这一方法的先验主义本质，指出它同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杜林用他的方法来构造哲学体系时，认为哲学应当包括一切知识和意志的原则，这些原则是简单的或迄今被想象为简单的成分，由这些成分或原则可以构成各种各样的知识和意志。他把这些原则分为三类：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或一般的世界模式；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关于人的学说。并且认为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05、37页。

原则本身是先于客观世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只是在后来才被应用于观客世界，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要适应于这些原则。这样一来，一切真实的关系都被颠倒了。实际上，"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① 世界模式，存在的基本原则不应当从头脑中得出来，而应当仅仅通过头脑从现实中得出来。杜林从先验的原则出发进行逻辑范畴的推演，推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完全是对黑格尔《哲学全书》的拙劣模仿。

如果说杜林在先验主义原则上抄袭黑格尔，那么在辩证法方面，他则完全同黑格尔相反。在杜林看来，"矛盾=背理，因而它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出现的"。② 他不仅把辩证法污蔑为"黑格尔瘟疫"、"神学逻辑"，而且恶毒地攻击马克思的《资本论》"缺乏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逻辑，这是辩证法的混乱交织和观念的阿拉伯式花纹的特点"，"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不得不"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结论"执行助产婆的职务"。这就充分暴露了杜林的方法不仅是先验唯心主义的，而且是形而上学的。恩格斯不仅以确凿的事实和深入的论证痛斥了杜林的攻击和污蔑，阐发了唯物辩证法是比形式逻辑"更高超得多"的认识方法，而且通过揭露杜林在构造体系时所陷入的自相矛盾，说明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必然陷于破产。正是由于形而上学方法的限制使杜林把运动与物质割裂开来，无法找到一条"从静到动的桥"；不能理解无限性本身是一个矛盾，愚蠢地得出时空有限的结论；企图严格地给出生命的定义，结果其中四个特征互不相容；在"平等"和"自由"问题上也陷入了可悲的自相矛盾境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页。

② 同上，第131页。

恩格斯不仅批判了杜林思维方法的先验形而上学本质，而且进一步揭示了其认识根源。他指出，杜林所以陷入先验主义和形而上学，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对数学方法和形式逻辑方法抱有错误的观点。杜林的方法实质上是数学和形式逻辑公理方法的泛化。他不仅认为数学和形式逻辑可以先验地从人们头脑中构想出来，而且认为一切知识都应当像它们那样，以简单的基本形式，按照公理来解决。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杜林先生以为，他可以不加入任何经验的成分，从那些'按照纯粹逻辑的观点既不可能也不需要论证'的数学公理导出全部纯数学，然后再把它应用于世界，同样他以为，他可以先从头脑中制造出存在的基本形式，一切知识的简单成分，哲学的公理，再从它们导出全部哲学或世界模式论，然后以至尊无上的姿态把自己的这一宪法赐给自然界和人类世界。"①

2.先验形而上学方法必然导致唯心史观和反历史主义观点

恩格斯不仅揭示了杜林先验形而上学方法同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对立，而且具体考察了这一对立在各个领域中的表现。在这一方面，恩格斯特别强调唯物辩证法同唯物史观的内在联系。他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②如果说杜林的先验形而上学方法在自然观的范围内尽管造成了严重的不彻底性，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然科学的某些唯物主义立场的话，那么，一旦进入社会历史领域，杜林就完全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成为一个极端的反历史主义者。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杜林不是从人们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而是从所谓的"社会"的最简单的要素出发，提出了"两个人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7—378页。

模式”。他把“社会”抽象地分解为“最简单的要素”，发现最简单的社会至少是由两个人组成的。于是这两个人的关系就成了全部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基本模式。因此，只要按照公理同这两个人打交道，便可以推论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基本模式。凭借这个基本模式，无论何时何地，一旦有了政治、经济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这两个人就会飞快地出动，并且立刻“按照公理”来解决问题。那么，什么是社会领域内的所谓公理呢？杜林认为，这就是“两个人的意志，按其本身而言，是彼此完全平等的，而且一方不能首先向另一方提出任何肯定的要求”。如果一方这样做了，并以暴力来实现自己的要求，那就是一种不正义的行为。

诚然，这种“两个人”的模式并非杜林“独创性的”发明，而是从启蒙学者以来的整个18世纪思想家所共有的思维方式。在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他们就已出现，而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中则扮演着从事不同行业并相互交换产品的猎人和渔夫。不过，在他们那里，这两个人还保留着某些具体规定和不同身份，并且主要只是充当说明的例子。只有在杜林的著作中，才变成了没有任何规定的两个赤裸裸的男人，同时又上升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和一切历史形态的唯一尺度。

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杜林对待社会的极端反历史主义态度。“他发现了全部以往的经济学、全部政治学和法学，一句话，全部以往的历史在其周围旋转的轴心。这就是：‘暴力和劳动是在构成社会联系时应该估计在内的两个主要因素’。这一句话里包含了以往的经济世界的全部宪法。这部宪法非常短，内容是：第一条，劳动进行生产。第二条，暴力进行分配。”① 而历史研究的“本质的先决条件是对历史上的各种正义和非正义的体制要有一个全面的考察”。② 而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暴力、奴役、非正义的历史，人类只有按照杜林的“社会的自然体系”模式，才能进入平等、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29、169页。

互助和正义的千载王国。

四　暴力的本质和作用以及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不仅从总体上揭示了整个马克界主义理论的世界观基础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本质，而且深化和发展了一系列基本哲学观点。其中有关自然观和认识观方面的，我们已在第二、三两节中阐述了。这里着重谈谈他在历史观方面的发展，这主要是关于暴力的本质和作用以及自由与必然关系这两个问题。

1.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问题观点的系统发挥

这是在批判杜林历史唯心主义的"暴力论"中实现的。杜林说："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经济的依存不过是一种作用或特殊情形，因而总是第二等的事实"。"当然，这些第二等的作用本身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在目前是最能使人感到的；但是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应先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① 恩格斯指出：把显赫的国家政治行为看做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样一种观念，已经像历史记载本身一样地古老，实际上民族的发展是在这个喧嚣的政治舞台背后悄悄地进行的。杜林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不过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老调重弹。杜林编造的"两个男人"的新模式并不能说明这一陈旧的观点。掠夺和暴力虽然可以改变财产的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无论如何财产必须先由劳动生产出来然后才能掠夺。在私有制形成的任何地方，都是由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变化，即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

政治状态不仅不是经济情况的决定者，相反倒是由后者产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8页。

并为之服务的。"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基础性'得多"。[①]社会革命为这一点提供了无可反驳的证明。革命不是按照杜林的原则，使经济情况适应于政治状态，而是相反地把陈腐的政治废物抛开，并造成能够适应于新的"经济情况"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状态。否则，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胜利的就不应当是资产阶级，而是拥有政治暴力的封建制度本身。当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和壮大起来以后，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利益也陷入了杜林陷入的那条迷途，以为用"直接的政治暴力"就能改造"经济情况"及其不可避免的发展，以为"用克虏伯炮和毛瑟枪就能把蒸汽机和由它发动的现代机器的经济效果，把世界贸易以及现代银行和信用的发展的经济效果从世界上消除掉"。[②]但这不过是痴心妄想。

政治暴力不仅是为经济服务的，而且作为手段本身也依赖于经济情况。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要使这种意志行为得到实现，必须有暴力的工具武器。"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③]恩格斯分析了武器和作战方法的发展史，说明了经济情况对暴力的决定作用。从中世纪骑士的盔甲和长矛直到先进的枪支、野跑和军舰，每一步进展都是由工业生产的发展所决定的。现代的军舰本身就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

恩格斯还针对杜林的所谓暴力在阶级起源中起决定作用、对自然界的统治是以对人的统治为前提的谬论，论述了阶级关系形成的过程和消灭的途经。阶级和阶级关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不是由暴力产生的。阶级和阶级关系的形成有两条道路。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9页。

②③ 同上，第205、206页。

余产品的出现，使剥削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由于公共事务增多，社会公职逐渐独立化，使一些公职人员如祭司、军事首领等逐渐脱离劳动而变成社会主人，这些统治人物逐渐集结成一个统治阶级。另一方面，公社成员的集体劳动逐渐被以农业家族为单位的生产所代替。由于内部的贫富分化，富有家族力求吸收若干劳动力，于是战俘不再被杀掉而留下来劳动。“这样，不是暴力支配经济情况，而是相反地暴力被迫为经济情况服务。奴隶制被发现了。”① 阶级的产生是一定经济情况造成的，它的消灭也是生产充分发展的结果。“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因此，只是在现在，任何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才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也只是在现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无论它拥有多少‘直接的暴力’，都将被无情地消灭。”②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暴力决定论的同时，还深刻阐述了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杜林戴着基督教的有色眼镜，把暴力看做“原罪”，看成“绝对的坏事”。似乎暴力玷污了全部历史，践踏了道德和法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恩格斯批判杜林时指出：“暴力在历史上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③

2.自由和必然。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是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夸大人的意志自由，认为人们可以不受任何条件限制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0页。

②③ 同上，第221、223页。

自由地决定一切，从而陷入了唯意志论；而形而上学的机械论则否认人的意志自由，把人看成是必然性的奴隶，这就走向了宿命论；二者都把自由与必然形而上学地绝对对立起来。黑格尔第一次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把二者统一起来，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杜林对自由和必然关系的看法是混乱的。他一方面认为自由是合理认识和本能冲动按平行四边形法则构成的合力，因而陷入折衷主义和二元论；另一方面他又说自由"只不过是按照先天的和后天的悟性对自觉动机的感受"，而"这样的动机"总是受到自然规律"不可避免的强制"。①这个看法带有唯物论的倾向。恩格斯指出，杜林对"自由"的混乱观点是自己打了自己一记耳光，是对黑格尔观念的庸俗化的理解。恩格斯在揭示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本质的同时，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的思想。他指出：黑格尔提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黑格尔说的必然并不是客观事物的规律，而是"潜在的概念"。恩格斯第一次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阐明了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他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②只有认识了客观规律，并利用它来为一定的目的服务，才有自由。

自由与必然不仅是一对认识论范畴，而且是一对重要的历史观范畴。既然自由是人们根据对客观世界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世界，而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又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所以恩格斯强调自由和必然都是历史的产物，自由与必然的历史发展是和人类的认识史、社会发展史相一致的。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页。

② 同上，第153—154页。

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① 只有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在这种制度下才能够第一次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②。这时人类社会已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思考与讨论

1.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通过总结19世纪自然科学的伟大发现而系统地确立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的？

2.为什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主要批判锋芒是针对英国经验主义，而不是德国唯心主义？

3.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是怎样阐述辩证逻辑的基本特征的。《自然辩证法》的逻辑和《资本论》的逻辑有何异同？

4.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是怎样阐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的？恩格斯是如何阐述科学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规律的？

5.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共同基础是什么？如何加以说明？

6.杜林体系的性质是什么？其方法论特点是什么？它同传统思维方法有何关系？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

第十章　把历史唯物主义推广应用于原始社会史的研究

原始社会史的研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注意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早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时期，他们就已开始这方面的探索。《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原始部落所有制作了最初的考察，《资本论》又进一步探讨了这个问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① 这里的亚西亚生产方式显然还不是指全部原始社会。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也有类似关于古代公有制土地公社的描述。但是，直到那时为止，有关原始社会的材料，尤其是考古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材料还很稀少，无论马克思或恩格斯都还不能对原始社会作深入详尽的研究。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原始社会仍然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久远的史前时代"。②

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这一问题又尖锐地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前。自从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资本主义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各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公开美化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民主。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在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也力图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这三个方面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他们宣称：私有制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产生了；而以父权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2页。

为核心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也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至于国家，他们坚持认为是超阶级的、永恒的，是崇高道德精神的体现。这些都迫切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作出科学的回答。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美国著名民族学家路·亨·摩尔根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陆续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原始社会史的著作。特别是摩尔根于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一书，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恩格斯当时是这样评价这本书的，他说："在论述社会原始状况方面，现在有一本像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这本书当然也是被马克思发现的，这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1]他指出："这本书对我们的整个世界观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摩尔根使我们能够指出崭新的观点，因为他对史前状态的说明为我们提供了一向缺乏根据的事实。"[2]由于摩尔根和当时其他许多史前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著作，在一些主要点上发现和恢复了人类成文历史的史前基础，这就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可能以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对原始社会史的深入研究，以便用严格的科学方法解释人类社会的起源及其向文明时代的过渡。

第一节　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贡献

一　马克思转向原始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原因

从本世纪30年代以来，整个西方哲学界围绕着"青年马克

---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408页。

② 同上，第414页。

思”和“老年（成熟）马克思”的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但对于马克思的晚年，人们却很少予以重视。

其实，马克思即使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尽管健康状况极其不佳，也仍然没有停止对重大理论问题的继续探索。他在最后几年里写下的大量人类学笔记就是证明。从1879年到1882年，他写了《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以及《约·巴·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等重要的笔记，对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马克思的这些笔记，除了《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由于恩格斯发表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而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外，其余各篇直到本世纪70年代还鲜为人知。

马克思晚年何以不顾病痛的折磨，同时又搁下他生平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的整理出版转而从事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呢？

首先，从马克思一生理论研究和思想发展的道路来看，历史唯物主义是他的最重要的发现。但是，在40年代，历史唯物主义暂时还只是一种假说，还有待于作出进一步的科学的证明。但要科学地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不能只是简单地把复杂的社会生活归结或还原为物质的经济基础，而必须要从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引出全部的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和一般社会生活的内容和形式。为此，马克思花了不下25年的时间，研究了资本主义这个人类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同时也是最复杂的社会经济形态。《资本论》就是这一研究的科学总结和最高成就。所以列宁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①

---

① 《列宁全集》第1卷，1955年版，第122页。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毕竟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局部情形，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历史规律毕竟只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要知道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一般规律在完全不同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原始社会中具有怎样的表现形式，这只有通过对原始社会本身的深入研究才能加以说明。须知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既没有商品生产，也没有商品交换，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不是经济关系，而是自然（血缘和地域）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适用于现代社会的规律可能完全不适用于原始时代的人类。

其次，几乎所有资产阶级学者都把私有制看作是一种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东西，认为资本主义植根于人类的本性，它一经产生就必然要永远存在下去。为了反驳资产阶级的这一谬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40年代起就曾几十次地从理论上说明了资本主义以及一般私有制的历史暂时性，论证了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私有制将最后地消失，全人类都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但是，以往的论证主要还是理论上的，还没有足够的历史事实作为根据。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一直在寻求一种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曾经存在过的，既没有私有制也没有剥削和压迫现象的社会状态。一旦发现了这种原始公有的社会状态，那末，资本主义以及整个私有制的暂时性和过渡性就将被历史本身所证明。

再次，马克思晚年理论研究重点的这一转移，也是由当时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发展所决定的。

如前所述，早在50年代初，马克思通过对法国1848到1850年的事变的总结，已经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建立和农民联盟的结论。1871年巴黎公社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但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由于西欧资本主义获得了和平稳定的发展，在欧洲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是否还有可能建立起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的革命联盟？如果从这些国家的内部看并不存在这种现实可能性，那末就世界范围而言，又该如何看

待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问题？

事实上，自从资本主义出现以来，由于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的极其便利，世界市场的不断开拓，它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之间日益频繁的相互交往和多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所有这一切造成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正像资本主义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也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到了19世纪下半期，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整个亚非各国的相互关系问题，实质上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的问题。这些曾经长期保持着古老生产方式的国家，它们的前途和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同西欧各国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样，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如何把西方先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同东方落后地区的农民的命运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就成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新任务。

不仅如此，自从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以后，一方面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普遍加强了对无产阶级的镇压，另一方面，西欧资本主义各国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在这些国家中，短时期内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然而在东方，极大的革命风暴的源泉却正在俄国形成，革命的重心正在由西方向东方转移。如果说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东方不发达国家是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但在这时，它们却是险象环生，风暴迭起，人民革命的热浪正在撞击着反动势力的冰层。所有这些，都引导着马克思的视线迅速转向东方，促使他把理论研究的重点转向人类“历史的过去”。

二　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探讨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的多达几十万字的人类学笔记和他以前所写的大多数

手稿不同，基本上都是从有关原著中摘录的材料，只有在原著特别值得注意和精辟的地方，或者认为有疑问或不确切的地方，他才加上边线标记，只是在不多几处他才写了一些简短的批注和补充材料。但是，通过仔细研究便可发现，这些材料都是马克思经过相当精心的挑选，并作了一定加工的可读材料。我们从马克思对材料的取舍以及所加的边线和批注中，可以看出，它是马克思晚年倾注了大量心血写下的一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准备材料。恩格斯曾经指出："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他为了执行马克思的遗言所写作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只是"稍稍补偿"了马克思的未竟之志。①

综观马克思的这些笔记，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新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理论问题，它是马克思一生所始终关注的。同时，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演进序列：

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未来的共产主义

在这里，部落所有制指的是原始社会晚期的所有制形式，而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则是指奴隶社会。

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又对人类历史的发展道路作了如下的表述：

亚西亚生产方式——→古代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生产方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页。

——→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①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在这里，他把亚西亚生产方式当作原始社会的再生形态②，而古代的生产方式则是指奴隶制社会③。

对于人类历史上这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关系，马克思不仅认为有着逻辑的必然性，而且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因而将普遍地适用于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指出："奴隶制和农奴制只是这种以部落体为基础的财产的继续发展。"④封建制只有在奴隶制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而资本主义则是封建制度解体的产物。他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出来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劳动者的奴役状态是产生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发展过程的起点。这一发展过程就是这种奴役状态的形式变换，就是封建剥削变成资本主义剥削。"⑤

毋庸置疑，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发展是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是建立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这一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之上的，因此是有科学根据的。但是，一般只能大致地包括个别，它不能详尽无遗地反映每个民族具体而生动的历史发展。每个民族的具体历史进程取决于它们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会陷入历史宿命论。在马克思的晚年，当他把视野从西欧转向更广大的以农村公社为主体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时候，尤其是在他读了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以后，他便立即以俄国农村公社为对象，写了《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

---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28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2—474页。

③ 同上，第474—477页。

④ 同上，第49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3—784页。

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以及《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系统地表达了自己在这一方面的看法。

在上述一系列著作中，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包括俄国在内的广大“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性质。在马克思看来，柯瓦列夫斯基虽然考察了亚、非、拉一些古老社会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在本国专制制度统治下的历史，但由于他是欧洲中心论者，因而他把自己的主要任务规定为，证明全世界所有地区的土地公有制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着与西欧同样的封建化过程。马克思反对柯瓦列夫斯基把东西方社会的历史作机械类比的形而上学观点。他认为西欧封建制度的本质特点在于：(1)农奴制；(2)土地不许出让给平民；(3)封建主对于农民拥有世袭的司法权或领主审判权。①以此为标准，东方非资本主义国家广大地区的农村公社，就只能被看作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社会发展阶段。他指出：“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沉积组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阶段。俄国农村公社属于这一链条中最新的类型。”②这也正如他在另一处所说的：原始公社曾经历过原生的、次生的、再生的等等类型，俄国农村公社属于其中的再生阶段。③

通过对农村公社的性质的分析，马克思阐述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在马克思看来，古代日耳曼人的农村公社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蜕变为封建制度，整个西欧都从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产生出资本主义制度，这并不构成人类历史发展的固定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84、274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4页。

③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对于原生的、次生的和再生的社会类型，是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的。除了上面所指含义之外，还有另一种含义，这就是：原生社会是指原始社会，次生社会是指私有制社会，再生的社会是指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模式，而是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就当时俄国农村公社所处的外部环境而言，俄国农村公社不仅和西欧资本主义是同一时代的东西（这使得它不必服从资本主义的活动方式就能够吸收其成果），而且还度过了没有被资本主义制度触动过的时期。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是不相容的。它的历史今后只能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已向一切人表明了它的暂时性。欧洲和美洲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民族，正力求打碎它的枷锁，以合作生产来代替资本主义生产，以古代类型的所有制的最高形式即共产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因此，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农村公社会再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显然是不可取的。

马克思认为，就俄国农村公社的内部环境而言，它是具有二重性的：(1)它是最早的没有血缘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2)在农业公社中，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归公社社员私有；(3)公共的土地不准转卖，定期在其成员中进行分配，各家庭独立地耕作分配来的份地；(4)产品私人占有；(5)动产私有权已出现，不动产的私有权正在萌芽。① 正是这种二重性，使它获得了巨大的生命力的源泉。一方面，它摆脱了牢固而狭窄的血亲关系的束缚，而以土地公有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为自己的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各个家庭单独占有房屋和园地，从事小块土地经营并占有其全部产品，这样就有利于促进个人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是在古老的公社机体内不曾有过的。但是，公社的这种二重性，由于私有制的发展，也可能转而发展成为公社解体的萌芽，那时公社就可能转而发展成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② 马克思指出：

---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9页。

② 同上，第450页。

"农业公社天生的二重性使得它只可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①

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只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进化（从原始公社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末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死亡。但是，今天的农村公社恰好是生存在现代历史环境中的，它处在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并且和资本主义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因此，俄国的农村公社只要吸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发展并改造它的古代形式，它就能够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开始获得新的生命，进入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一年以后，马克思在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就这个问题作了更加明确的表态："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②

当然，马克思的这一预言并未完全实现，后来俄国的历史发展依然经历了一段资本主义道路。但是，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的上述理论是不正确的。因为马克思认为这种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过渡到公有制的发展，是必须有足够的条件为前提的。这就是：它必须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但俄国后来的历史发展并不具备这一条件。对此马克思也是有所预见的。他指出：由于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国家使俄国公社处在不正常的经济条件之下。"③ 他认为，俄国那次农奴制改革是不适时的。他说："如果革命在适当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0—4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页。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1、439页。

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的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国家的优越因素。"① 马克思最后得出结论："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②

由上可见，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沿着一种活生生的、充满矛盾的道路前进的，它不能被塞进任何僵死的公式中去。如果人们只看到它的统一性，而看不到它的多样性，那就会陷入简单庸俗的形而上学观点。马克思针对有人企图把他关于历史发展道路的理论公式化，曾气愤地指出：如果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2. 研究原始社会历史的方法论问题

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表达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律，人们在研究人类历史的发展时，应该把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社会经济结构看作全部社会制度的基础，由此去说明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对于解释人类的全部"文明史"自然是非常正确的，但一旦把它应用到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中去，它的真理性的界限就暴露出来了。

1877年，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发表了他的划时代的著作《古代社会》。这部著作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它在主要特征上发现并恢复了人类成文历史的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希腊、罗马和一切文明民族的上古史上的一些极为重要而又一直未能解决的哑谜的钥匙。摩尔根依据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1页。
② 同上，第446页。

洲印第安人部落和夏威夷群岛上土著居民的家庭关系和亲属称谓制度之间的矛盾，从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亲属称谓制度中，推出了在原始社会史上相继出现的各种家庭形态，从而对原始家庭形态的发展作出了科学的说明。他还从原始家庭的发展线索中，揭示了氏族制度的起源和本质，明确地把氏族和部落区别开来，并证明母权制氏族是先于父权氏族的最初形式。更加可贵的是，在由史前史向文明史过渡的分期上，摩尔根看到了生产发展的决定作用，认为生活资料生产上的进步是人类从蒙昧时代向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过渡的动力，因而也是划分史前各文化阶段的标准。这就为马克思制定原始社会史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提供了新的事实根据。

马克思通过柯瓦列夫斯基获得这一著作后，立即以极其兴奋的心情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写下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谈到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本身的生产时认为：(1) 物质生活资料的扩充和人的繁殖以及家庭形式的变化是一致的，其中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基础；(2) 家庭是一个能动的因素，生命生产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推动力量；(3)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生命的生产决定着原始社会的组织状况。在此基础上，他揭示了氏族制度的起源和本质，证明了氏族社会是建立在血缘亲属关系之上的社会。然而在理论结构上摩尔根却把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关系即血缘亲属关系置于作为社会制度的氏族组织之上。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第一次提出了两种生产的理论。他说："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① 但是，马克思这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页。

还不能解决这两种生产的辩证关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他进一步谈到了原始社会末期，自然形成的血缘关系较之人们相互间的经济关系，是一种更为根本和牢固得多的关系。而在研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时，马克思一方面把摩尔根原书的结构——从生产技术的发展到政治观念的发展再到家庭形式的变化和私有制的产生，改变成为从生产技术的发展到家庭形式的变化再到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同时他着重指出：在原始社会中，由历史上依次演变的家庭和婚姻形式所产生的血缘亲属关系和由土地公有制所体现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是两种极其重要的关系。而在这中间，从人类本身的生产中自然形成起来的血缘亲属关系就构成了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关系开始只是居于从属地位，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私有财产和交换，经济因素的作用才逐渐上升为社会中的决定力量。他把人类原始时代的亲属（称谓）制度比作社会的上层建筑，并指出："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以至一般哲学的体系，都是如此。"① 这就深刻地揭示了血缘亲属关系在原始社会中作为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他特别指出，血缘亲属关系的性质"不是观念的、物质的，用德语说是肉欲的！"这样，马克思就把人本身的生产（生育）关系也区分为物质的关系（血缘亲属关系）和思想的关系(亲属制度)，从而确认了血缘亲属关系在原始社会史上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史上的两种关系即血缘亲属关系和经济关系的理论，为进一步阐明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原则。在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他已对此作了初步的探讨。

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想通过希腊、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354页。

罗马氏族制度的瓦解，说明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形成。例如，他在研究奴隶制取代原始公有制时，指出："不管地域如何，同一氏族中的财产差别使氏族成员的利益的共同性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对抗性；此外，与土地和牲畜一起，货币资本也随着奴隶制的发展而具有了决定意义。"①在《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中，马克思针对梅恩把国家的产生看作道德影响的结果这种抽象唯心主义的观点，指明了道德和国家一样都是第二性的，它不能成为国家产生的原因。他说："在存在国家（在原始公社等之后）——即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的地方，国家决不是第一性的，它不过看来如此"。② 而道德也"始终是派生的，第二性的，决不是第一性的。"③接着，马克思又阐述了国家的起源、它的阶级性质及其必然消亡等问题。他深刻指出："梅恩忽略了深刻得多的东西：国家的看来是至高无上的独立的存在本身，不过是表面的，所有各种形式的国家都是社会身上的赘瘤；正如它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出现一样，一当社会达到迄今尚未达到的阶段，它也会消失。先是个性摆脱最初并不是专制的桎梏（如傻瓜梅恩所理解的），而是群体即原始共同体的给人带来满足和乐趣的纽带——从而是个性的片面发展。但是只要我们分析这种个性的内容即它的利益，它的真正性就会显露出来。那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利益又是一定社会集团的共同特有的利益，即阶级利益等等，所以这种个性本身就是阶级的个性等等，而它们最终全部以经济条件为基础。这种条件是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它的前提。"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22页。

② 同上，第645页。

③ 同上，第646页。

④ 同上，第646、647页。

第二节 恩格斯对原始公社史的进一步研究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从马克思晚年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人类学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正在计划写一部历史哲学理论的巨著，可惜由于健康原因，马克思未能实现这一计划。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遗稿时，发现了马克思在1880年到1881年间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详细摘要。在他研究了这个摘要之后，认为有必要广泛运用马克思的批语以及摩尔根这本书中的某些结论和材料，来写一部专门著作，以便“稍稍补偿”马克思的未竟之志。①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恩格斯还先后阅读了爱·伯·泰罗的《人类原始历史和文明的产生研究》、约·雅·巴霍芬的《母权论、根据古代世界的宗教和法权本质对古代世界的妇女统治的研究》等几十部著作，从中吸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加上恩格斯在此以前的研究成果（《古代的爱尔兰》、《论日尔曼人古代历史》、《法兰克时代》和《马尔克》等等），他在 1884 年 3 — 5 月终于写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该书在1891年再版时又作了较大的增补和修订。在这以前很久，他已完成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这两者都是恩格斯研究人类社会的史前历史的不朽著作。

一 关于人类起源和原始社会史分期的方法论原则

要进行原始社会史分期问题的研究，必须首先搞清楚人类社会的起源，而要搞清楚人类社会的起源，又必须搞清楚猿是如何转变成人的。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科学地解决了自然界向人类社会过渡的问题，得出了劳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页。

创造了人本身的科学结论。

1.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

人类起源的问题，是一个哲学史上长期困惑不解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最先天才地提出了人类通过劳动而自我创造和自我生成的思想。马克思对此作过高度评价，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现实的人理解为自己劳动的结果。但是，黑格尔所说的劳动只是抽象的精神活动。马克思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改造了黑格尔的这一思想。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肯定了劳动是人的本质，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逐步形成了劳动——实践的历史哲学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他们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①但是由于当时自然科学材料的缺乏，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可能最终解决人类的起源问题。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一切植物和动物的种类都是由进化而来的，人类当然也不例外。1863年，英国科学家赫胥黎发表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一书，明确提出了人的祖先是猿。但是，关于猿怎样终于变成了人，他却未能作出进一步的证明。恩格斯在自然科学特别是进化论所提供的大量新材料的基础上，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继续发展了他和马克思早期提出过的关于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的思想，科学地解决了人类起源这个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

恩格斯根据唯物主义和进化论的观点，首先肯定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他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指出："人也是由分化产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页。

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经过多少万年之久的努力，手和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确定下来了，于是人就和猿区别开来，于是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发展和头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就奠定了，这就使得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成为不可逾越的了。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①

然而，人类的产生最初完全是按自然规律进行的缓慢的量变，当这种量变进行到一定点的时候才爆发出了质变，于是在人的动物祖先中出现了某种具有决定意义的新因素，它使人开始突然地从动物界分离出来。这个新因素就是劳动。恩格斯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② 以劳动为基点，就能获得人类历史的起点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找到理解人的本质及其历史发展的钥匙。

在劳动中并随着劳动的发展，人的语言也开始产生并日益发达起来。因为，劳动一开始就具有社会性，因而使语言的产生成为直接的需要。在劳动和语言共同作用下，人的思维的器官——头脑也跟着发展起来了。恩格斯说："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了人的脑髓……在脑髓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它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展起来了。正如语言的逐渐发展必然是和听觉器官的相应完善化同时进行的一样，脑髓的发展也完全是和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化同时进行的。"③ 例如，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3页。

② 同上，第509页。

③ 同上，第513页。

比人看得远得多，但是人的眼睛识别的东西却远胜于鹰；狗比人具有锐敏得多的嗅觉，但是它不能辨别在人看来是各种东西的特定标志的气味的百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肯定劳动和语言共同促进了人的思维产生和发展的同时，又肯定了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他说：脑髓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

就这样，恩格斯一步一步地剖析了劳动在人类起源过程中的作用，既从哲学的高度又以严格科学的方法，解决了黑格尔试图解决但却未能解决的问题，证明了人以及他的主要特征——手、发音器官和脑髓都是劳动的产物。随着完全形成了的人的出现，在茫茫自然界中就产生了全新的因素——社会，于是就有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因此，根据恩格斯的观点，不仅可以得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结论，也可以得出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的结论。正因为如此，他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阐述人类的起源时，提出了“两个提升”的著名结论。他说：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

2.关于原始社会史分期的方法论原则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自发地看到了生活资料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历史进步的指示器。他说：“在人类进步的道路上，发明和发现层出不穷，成为顺序相承的各个进步阶段的标志。”① 他认为生产的技能，对于人类的优势程度和支配自然的程度具有决定的意义，在一切生物之中，只有人类才达到几乎能绝对控制食物生产的地步。人类进步的一切伟大时代，都是跟生存

① 参看摩尔根《古代社会》第2卷，第16页。

资源扩充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据此，摩尔根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为三大阶段：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其中，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又各自经历了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发展阶段。

摩尔根作为第一个给人类史前历史建立确定系统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原则，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是，摩尔根并没有从物质资料生产的物质技术出发，进一步形成生产结构和经济结构这样的物质生产关系概念。他认为，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生活资料生产的物质技术是第一类“事实”，此外还有三类“事实”：(1)“政治制度”，包括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社会”和以地域、财产为基础的政治社会；(2)“家族制度”；(3)“财产制度”。在摩尔根看来：“上述四类事实沿着人类从蒙昧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进步途径平行前进。”① “各种社会制度，因与人类的永恒需要密切相关，都是从少数原始思想的幼苗发展出来的，它们也同样成为进步的标志。”② 由于摩尔根把后三类“事实”看作是和物质生产的技术基础无关，而仅仅是从“思想的幼苗发展出来的”，所以他在研究原始社会历史的方法论问题上，就不能把唯物主义的原则坚持到底，而是将观念的东西与物质的东西同样都作为他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他的《古代社会》一书第一、二、三、四编的大标题——“各种发明和发现所体现的智力发展”、“政治观念的发展”、“家族观念的发展”、“财产观念的发展”——就是依据这个原则拟定的。但是，对于这种不彻底的方法，他本身也是心存疑虑的。他在决定历史时期的划分时，就不无踌躇地写了这样一段话：“顺序相承的各种生存技术每隔一段长时间就出现一次革新，它们对人类的生活状况必然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以这些生存技术作为上述分期的基础也许最能使我们满意。”③

①② 参看摩尔根《古代社会》第2卷，第2、3页。

③ 同上，第8页。

可见，对原始社会史进行分期的方法论原则，必须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谈到划分历史时期的原则时，曾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①

摩尔根关于原始社会理论的不彻底性，决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必须作辩证的扬弃。恩格斯说："如果只是客观地叙述摩尔根的著作，对它不作批判的探讨，不利用新得出的成果，不同我们的观点和已经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阐述，那就没有意义了，这对我们的工人不会有什么帮助。"②

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摘录了关于原始社会的历史分期的具体论述。但是，他改变了原书的结构和顺序，使它从生产技术的发展和家庭形式的变化到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这样就纠正了摩尔根原来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彻底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第一章中，批判地继承了摩尔根关于第一类"事实"的合理思想，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原始社会的分期原则。他说："我们可以把摩尔根的分期法概括如下：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类的制造品主要是用作这种采集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③恩格斯在引用摩尔根关于原始社会中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的"三阶段"的结构时，深化了它的唯物主义内容。他在具体论述蒙昧时代的"三阶段"结构时，牢牢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4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8页。

把握住分节语的形成、火的使用和弓箭的制造，把它们看作生产力在这一时代的各个阶段中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而在论述野蛮时代的“三阶段”结构时，他则牢牢地把握住了制陶术、驯养家畜和种植食用植物以及铁矿的冶炼，作为野蛮时代不同阶段上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这样他就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针，科学地确立了原始社会史的分期原则。

二 原始社会的发展及其向文明社会过渡的机制。“两种生产”的理论

恩格斯在科学地解决了从自然界向人类社会过渡以及关于原始社会史的分期原则之后，他所面临的另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解决原始社会是如何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这就须要科学地阐明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和本质。对此，他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

1.“两种生产”在原始社会史上的关系

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提出，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基础。这个原理如何运用于原始社会史的研究，这是他们后来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难题。因为当人类刚刚从动物界脱离出来的时候，无论就人对自然的关系来说，还是就人们相互间的关系来说，占支配地位的东西，都还不是人们在自己的劳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而是自然形成的。虽然一般说来，只要有生产，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就带有生产关系的性质。但是，只有当人们赖以生活的物质资料主要地不是依赖于自然界的“恩赐”，而是完全由人们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来并加以控制的时候，那种完全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系（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才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居于决定性的地位。因此，说生产（物质资料生产）关系的总和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这是就“文明社会”而言的；对于

人类的幼年时代，至少对于蒙昧时代的人类来说，生产关系不可能是决定和支配一切的关系。不仅如此，处在人类这一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取得独立的形态，它还被紧紧地裹在自然形成的血族关系的胞胎之中。因此，要理解原始社会的结构和组织，揭示人类史前史的发展规律，并说明阶级社会的最初发生，就不能只从物质资料的生产出发，而且要从人类幼年时代自然形成的关系出发，亦即从人类本身的生产出发。这就是说，必须研究两种生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生前就十分注意探讨这个问题，尤其在他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对此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根据马克思提出的思想线索，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作出了明确的系统表述。他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到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① 这就是说，虽然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但人类史前史的内容和成文史的内容却有显著的差别。在迄今为止的全部成文历史中，物质资料的生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关系始终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而在史前社会中，情况却不是这样。在人类历史的最初阶段，人本身的生产曾直接起过决定性的作用。那时血缘亲属关系曾是全部社会组织的基础。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力日益发展起来了，与此同时，私有制、交换、财产差别、使用和占有他人劳动的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30页。

能性也出现了，所有这些新的社会因素日盛一日地得到发展，不断迫使旧的社会组织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场彻底的变革为止。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组织，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而组成国家的基层单位已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正是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天为止的全部文明历史的内容。

在恩格斯看来，两种生产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它们互相制约、互相联结、互为条件，共同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但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二者所起的作用是按照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自身在生产中的作用越大，社会的组织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愈受人类自身生产的制约。但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和阶级出现了，人的生产就越来越服从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否则，就不能解释氏族制度的产生和瓦解。由摩尔根所发现的夏威夷岛上的土著居民和美洲印第安人的家庭和姻亲关系的材料证明：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① 人们决不能用一句空话来抹煞这一如此广泛流行的制度的意义，而应该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这一点。如果人们硬是把物质资料生产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应用于原始社会，把血缘亲属关系和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全部社会制度归结为经济关系，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般原理来理解蒙昧时代的社会制度，除了牵强附会，是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的。如果一定要寻找这种制度的经济原因，那末它们的经济基础也只能是否定性的。这就是说，正因为劳动生产力的极端低下和财产关系的不发达，所以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经济因素才不起决定作用，社会制度的性质才为血族关系的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页。

质所决定。

恩格斯曾说过："摩尔根使我们能够树立崭新的观点，因为他通过史前史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事实根据。"① 这个崭新的观点就是两种生产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但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普遍规律，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它发生作用的方式和范围是有差别的。从人类刚刚由动物界脱离出来开始，到形成由人们自身所创造的社会为止，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的开始阶段，支配人类肉体生产的自然规律必然起着决定的作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人类社会的组织和结构也就在多大程度上打上自然的烙印。这一点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的：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人们相互之间的狭隘关系。所谓经济关系以及以这种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人类在自己的劳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人们在通过劳动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同时，也生产着自己的生产关系。因此，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为我们认识人类史前时代的漫长历史提供了思想武器，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发展。

2.原始婚姻家庭和社会经济关系的辩证法

在恩格斯看来，由于原始时代的生产力极端低下，物质资料极端匮乏，这就使任何真正的财产所有制都不可能产生出来，所谓原始共产主义的财产公有制也只是到了史前历史的后期阶段才出现的。所有制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仅仅是和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在严格意义的财产制度尚未出现或仅仅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自然谈不上经济关系对社会制度的决定作用。反之，由于这时人类刚刚学会制造和使用极简单的生产工具，因而在形成生产力的诸因素中，人本身便是决定的因素，改善人类自身的状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44页。

对于生产力的进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类要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得到生存和发展，它所能利用的手段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是群体的力量，第二是通过自然选择的道路来增强种的进化。而这第二点，又是由原始婚姻关系所决定的。所以，在从血缘家庭到对偶家庭的漫长发展过程中，支配人类历史的不是经济规律，而是自然规律，是自然选择的原则。恩格斯指出："被共同的婚姻纽带所连结的范围，起初是很广泛的，后来越来越少，直到最后只留下现在占主要地位的成对配偶为止。"① 事实表明，在血缘家庭的发展过程中，凡血亲婚配进一步受到限制的地方，人类的发展就比那些依然把兄弟姊妹之间的婚姻当作惯例和义务来遵守的地方更加迅速，更加完全。恩格斯说："这一进步的影响是多么强大，可以用氏族的建立来证明，氏族就是由这一进步直接引起的，而且远远超出了最初的目的，它构成地球上即使不是所有的也是多数的野蛮民族社会制度的基础。"②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氏族制度的瓦解和个体家庭的出现，尤其是在成对配偶制中，群已经缩小到它的最后单位，成为仅由两个原子组成的分子，即一男一女。自然选择已经通过日益缩小的婚姻关系的范围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这一方面，它再也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因此，如果没有新的社会的动力发生作用，那末，从成对配偶制中就没有任何根据产生新的家庭形式了。③ 但是，这种新的动力已经产生并开始发生作用了。这就是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社会财富的逐渐积累，人类个体独立生活能力的不断增强和群体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的减弱，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私有财产制度。只是从这时起，社会经济关系才取代原始的婚姻家庭关系，而对整个社会制度的变化和发展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由上可见，恩格斯运用两种生产理论，把原始婚姻关系和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2页。

②③ 同上，第49、65页。

会经济关系统一起来作综合的、总体的考察，从而揭示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力地说明了原始共产主义经济制度即使它早已产生并确实存在过，但对原始社会制度的发展也未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过是人类的自然状态的延续，是传统的消极产物，而不是由人类自身创造（通过劳动）的积极因素，因而就其与原始婚姻家庭的关系而言，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只是伴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而产生了一夫一妻的家庭以后，这种共产主义的家庭经济才最后崩溃，才能谈到经济关系对整个社会制度的决定作用。

三　家庭、个人和阶级在历史发展中的关系

从两种生产的基本原理出发，恩格斯通过对原始社会的具体剖析，还进一步阐明了家庭、个人和阶级在历史发展中的关系。

恩格斯指出：家庭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在历史上产生和发展着的；文明时代的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揭示了家庭在历史发展中的演变形式。

当人类还处于最初的原始状态时，曾经盛行着一种毫无限制的性交关系，即同一个群体内部的每一个男子属于每一个女子，而每一个女子也属于每一个男子，没有父母、夫妻、子女的区别。所以，在这个杂乱性交的社会阶段，根本不存在社会以外的家庭和家庭以外的社会。这种家庭形式在人类最初产生时所以必然会出现，是因为若不依靠群体的联合力量，人类就无法生存下来。恩格斯说："人类最初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①

从杂乱性交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人类的第一种家庭形式是血缘家庭。在这种家庭形式中，婚姻是按辈数来划分的，即同一家庭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5页。

的每一代人，既是兄弟姊妹，也互为夫妇。但是，不同辈分的人是禁止通婚的。血缘家庭属于群婚的第一种形式，也是人类在保持群居生活的前提下所实现的第一个进步。

第二种形式是普那路亚家庭，这是群婚的最高家庭形式。这一形式排除了兄弟姐妹之间的通婚(由近亲旁及远亲)，因而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造成这一进步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人类终于发现了自然选择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原始共产制家庭经济规模的限制，使原始家庭的分裂成为必要。在婚姻关系所取得的这一进步的影响下，导致了氏族制度的建立。因为在普那路亚家庭形式下，实现族外婚姻，因而必然形成两个集团：一列或数列姊妹组成为一个家庭的核心，而她们的同胞兄弟则成为另一个家庭的成员。每一个家庭都在一个共同的女祖先率领下劳动和生活。这种以母系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原始共产制的家庭公社，就是最初的氏族。

第三种形式是对偶家庭。由于氏族制度在禁止血缘亲属结婚方面所起的有力推动作用，终于在一切亲属之间都普遍禁止结婚。这样，对偶婚(即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共同生活)就逐渐排挤和取代了群婚。但由于原始社会公有制的氏族经济仍然存在，配偶双方没有独立的经济，因而这种婚姻关系是很容易由任何一方撕破的，而女子则像以前一样，仍属于母亲所在的氏族。

从血缘家庭到对偶家庭的发展，是在自然选择原则的作用下通过不断缩小婚姻范围来实现的。但是，从对偶家庭进一步向前发展，已不能通过缩小婚姻范围来进行了，因为它已缩小到最后单位。在这种情况下，自然选择的历史使命完成了，必须要有新的动力才能促使新的家庭形式产生。这种新的动力就是财产关系。

如前所述，到对偶家庭为止，自然形成的关系一直在原始人类的生活中起着决定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缓慢而持续的发展，人们所创造的仅仅归氏族所有的财富越来越多，而作为财富创造者的成年男子及其子女，虽然同属于一个家庭却不同属于一个氏族，

因而不能享有父亲氏族的财产。这一矛盾，决定了财产必然逐渐由氏族所有转归各个家庭所有。恩格斯说："这些财富，一旦转归各个家庭私有并且迅速增加起来，就给了以对偶婚和母权制氏族为基础的社会一个有力打击。"① 再从另一方面看，自从对偶家庭产生以后，家庭出现了新的因素，即除了生母以外，也有了确实的生父。然而根据母权制，男性死者的子女属于他们母亲的氏族，因而不能继承父亲的财产。父亲的财产却必须转归其兄弟姊妹和姊妹的子女所有。这种由传统保留下来的继承制度和正在发育着的私有财产之间的矛盾，使母系氏族制度的解体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同时，由于在两性之间早已存在的分工，也使男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以上几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就使母权制的废除和父权制的确立成为人类所经历的最自然也是最激进的革命。因为这并不侵害任何一个氏族成员的利益，而只须规定氏族男性成员的子女今后留在本氏族之内，而女性成员的子女则转到他们父亲的氏族中去。

母权制的被推翻，就产生了家长制家庭这个向一夫一妻制家庭过渡的中间形式。在这种形式的家庭中，丈夫掌握了权柄，妻子则被贬低和奴役，变成了生育子女的简单工具。而它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把非自由人（奴隶）包括在家庭之中。对于这一点，马克思说："现代家庭（家长制家庭——引者注）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②

从这时起，血缘家庭关系就最后失去了支配作用，而财产关系则取得了决定一切的地位。自然形成的关系让位于人们自身所创造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人们在生产自己的财富时一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66页。

生产出来的。人类正是带着这种由自身所创造的关系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

第四种形式是一夫一妻制家庭。这种家庭与对偶制家庭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以自然纽带为基础，而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它是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作为建立在丈夫统治之下的家庭形式，它的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而这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将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财产。在恩格斯看来，这种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是与人类文明时代，即进入成文历史时期的阶级社会（奴隶社会）相适应的。

总的说来，在原始社会史的发展进程中，以家庭形式的变化为线索，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与其说是生活在家庭中，不如说是生活在社会中；因为那时存在的所谓家庭，不过是就传统和习惯所允许的男女婚配的一定范围而言的，夫妻双方并不生活在同一个集团中。恩格斯说："在氏族制度之下，家庭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组织单位，因为夫与妻必然属于两个不同的氏族。氏族整个包括在胞族内，胞族整个包括在部落内；而家庭却是一半包括在丈夫的氏族内，一半包括在妻子的氏族内。"[①]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谈不上个性的充分发展。但是，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随着生产力的缓慢而持续的增长，私有财产的出现，自然选择原则经由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同时经济关系也逐渐取得了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这就必然导致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出现，以及阶级的产生和个人的发展。恩格斯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财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16页。

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个体婚制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根据这种形态，我们可以研究内部充分发展着的文明社会的对立和矛盾的本来性质。”①

四 国家的起源、本质和消亡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探讨国家问题时，把注意力集中在氏族制度和形成中的国家的联系上，并且把氏族制度理想化了。恩格斯发挥了马克思晚年对这一问题的原则性见解，对摩尔根的上述发现作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说明。

首先，恩格斯指出，国家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社会组织，最初产生于普那路亚家庭，先后经历了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基本特征如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在原始公有制的基础上，没有私有制和阶级压迫，也没有国家和法。在氏族制度下，每一个氏族都有一个民主选举并可任意撤换的首长和军事首领。氏族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氏族全体男女成员都享有平等表决权的氏族议事会。可见，在氏族制度下，人们不知道国家为何物，首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纯道德性的，他没有任何强制的手段，也没有产生世袭权力的可能性。因为全盛时期 氏族制度，是以生产力的极端低下、人口稀少、地区广大为前提的。这时的人类还没有脱离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几乎完全要受外部大自然的支配，因而他们的眼界不能超出部落的范围。在他们看来，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

但是，由于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和私有财产的出现，尤其是到了野蛮时期的高级阶段，当确立了财产由子女继承的父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78页。

制家庭取代了对偶制家庭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决定了氏族制度一定要被炸毁。这是因为：(1)各家庭的财产差别越来越大；(2)在古代自然长成的民主制内部产生的贵族分子(氏族显贵)，由于父权制的作用，其职位也渐渐可以由儿子来继承；(3)各部落和氏族由于人口增多而为争夺最好土地和其他战利品而进行的战争不断增多，以至把战俘充作奴隶也渐渐成为公认的制度。所有这一切，都使私有财产的规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奴隶制日趋盛行并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对财富的追求已成为普遍目的，最初部落对部落的战争，也蜕变为专门以掠夺家畜、奴隶和财宝为目的的战争，抢劫变成了正常的营生。这时唯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种机关，这种机关必须获得不同于旧的氏族机关的权力，即它不再是成年氏族成员的共同意志的表现，而只是私有财产的力量的集中化，是以整个社会的名义对私有财产制度的确认，并使正在开始的社会被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这个应运而生的机关就是国家。

恩格斯认为，国家权力的最初产生，一方面是靠改造旧氏族的机关，另一方面是用设置新机关来进行的。起初，氏族、胞族和部落中为保卫自己而组织起来的武装人民，渐渐地变成了可以被用来反对人民自己的武装的"公共权力"。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人民已不再按氏族来划分，而是视其财产的多少按阶级来划分了。贵族被赋予了担任公职的独占权，农民和手工业者则被排除了担任任何公职的可能性。并且，既然财产关系已成为人们之间唯一起支配作用的关系，因而按氏族聚居也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人民开始按地区组织起来。部落虽然仍被视为一种社会单位，但它也早已失去其原有的内容和意义。议事会的成员不再是由氏族选出来的首长担任，而是由各阶级的代表充当，并且规定只有最高阶级才能担任最高官职，贫民只享有发言和投票的权利。既然有产者攫取了全部官职，他们也就使公共权力和人民相脱离并完全变成了自己的私有物。不仅如此，阶级的划分也成为新的军队

的组织基础，最富有的阶级构成了在军队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氏族制度已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其结果就是和人民大众相脱离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国家的产生。

由于生产、分工和交换的发展，手握大量金属货币的新的财富贵族迅速上升到社会权力的顶峰，并把旧的部落贵族排挤到后面去了。而随着部落贵族的衰落，原来早已徒具形式的氏族制度的最后痕迹也彻底扫除了。历史现在进入了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由于全部经济生活的发展而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社会本身不仅不能调和这种对立，而且使之日趋尖锐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它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互相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互相斗争的各个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冲突，顶多容许它们的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以所谓合法形式进行。这个第三种力量就是建立在氏族制度废墟上的国家。恩格斯具体研究了从氏族制度废墟上兴起的国家的三种形式。他指出，雅典是最典型的、最纯粹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在罗马，由于人数众多的平民战胜了贵族，炸毁了氏族制度，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国家。德意志国家则是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因为氏族不能提供任何手段来统治如此广阔的领土。

接着，恩格斯揭示了国家的本质。他说："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道德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

力量，就是国家。"①根据恩格斯的观点，国家尽管从表面上看来维护着社会的公共利益，把对立着的各阶级的冲突限制在现有"秩序"的范围以内，因而俨然是一个凌驾于各阶级之上的独立机关，但这恰恰表现了它的阶级本质；因为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建立在一定的阶级结构上的。

恩格斯通过把国家与氏族制度进行比较，概括了国家不同于于氏族制度的三个基本特征：

(1)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而不是按血缘关系划分和组织居民。这样，它便打破了氏族的限制，使公民在他们的居住地行使公共的权利和义务。"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②

(2)脱离居民组织的特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是由组织起来的武装的人民来体现了，它代之以某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系统，以及它的物质附属物，如监狱、法庭等等各种强制性的机关。所有这些都作为脱离社会的权力而驾于社会之上，并随着内部和外部斗争的不断加剧而达到吞食整个社会的地步。

(3)从居民中收取捐税以维持这种公共权力。这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完全没有的。

但是，在历史上也曾有过这样的国家，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例如，17世纪和18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然而，即使这样，也是以另一种方式使国家的阶级性得到了证明。

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证明了它本身也是一定要消亡的。

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国民的权利是按照其财产的状况而加以严格限制的。这种限制直接地宣布了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4页。

② 同上，第194页。

防范贫民和穷人的工具。在按财产状况划分阶级的雅典和罗马，就已经是这样。在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也是这样。在这里，政治权力地位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这一点也表现在现代代议制国家的选举资格上。但是，对财产差别的这种政治上的承认，决不是本质的东西。相反地，它标志着国家发展的低级阶段。在国家发展的最高阶段，在民主共和国中，公民权利的财产限制已经不再存在了。在这里，财富是间接地但却是更加可靠地运用着自己的权力。并且，正是在这样的国家中，阶级斗争才以最公开和最彻底的形式进行着。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的决定性斗争能够在其中进行的最好形式。这一斗争的最后结果将是国家权力的消灭。恩格斯说："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灭，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灭。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① 这就是说，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它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随着生产发展到更高阶段，它的消灭也是历史的必然。

恩格斯还以简洁的语言，从历史的宏观角度，说明了国家在历史上的暂时性。他指出：在文明时代存在着三种相互依次更替的压迫、奴役和剥削形式。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个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但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文明时代，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必将为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正像从无阶级社会到有阶级社会、从无国家到有国家的历史规律是不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7—198页。

抗拒的一样，从有阶级和有国家的社会发展到未来无阶级和无国家的共产主义，也同样是历史的必然。

思考和讨论

1. 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原因。
2. 马克思晚年是怎样论述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的？
3. 恩格斯是如何阐明原始社会史的分期原则的？
4. 马克思、恩格斯在原始社会史研究中是如何运用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
5.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阐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
6. “两种生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意义。

第十一章　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钓捍卫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世纪下半叶曾经风靡一时的全盘否定黑格尔哲学的思潮，到了19世纪下半叶便销声匿迹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把德国古典哲学庸俗化的腐败风气。无论是在德国，或是在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都出现了一种要复活德国古典哲学的样子。但这种复活是在所谓新形式下进行的，康德哲学变成了"新康德主义"，黑格尔哲学变成了"新黑格尔主义"。其结果，无论康德哲学还是黑格尔哲学，都被弄成了低劣庸俗的唯心主义和折衷主义。出现于6—70年代的德国新康德主义者，如柯亨、那托尔卜、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人，抛弃了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竭力鼓吹它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号召要"回到康德去"。而最早出现于瑞典、挪威等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如博斯特隆和拉蒙德，则完全抛弃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宣称自己的体系是"理性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泛神论"。所有这些派别都攻击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社会革命论。

在19世纪最后的20年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歪曲和攻击的，不仅有党外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而且还有一批新近入党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却一点也不熟悉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实际条件，往往以傲慢的态

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庸俗化和简单化的解释，并且时常偷运唯心主义的观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把它变成似乎可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的现成公式。而在这样做显得毫无用处之后，便又转而偷运唯心主义，侈谈“人的本质”。“如青年派”的领袖保·恩斯特就说：“如果我们要想成为正确的，我们就不应当仅限于客观的生产过程，我们还要研究人的本质。”这样，他们就最后跌进了新康德主义的泥坑。

鉴于上述情况，恩格斯从1886年到1895年先后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① 以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通信，深入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内容和重大的基本论题，以及它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

第一节 恩格斯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

一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历史功绩和局限性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着重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联系和区别，说明了马克思和他怎样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出发，然后又很快越过了他们，沿着一条崭新的思想路线而达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没有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作为理论先驱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并不是对黑格尔和费尔巴

① 1885年，丹麦哲学家、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卡·施达克发表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188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新时代》杂志编辑部建议恩格斯对该书进行评论。恩格斯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系统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它的先驱者——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借此回击德国古典哲学的不肖子孙对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和攻击。施达克虽然站在维护费尔巴哈的立场上，但由于他不懂得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正确标准，所以仍然把费尔巴哈说成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对此，恩格斯在书中作了批評。

哈哲学的直接继承和简单综合，作为它的最重要的思想源泉的东西，不是任何哲学，而是现实历史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不断总结和深化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新知识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这个总结和深化的过程中，无论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还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都不能在其现成的形态上加以运用，必须经过深入的分析、批判和改造才能成为有效的思想武器。这一点，正是那些资产阶级的庸俗学者所不能理解的。他们或者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黑格尔哲学，或者把它等同于费尔巴哈哲学。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哲学的本质区别，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对它们作出全面的评价，在肯定其历史功绩的同时指出它们的重大局限性。

黑格尔的巨大功绩是他建立了自觉的辩证法，但是他的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却又被他的保守的体系所窒息。如果不打破并抛弃他的绝对唯心主义的体系，拯救和改造他的辩证方法，整个黑格尔哲学几乎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恩格斯通过分析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一命题，即"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来说这个问题。恩格斯认为，这个命题在黑格尔那里，既具有批判的革命的性质，也具有辩护的保守的性质。说它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是因为它是一个辩证命题。说它具有辩护性和保守性，是因为它同时又表达了体系的要求。黑格尔本人则动摇于这两种倾向之间。一方面，黑格尔认为现存的东西并不都是现实的，"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① 有些东西尽管存在着，但只是偶然的、可能的存在，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另一些东西虽然在一定时期有必然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逐渐丧失必然性，因而也不再是现实的。他说："任何不合理的事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1页。

御因其不合理，便不得认作现实。"[①] 这就明白地表示了，一切丧失了必然性、合理性的东西都不得认作是现实的，因为它们注定地要灭亡。因此，根据合理的推论，黑格尔的上述命题应当表述为："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而这就是一个纯粹革命的结论了。然而黑格尔却不能直截了当地得出这个结论，原因是他的哲学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这就是他企图建立起一个绝对唯心主义的体系。并且在黑格尔那里，方法是为体系服务的，囿于体系的性质，他不得不使他的方法成为不彻底的、半途而废的。

恩格斯认为，体系哲学是以往一切旧哲学的共同特征。而任何哲学体系都产生于人类精神的这样一种需要，它不满足于一切有限的知识，而要以认识绝对的、无限的知识为自己的目的。按照这种要求，哲学体系都要以某种绝对真理的知识来作为自己的终结。这就是说，它必须是封闭的、完成了的知识体系。作为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的黑格尔哲学，是以一切以往的哲学成就为出发点的，他不能承认过去的任何哲学体系具有绝对的、最终的性质。在他看来，所有这些体系都只是标志着绝对真理发展过程中的相对的、有限的阶段，因而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来分析和确定它们的地位与价值。这就使他的方法具有了辩证的性质。然而黑格尔并未因此就放弃建立任何绝对真理体系的企图，他和以往哲学家一样陷入了幻想，认为自己能最终地排除认识过程中的一切矛盾并结束这一过程，从而建立起绝对真理的体系。这样，由他输入到认识领域和实践活动领域中去的辩证发展观，就又被他本人所废弃。因为无论是认识还是历史的发展，都必须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宣告结束。也正因为这样，那些和黑格尔同时代的东西，无论是基督教也好，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制度也好，就统统被当作绝对真理的体现者。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它深刻地反映了黑格尔哲学的二重性格。无怪乎他的哲学引起了"近似的政府的感激

① 黑格尔《小逻辑》第296页。

和同样近似的自由派的愤怒”。①

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矛盾的分析，恩格斯揭露了一切体系哲学的局限性。他指出，在一切哲学家那里，“体系”总是暂时性的东西，因为它源出于一种精神的虚幻要求，以为人们能最终地消除一切矛盾。但是，如果一切矛盾都被永远地消除了，那末任何进一步的发展就都是不可能的，认识和历史就都将达到自己的尽头。然而这两者都是不可设想的。恩格斯的这一分析有着重大的认识论意义。实际上他是在更一般、更普遍的形式上得出了和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律② 相同的结论。

不过，正因黑格尔哲学中包含了上述不可克服的矛盾，因而它本身也就指出了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到达真正科学地认识世界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把人们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完全达到的“绝对真理”抛在一旁，以便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对一切实证科学的成果进行总结和概括，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分析、批判和改造，抛弃了它的唯心主义外壳，吸取了它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使它建立在唯物主义和实证科学知识的坚实基础之上，从而宣告了一切体系哲学的终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除了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以外，不包括任何幻想的成分和教条的内容。它不是黑格尔所宣称的绝对知识体系，而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克服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是得到过费尔巴哈的帮助的。因为还当黑格尔哲学在德国处于统治地位的时候，费尔巴哈就率先起来批判他的唯心主义，返回到唯物主义立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1页。

② 1931年，奥地利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库尔特·哥德尔证明了任何公理化形式体系或者是不相容的（矛盾的），或者是不完备的。推而言之，任何科学知识的完全形式化是不可能的，

场。费尔巴哈作为激进的民主派的代表，在黑格尔思辨哲学的长期统治下，勇敢地起来批判唯心主义和宗教，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了宝座。他断然否定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先于自然界而存在的思想，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则，从而恢复了被黑格尔颠倒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捍卫了存在是“主词”、思维是“宾词”的唯物主义思想。恩格斯在概括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历史功绩时写道：“他不可遏止地意识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先于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是对超世界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① 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这个评价，可以说是对他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的精辟阐述。费尔巴哈提出的唯物主义的新观点，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热烈欢迎，对他们的科学世界观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

虽然费尔巴哈哲学“在抽象而费解的黑格尔主义长期统治以后，使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但是它本身仍然没有摆脱旧的体系哲学的羁绊，哲学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仍然被当作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的“绝对真理”和“科学的科学”。他推倒了一个绝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又树起了另一个绝对（抽象的人的本质）。而且和黑格尔相比，费尔巴哈哲学在两个方面是大大地倒退了。第一，他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虽然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但他却赋予了它以生命和运动，在唯心主义的形式下黑格尔把认识史、自然史和社会史的全部丰富内容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3页。

囊括在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过程中。而在费尔巴哈那里，囊括宇宙的绝对精神变成了抽象贫乏的人的本质，他的体系的全部内容因此也变成了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简单循环。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巨大的历史感"不见了，精神的辩证运动的丰富内容也不见了。第二，他割断了思维和存在、哲学和现实世界的多种多样的联系。黑格尔哲学从总体性思想出发，把思维和存在、抽象的哲学精神和具体的现实世界看作是统一而不可分离的具体总体的不同表现形式，所以他能在一个无比广阔的领域中运用辩证法。现实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没有不是黑格尔哲学所考察的对象，并且统统都包括在他的体系之中。这就使它在极其抽象的形式下包含了无比丰富的现实内容。例如，黑格尔的伦理学就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他那里，伦理学又是法哲学，其中包括：(1)抽象的法；(2)道德；(3)伦理。伦理中又包括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这就是说，黑格尔不是纯粹抽象地讨论伦理问题，而是把它同经济、政治和法律一并加以研究。而费尔巴哈则不同，被他当作出发点的人的本质是孤立的人的本质，在他那里，既没有联系家庭来研究人，也没有联系市民社会和国家来研究人。他根本没有探讨过人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经济和政治对他来说始终是未知的领域。

由于上述缺点，费尔巴哈不能把他所发现的唯物主义贯彻到底。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而上半截则依旧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在社会历史观上甚至他拒绝唯物主义这个名称。他反对当时流行的庸俗唯物主义，强调理想、道德、精神在历史中的巨大作用，认为这是和唯物主义的观点不相容的。他错误地把唯物主义和它在某一特定时期的特殊表现形式混为一谈，而不能创造性地把它适用于新的研究领域，丰富它的内容并推动其向前发展。他反对机械论，但又不能把自已提高到辩证法的水平，到头来仍然是一个机械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

不过，由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所开辟的道路，终究是有人要走

完的。这个继承和发展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传统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位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当然继承者

恩格斯指出：“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产生真实结果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①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离开世界文明的大道凭空产生的，尽管它与旧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却是在直接地继承和改造旧哲学，特别是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继承与批判、改造与创新的过程，贯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大部分活动中。他们的工作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吸取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抛弃了他的形而上学方法和唯心史观，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一切领域中；其次，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清算了他的唯心主义体系，把辩证法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创立了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历史观和认识论；最后，把唯物辩证法广泛运用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使它成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认识工具和实践指南。

和费尔巴哈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最初“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产生的结果”。② 但是，和费尔巴哈不同的是，他们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它彻底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特别是用来科学地分析和说明贯穿在历史事件中的规律。然而在这个领域内情况恰恰是非常复杂的。要揭示历史运动中的规律性，唯物主义地解释历史的发展，较之发现自然界的规律远为困难得多。因为，“在自然界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8页。

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①因此，要证明历史过程同样地是受内在的物质规律的支配，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了揭示支配历史发展的规律，必须能够说明制约着人们的自觉动机和理想意图的内在动因是什么。在这一点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无疑是作出了贡献的。在黑格尔看来，无论是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在这些动机的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讨的别的动力。但是由于他是唯心主义者，他当然不能在人们的思想动因背后寻找物质的动力，而是企图在历史之外去寻找这种动力，最终把它归结为绝对精神。可见，在探索历史运动规律问题上，旧唯物主义者仍然抱住自觉动机和理想目的，因而不得不背叛自己的立场。黑格尔深刻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囿于他的唯心主义立场，因而注定了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唯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是坚决地沿着唯物主义道路前进的，他们运用改造了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为武器，终于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要把在黑格尔那里完全是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方法改造成为有科学根据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同样是困难的。这里首先需要由科学发展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因为只有这样，才不致像黑格尔及其以前的哲学家那样，仅仅"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自然科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② 同上，第242页。

学已经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成就是动植物细胞、能量转化定律和生物进化论的发现。由于这些以及自然科学中其他领域的许多重要发现，自然界中普遍地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辩证规律就能够被揭示出来。而在历史领域中，类似的事实也正在由一部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揭示出来。作为近代欧洲历史舞台上最令人触目的事实就是三大阶级之间为争夺统治权而进行的斗争，这表明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是近代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只要弄清这些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它们在历史上是怎样变化和发展的，人们就能科学地说明全部历史，而不需要像黑格尔那样，把历史想象为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和自我显现。正是沿着这条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使人类对社会历史的认识第一次变成科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给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哲学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都是为了适应一定阶级的政治需要和经济利益而产生的，都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适应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公开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哲学。恩格斯指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同情，这种同情，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是既寻找不到也期望不到的。"① 所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定信奉者，德国工人阶级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继承者。

第二节　恩格斯论哲学的基本问题

一　思维对存在的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在《费尔巴哈论》中，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

特别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恩格斯对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进行了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在哲学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规定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而指出了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条基本哲学路线的科学标准。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因为任何哲学家都必须对此作出这样那样的回答，它是各种哲学学派斗争的焦点。这个问题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很远的古代，“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① 在原始时代，由于受科学水平和思维能力的限制，人们对自己的身体构造一无所知，不能解释做梦一类的生理心理现象，于是产生这样一种观念，认为人体中有一个神秘的灵魂，人们的思想和感觉不是人的身体的机制，而是灵魂的活动，并且人死后灵魂还能继续存在着。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就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产生了思维对存在关系问题的原始形式。

处于原始时代的人们，对雷鸣、闪电、狂风、暴雨等自然现象也不能加以解释，征服自然的能力极端低下，只能忍受自然界的自发力量的控制。于是他们就把自然力人格化，认为自然现象是受某种神秘力量支配的，并按自己的形象想象出各种神灵，产生了偶象崇拜，形成狭隘而愚昧的原始宗教观念。灵魂不死和神的观念的出现，既标志了唯心主义和宗教的产生，又表明哲学基本问题的最初提出。

中世纪被称为黑暗的世纪，教会和神学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统治阶级利用宗教和经院哲学对劳动人民进行精神统治，科学成了神学的附属品，哲学变成了神学婢女，圣经成为人们盲目信仰的对象。然而就是在这个历史时代里，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也还被人们以多少隐蔽的形式提出来。当时，在经院哲学内部出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了唯名论和唯实论的斗争。唯名论认为，只有个别才是真实的，一般不是先于个别而存在的，个别高于一般；而唯实论则相反，认为一般是实在的，一般能够脱离个别而存在。唯名论和唯实论的斗争，实质上是围绕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进行的。列宁指出："中世纪唯名论者同实在论者的斗争和唯物主义者同唯心主义者的斗争具有相似之处。"① 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个问题是以比较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哲学基本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② 从14、15世纪开始，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一些先进国家中，出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必须同严重阻碍科学技术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势力作斗争，反对宗教和唯心主义，打破基督教的垄断地位。在15世纪中叶出现的文艺复兴运动，举起了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帜，要求恢复人的尊严，捍卫人的权利，把人们的视线从天上转到地上，从神学转向人学。这样，哲学也就从神秘的"天国"降到现实的尘世。人和自然以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各种哲学派别斗争的焦点，成为近代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是作为全部哲学的中心课题来研究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特点不是研究思维或存在的某一方面，而是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集中注意于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矛盾及其相互转化。例如，黑格尔认为："现时哲学观点的主要兴趣，均在于说明思想与客观对立的性质和效用，而且关于真理的问题，以及关于认识真理是否可能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的问题，也都围绕思想与客观的对立问题而旋转。”①费尔巴哈也认为全部哲学史就是在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周围兜圈子。

但是，由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世界观都还不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因而都不能对哲学基本问题作出有科学根据的概括。就黑格尔来说，他坚持的是思维第一性、存在第二性的原则，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不过是思维和思维的同一性。费尔巴哈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明确宣称：“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②这个论述固然是正确的，然而他却不了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与哲学基本问题之间的联系；他虽然在自然观上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却又反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并且，他还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缩小为人神关系的问题，他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始终没有超出反神学斗争的范围。此外，费尔巴哈虽然强调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认为思维能够正确地反映存在，但他又否定人的反映机制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因为他不了解人的历史发展，不了解实践在人的历史活动和认识活动中的决定性意义。形而上学和机械论的偏见，使他不能把唯物主义哲学贯彻到底。

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吸收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思想成果，并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之后，才在哲学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二　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彻底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而获得彻底解

① 《小逻辑》第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

决的。而科学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又是奠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个理论体系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与以往所有哲学派别的本质区别：首先在于，他们从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强调物质不依赖于思维而存在，彻底批判了企图取消精神和意识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唯心主义；其次在于，他们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把实践观点引进认识论，正确解决了意识和思维如何在实践的基础上发生，又如何在实践的基础上变化和发展，克服了形而上学的消极、直观、被动的反映论；最后在于，他们把唯物主义推广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提出并解决了社会历史观中的基本问题，为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提供了客观准则。

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究竟是思维第一性，还是存在第一性？哲学史上不同派别的斗争，主要是围绕这个问题而展开的。"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② 恩格斯从纷繁复杂的哲学斗争中提出了一条基本线索，为总结全部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提供了标准。他特别强调存在对思维的本原性问题是划分一切哲学派别的唯一标准，"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③ 假如离开这个意义来判别什么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就势必造成混乱。施达克就是一个例子。施达克把是否"相信人类的进步"，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

② 同上，第220页。

③ 同上，第220页。

是否“追求理想目的”，是否具有“同情、爱以及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等等，作为划分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标准。因此，他在费尔巴哈那里自然就看不到有任何唯物主义，而是完完全全的唯心主义了。

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不仅唯物辩证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且把它贯彻到历史领域，同样唯物地解决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恩格斯说：“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①费尔巴哈虽然在自然观上是有唯物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却不能摆脱传统唯心主义的束缚，不能唯物地解决社会历史观中的基本问题。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对哲学基本问题作了完整的考察和研究，不仅在自然观上，而且在历史观上，都上升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高度，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 。

恩格斯指出，哲学基本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②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一切唯物主义哲学家都在坚持存在第一性的前提下，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而唯心主义哲学家则在坚持思维第一性的前提下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如对黑格尔来说，思维自然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内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页。

② 同上，第221页。

容。① 然而，也有一些哲学家，他们“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② 这种不可知论的杰出代表，就是在近代哲学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休谟和康德。休谟认为，我们只能认识到我们所经验的东西，任何关于经验之外存在的假设，都是不可能证实的。康德则认为，人们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而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恩格斯指出，黑格尔对这种不可知论曾作过尖锐的批判。“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他都说了”。③ 费尔巴哈也从唯物主义立场对不可知论进行过批判。他说：“我们也没有理由可以设想，倘若人有更多的感官，人就会认识自然界的更多的属性或事物，……人的感官不多不少，恰合在世界的全体中认识世界之用。”④ 费尔巴哈还认为，在我认识不到的，别人可以认识到；现在不能认识到的，将来可以认识。但是，费尔巴哈的这些批判，虽然机智，但不深刻。因为他不了解实践的深刻含义，也没有揭示认识的辩证性质。其实“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⑤

把实践的观点引进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重大贡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实践不仅被理解为认识的基础，而且被理解为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实践提供了对不可知论进行最令人信服的驳斥的有力武器：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所谓“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就被证明是可以认识的了。事实上通过实践，勒维烈证明哥白尼的太阳学说不是假说，而是科学；通过实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② 同上，第221页。

③ 同上，第221页。

④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63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践，可以使一切“自在之物”都能变成为我之物，从而宣告不可知论的彻底破产。

总之，把哲学基本问题分为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方面，并加以全面准确的阐述，这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杰出贡献。这既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又解决了认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

三　历史发展中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把人类历史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历史或者被看作是个别英雄人物的意志、思想的产物，或者被看作是上帝、神的创造，或者像在黑格尔那里那样被看成是“绝对观念”的自我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根本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且也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恩格斯指出，他们都是用“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①因此，必须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要完成这个任务，就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活动规律”。②

社会发展规建和自然发展规律有不同的特点。自然规律是离开人自发地、盲目地起作用的。在自然界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③社会规律却不同，因为在社会历史领域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有意识、有思维能力的。人的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按照自己的意图，追求一定的目的的。但是，这一点丝毫也不能改变历史进程是受内在规律支配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2页。

② 同上，第243页。

③ 同上，第243页。

客观事实。社会历史的发展证明，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原因是很少能够如愿以偿的。有时是许多预期目的在同一场合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有时某种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不能实现的幻想，有时是虽有明确的目的但缺乏实现的手段。结果，就造成这样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① 历史的发展表面上像是偶然性在起作用，其实这种偶然性(人们的个别动机和目的)始终是受内部隐藏着的规律支配的。问题只在于如何发现这些客观规律。

恩格斯指出，要探索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研究人的思想动机背后的"动机"，唯物地分析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② 旧唯物主义从未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和唯心主义一样把精神动力看成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而不追溯这些"动力"后面的"动因"。黑格尔的历史观比这前进了一步，他提出了历史是有规律地发展的观点，并试图寻找支配着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是他不是从历史本身中去寻找，而是从外面，从哲学家本人的意识中去寻找这种规律。

如何探究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呢?恩格斯指出："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③ 毕竟是任何真正的历史运动的主体，支配历史发展的规律也必定是支配着最大多数的人的行动的规律。因此，要发现人的思想动机背后的"动因"，必须研究推动广大群众以至整个民族或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因。对于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当然不应抹煞，所以也必须研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④ 但是，任何杰出人物都不能超越历史时代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② 同上，第244页。

③ 同上，第245页。

④ 同上，第245页。

需要和无视整个社会的要求，他们决不能和民族的、阶级的、群众的意志和行为背道而驰，否则就要遭到失败和灭亡的命运。这就是说，即使是杰出的伟大人物，也必须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才能对历史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才能成为杰出的历史人物。此外，恩格斯还指出，研究历史发展的动力，必须十分重视在历史发展中持久地起作用的，引起了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这就是说必须研究每一历史时代中群众的物质生产条件所发生的变化。那么，引起人民群众行动起来的思想动机背后的动力，即推动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根据对以往历史的分析，恩格斯认为，至少在近代的历史上，阶级斗争无疑是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而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则是产生近代社会中各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的决定性力量。

通过对阶级斗争及其历史发展的研究不难发现，阶级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而出现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也是由于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变化而产生的。阶级斗争尽管都具有政治斗争的形式，但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利益而进行的。这也表明，人类历史归根到底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

综上所述，恩格斯向我们展现了这样的思想发展逻辑：从分析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本质差异，到指出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论原则，再进而揭示掩藏在历史事件背后的物质动因，从而完整地阐明了历史发展中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辩证关系。这是他继《反杜林论》之后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又一次精湛的论述。

第三节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恩格斯晚年写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文献。在这些书信中，恩格斯重新解释和

发挥了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原理，特别是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驳斥了资产阶级学者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伪造和歪曲，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恩格斯写这些信的直接起因是德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莱比锡教授保尔·巴尔特(1858—1922年)对唯物史观的歪曲和攻击。恩格斯从摩里茨·维尔特在维也纳的《德语》杂志上所写的一篇书评，得知巴尔特的《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这本书，读后对该书产生了不良印象。使人愤慨的是：当历史进入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已因战胜了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而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战斗旗帜的时候，资产阶级思想家却企图使用歪曲丑化的方法来阻止它的发展。保尔·巴尔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保尔·巴尔特污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思想是"任意的历史编造"，是"否定一切观念的力量"，是把"人类变成了一种机械发展的毫无抵抗力的玩物"。他硬说马克思把"经济"发展当成了在历史中唯一起作用的因素，攻击唯物史观是"技术经济史观"，"经济唯物主义"，"社会静力学"，是经济上的机械论和自动论，把历史看成了没有人参与的自动的机械过程。保尔·巴尔特把唯物史观庸俗化的称心理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① 这在当时，为了把唯心主义从最后一个避难所—社会历史领域中驱逐出去，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是必要的。但这样做的结果也造成了一些无庸置疑的缺点，这就是"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② 同时，在某些场合对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也论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书简》第72—73页。

述不够。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①而这个忽略，被巴尔特之流利用来作为攻击唯物史观的口实。这样，回击资产阶级学者的挑战就势在必行了。

恩格斯写这些信的另一个原因，是批评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青年派"。这个派别按其性质是党内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是由刚刚加入社会民主党的年轻大学生和编辑组成的。其特点是把唯物史观庸俗化和教条化。他们不是把唯物史观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是用作套语和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同时把本身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这种情况也给保尔·巴尔特等人攻击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口实。为了恢复被"青年派"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为了指导党在现实中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也为了不使强大而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理所当然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恩格斯不得不公开对"青年派"的行径进行清算。

恩格斯写作这些书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和帮助社会民主党的许多领导人，提高他们的理论素养，增加工人党的战斗力。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倍倍尔、梅林等人在理论上还不够成熟，在原则问题上含糊不清，在路线问题上缺乏坚定性，喜欢调和矛盾，回避斗争，表现出"不牢靠和性格软弱"，②尤其对唯物史观的实质内容理解不透彻，常常在《新时代》杂志、《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一些折衷主义的错误百出的文章，甚至直接批判辩证唯物主义和鼓吹新康德主义思想。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战略和策略，澄清思想理论上的混乱，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简》，第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24

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就尤为迫切了。基于上述原因，恩格斯在信中全面而精辟地论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充分肯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着重论述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尽管恩格斯为“没有时间能像给报刊写文章那样清晰而明确地”①阐述这些问题而感到遗憾，然而他的充满历史辩证法极其光辉而深刻的思想精髓，已集中地包含在这些彪炳史册的书信中。

一　恩格斯对“经济基础”的再解释

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准确地解释了经济关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赋予经济关系以丰富的具体内容。恩格斯提出：“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力才继续保存下来)，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②在这里，恩格斯把经济关系看成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它既包括生产的社会形式即各种生产关系，又包括生产的物质内容即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统一。

在这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及社会经济基础时一般总是指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简》第83页。

② 同上，第80页。

即经济结构或经济制度。这对于在社会历史研究中贯彻唯物辩证法，摆脱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明确划分各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把生产力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恩格斯在上述至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明确指出：“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事实上，物质生产力不仅对于产品的生产、交换和分配方式具有决定作用，而且对于政治思想上层建筑也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

恩格斯不仅把生产方式作为“经济基础”的内涵，他还进一步说明了与生产紧密相关的其他几个方面的因素和条件，也应当包括在经济关系的范畴之内。其中有：生产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自然环境、气候、土壤、水源、矿藏等），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等），以及人口、种族等因素。恩格斯所以必须要对经济基础作扩大的解释，一方面是针对把马克思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纠正党内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片面的、庸俗的解释，错误地只把生产关系看做唯一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在恩格斯看来，作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包括着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所存在的一切物质关系的总和，或者说全部生产过程所赖以进行的各种前提和条件的总和。因此，“经济基础”这一范畴决不是指某种抽去具体现实内容的单纯关系，而是与现实的生产力乃至特定的自然条件、人口因素等密切相关的统一的经济有机体。由于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因此经济有机体也处于动态过程中。同时，经济关系内部的各种要素，也不是互相并列的，而是互相从属，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作为历史发展的最终基础的是以技术装备为标志的生产力，而决定每一社会的性质并使不同社会形态互相区别开来的，则是与生产力相联系的生产关系。地理基础、旧经济的残余、外部经济环境和种族、人口等因素，对社会的发展虽然也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作用，但它们一般都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恩格斯对“经济基础”的新理解是对巴尔特之流的有力回击。巴尔特首先把“经济”一词的内容解释得非常片面和狭窄，然后就宣称历史唯物主义为一种狭隘和片面的理论。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似乎只承认“经济环境”，而完全忽视了地理环境、人口、种族之类的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因而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学理论。恩格斯则对此作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戳穿对历史唯物主义作片面解释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而是它的资产阶级伪造者。

二 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实现于人的自觉能动的活动中。驳“经济关系”自动起作用

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①然而，巴尔特在他的书中却加以歪曲，攻击唯物史观只承认经济因素的唯一决定作用，而人只是受经济状况摆布的可怜的傀儡。他诬蔑唯物史观像笛卡儿认为“动物是机器”一样，也主张人是机器。恩格斯针对巴尔特把“经济关系自动起作用”的观点强加于马克思的无稽之谈，重申了唯物史观的下述基本原理：“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②他指出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正是通过人们的自觉能动的活动来实现的。恩格斯明确指出：“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这并不像某些人为着简便起见而设想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简》第61页。

② 同上，第58页。

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① 唯物史观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前提下，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在这里，恩格斯强调了经济关系对人类社会及其多方面的发展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但不能从唯一的意义上去理解这种决定作用。这样才有可能科学地确定人作为历史的主体即创造者所起的作用。人和动物的区别首先在于人有自觉的能动性，人不仅能能动地认识世界，而且能能动地改造世界。社会规律是人们活动的规律，它不是存在于人们的活动之外，而是存在于人们的活动之中。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是由人参与和实现的，没有人们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任何社会规律的作用都是一句空话。只有正确理解作为历史的主体的人，人的各种活动所赖以进行的条件，以及在各种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主观因素(理智、意志和情感)所起的多种形式的作用，才能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当然，这样来阐明人的创造作用不是要和经济状况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分割开来，而是要辩证地统一起来。恩格斯以普鲁士国家的形成为例，生动地说明了政治、思想、传统等都对历史的发展起着无庸置疑的作用和影响。如果把经济因素看成唯一的决定因素，就会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恩格斯以讽刺的口吻指出："庸俗的经济自动论者"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在这里只看到原因，在那里只看到结果。而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在危机时期才有，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当然相互作用的各方的力量并不均衡：其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简》第81页。

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

恩格斯对"经济关系自动起作用"的机械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的批判，不仅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在理论上更加全面和完整，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巴黎公社失败后，由于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和无产阶级在合法斗争中取得的成就，出现了一种把经济发展当作社会前进的唯一动力，主张放弃革命斗争，依靠经济发展自然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观点。恩格斯的论述，强调了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应当看到主观因素的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工人阶级不仅应当组织起来，在革命政党的领导下，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而且还必须加强思想和世界观方面的教育，以便自觉而有组织地开展各个领域的斗争。

三 历史活动中的必然和偶然、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恩格斯关于"合力"的思想

恩格斯从必然和偶然、自由和必然的相互关系出发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和人的自觉创造活动之间的关系，阐明了人们是怎样在现实关系的基础之上能动地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恩格斯指出，人们创造历史，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共同计划，也不是在各个孤立的时间和地点来进行这种创造的，而是在延续不断的各个时代，通过各个个人、各个阶级、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不断的相互作用来进行这种创造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意向和行动既不是绝对统一，也不是绝对对立，而是相互交错、相互作用着的。"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① 在这里，恩格斯精辟地阐明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没有脱离偶然性的必然性，偶然性是必然性的必要补充和表现形

---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书简》第81页。

式；另一方面，也没有脱离必然性的偶然性，在偶然性的背后隐藏着起支配作用的必然性，必然性要通过各种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恩格斯以伟大人物的出现为例来说明。“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①拿破仑、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都是如此。这是因为社会发展的一定时代的历史任务，总要通过一定的代表和历史人物来推动其实现，这是必然的。至于这些历史人物是谁，什么时间出现，则带有偶然性。正如没有拿破仑，历史同样会造就出“拿破仑”式的人物来充当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样的角色。至于历史人物的气质、性格、品行、爱好乃至健康状况所给予社会发展的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这自然是偶然的。不过在历史舞台上演出的丰富多彩的话剧中，始终都贯穿着一定的必然性。恩格斯以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为例，说明即使没有马克思，这一学说也终将被人发现。因为产生它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19世纪中叶以来，法国和英国的历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应用过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当代的历史；尤其是在7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摩尔根以其独特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这些事实都证明，发现唯物史观的时机一旦成熟，没有马克思它也将被别人所发现，不然，任何天才也不会发现它。恩格斯进而指出：“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性和表面的偶然性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简》第81—82页。

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①

经济必然性归根到底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制约着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以及这种活动所导致的最终结果，但这丝毫不排除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自由意志的影响和作用。只要我们不把自由理解为不遵循客观规律的随心所欲，理解为在想象中摆脱了一切限制的放纵和任性，那么自由和必然就不单是彼此对立而且是互相统一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对于客观存在的必然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人们的行动总是盲目的、不由自主的。只有在认识了这种客观必然性并根据它来确定自己的实践目的和活动方式，人们才会在这个范围内，获得行动的自主权。自由并不存在于必然性的彼岸。只有在必然性的基础上，通过对必然性的认识和掌握才能实现向自由的过渡。人们一旦认识了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必然性，他们就会有足够的自由运用正确的手段来影响历史的进程，走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硬说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人们必须奴隶般地服从经济规律，经济必然性的作用必然排除主体的自由意志等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知和歪曲。

恩格斯运用力学平行四边形的法则，形象地比喻了历史活动中个人的自由意志和支配着他们的客观必然性的关系。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②恩格斯关于历史发展中的"合力"的原理，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深刻的思想。首先，由于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第82页。

② 同上，第62页。

许多单个人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无数分散的力量的相互交错，形成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出总的合力，这是任何历史事变产生的原因。其次，参加到合力中去的每一个意志和力量都产生于特殊的生活条件，如个人的体质、生理需要以及外部的经济环境(或是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的)，因而每一个意志和力量在质上或量上都是不一样的，这些意志和力量，无论大小都融合在总的合力中，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它们的作用绝不等于零。再次，总的合力的形成和它所产生的最终结果，是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一致的，表现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由此说明，历史的进程虽然在表面上纷繁复杂，但总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所支配。这个内在的一般规律就是经济必然性。为了避免盲目性，减少自发性，扩大自主活动的范围，关键在于发现并掌握这种规律，根据这种规律来指导人们的活动。

四　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是通过一系列中介环节的交互作用实现的

恩格斯认为贯穿在历史中的规律归根到底是经济必然性，但他并没有认为经济规律是唯一起作用的社会规律。他通过分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揭示历史中各种规律的交错性，及其作用形式的复杂性。恩格斯通过几乎对所有政治思想上层建筑形式的历史考察和分析，揭示了它们同经济基础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着重阐明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是通过上层建筑自身中的一系列中介环节而发生的。这些中介环节并不是经济基础的作用的单纯的承受者和传导者，它们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按照不同方式，不断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彼此相互作用。因此绝不能把上层建筑中的各种现象单纯地、直接地归结于经济。

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

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1]在恩格斯看来，社会是由所有重要领域或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应当从这些因素的相互联系、联结、运动来考察社会有机体的存在和发展，从"交互作用"的观点来论述社会发展的规律。其中首先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交互作用；其次是上层建筑中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是因为上层建筑是一个有着诸多层次和复杂结构的庞大体系，其中每一个要素，都同经济基础有某种联系，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只不过这种联系有的直接、有的疏远、有的显而易见、有的难于确定，以致可以忽略这种联系，认为它们并不存在。在全部上层建筑中，政治和法律较为直接地反映经济关系，而哲学和宗教则是远离经济悬浮在空中的思想领域，它们对于经济关系的依赖性往往是通过许多中间环节而间接地发生的。即使是更接近于经济基础的政治和法律，也不能直接归结于经济基础，因为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不仅要受经济关系的制约，而且要受到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其中包括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

恩格斯以哲学为例，说明经济发展对哲学发展的归根到底的支配作用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种支配作用只能发生在哲学发展本身所规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通常表现在经济运动通过政治等等的形式，对先前哲学家所提供的现有哲学资料发生作用。经济运动本身并不能创造出任何新的哲学思想，它只能决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简》第61页。

现有思想资料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和方式。而且即使这种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对哲学发生最大的也是最直接影响的，其实是政治、法律和道德。

由此可见，只有从"交互作用"的意义上才能科学地理解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在任何情况下，经济必然性的作用都是通过历史发展进程中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如果企图把所有社会现象都直接归结于经济的原因，这如果不是出于有意歪曲，也是孩子气十足了。

第四节 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在《通信》中，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同时，着重阐述了上层建筑诸因素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一 恩格斯论分工和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

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从社会分工的角度，阐述了生产和商品市场的关系以及两者和金融市场的关系的变化过程。他指出："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但是，"凡是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地方，单独的劳动过程就成为相互独立的。"① 例如，产品贸易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的支配的，但是它一旦脱离生产而独立起来，就会沿着自身的运动方向运行，有自己的阶段，并且也反过来对生产起作用。金融市场也是如此。它是由生产和商品贸易所决定的。但金融贸易和商品贸易一分离，它就具有由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的规律和阶段。金融贸易在它进一步的发展中扩大为证券交易，这些证券不仅是

①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书简》第65页。

国家证券，而且也包括工业和运输业的股票，因而总的说来，原来支配着金融贸易的生产，有一部分就沦为受金融贸易直接支配的领域，这充分表明了金融贸易对生产的反作用已变得更为厉害和复杂。这一点对理解同样由社会分工而产生的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基础的反作用，十分有用。因此，恩格斯指出："在上述关于我对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和金融贸易的关系的见解的几点说明中，我基本上也已经回答了您关于整个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社会产生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就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①他们在对授权与他们的人的关系上，成为具有独立地位的人，并且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于是国家、法等等上层建筑机构一经产生，就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具有了和社会相脱离的性质。

可见，国家权力等等最初是由社会产生的，但它一经产生，就成为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进行着一种特殊的活动以及为这种活动所决定的特殊利益。它凌驾于社会之上并同社会相对立，对社会的生产活动和进程发挥着极其巨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大致可以有三种情况：(1)沿着和经济发展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会得到较快的发展；(2)沿着和经济发展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或迟或早都要遭到崩溃；(3)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仍然跳不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可能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从而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此外，还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即"侵占和粗暴地毁灭经济资源这样的情况；由于这种情况，从前在一定的环境下某一地方和某一民族的全部经济发展可能完全被毁灭。"②这种情况虽属罕见，但在历史上的确曾出现过。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简》第66页。

② 同上，第67页。

例如15世纪西班牙人对摩尔人的征服，就破坏了摩尔人经营的在当时是高度发展的农业、园艺业及其大量的灌溉工程，使摩尔民族的经济发展几乎完全被毁灭。

法也是如此。产生了职业法律家的新分工一旦出现，就会开辟一个新的独立部门，具有特殊的能力并获得相对独立性。恩格斯以资产阶级的法为例作了说明。他说："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① 法律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它必须适应并且表现总的经济状况，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意识形式，必须保持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不致因体系内部的自相矛盾而自己反对自己。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生活本身是充满矛盾的，不仅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根本利益上的冲突，而且在资产阶级内部的各个阶层和集团之间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对立冲突。如果不加掩饰地反映这些矛盾，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就要受到破坏。而为了使法律的尊严和效用得到保证，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是必须保持的。这样，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注定要受到破坏。于是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少能够把一个阶级的统治鲜明地、不加掩饰和歪曲地表现出来的所谓普遍的法律原则或"法权观念"，倒成了编纂法律规范时的共同前提和一般基础。例如，拿破仑法典，尽管1792—1796年时期革命资产阶级的纯粹而彻底的法观念已经在其中遭到歪曲，但仍不妨碍它在世界各地编纂新法典时被当作基础来使用。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各部门并不是机械刻板地反映经济基础的，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程度的相对独立性，形成各自不同的特殊发展规律和相对独立的历史，并且积极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是上层建筑的独立性仅仅是相对的，它们不可能绝对地脱离经济基础而单独存在和发展。同时，无论它们对经济基础

---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简》第67页。

的反作用有多大，经济运动归根到底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离开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离开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制约作用去谈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必然导致历史唯心主义。

二　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原则，同时充分重视主体在认识中的能动作用

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生活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人始终是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领域内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的活动的结果。无论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或是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都不可能是脱离人的力量的作用，而是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的。承认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承认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这并不排斥人的思想、意志和情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并不贬低主观因素在历史中的意义。相反，只有透过纷繁复杂和曲折多变的社会生活现象去深入揭示历史运动中的客观规律性，才能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开辟广阔的道路。在《通信》中，恩格斯着重阐明了历史中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辩证法，指出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主观因素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将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经济的、政治的和其他的反映同人眼睛中的反映是完全一样的，它们都通过聚光镜，因而都表现为倒立的影像——头足倒置。这里只缺少一个使它们在我们的观念中又正立起来的神经器官。"① 这个"神经器官"就是人们的正确世界观和方法论。恩格斯举出了生产和商品贸易以及两者和金融贸易的关系，来说明国家和法以及宗教和哲学同经济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经济运动本来是第一性的东西，是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而国家权力、政治观念以及宗教、哲学等等是第二性的东西，是经济关系的反映。但是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简》第64页。

第二性的东西一旦取得了相对独立性，并反作用于第一性的东西时，原来的关系就被歪曲、被颠倒了，呈现出头足倒置的现象。这就说明唯心史观的产生存在着重要的认识论根源。举例来说："金融市场上的人所看到的工业和世界市场的运动，恰好只是金融和证券市场的倒置的反映，所以在他们看来结果就变成了原因。"①其实，工业和世界市场同金融、证券市场的关系应当是：后者最初是从前者中由分工而分离出来的新部门，那时它总是尾随着前者而运动的，离开了工业和世界市场，金融贸易不会有自己独立的运动。金融、证券市场的危机对于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危机而言多半只是一种征兆而已。然而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情况却发生了变化。这时，的的确确的事实是，"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的作用，或者甚至根本不起作用。"②这说明，原来支配着金融贸易的生产起码正有一部分为金融贸易所直接支配，金融贸易对生产的反作用已呈喧宾夺主之势。这样一来，生产和商品贸易与金融贸易的真正关系在实际生活中已很难一下子辨认清楚。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它们之间的决定和被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使被倒置的现象在观念中重新正立起来，就必须发挥主体的正确思维的功能。为此，一种特殊的"神经器官"——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建立是不可缺少的。

国家和法的产生都是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它们也像商品贸易和金融贸易一样，最初是尾随着经济运动的，但是它们一经产生就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并反过来对经济的运动和进程发生影响。这样就形成了两种力量之间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的决定作用，它必然替自己开辟道路，另一方面是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简》第64页。

② 同上，第64—65页。

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同样是头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维护这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并且是这样头足倒置起来，以致需要经过几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① 资产阶级法学家总以为他们是凭着先验的法律原则来活动，并由此认为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而经济内容什么也不是。而实际上，所谓法律原则终不过是经济运动经过粉饰的反映而已。

总之，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原则，坚持经济因素是归根到底的原因，而政治和法律观念则是它的最终结果。不过就全部历史过程看来，二者又表现为互为因果，它们的地位和作用是在不断的相互作用中相互转化着的。要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能动作用，提高自己斗争的自觉性，就不仅要把自己组织起来，而且应当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加强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在纷繁复杂的偶然事件中，把握支配历史运动的必然性，以便为人类的进步和解放事业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

三　恩格斯论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区别，驳“真理多元论”

在《通信》中，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一个突出贡献是深入研究了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的特殊性。他不仅研究了内容如何决定形式，而且探讨了这些形式是如何产生，通过什么方式和方法产生，然后，它们又怎样发展，有哪些独特的规律。

恩格斯首先阐明了社会意识形态一旦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便具有历史继承性和按照自己特有的规律发展的内在逻辑。他以哲学为例，证明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殊领域，都具有它的前驱者传给它，而它则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简》第67页。

提。经济运动对这个领域的最终支配作用只是发生在它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如果没有可资继承的先前各代的思想资料，单凭经济的发展决不会造成哲学的繁荣。因为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它只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恩格斯以路德和加尔文"克服"官方的天主教，黑格尔"克服"费希特和康德，卢梭以其共和主义的《社会契约论》间接地"克服"立宪主义者孟德斯鸠，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克服"重商主义者，说明在所有这些领域的发展过程中，都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有着相对独立的历史。正因为意识形态发展具有这种"独立历史"的外表，蒙蔽了许多人的眼睛，好像任何思想史的发展过程都是以思维为基础的。一种思想对另一种思想的"克服"，仅仅被看作纯思想的胜利，而不是被看作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事实上，意识形态的发展虽有其特殊的规律，但决不意味着它们可以完全脱离经济运动而自行变化和发展；相反，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任何带根本性的变化，归根到底都是由经济关系的变化决定的。

其次，恩格斯阐明了意识形态的发展同社会经济发展往往是不平衡的。"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十八世纪的法国对英国（而英国哲学是法国人引为依据的）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①

再次，恩格斯阐明了各种意识形式的发展是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实现的。在各种意识形式中，政治、法律观念和经济基础的联系最为紧密，意识形态中的其他各种形式往往是通过政治、法律的中介而实现其和经济基础的交互作用，从而获得进一步的变化和发展。例如，对哲学发生最大最直接影响的是政治、法律和道德的反映。这说明经济对哲学的影响多半是间接的。如果把哲学的发展直接归之于经济的原因，那就把复杂的事

---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简》第69页。

物简单化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有其特殊的涵义。它有时是指对社会现实的或多或少科学的认识，有时是指对现实的完全虚幻的、歪曲的反映。但无论怎样，它都是同完全自觉的和严格科学的知识体系相区别的。恩格斯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的信中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① 因此，历史科学的真正任务，就在于不断克服意识形态的难以避免的偏见和谬误，消除意识形态发展中的虚假意识，以便获得真正的科学。"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论逐渐消除或是更新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论的历史。"② 所以，科学与意识形态不同，它以消除意识形态中的无意识和缪论以便达到真理为目的。

科学的发展虽然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就是说，它虽然也必须从先前积累下来的资料出发，但这种相对独立性却大大地不同于意识形态。首先，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和物质生产发展的关系特别紧密，而意识形态和生产以及生产关系的联系，却往往是通过一系列中介环节而间接发生的，并且常常是被掩盖着的；其次，尽管在科学发展中经常地发生变革和转折，但在这里，必须严格地继承先前所达到的科学成果，而不能凭任何观念或意志来决定取舍；再次，尽管各阶级的政治对科学发展也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自然科学本身却并不带有政治上层建筑的性质，不会受到阶级政治的猛烈冲击和干扰。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中，人们对自然界、社会以及其他方面认识的发展，开始虽然表现为各种假说之间的对立的斗争，但经过实践的验证和历史的过滤，愈到后来就愈能发展成为更加符合实际的科学真理。真理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有其客观的统一的标准。所谓"多元真理论"不符合马克思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简》，第93页。

② 同上，第69页。

义的观点。究其原因是把“意识形态”和“科学”完全等同起来，从而夸大了人类知识的相对性，而否定了它的绝对性。

思考与讨论

1.恩格斯论黑格尔哲学的历史功绩及其方法与体系的矛盾。

2.恩格斯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及其局限性。

3.恩格斯论经济基础的哲学涵义及其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

4.恩格斯论必然与偶然、自由与必然在历史中的关系。

5.恩格斯论社会分工和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

6.恩格斯论意识形态的特点及其发展的规律。

第十二章　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的传播和发展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和继承者们

从19世纪80年代时起，马克思主义在欧洲迅速、广泛地传播开来，取代了形形色色非无产阶级思想流派而成为各国工人运动的主导思想。资产阶级理论家们企图以“沉默”来扼杀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完全破产，以至不得不开始认真地、大量地进行公开的批判和研究。① 列宁在评述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特点时指出：“到处都在形成根本上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② 这种新格局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第一代继承者们的努力。在他们中间，有许多卓越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党务活动家（如威廉·李卜克内西、奥古斯特·倍倍尔、克拉拉·蔡特金等）。但是，如果着眼于对马克思学说的传播和发展，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则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弗兰茨·梅林、卡尔·考茨基、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以及保尔·拉法格。这都是一些富有个性的人，其生活道路和理论成就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晚年的政治立场差别

① 据威·桑巴特统计，在1883年以前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共计只有24篇，而在1883—1904年期间这类著作却发表了280篇，其中1895—1904年期间为214篇。转引自尼·伊·拉宾著《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第8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438—439页。

更大。① 然而他们又都是特定时代的产儿。两个时代的转换、交替（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阶段到直接实践阶段），决定了他们是一代“过渡型”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理论成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向列宁主义阶段发展的中间环节。

一 走向马克思主义之路

从最直观的角度看，对 19 世纪末马克思主义的大传播作出重大贡献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下述特点：就时间而言，他们都出生于该世纪 40—50 年代，都在 80—90 年代转向马克思主义；就地域而言，他们都出生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东欧、南欧或其他地区，且都来自较富裕的家庭；就政治倾向而言，他们都是第二国际的组织者和重要活动家，都属于马克思主义者中的“正统派”（相对于修正主义而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其内部才公开分裂——考茨基于 1910 年 10 月公开宣布了其“中派”立场。② 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特点，我们需要把他

① 一般说来，拉法格、梅林和拉布里奥拉基本上保持了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晚节，而考茨基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堕落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以后逐步转到孟什维克立场。

② 参看下表：

人物	出生（时间、地域、家庭）	转向马克思主义（时间、地点）
普列汉诺夫	1856年，坦波夫（俄国中部）地主	1881年底（瑞士日内瓦）
梅林	1846年施拉威（波美拉尼亚）容克地主	1891年（德国斯图加特）
拉布里奥拉	1843年卡西诺（坎帕尼亚）地主	90年代初(意大利罗马)
考茨基	1854年布拉格(波希米亚)画家	1884年（英国伦敦）
拉法格	1842年圣地亚哥（古巴）种植园主	1872—1880年（英国伦敦）

参看（苏）N·C·纳尔斯基等著的《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册），（英）佩里·安德森著《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等。

们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代人，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约·魏德迈、威廉·沃尔夫等)，以及比他们稍晚一些的马克思主义者(弗·依·列宁、罗莎·卢森堡等)作个比较。

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是在从事社会主义事业、投身工人运动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马克思的学说。也就是说，他们首先参加了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斗争，然后才成为马克思学说的拥护者。魏德迈、沃尔夫等早在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前就是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潮的信奉者，1848年革命时逐渐接受了马克思的学说；列宁、卢森堡等均是中学毕业后就投身本国革命运动，后来研究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考茨基受巴黎公社革命影响，在70年代中期就开始投身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梅林在70至80年代就参加了反对俾斯麦专制政府的斗争，并逐渐向工人运动靠拢；拉法格在大学念书时就投身于反政府的学生运动，并寻找同工人组织的接触；普列汉诺夫于1876年起就成为职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并在工人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拉布里奥拉在70年代开始同工人群众接触，其政治观点迅速地从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但是，普列汉诺夫等和较前及较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就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观点，已经是颇有名气的教授或政治家。

无论是魏德迈等人或是列宁等人，在他们接受马克思学说以前，都没有发表过什么有影响的论著。和他们不同，考茨基早在1875年便开始发表作品，系统地研究过达尔文、斯宾塞、穆勒、布克尔、毕希纳等人的思想，以及拉萨尔、路易·勃朗、杜林、阿·朗格等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调的哲学观点。作为德奥两国社会民主党党报的重要撰稿人，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马克思还抱着冷漠态度”，尽管他曾想读读《资本论》，“但是这种尝试完全失败了”，以至“心灰意冷地放弃了

它”。[①]他晚年在回顾自己思想历程时写道：“……我的出发点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出发点，因此我对他们所较少注意的那些现象感兴趣……他们是从黑格尔出发的，我是从达尔文出发的。我所研究的首先是达尔文，后来才是马克思。首先是物种的生存斗争，后来才是阶级斗争。”他承认：“我在获知马克思的历史观以前，已经拥有一种历史观了。”[②]这种历史观企图用达尔文的生存斗争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并把人口规律看作探讨社会问题的出发点，把社会的东西归结为人的生物本能。他用这个观点撰写的主要作品有：《从脑力工人观点看社会问题》(1875年)、《人类发展史大纲》(1876年)、《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1880年)、《婚姻与家庭的起源》(1882年)、《动物界的社会本能》、《人类的社会本能》(1883—1884)等。

和考茨基相比较，其他几个人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名气要更大些：拉布里奥拉作为已有20年教授历史的著名黑格尔派哲学家，发表过多种有影响的哲学著作；梅林作为从事了30年新闻工作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报刊的著名政论家，早已蜚声德国政论界；普列汉诺夫作为革命民粹主义“黑分派”的著名领导人，在合法刊物(《开端》、《俄国财富》)和非法刊物(《土地和自由》)上发表过大量表现其杰出的宣传才能的文章。这个特点决定了他们走向马克思主义之路的特色：这条道路是典型的——从革命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中走向马克思主义；然而这条道路又是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和已经十分牢固而且系统化了的哲学信念决裂是极其困难的。事实证明，尽管他们的名望、才干和理论素养使他们在接受马克思学说以后很快就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然而旧的世界观的残余却始终不易根除——考茨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梅林的拉萨尔主义、拉法格的

① 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

②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

普鲁东主义、普列汉诺夫的民粹派观点等。他们后来的失足或失误无不与此有关。那么，造成他们世界观转变不彻底的原因何在呢？

我们首先当然还是要着眼于当时的时代。这是资本主义“和平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时期；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还不具有直接的实践意义，而利用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等)宣传和动员工人群众、进行合法的斗争还是工人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因此，对阶级斗争、尤其是暴力革命的忽视，对国家和合法性的崇拜已成为当时工人运动中的普遍倾向。同时，历史暂时还没有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当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标志，致使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深处继续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当作不能逾越的政治信条。其次，当时是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广为流传的时代，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在当时的科学界和整个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简单移植到社会领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像瘟疫一样地流传开来。这种情况也反映到工人运动中来，许多人力图从理论上使达尔文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接近。因此从拉法格到普列汉诺夫，甚至拉布里奥拉，都采用了“人工器官”、“人为环境”、“社会本能”这些概念来阐发唯物史观，也就不是偶然的了。最后，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看，当时也是马克思学说的经济方面被提到首位的时期。这一时期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人，大都以经济思想为突破口而接受了马克思的学说。他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顺序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顺序正好相反，并非从哲学世界观的转变开始。因此，他们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不了解《共产党宣言》以前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更没有经历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所经历过的那种艰难复杂的哲学探索和思想斗争。这样，他们在世界观上的转变不够彻底，也是不足为奇的。

这种世界观上的缺陷归结起来，就是他们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世界观意义，从而导致了把马克思主义

哲学不同程度地实证化、简单化的倾向。他们毫无例外地把历史唯物主义绝对化，而对作为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辩证法理解不透——把它混同于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区别，往往为了和黑格尔划清界线，避免把辩证法变成先验的普遍公式，因而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即实际上否定了辩证法的客观普遍性。在这方面，考茨基最为突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同旧唯物主义的原则区别在于，它不是一种哲学，而是和达尔文进化论具有同样性质的"经验科学"；它不是那种"超越经验界限"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方法"。因此，他承认："哲学从来不是我的专长。我宁愿不去写什么哲学问题。……只不过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我可以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同时又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说和经济学说。"①

梅林同样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的意义，把它局限于社会历史领域。他写道："马克思恩格斯固然和任何哲学都断绝了关系，但他们把哲学的历史结果——历史发展的观念——移入了唯物主义。他们把这个观念首先不是移入自然中，而是移入历史中，从主观上说，这可以解释为他们二人都不是自然科学家，而是历史学家。"他甚至断言："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也是机械唯物主义者，正像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他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②因此，梅林在自己的著作中几乎从来不曾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而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只看作"历史唯物主义"。就连他们当中最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的普列汉诺夫，对辩证法的认识也存在着明显的欠缺。他虽然重视将辩证法运用于解释社会生活过程，并取得了一些创造性的

---

①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的哲学遗著》，莫斯科1973年版，第2卷，第172页，并参看《唯物主义历史观》等。

②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48—149页；《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册）第257页。

成果，但却忽视了作为认识论的辩证法。实际上，他仍然不理解辩证法的客观普遍性。这样，尽管他们一再批判资产阶级强加于马克思主义的“宿命论”，却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经济唯物主义倾向，并不真正懂得认识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和革命活动中的主观因素的作用。这就决定了他们跟不上正处在急剧转换过程中的时代，不可能担负起新时代所提出的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使命。

二 在跨世纪时代面前的选择

实际上，从19世纪末开始，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已在迅速降临。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完成，新的帝国主义时代已经开始。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中的一些薄弱环节，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提到了历史进程的面前。同时，由于世界范围内的殖民统治和高额垄断利润的形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内部因受垄断资本收买而出现了工人贵族阶层，以及它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代表——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对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在前一个时代，合法斗争是革命的主要形式；而在帝国主义时代，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提到了首位。在前一个时代，工人运动的主要敌人是其外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而在帝国主义时代，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已成为垄断资本最凶恶的帮凶。批判机会主义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政党在思想领域内的主要任务。正是在这个急剧变换的时代面前，第二国际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纷纷落伍了，有的甚至走到了工人阶级的对立面。对时代交替缺乏应有的敏锐，从主观方面看，不能不归咎于他们在世界观上的缺陷。

应该说，对于时代的变化，他们或多或少也有所觉察，并试图予以理论上的说明。普列汉诺夫是他们中最早注意到时代变化的人。从 1890 年末开始，他用了十年时间，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

中的新现象，即工业与商业中垄断的增长问题，进行了研究。①他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首先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垄断现象的出现，标志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矛盾的尖锐化。他批驳了卢塞关于美国的垄断具有人为的偶然性的观点，指出："垄断……是工业发展的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他批驳了马克罗斯季关于托拉斯有助于保持工业的稳定，使工人有可能间接地分沾"联合为一个辛迪加的企业利润"的观点，认为，由托拉斯的增加"过渡到生产的社会管理本身，必须以具备一定的条件为前提，在缺乏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这种过渡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比它带来的益处要大得多。"

几乎在同一时期，拉法格也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进行了考察，并撰写了《交易所的经济作用》(1897年)、《美国的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与政治意义》(1903年)等重要经济学著作。他对资本主义工业垄断的分析要比普列汉诺夫深刻些。他从收集到的有关美国托拉斯的大量统计资料中，得出了"托拉斯制度"将引起一系列经济、政治后果的结论。他认为：托拉斯制度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集中、小资产阶级这个过渡阶级逐渐消灭、群众日益贫困化等学说的一个勿庸辩驳的论据"。这说明，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垄断趋势相联系的后果是阶级剥削的加剧，工人阶级与整个社会所遭受的政治压迫的加强。因为这是垄断资本的统治，它必然要成为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全权主宰。拉法格以美国托拉斯为例指出：它"不仅在经济领域占有统治地位，就是美国人民的宗教、政治和精神生活也要受它支配。托拉斯正在创造美国人民的历史。"尤为难得的是，他敏锐地看到了工

---

① 普列汉诺夫这一时期详细研究过的主要著作有：波尔·杰·卢塞的《在合众国中的工业垄断》、阿·古列夫的《工业辛迪加》和马克罗斯季关于美国工业和商业中垄断化的发展方面的著述。见"普列汉诺夫纪念馆档案室"档案材料，转引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4年第19期，第46页。

业垄断所引起的统治阶级侵略性的增长，抓住了资本主义新阶段的一些特点。他写道："在托拉斯建立的头十年内，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促使美国以帝国主义政策，即利用军事力量为其托拉斯工业占领市场的政策，去代替它的传统政策。"

拉布里奥拉觉察到了历史条件的变化。他在1895年便指出："新时代正在开始，正在兴起，或者更确切地说，新时代正从现时代脱颖而出，并由于后者固有的内在结构而向前发展着。因此，这个新时代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即使今后可能不断发生今天还无法预见的种种变迁。"① 其后，他把自己正在着手的《历史唯物主义概论》第四部分的题目定为《在两个世纪的交界处》。他拟在书中对19世纪末各国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遗憾的是，他尚未来得及实现自己的设想便去世了。

考茨基敏锐地预感到新历史条件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发生的重大影响，他最早提出了"革命中心东移"的预言。他在190年写作的《斯拉夫人与革命》一文中指出："革命中心正从西方移向东方。19世纪前半叶，革命中心在法国，有时候在英国。1848年德国也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新的世纪开始时所发生的事变意味着我们正在迎接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亦即移向俄国。"② 不难看出，在时代的交替面前，上述马克思主义者都阐发过一些卓越的思想。

但是，总的来看，他们并不真正理解新时代的特点，并没有准确抓住和解决无产阶级实践所面临的紧迫课题。他们都没有从总体上考察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新现象，没有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已进入一个性质崭新、最高和最后的发展阶段，没有深入分析并揭示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及其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因此，在对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新历史时代的分析

---

①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1页。

②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0卷，第485页，第31卷，第5页。

上，他们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

首先，他们都把“帝国主义”看作资产阶级国家为了托拉斯工业的利益而实行的一种侵略性掠夺政策的特征，而不是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实际上是忽视了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国际现象的客观必然性。因此，他们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已指示过的工业垄断趋势上，并没有注意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相结合这个现象，尤其是没有从这一现象中得出财政资本的形成以及资本输出因而具有新的作用的结论，没有得出资本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已经瓜分完毕的世界而进行斗争的意义的结论。这一失误的极端表现，就是后来由考茨基所提出的“超帝国主义论”，即把帝国主义看作工业资本“情愿采取”、因而可以随意改变的一种政策。这一失误必然导致下述结果。

（1）他们对于日益迫近的帝国主义战争必然缺乏思想准备。拉法格就曾断言，战争在当时不可能发生或者很少可能发生。至于未来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等重大问题，他们更是极少问津。因此，他们不可能把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他们还谈不上积极去指导革命，最多只能是顺应革命形势（如梅林），而有些人则蜕变为革命的叛徒（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①

（2）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和形式的转变必然缺乏思想准备。本来，随着新的危机和战争时代的到来，无产阶级已由积蓄力量转变为直接进行革命，马克思主义已由掌握群众转变为直接付诸实践，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已日益摆到了首位。但是，由于思想上的僵化，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把无产阶级专政

① 拉布里奥拉于1904年去世，拉法格于1914年去世，因此，无从考察他们在“一战”中的表现。此外，需要说明，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直到最后，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忠实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的。他们并没有公开站在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的立场上。

和暴力革命仅仅看作革命的一个具体形式和策略，并不认为它具有直接的实践意义。普列汉诺夫曾借口时机不成熟而反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考茨基则更明确地表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拿到将来去解决，而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无须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因此，如果说他们对于如何利用议会斗争是行家（拉法格是第一位当选为法国议会议员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那么面对新的革命形势则总是有点力不从心。①

(3) 他们对于革命动力和对象的重大变化必然缺乏思想准备。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有了全新的意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的形成，开始了宗主国对殖民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全面控制和掠夺，而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愈益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帝国主义的出现，表明资产阶级任何进步作用的丧失，而广大农民则因垄断资本的剥削而愈益由无产阶级的后备军转变为可靠同盟军（尤其是在俄国等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但是，他们恰恰没注意这个变化，在民族和农民问题上犯了一系列错误。普列汉诺夫认为在俄国未来的革命中，工人阶级只能同资产阶级结盟。他断言："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外，我们看不到我们这里反对派或革命派的组合所依靠的其他社会力量"（1890年）。12年后，他仍坚持这一观点，认为，"从生产关系的观点看来，农民不是无产者。……暂时他捍卫着他特有的生产关系，因而他是保守分子和反动分子。"拉布里奥拉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他发表的支持意大利政府的殖民扩张政策的言论（1902年）。在他看来，加速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的发展将导致那里工人运动的发展，因而最终有利于社会主义。他还错误地把民族划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大类。梅林、考茨

① 我们在这里只能分析他们的共性，实际上，在政治立场上他们不仅个人和个人，而且同一个人的前后之间也差异很大，不能一律看待。这是需要读者特别注意的。

基等在上述问题上也持有类似的错误观点。①

其次，他们把“修正主义”看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一般渗透的结果，而不是看作帝国主义时代的一种必然的国际现象。不容否认，他们曾经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在同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梅林在党的报刊《新时代》上第一个撰文回击伯恩施坦，因为后者把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看作违背了马克思的决定论。梅林指出，这是“想要把唯物主义历史观改为经济历史观”。普列汉诺夫从哲学根源上，尤其是和新康德主义的联系上深刻地批判了伯恩施坦的观点。倍倍尔称此举在哲学上击溃了伯恩施坦。考茨基则侧重从政治经济学的唯物史观方面发起攻击，不仅驳斥了伯恩施坦对唯物史观的诬蔑，而且驳斥了他对马克思价值理论、资本集中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危机理论和资本积累历史趋势的理论的攻击。拉法格是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头一个在1900年初就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哲学基础提出尖锐批判的人，同时，他重点批判了法国工人政党内的修正主义派别——饶勒斯派，以及加入反动政府的“入阁派”——米勒兰派，同他们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拉布里奥拉不仅同伯恩施坦，而且同“暂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意大利的柯罗齐和索列尔坚决地划清了界限。他们甚至也注意探索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例如，考茨基就曾把知识分子当时所处的“新的中间等级”这一社会地位与修正主义思潮的产生和传播加以联系。

但是，总的看来，他们没有将修正主义同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联系起来分析，因而不懂得修正主义最深厚的根源在于被高额垄断利润所收买了的工人贵族阶层，其社会作用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前夜缓和劳资之间的矛盾”，以扼杀无产阶级革命；不懂得对修正主义的斗争除了思想上的批判外，还必须从组织上将

① 唯一例外的是拉法格，他在农民问题上的主要错误是不加区分地把全体农民都看成工人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可靠同盟军。

其清除出党，必须致力于建设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最早和最坚定批判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梅林在分析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时，也认为它只是“暂时的情绪，是小资产阶级成分渗入党内的结果”。他还倾向于用心理学上的原因来加以解释，把它看作是德国无产阶级由于在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的压迫下斗争了20年而感到疲劳的结果。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中甚至认为：“除了一种情绪以外，在德国从来不曾有过修正主义。”至于对批判修正主义持动摇态度的考茨基，即使在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认识也极其含糊。他认为修正主义不过是“转瞬即逝”、“必定不能起任何作用”的一种理论退步，①以至在1904年10月，他便赶紧宣布：“最近几年”，修正派的运动已经“熄灭”，其理论方面的错误也“完全予以肃清”了。

因此，他们这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给修正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这一任务后来由列宁等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完成）。实际上，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危险性不仅仅在于他曾经是一个颇有名气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在于他抓住了时代的某些变化，企图借此证明不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也可能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造。这里涉及到揭示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趋势问题，涉及到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问题。伯恩施坦的力量和危险性都在于此，以至考茨基在1898年10月斯图加特党的代表大会上还认为：“伯恩施坦迫使我们思考，为此我们将感谢他。”很明显，只有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彻底打败修正主义，而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们或多或少的教条主义倾向，使他们无力担当起这副重担。

三　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

时代的变换，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提到了首位。第二国

---

① 考茨基《德累斯顿代表大会》。

际马克思主义者世界观上的缺陷（不懂辩证法）最突出地表现在，他们不了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他们都具有忠实于马克思学说的良好愿望，而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教诲和他们自身的刻苦学习，又使得他们对于马克思的学说非常熟悉，以至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叹为观止。列宁是这样评价考茨基的："我们不要忘记，考茨基是一个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的人；从考茨基的一切著作来看，在他的书桌或脑袋里一定有许多木箱，把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引用起来极其方便。"① 他们都把忠实于马克思学说当作自己的最高愿望，并为此而同一切违背这一学说的思潮作斗争。1891年，普列汉诺夫在《新时代》上发表了《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一文，受到恩格斯的称赞。他马上写信给恩格斯说："有人转告我，您对考茨基谈到我论黑格尔的文章，曾经说过一些夸奖的话，如果这是确实的话，我就不再希求其他的称赞了。我的全部愿望只是要做一个够格成为马克思和您这样老师的学生的人。"② 因此，他们都把整理、宣传、阐发和捍卫老师的理论遗产作为自己的最高使命。就连他们当中思想最不僵化，信奉"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并痛斥了那种玩弄"马克思主义词句"行为的梅林，也把继承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任务。他在1891年因受党的审查而离开《柏林人民报》编辑职位的若干年后宣称："我将投身于科学研究工作那极大的欢乐之中，这样我可以不受会议和报纸稿子的干扰，更加热忱地继续整理我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生前的著作。对于他们的遗产，在某些并非不重要的方面，我会比现在活着的任何其他人处理得更好。这个任务高于我，也高于党。"③ 这样，他们基本上是站在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的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第215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第1卷，第895页。

③ 转引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13期，第67页。

理论水平上同修正主义作战。如果说，他们在保卫马克思的理论遗产方面是称职的、甚至是卓越的话，那么，在需要创造性地回答新时代所提出的重大课题方面则显得迟钝和平庸。他们不懂得离开了发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僵化，就会使忠实的愿望变成与之格格不入的教条主义。

我们曾经说过，他们在哲学世界观上的一个共同弱点是，由于对辩证法理解的片面而在阐述经济同意识形态关系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某种简单化、公式化倾向，从而导致对于革命主观因素的自觉作用的忽视。从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中不难发现，他在说明认识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和革命活动中的主观因素时有某种直观性，在说明社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的相互关系和上层建筑自身的辩证过程时，也有抽象化公式化的表现。因此，他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过高评价就不是偶然的。梅林在阐明经济发展对意识形态领域施加决定影响时，往往忽略了政治的、法律的及道德的观念等由此产生的中间环节，因此，他不善于充分揭示社会生活现象的复杂的相互作用。他的这种简单化突出表现在他对拉萨尔的过高评价上：他试图在哲学家的社会政治立场及其学说之间找出某种直接的联系——既然拉萨尔信奉《共产党宣言》，那么他的黑格尔唯心主义也就无可指责。考茨基更为典型。他把社会发展的强制性摆在首位，实际上把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革命活动的作用放到了次要地位。他在《社会民主党教义问答》（载《新时代》，1893—1894）一文中写道：“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达到；但我们也同样知道，我们不能举行这个革命，正像我们的敌人不能阻止这个革命一样。因此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举行或准备革命。既然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举行革命，所以我们也无从谈起革命将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到来以及革命将要采取什么形式。”① 他试图从经济必然性的逻辑中推导出革命任务，

① 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

而这种必然性是“不依赖无产阶级的意图和愿望将是如何的”。他把社会的革命变革主要归结为生产力状况，首先是科学技术成熟的程度。他和普列汉诺夫都把马克思关于“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在全部生产力在其中得到高度发展之前是不会灭亡的”这一原理教条化，因此断言俄国作为工业不发达的农业国，无论从经济条件还是“从精神力量，从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方面来说，都不具备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条件”。[①] 这就是他们后来堕落为无产阶级革命叛徒的哲学根源。

但是，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这种程度不同的僵化态度，主要地还是时代的产物（要知道，他们这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中的最优秀分子也没能完全避免这一错误）；因为在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从事理论活动的主要时期（即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巩固和扩大马克思、恩格斯革命变革的伟大成果，并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各国工人运动中去，确实是首要的任务。如果说，对于后一个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来说，他们是平庸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对于前一个时代来说，他们都是十分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一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以至于他们的理论遗产，成为任何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认真吸取的宝贵财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列宁主义，就是在他们思想成果的基地上生长出来的。从这方面看，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

第二节　促使马克思主义和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在于它是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思想武器。但是，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相结合，中间有一系列复杂的链

① 考茨基《民主与专政》。

条。早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各国工人运动和各种社会主义团体已经在逐渐发展。马克思主义面临着的是社会发展、革命传统、文化背景和组织程度都差异很大的各国具体实践。除了英、法、德等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地区外，还有意大利、俄国、保加利亚等具有不太发展的资产阶级和半手工业式的工人阶级的落后国家。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在这些国家工人运动中并没有马上取得支配地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仍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在德国是拉萨尔主义、在法国是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在意大利是马志尼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等。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功绩之一，就是使这些实际情况极不相同的国家的工人运动，逐步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化。

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化和通俗化

马克思主义同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首要条件是在各国广泛传播。除了来自各国反动政府的查禁、封锁，以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歪曲、污蔑外，从马克思主义自身来看，这方面的障碍大致有：(1)语言问题。据统计，尽管马克思的全部手稿采用过多种文字（其中德文占60%，英文占30%，法文占5%，其余的为希腊文、意大利文、拉丁文等），然而其一些主要著作(《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的原文均为德文。这就给其他一些国家的读者(尤其是不同语系的)接受马克思主义造成了困难。(2)通俗化问题。马克思主义集人类文明之大成，博大精深。即便是具有很高文化和哲学素养的人，也不易真正领会（自然这里还有阶级立场问题)。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来说，显然需要更为通俗易懂的解释。(3)具体化问题。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高度，深刻阐明了工个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但是，要指导不同国家的革命实践，还必须把这一理论具体化，制定适合各国国情的革命战略策略，尤其是工人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只有克

服上述障碍，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各国扎根和发展。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主要表现是：翻译、编辑和出版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鼓动力的阐发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通俗性小册子；探索和阐发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策略理论，起草和制定有关政党的纲领；批判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错误思潮，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重大原则。这里，我们先侧重介绍他们在出版和著述方面是如何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紧密联系自身的世界观改造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是他们活动的特色之一。无论是翻译、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遗产，还是撰写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通俗作品，都和清算自己过去的理论信仰有着直接联系。普列汉诺夫于1881年底开始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俄文，而这正是他的世界观发生决定性转折的标志。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过程，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克服自己的民粹派观点的过程。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关于我自己，我可以说：阅读《共产党宣言》构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时代。我被《宣言》所感奋，并立即决定把它译成俄文。当我把自己的意见告知拉甫罗夫时，他对此抱冷淡态度。他说：'当然，也许应当翻译《宣言》，但如果您自己写点什么，也许会更好些'，我却并没有急于先写自己的东西，而是宁愿首先翻译《宣言》。"①在普列汉诺夫的影响下，"劳动解放社"把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列为自己的两大任务之一，并于80年代翻译和出版了一系列这方面的著作。拉法格在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流亡西班牙，开始同蒲鲁东主义彻底决裂，便努力促使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在西班牙翻译出版。他在西班牙寄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说："蒲鲁东的那一套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他的那本书（指《贫困

① 《普列汉诺夫文学遗产》文集第8卷，第1部分第17页，转引自《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册）第354—355页。

的哲学》——中文版译者注）是这儿公认的具有社会色彩的书。我已拿到了解毒剂，我要西班牙人服下这剂药。我已经同梅萨商洽好了，叫他翻译《哲学的贫困》，由他去负责出版。这本书无疑会产生效果的，而且将为《资本论》的出版铺平道路。"① 考茨基在1884年同伯恩施坦一起，把《哲学的贫困》由法文译为德文，也正好是这一年，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转折点。

此外，他们转向马克思主义后所撰写的第一部著作主要也是清算自己过去的理论信仰。例如，1886年秋，拉法格在《左翼报》上发表的题为《社会斗争》文章，可以称作他的第一篇马克思主义著作。该文详细地摘录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文，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的同时批判了蒲鲁东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幻想。普列汉诺夫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是1883年夏天写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他在书中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原则区别，首次论证了在俄国建立工人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给予民粹主义思想以沉重的打击。不难看出，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坚定信仰和深入理解的基础上，是他们"以教授式的认真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后的自觉行为。在这方面，拉布里奥拉更为典型。为了完整理解马克思的学说，他花了很多钱和想了种种方法去搜集第一手材料，用他的话来说，他为了找到某一期《新莱茵报》而"花费的时间远远超过研究古代埃及历史的全部资料！"这正是他们的宣传所以卓有成效的基本前提。

他们的出版和著述活动的另一特色是，完全根据工人切身利益问题和工人运动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活动。梅林曾自豪地声明："我的荣誉和幸福，就在于我是党的作家！"他们的许多有影响的作品，都是直接受马克思恩格斯或工人阶级政党的委托而完成的。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爱尔福特纲领解说》，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传》

① 《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页。

等。至于拉法格，由于其革命活动同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二国际（主要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有直接联系而被法国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讥为"普鲁士的代理人"。① 不仅如此，在编辑、整理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时，他们首先考虑的也是工人运动的需要。1890年，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针对德国党内拉萨尔主义有蔓延趋势，在恩格斯的倡导和推动下，考茨基顶住了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强大压力，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为后来的《爱尔福特纲领》的正确制定铺平了道路。②

1895年，鉴于第二国际内许多人对马克思恩格斯所实现的哲学变革了解甚少，梅林建议出版马克思的遗著。在恩格斯去世后他单独承担了这一重任，于1902年出版了四卷本的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的早期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在《莱茵报》、《德法年鉴》、《新莱茵报》、《德法报》上的文章，以及像《神圣家族》这样有价值的著作。这对于当时正在全面展开的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帮助。③ 梅林本人十分中肯地说明了出版这部著作的意义："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根源，就是揭穿了所谓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说法是毫无根据

---

① 法国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吉约对拉法格等用以下方式进行了攻击："自从我国的社会主义者从普鲁士人那儿贩来了社会主义理想以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们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做一个德国人，认为按照德国人的方式进行思考、交谈，认为有像保尔·拉法格先生之流的马克思的女婿们作为自己的领袖，是一种光荣。"

② 长期以来，理论界对考茨基在发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表现的评价是不公正的，认为他实际上站在拉萨尔主义一边，只是迫于恩格斯的压力才不得不发表。事实上，正如恩格斯评价的，他"在整个事件中一直表现得很勇敢"。

③ 这部著作的编辑也反映了梅林的一贯错误，即把拉萨尔同马克思恩格斯并列为科学社会主义三大奠基人。因此，该著作的书名是《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斐·拉萨尔遗著》。尽管如此，它的作用是如此巨大：列宁就是用这部书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的策略。参见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的。"此外，针对第二国际领袖们轻视哲学理论的倾向，应考茨基的请求，普列汉诺夫专门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撰写了一组文章，论述法国唯物主义者以及马克思的哲学同他们的观点的联系。这组文章后来以《唯物主义史论丛》为名于1896年出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理论兴趣和突出成就都毫无例外地主要集中在历史唯物主义及与之相关的科学社会主义问题上，因为这正是各国工人运动发展所最迫切需要的指导性理论。一方面，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流派均把历史唯物主义诬蔑成"宿命论"，另一方面，恩格斯通过自己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特别提醒马克思主义者注意研究各种意识形态及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

因此，关于历史的主观因素的问题，即关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活动，关于思想、社会意识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问题，在革命的工人运动中便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们在这一领域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其中最主要的有：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1892年），梅林的《论历史唯物主义》（1893），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历史观的发展》（1895年），拉布里奥拉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1896年），拉法格的《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9年），等等。它们后来均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在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①

他们在出版和著述方面活动的又一个特点，就是善于采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工人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他们善于运用各种实际知识和生动的例证（经济、历史、文学、美学以及现实生活中等各方面事实），进行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他们的许多著作具有"普及型"通俗小册子的特点，不仅适合知

① 例如，考茨基的书被译成18种文字，并被看成社会民主党的必备读物。毛泽东同志就曾说过，在他最初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就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一书在当时的中文本译名）。

识分子，而且适合具有初步文化知识的先进工人阅读。他们在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有三项。

（1）出版马克思恩格斯一些主要著作的普及版及有注释的读本。例如，考茨基于1914年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普及本(通称为考茨基版)，普列汉诺夫对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所加的注释，梅林为自己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遗著所加的导言、注释等。

（2）发表通俗介绍马克思个人及其基本思想的著作。例如，梅林经过25年时间收集资料而写成的《马克思传》，生动地再现了马克思的革命活动和基本思想，至今仍是最好的马克思传记读本；考茨基根据恩格斯关于"出一本新的、通俗的、简短的（篇幅比杰维尔的少一半）阐述剩余价值理论的著作"的意见而撰写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受到了恩格斯的较高评价；拉布里奥拉撰写了《纪念共产党宣言》，梅林认为，"就通俗易懂而又透彻明了地介绍《宣言》的丰富思想这一点来说，他的著作可以同恩格斯那本关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小册子媲美，而在其他方面还有其独到的见解。"

（3）编写便于讲授、演讲的宣传材料，并开展形式多样的传播活动。梅林编写了第一部关于德国史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校教了五年德国史；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都参加了本国工人阶级政党党纲的制定和宣讲活动①；拉法格被列宁誉为"马克思主义最渊博的传播者"，是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通俗作家。"拉法格通过报纸、传单和在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说的方式，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工作。面对着令人震惊的现实中的种种事实，拉法格在辛辣的抨击性文章中，在通俗的科学

① 由考茨基起草理论部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爱尔福特纲领》具有巨大的宣传意义。列宁认为："这个纲领的每一条都包含有数十万篇鼓动性的演说和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3页。

性谈话中，以生动而往往又是形象化的、令人难忘的方式，以尖刻的讽刺，以充满热情的激动人心的幻想，揭露一切'永恒'真理，一切'黄粱美梦'，同时面对着最近将来的力量，运用自己的全部知识，施展自己的一切才干，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灌到无产者的头脑中去。"① 需要指出，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卓有成效，并不因为仅仅采用了易懂的方式重复马克思的思想，而在于创造地阐述，引用新材料，进行独立思考，自觉作出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致的结论。

二 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理论的探索

正确的革命战略策略思想，是工人阶级政党制定行动纲领、组织和发动本阶级群众深入开展革命活动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中介。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为此而进行的种种探索，是他们更为重要的理论贡献。他们的主要功绩有：(1)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揭示和阐明本国发展的具体历史过程和目前的社会性质；(2)正确说明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相互关系，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活动确立科学的指导思想；(3)参与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纲领的制定，明确规定党的战略任务和近期活动策略，等等。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具体说明各国历史发展，是确立正确的革命战略策略的前提。他们为此倾注了大量的活动。梅林通过《德国史》，提供了德意志民族形成过程的简明而极为生动的概貌，通过《莱辛传奇》揭示了勃兰登堡——普鲁士国家的产生过程。这就为工人阶级正确认识19世纪末的德国社会奠定了基础。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在这方面的努力更为可贵。大家知道，尽管资本主义也已在那里发展起来，然而他们的国家毕竟处在远比英法德落后的历史状况中。正如拉布里奥拉所指出的："一个现代国

① 转引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34期第15页。

家如果处于一种几乎单一农业的社会，处于一个农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落后的国度，那就会更加令人普遍地感觉到各种艰难困苦。"①因此，他们的任务就不仅是一般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而且要通过具体分析本国的特殊性，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此，"人们首先必须了解每个历史时代所特有的经济，以便准确地区分在每个历史时代中发展起来的各个阶级；人们必须避免不可靠的假想，并且不要把我们所特有的情况硬塞给每一个历史时代。"②他们所遇到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像意大利、俄国这样的国家，是否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否已成为这些国家社会生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们(例如民粹主义)，正是借口本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农民占优势，农村公社残余的存在等等)，似乎资本主义道路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者依据某种宿命论观念的臆造。普列汉诺夫则根据俄国的大量材料证明："一国历史的任何特点都不能使该国逃出一般的社会学规律的作用"，俄国的资本主义正在发展。同时，他也指出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特点："我们不应当忽视的是这样一种极为重要的情况，即我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在资本主义刚萌芽的时候开始的。俄国历史发展的这一特点并不是斯拉夫派或斯拉夫派化的革命家所臆造出来的。它是无可争辩的和尽人皆知的事实，这一事实将给我国工人阶级的事业带来极大的好处。只要俄国社会主义者不枉费自己的智力和精力去建立像封建一市民会议时代那样的空中楼阁"。③为了避免任何形式的空想和臆造，必须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运用于解释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社会发展过程。他明确指出，在俄国，首先发生的将是资产阶级

---

① 安·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36页。

② 同上，第49—50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110页，第314—315页。

革命，然后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将成为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序幕。他写道："想把像推翻专制制度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种实质上不同的事情联结为一，想在进行革命斗争时把社会发展的这两个环节在我国历史中合而为一——这等于把前者和后者到来的时刻都推迟。但是使这两个时刻彼此接近是取决于我们的。"① 这些富有创造性的分析对于推动各国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尤其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相互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同工人运动中的"自发论"倾向（后来由伯恩施坦系统地加以鼓吹）的斗争中，突出地强调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普列汉诺夫把创建工人阶级政党看作工人阶级解放事业成败的关键。他指示："尽可能迅速地组成工人党，是解决现代俄国所有经济和政治矛盾的唯一手段。在这条道路上等待着我们的，是成功和胜利；其他道路只有导向失败和软弱无力。"② 但是，工人阶级政党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为工人阶级革命斗争指出正确的方向，从而使这一斗争具有自觉的性质；而党的预见性和力量则在于它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并能用这一世界观教育和武装全体工人群众。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是什么关系？如果马克思主义是工人运动自发产生的，那就用不着党去"教育"；如果工人运动不能自发产生马克思主义，那么后者为什么又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

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作出了突出贡献的是考茨基。他指出："有许多人以为马克思似乎曾经断言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不仅造成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且还直接产生认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332页。

② 同上，第401页。

识到社会主义生产的必要性的意识"，这是一种曲解。① 他认为，尽管社会主义的科学学说和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然而两者"是并列地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从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方面看，"工人运动产生社会主义本能"，"而使这种本能变成明白的意识所必需的理论意识并不是从无产阶级队伍中间产生的，因为无产者没有产生这种认识所必需的进行科学工作的一切条件"。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方面看，它"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因此，"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代的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的人物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个学说不交给无产阶级群众，"这些理论就始终会是一些平常的理论"。由此产生了两者结合的必然性，而结合的纽带则是工人阶级政党。他指出："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能够成为更自觉和更合目的的斗争，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识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任务的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② 这些思想后来为列宁所接受并加以发展。③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从理论上阐明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并且积极地与党内企图否认或削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倾向进行了斗争。例如，拉布里奥拉在 90 年代同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屠拉梯等严重冲突，主要原因就在于前者要

① 考茨基在这里主要针对1901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党纲草案中的下述观点，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是使无产阶级的数量增加，无产阶级也就越是不得不进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且也越有可能来进行这个斗争，无产阶级就会意识到社会主义有实现的可能与必要。因此，社会主义的意识就是无产阶级斗争必然、直接的结果。"

② 考茨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的修改》。

③ 苏联某些学者制造列宁和考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对立，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参看〔苏〕布拉伊奥维奇：《考茨基：其观点的演变》）

使党的理论基础成为严格马克思主义的，而后者则借口团结各种不同的派别而不惜去寻求思想上的妥协。拉法格在揭露那些不想把自己同“马克思主义学说”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者”时指出，不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为了维护法国工人党的马克思主义纲领，他在1880年与党内“温和派”（“合作派”、工会主义者、实证主义者等），1882年与以马隆、布鲁斯为首的“可能派”都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②]至于他们后来从不同侧面对伯恩施坦展开的批判，更是捍卫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突出表现。

党的纲领是革命战略策略思想的具体体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制定正确的纲领，是促使马克思主义同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关键。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都有重大的贡献。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创建最早、影响最大的工人阶级政党，《爱尔福特纲领》是该党第一部完全肃清了拉萨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考茨基对这一纲领的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参与了纲领制定的整个过程，而且直接起草了纲领的理论部分。其主要内容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发展进程的评述；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在《共产党宣言》之后，这是第一个提出关于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通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对资本主义社会实行彻底改造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纲领。同时，它根据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把这一原理加以具体化，制定了正确的策略思想。它不仅代表了当时德国工人党沿着革命道路向前发展的最高成就，而且代表了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最高成就。因此，它得到恩

---

① 恩格斯对此作了如下评论：“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是应当把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应当像机会主义者（翻译成社会主义者的语言就是：可能派）那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就可以把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都丢开不管？马隆和布鲁斯赞成后一种做法，从而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性，并且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80页。

格斯和列宁的肯定,[1]并成为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制定纲领的楷模。[2]

和考茨基一样,拉法格于1880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和盖得一起拟定了法国工人党的纲领(其中导言部分是马克思写的)。但是,除导言外,纲领的其余条款中还有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某些残余。1883年拉法格在狱中为这个党纲的理论部分写了注释,它基本克服了党纲中的错误观点。对于在法国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起了重大作用。普列汉诺夫分别于1883年和1885年为"劳动解放社"起草了两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这两个草案还残留着革命民粹主义者的一个错误,即认为必须以恐怖手段对待专制主义,此外,还过于公式化。但是,它毕竟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实际的初次尝试。尤为可贵的是,纲领突出地强调了俄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而这个问题在后来的俄国革命(1905年)中充分显露了出来。[3]所有这些努力,促使各国工人运动逐渐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划清了界限,促进了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

三 批判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错误思潮

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和发展,一方面迫使资产阶级思想家

---

① 恩格斯对纲领的理论部分表示赞许,他写道:"我们感到满意的是,马克思的批判发挥了充分的作用。拉萨尔主义最后的残余也已肃清。""不管怎样,纲领的理论部分现在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50页,第234页。至于列宁的评价,参阅《列宁全集》第4卷第206页。

② 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塞尔维亚等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都是按照爱尔福特纲领的榜样制定的。

③ 列宁在评价普列汉诺夫1885年党纲草案时写道:"这个纲领的错误在于太抽象,对问题没有任何具体的看法。说实在的,这不是什么纲领,而是一项最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宣言。但是纲领起草人阐述这些著名的原则,是远在工人政党成立之前,又是初次尝试,因此把这个错误推在起草人身上,当然是很荒谬的。相反,应当特别着重指出,这个纲领早在俄国革命爆发前20年就已经肯定农民改革与业必然要进行'彻底的改变'。"(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第235页)

改变了反马克思主义策略，他们由不屑一顾的“沉默”或明火执仗的“批判”，越来越多地转向所谓“公正客观”的研究，甚至或多或少的“接受”；另一方面，在公开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中，认识十分肤浅甚至根本错误的为数甚多。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工人运动内部的思想斗争。从19世纪八九十年代到20世纪初，为工人运动内部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派别提供思想武器的哲学思潮主要有：经济唯物主义，新康德主义，庸俗进化论以及实证主义。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上述哲学思潮的批判中，尽管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仍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梅林尤为突出，他因而获得了“不调和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荣誉)

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看成“经济唯物主义”或“经济历史观”，甚至公然地赋予“宿命论”的意义，这是当时对这一学说极为普遍的曲解和误解。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澄清这一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分析。按照恩格斯的看法，梅林是第一个在这方面采取了实际行动的人。他先是回击了资产阶级评论家保尔·巴尔特以批判“青年派”为借口指责马克思主义否认思想作用的恶劣行径，指出：“保尔·巴尔特的论述完全是形而上学的，而不是辩证的，因为他把原因和结果理解为僵死的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其间的相互作用。请问，历史唯物主义什么时候否认过这样一点：当一种历史现象一旦由于另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原因而形成的时候，它也要影响周围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随后，他又回击了伯恩施坦认为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违背了马克思的决定论的指责，明确提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争论的实质并不在于对决定论采取何种态度，而是要看如何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绝不认为，人类是无意志的玩物。它决不否定思想的作用”。[1] 更重要的是，梅林通过

---

① 考茨基后来也对伯恩施坦作了类似的批判。

他对德国历史卓有成效的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形式、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作用等问题的理解具体化了。恩格斯对他这方面的努力做了如下的肯定："您的巨大功绩是，您在普鲁士历史这一摊污泥浊水里清出一条路来，并指出了事物的真正联系。"① 普列汉诺夫在这方面的批判更富有哲学色彩和理论深度，他反覆强调了以下关系。(1)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某种经济能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观？不能，只有通过政治斗争。为了保障经济的利益，政治斗争是必要的"；"经济几乎永远不会自然而然地取得胜利，……而是永远必须通过上层建筑，永远必须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② (2)人和规律的辩证关系。他论证道："社会发展规律，如果没有人的中介作用，很少能够实现，正如同自然规律如果没有物质的中介作用也是很少能够实现的一样。但这完全不是说'个人'就可以忽视社会发展的规律了。如果忽视的话，他至少要受到这样的惩罚，即变成可笑的唐·吉诃德。"③ (3)革命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辩证关系。在这方面，他批判了伯恩施坦强加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革命只是普遍经济危机的结果的观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强加的关于资本主义自动崩溃论，司徒卢威臆造的关于革命仅是工人阶级的极端贫困化状况的结果等，强调革命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是有密切的相互关系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④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普列汉诺夫等对革命的主观因素(尤其是工人阶级政党的能动作用)仍然估计不足。

在把"宿命论"强加给马克思的同时，资产阶级学者以及工人阶级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提出了"回到康德去"的口号。他们否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鼓吹形而上学的折中主义和"伦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64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37页。

③④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选集》第1卷，第95、547页。

社会主义”原则。梅林及时地看出了新康德主义的危险性，指出它“在客观和实质上只是一种想摧毁历史唯物主义的企图”。①他对这个流派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柯亨、纳托尔普、施塔姆勒)及新康德主义化了的修正主义者们（伯恩施坦、鲍威尔、施陶丁格尔、沃伦德尔、麦·阿德勒)的观点进行了批判，重点是所谓“伦理社会主义”。他认为，用康德的无上命令代替科学社会主义，从中“推演”出社会主义并用之武装工人的企图，“同荒谬可笑只有一步之差”，它丝毫无助于论证社会主义。梅林敏锐地觉察到了“回到康德去”背后的折中主义和怀疑主义倾向。他指出：“谁想越过马克思主义，而又不想直截了当地回到资产阶级世界，那他不是陷入折中主义就是陷入怀疑主义——陷入折中主义，就是说他用从各处凑集起来的材料建立起一种新的理论，而这种理论的坚定性只能与一座纸房子相比；陷入怀疑主义，就是说他在马克思的每句话后面打上一个问号。”

拉布里奥拉的特殊功绩在于他第一个注意到“历史因素论”这一折中主义的新变种。他认为，“因素论”是一种打着全面看待社会的幌子而机械地把社会的各种不同方面结合起来的错误见解，但是，“光是否定错误见解是不够的，应当对它作出正确的说明，从而战胜它和根除它。”②他指出，从认识论根源上看，它处在认识的这样一个阶段，即这时科学所需要的只是对事实作初步的、经验的分类，而无需深入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因此，“历史因素论……归根到底是某种真理甚少而迷误甚多的东西。因素是处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科学的必然成果。”“无论因素论当时是怎样合理和适用，但是今天却经不住批判”。③这种对人们认识社会方式的辩证分析，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富有创造性的阐发。但是，

---

① 《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26页。

②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81页。

③ 同上，第87页。

总的看来，他们对认识论领域的原则斗争重视不够。

否定辩证法，鼓吹折中主义，根本目的是否定革命，鼓吹社会改良。在这方面，庸俗进化论打着达尔文"进化论"的科学旗号，起着特别恶劣的作用。它的实质是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拉布里奥拉清醒地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写道："政治的和社会的达尔文主义许多年来像瘟疫一样控制着一些研究工作者和更多的律师和高谈阔论的社会学者的头脑，而且最后甚至像时髦或流行病那样影响着政治实践家的日常语言。""其实这种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是滥用类比和匆忙下结论。"① 他和梅林都特别强调了人和动物、社会和自然的区别。拉布里奥拉在叙述了人类创造自己历史的过程后指出："可见，没有任何理由把构成历史的人的这种创造活动归结为单纯的生存斗争。"② 梅林证明了借助从自然科学领域中因袭来的范畴和概念来解释社会现象的荒谬性，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所遵循的规律与自然发展所遵循的规律不同。"③拉法格在英国的《进步》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的文章，证明资产阶级思想家从达尔文的思想中引出了反科学的结论，因而受到了恩格斯的赞许。普列汉诺夫从辩证法的角度论证了飞跃的客观性和必然性，驳斥了司徒卢威等否认社会革命的可能性，鼓吹从资本主义逐渐"长人"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观点。他指出："就理论方面说，司徒卢威先生所拥护的进化论，如我们所知道的，有一种根本的缺点，就是在它里面只有为已发生的物的变化留有地位，而没有为新物的发生留地位。"④ 他认为革命之所以是必然的，就因为"逐渐积累的数量

①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64页。

② 同上，第67页。

③ 梅林在这里似乎把两者的区别夸大了。他在同一页还写道，社会科学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的方法之所以不同，"正是因为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自然发展的规律不同"。见《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49页。

④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697页。

变化，最后转变为质的变化。这些转变是以跳跃来完成的，而且不能以别一方式完成。"①一般说来，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时期，其社会革命思想还是明确的，同社会改良主义的斗争也很有成效，但对这股思潮的哲学世界观的分析则略嫌不足。

庸俗进化论的世界观基础主要是实证主义。它混淆哲学和实证科学的区别，以对具体事实的归纳和解释代替对其普遍本质的揭示；它以反对"形而上学"为名，力图剔除辩证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灵魂。伯恩斯坦断言，正是辩证法导致了对社会生活的随意解释，它是马克思主义中的"背叛成分"。麦·阿德勒宣布辩证法只是"思维方法"中的一种，只是诸种"探索和评价的方法"中的一种。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自身对辩证法认识的欠缺，在这种拋弃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实证化的浪潮袭来时，反击得并不十分有力。其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只有梅林和普列汉诺夫。②梅林是继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第一个强调辩证法方法对于认识历史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人。他认为，辩证法乃是对革命斗争的理论论证，没有它"就既不能创造历史也不能描述历史"。因此，"我们应当学会辩证思维，懂得辩证思维规律的人以完全另外一种方式来研究现实的辩证法，他不同于那些对各种事实之间的真实的相互关系没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之前一直为难以理喻的事实而大伤脑筋的人"。③拉法格站在辩证发展观的立场上，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29页。

② 诚然，考茨基也批判过伯恩施坦反对辩证法的言论，强调辩证法是从事理论研究最好的工具和最尖锐的武器。但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世界观方面在辩论中实际上只限于引证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这同他自身世界观的实证主义倾向不无关系；拉布里奥拉也用辩证法同实证主义者的庸俗进化论相对立，并不止一次谈到过矛盾、转化、辩证灵活性等等，但他把辩证法理解为思维的表达方式，而不是发展的一般规律，实际上没有把握住辩证法同具体科学方法的区别。

③ 梅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若干意见》，转引自《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册）第258页。

对孔德排除飞跃式转化，否认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所谓“进步律”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并强调了没有质变、革命便没有社会进步的观点。①普列汉诺夫是他们当中对辩证法懂得最多的人。他认为矛盾规律是发展的普遍规律，它不仅与过去有关，而且与现在和将来有关；在他的著作中有不少关于否定之否定、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以及真理是具体的，它依赖于时间、地点和条件等深刻思想；他注意把矛盾规律和量变质变规律运用于分析社会历史和革命运动；他“为了通俗化”而引用了大量的实例，证明在自然界和社会的现象中存在着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他不止一次提到关于认识的辩证法，认为矛盾到处都引向前进，包括认识过程在内，也由矛盾推动人的认识走向客观真理等等。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得尤为可贵。但是，他仍不懂得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主要规律，不善于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没有把辩证法的思想片断发挥成完整的辩证逻辑范畴体系，而其大量列举实例也造成了辩证法是实例的总和的印象。所有这些，使得即使是普列汉诺夫，对实证主义和庸俗进化论的发展观的打击仍然是不力的。

综上所述，经过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的多方面努力，马克思主义朝着和各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大大迈进了一步。这就为新的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创造了条件。

第三节　巩固和拓宽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思想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革。毫无疑问，它的生命活力在于和人类的实践、首先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这一过程的展开表现为两个共时性

① 但是，拉法格似乎混淆了量变和质变的界限，把量变阶段的新质要素看成新质的完整形态，从而把质变的意义绝对化。

的侧面：一方面是理论经过实践不断地转化为现实，即理论的对象化；另一方面是现实中的必然联系经过思想加工而不断地转化为理论，即现实的抽象化。如果说，我们在上一节是着重介绍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前一个侧面，那么我们在这一节则着重介绍它的后一个侧面。这一侧面其实也包含着双重内容：一是从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出发，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新进展丰富和发展理论；二是从各门具体科学的实际特点出发，在深入研究这些学科基础上作出的新哲学概括，从而丰富和发展理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没能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具有重大突破的创造性发展，然而毕竟在考察和回答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所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中，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和探索人类的各种知识领域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巩固和拓宽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完成的伟大革命变革的思想成果。

一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补充和完善

继恩格斯之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在理解程度上不一致，但都把马克思学说的形成看作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成果。其中，对马克思、恩格斯所实现的革命变革的哲学意义理解较为完整、注意和强调也最多的，要数普列汉诺夫。正是他指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现，是人类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真正的革命，是最伟大的革命。"①他认为，保卫这一伟大革命的思想成果的最好方式，是继续把它推向前进，用新的思想成果加以充实和完善。他写道："为确定新学说的一些基本原理，必须继续对与之有关的问题的细节进行研究，即是补充和完成《共产党宣言》作者们在科学中所实现的革命的那种研究。"②对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他们所继续进行的这种研究是极其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07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0页。

广泛的。如果在这里暂时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范围内（不包括它在各门学科中的分支），那么，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两类问题：一是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学说时所必须首先突出强调的重点比较而相对忽略了的问题，由此从结构上补充和完善理论体系；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由此从过程上补充和完善理论体系。第一类问题大致有：意识形态的结构及各种意识形态具体形式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和经济条件的辩证关系；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等。第二类问题大致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社会主义思想史，工人阶级政党史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个人传记等。

关于意识形态的基本结构和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已作过深刻的分析。但是，一方面由于他们与此相关的许多重要著作(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并不为世人所知，另一方面囿于具体材料不足而没有对一些具体的意识形态形式(例如原始宗教)作出详尽分析，因而使得关于各种意识形态形式如何从经济条件产生的一些中间环节的分析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对马克思主义作“经济决定论”曲解的普遍倾向的出现，不能不说与此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贡献是：(1)把对社会心理的分析引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2)依据一定的客观标准划分意识形态的层次性；(3)具体阐明意识形态各种形式的起源及变化规律。

他们首先注意到，要说明意识形态诸形式的形成以及它们同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不能忽视社会心理这个环节。拉布里奥拉第一次把这一概念引进马克思主义。他认为，解决物质的东西和观念的东西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必须“研究概念和知识的这样一种综合体，这种综合体可以被称之为（由于缺乏其他术语）社会心理学”。① 但是，在他那里，社会心理与意识

① 见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62页。

形态的区分尚不十分严格。普列汉诺夫的研究大为前进了一步。他在其著名的社会结构“五要素”公式（生产力、经济关系、政治法律关系、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中，明确区分了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概念，并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第一次提出了两者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归根到底是从基础的变化中成长起来的社会心理，逐渐成为道德、艺术等意识形态之间的中间环节。因此，要了解某一国的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①] 他把社会心理看作人的心境的所有形式，包括情感、意志、愿望、本能的东西和无意识的东西等，认为它们在意识形态的形成中全都起着一定的作用。不仅如此，尽管社会心理最终取决于特定的经济关系并因而具有阶级性，但“心理的‘因素’影响着社会的（从而影响着经济的）关系”。[②] 因此，“唯物主义者绝不否定心理的意义”。

他们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试图具体分析意识形态的结构。在他们看来，根据对经济关系的依赖程度和相对独立性的大小，意识形态是有层次性的。拉布里奥拉把艺术、宗教和科学称为经济基础的“第二层次产物”，指出它们在很大的程度上还存在着对于自然因素的复杂依赖关系，因而和国家、法、道德等现象有着重大差别。普列汉诺夫的区分更为精细，他把政治、法律列入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第一级序列，把科学和道德列入第二级的序列，而把哲学和艺术一起列入最高级序列的上层建筑形式，由此便提出了社会意识的各种不同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他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要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其他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法律起初是服从于宗教的，以后——例如在18世纪——它受到了哲学的影响。”[③] 这样，尽管意识形态的发展归根到底必须由经济关系的发展来加以说明，然而它毕竟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72页。

② 同上，第556页。

③ 同上，第326页。

有着自身的特点，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公式去套。"在思想的历史上，有时宗教占第一位，有时哲学占第一位，有时政治占第一位，等等，在什么都没有搞清楚的威胁下，务必记住的就是这样"。

因此，揭示具体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形成原因，就是十分复杂的课题。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作出了创造性贡献。考茨基对早期基督教的形成和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进行了有创见的研究；① 拉法格对希腊神话的起源及社会意义等作了精辟的分析；② 拉布里奥拉着重考察了国家和法的一些具体历史形式的起源，提出了许多新鲜见解；③ 梅林在这方面的独特贡献在于对德意志国家以及德国古典文学形成和发展的研究，他成功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是促成国家统一的根本原因，并把克劳普什托克、文克耳曼、海德、席勒和歌德的作品评价为年轻的德国资产阶级解放愿望在思想艺术上的表现。普列汉诺夫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道德、宗教、艺术等社会意识形式的起源和相对独立性。他并不仅仅把宗教归结为意识形态的领域，而且还看到了宗教的心理方面，以及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活动的组织程序；④

① 例如，考茨基在对早期基督教的研究中提出了若干同恩格斯不同的观点。他不同意恩格斯关于原始基督教是一种包括奴隶在内的被压迫者的宗教，认为"基督教决不能称为一种奴隶的宗教；它对于奴隶，是没有作出什么来。"还认为，"为基督教所公布的对不幸者的阶级，最初是很物质的，其实是在地上，而不在于天堂"，从而不赞成恩格斯关于基督教总是把被压迫者的拯救"寄托于死后的天堂之一种将来的生活"的论断。参见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中文版，第470页，第388页。

② 他在这方面的作品有：《关于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关于潘多拉的神话》、《亚当与夏娃的神话》、《关于贞洁的受孕的神话》等等。

③ 例如，他在分析自然法的产生时，除了分析其阶级基础外，还详细分析了它同罗马法及古希腊哲学的关系。参看《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113—117页。

④ 他给宗教下了个全面的定义："宗教是观念、情绪和活动的相当严整的体系。观念是宗教的神话因素，情绪属于宗教感情领域，而活动则属于宗教礼拜方面，换句话说，属于宗教仪式方面"。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363页。

因此 他不仅考察宗教观念的起源，还把宗教仪式的创立归结为“由人们对神们或神的关系所引起。这些活动的总和就称之为宗教仪式”。关于艺术的起源，他认为，实践和艺术的最接近的联系仅存在于人类社会的第一阶段，而且甚至原始的艺术与经济的联系也并不总是直接的：“往往在那里发生作用的是相当多的和各种各样的中间‘因素’。可是，甚至一个间接的因果联系也依然是因果联系”。① 他还驳斥了把道德的起源和宗教观念相联系的观点，指出：“在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上，人们的道德观念并不依赖于他们对精灵的存在的信仰”，② 而是在人们之间现有的关系基础上产生的。它既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又是社会关系的特殊形式。所有这些，都大大地充实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

19世纪末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逐渐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问题突出了。按照恩格斯这一时期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书信的思想，他的学生们进一步深化了这方面的认识。考茨基在阐发恩格斯关于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只能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加以理解这一观点时，试图具体阐明各种“中间环节”的特定作用。他认为，法律是生产方式的“润滑油”，“它的生命力在于尽可能减少经济机构中的摩擦所造成的阻力”。思想是“社会进步的媒介物”，“社会是不能自动适应新的生产条件的，这需要有能够思维的人的理性作媒介”。作为一定时代人们思维方式和意愿要求总体的“时代精神”，“形成社会发展的火车头”，而“物质关系”是“发动这个火车头的原动力”。③ 拉布里奥拉从“实践哲学”（他认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的观点出发分析了思想的能动作用。他认为，“思维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努力，换句话说，是一种新的工作”，即借助一定的方法论手段对“清除了经验”的材料所做的工作。

---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430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60页。

③ 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

在实践中，事物不再是“探讨的生硬客体”，思想也不再是事物的“前提或预报”，而成为“具体的东西”，以至两者密不可分。普列汉诺夫明确提出了历史过程中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辩证法问题。他认为，如果把人们之间必然形成的客观经济关系看作社会生活的客观方面，那么，“人的生活的主观方面，正是心理的方面，‘人的精神’，人的情感和观念”。[①] 他指出，社会的心理固然要适应于它的经济，但是，经济关系的变化必然反映在人们的心理上，而心理的进化却恰恰发生在经济的革命之前。社会心理对经济的重大作用就在于它成为这样那样的阶级斗争渗入其中的形式。意志、信念、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的表象和类似的心理组成部分总是或大或小地影响着阶级斗争的结果。他还特别强调了政治对于经济的积极作用，认为生产关系的巩固或改变，都必须借助于阶级的“政治因素”（国家、政治组织、政党等）。

此外，他们都毫无例外地看到，社会生活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这种相互作用必须以人为中介。因此，正确地评价人的活动，尤其是个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就成为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拉布里奥拉从矛盾的辩证转化方面充分肯定了个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他指出：“矛盾、对立、斗争、战争构成整个历史的基础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一定的人在一定的情况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错综复杂的对立条件本身导致某些天才的、英雄的、走运的和罪恶的个人在危急的时刻应运而生，说出决定性的话。”[②] 考茨基把恩格斯关于历史发展必然性（客观规律）和偶然性（思想动机、具体事件）的辩证法，运用于分析历史活动中的群众和个人的作用。他认为，历史研究的“范围越窄，在此范围内从事活动的个别人物就愈显得重要”，但是，如果把杰出人物“放到若干世纪的历史总关联里来看，他们之中就没有一个人具有什么重要性了，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186页。

②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139页。

他们每一个人都只不过是对历史过程的总结局不会引起丝毫改变的一段插曲而已”。[①] 他由此提出，分析每一杰出的人物的作用，必须寻求他生活其中的那种能把一般与个别联系起来的特殊条件，这种条件使之能最终超出其同时代人。他在具体分析空想社会主义始祖莫尔时，把其特殊条件归结为当时英国状况的特殊性和莫尔个人活动方面的特殊性。普列汉诺夫从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的角度，分析了个人的历史作用。他在反驳宿命论关于人是规律的奴隶时指出："既然我认识了这个铁的规律，那么推翻其桎梏就决定于我们，把必然性变成理性的顺从的奴隶亦决定于我们。”“当我无知的时候我是虫豸，可是当我知道的时候，我是神……”[②] 因此，虽然他们对于革命的主观因素（尤其是无产阶级政党）作用仍然估计不足，但还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中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观点。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相继去世，以及资产阶级思想家反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改变（从“沉默”到公开“批判”和“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平、著述及活动的研究的意义日益重大[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们看到了这一斗争的需要，[④] 他们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并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有：《社会主义史》（由考茨基、拉法格、梅林等发起编写）；考茨基的《马克思及其历史意义》、《恩格斯的生平和著作》；普列汉诺夫的《为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俄译本第一版所写的序言和

---

①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4卷，第1篇，第10章。

② 参看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等作品，在那里有对这个问题的完整分析。

③ 后来的事实表明，当代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专家力图从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夺走“马克思”这面旗帜。

④ 例如，普列汉诺夫在1891年就写到：“工人运动的巨大成就迫使那些所谓有教养的阶级关心作为这个运动的旗帜的那个理论，同时又迫使这些阶级关心这个理论的历史起源。”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70—471页。

注释》、《唯物主义史论丛》;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传》等。普列汉诺夫着重从思想发展的逻辑过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他成功地证明了:(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往人类思想成果的合理继承者;(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地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的学说。梅林着重从历史记述和传记写作方面,力图活生生地再现马克思的光辉生平。他的主要功绩在于,他是这批学生中唯一注意到并研究了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人。他通过自己的著作,努力揭示了马克思在创立自己学说过程中所经历过的世界观转变,以及这种转变的具体历史条件。① 考茨基主要从"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这一观点出发,力图以这一结合为中心线索来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史。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深刻的科学性和高度的革命性的统一,就在于它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英、法、德三个民族优秀思想成果的综合,以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此外,他还对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之一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作了具有独创性的分析。② 因此,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正是他们奠立了科学"马克思学"的基础。

二 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和开拓新的知识领域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

① 梅林认为:马克思确立科学世界观的道路,就是他从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概念的魔法下逐渐解放出来,用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去取代这些思辨概念,深刻认识经济过程是一切社会生活现象的最终基础作用的过程。这种认识既表明他抓住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又表明他把这种发展理解得过于狭窄(局限于社会现象研究方法的改革,而不是新世界观)。

② 例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乃是两种社会主义潮流的汇合:一方面是无产者对于其受压迫状态的本能的反抗,这种反抗往往发展成一种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另一方面是较上层阶级中受过科学教育的人道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社会从经济上所作的思想丰富的批判,其积极成果就发展成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参见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

一种方法，因此，他们都特别重视发挥其方法论职能。尽管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理解得比较偏狭，没有把它同时看作一种完整的哲学世界观，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把这一方法推广运用到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中。他们把这一运用看作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内容，以及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生动论证。对于随着资产阶级兴起才发展起来的人文科学各学科，他们几乎都用历史唯物主义认真地进行批判改造；对于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有直接影响的知识领域，他们都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属于前一类的学科主要有：美学，语言文学，伦理学，宗教学，历史学等。属于后一类的主要学科有：经济学，民族学，战争科学，人口学，社会生态学等。这样，通过不断扩展唯物史观的研究领域，他们从又一个方面直接推进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完成的革命变革，并因此而奠立了一系列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新学科问世的基础。

尽管近代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是以批判宗教神学开路的，但是，这一领域从根本上说，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天下。仅仅从宗教观念中引伸出其世俗内容(如费尔巴哈等所做的那样)，并不足以奠立批判宗教的科学基础。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1]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们把这一指示看作建立科学宗教学的根本方向，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考茨基主要通过基督教历史的研究，用阶级斗争和社会制度的性质去说明其演变规律。他认为，基督教的全部历史呈现出一种“辩证法的历程”，即“从共产主义而生，而现在却成为近代共产主义不共戴天的死敌之一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早期基督教是一种主要由当时的城市无产者为主体的被压迫人民反对奴隶制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

的共产主义运动，其后，虽然它获得了胜利的发展，然而“在它的胜利之道途中，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和慈善组织，渐渐变为世界的统治和掠夺的最厉害的工具了”。考茨基还从早期基督教的阶级根源中寻找其发生蜕变的原因，并借此反驳无政府主义断言现代共产主义运动也必然变质的论调。他认为，“今日之无产者与基督教起源时代不同”，他们“是一种劳动的无产阶级，它晓得一切社会都放在它的肩上”，而古代无产者则完全依赖于社会，其愿望中“没有劳动的位置”。因此，“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是一种财富‘分配’和‘消费’标准化的共产主义，而近代的共产主义则是财富之‘集中’和‘生产之集中’”，是一种新型的生产方式。[①]

和考茨基不同，普列汉诺夫主要依据某些新的民族志和历史材料，从一般理论上探讨宗教的起源和实质。他在研究中注意到：(1)原始宗教和对抗社会宗教的区别和联系；(2)宗教观念、宗教情绪和宗教仪式的区别和联系；(3)宗教和意识形态其他形式的区别和联系。为了反驳唯心主义的宗教观念，他着重考察了两个问题：(1)万物有灵论的起源；(2)宗教和道德的关系。他认为，万物有灵论是原始世界观的主要特点，“具有这种世界观的人把自然现象人格化。原始人以为这一切现象都是同他们一样具有意识、需要、爱好、希望和意志的特殊存在物的行动”。[②]由此构成了原始宗教的世界观因素。尽管宗教在任何形式中都保存万物有灵论，但是，宗教作为一定的社会体系，只存在于分裂为阶级的社会里，而“原始的宇宙起源论的性质一般地说决定于原始技术的性质”。[③]他还提出，道德最初并不依赖于万物有灵论的观念而存在，只是在人类文化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道德概念才与起着神的作用的关于灵魂的想象家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从这个时候起，人们才以为，道德是以相信神的存在为基础，如果这种信仰丧失，道德也就会随之

① 参见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364—365页，第471—478页。

② 参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365页。

③ 同上，第375页。

而丧失”。① 这就有力地打破了唯心主义把宗教永恒化的企图。

在美学及与之联系密切的文学领域，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表现得最为充分的学科，其美学原则的根本点在于把文学艺术看作绝对个人的创作领域。因此，关于美感，审美能力的起源和本质，是不同世界观在美学领域斗争的基本问题。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把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这个知识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普列汉诺夫在比较了文学艺术的各种派别后指出：“我深深地相信，从今以后，批评（更确切些说，美学的科学理论）只有依据唯物史观，才能够向前迈进。”他在考察审美观念的起源时，十分注意以下几点。

(1) 劳动在原始社会的艺术中，而后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在艺术和艺术的各种形式的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如果原始民族所拥有的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着他们所特有的装饰品，那么一个部落所使用的装饰品的性质就应该表明它的生产力的状况。”这说明了原始艺术对于劳动实践的直接依赖性。虽然由于社会的发展，这种联系变得十分复杂，但它还是存在的。“事实上，文明民族的艺术创作之从属于必要性，是不下于原始民族的艺术创作的。差别只在于，在文明民族那里，艺术对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直接依赖性消失了。当然，我知道这是很大的差别。但是我也知道，这种差别无非是由那促成各阶级间的社会分工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② 他因此批判了文德尔班把艺术和劳动群众相对立的观点。③

(2) 阶级斗争对于审美观念和艺术发展的作用。他提出，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09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427页，第441—442页。

③ 文德尔班在其著作《十九世纪德国精神生活中的哲学》中写道：“要知道，艺术按其最深刻的实质说很少接近群氓；它是个人的自然避难所。”普列汉诺夫反驳说：“在历史上这是不正确的。”

"在文明社会，优美艺术的进步决定于阶级斗争"。他认为，艺术和阶级斗争的这种联系在革命时期成为完全可以感觉得到的联系。"至于谈到法国革命时代的艺术，那末'无套裤党'把它引向一条这样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不会成为各高等阶级的艺术，艺术逐渐成为全体人民的事业"。①

（3）整个社会生活对审美观念和艺术发展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他指出，"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人的社会本性决定了审美情趣的形成，"人的本性使他能够有审美的趣味和概念。他周围的条件决定着这个可能性怎样转变为现实；这些条件说明了一定的社会的人（即一定的社会、一定的民族、一定的阶级）正是有着这些而非其他的审美的趣味和概念"。② 由此出发，他既反对美学研究中的社会生物学倾向，批判从人的各种生物学基础引出艺术的企图，也反对这一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批判在分析"社会等价物"中忘记它们的美学价值的态度；既反对否定社会环境决定性影响的绝对个人原则，也反对否定作家对社会环境积极作用的机械论倾向。③ 普列汉诺夫还全面而深刻地分析了黑格尔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的美学理论。

拉法格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他努力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和他的社会环境的关系，并把这一分析贯彻到对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中。他指出："艺术作品绝非是什么'特殊的奇迹……或神赐的显现'，就像没有重瓣的玫瑰和双头牛犊一样。作家同自己的社会环境溶为一体；不管他的意愿如何，他既不能割断也不能脱离周围世界，不管他自觉还是不自觉，他都不能不受其影响。不管

① 普列汉诺夫《文学和美学》俄文版第1卷，第38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320页。

③ 例如，他认为："一个作家不仅是推动他的社会环境的表现者，而且是它的产物……他给文学注入他对社会环境的同情和反感、世界观、习性、思想，甚至语言。"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俄文版第4卷，第42页。

他沉湎于过去或者希冀于将来，他都超不出自己时代的界限。”①他认为，文学艺术必须贯彻真实地反映时代和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原则，并由此出发批判了形式主义和自然主义这一文艺创作中的两个极端。他在自己的一系列文学评论作品（《浪漫主义的渊源》、《维克多·雨果传奇》、《左拉的〈金钱〉》等）中，较好地贯彻了这一原则。②拉法格还首先尝试把语言的发展同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进行比较，以阐明阶级对语言、对各阶级的特殊语言的产生和消失的影响，尽管这一尝试中存在着某种简单化的倾向。

至于他们对于历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贡献，前面已有所提及而且广为人知，这里不再赘述。此外，考茨基的《土地问题》（1899年）被列宁称为“继《资本论》第3卷之后最新经济学著作中最优秀作品之一”，它把“最细小的现象同资本主义农业的整个结构以及同资本主义的整个进化联系起来”。③梅林是继恩格斯之后在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战争科学唯一作过认真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和梅林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指导民族学研究也有一定建树。前者提出了和鲍尔的心理民族学理论相对立的历史经济学的民族理论，后者采用了比较历史法研究德意志民族史④。所有这些，都程度不同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具体科学的

---

① 见《拉法格全集》第3卷，第286页。转引自《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册）第281页。

② 其中，恩格斯对《维克多·雨果传奇》评价最高。他在1886年5月9日给劳拉的信中写道：“保尔在《新时代》上发表的《维克多·雨果》非常好。如果人们能在法国看到这篇文章，不知会说些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59页。

③ 见《列宁全集》第4卷，第77—78页。

④ 恩格斯充分肯定了梅林的这一方法。他指出：“在研究德国历史（完全是一篇苦难史）时，我始终认为，只有拿法国的相应时代来作比较，才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标准，因为那里的一切正好和我们这里发生的相反。”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97页。

方法论作用，巩固了它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不容抹杀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各国的广泛传播和深入普及，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各个文化知识领域的开拓，以及对于时代的交替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作的有益的探索，都和这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联系在一起。他们是时代的儿子，固然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局限，惟其如此，尽管时代必然变换，而历史却不会割断。他们将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代学识渊博、富有个性的学生和继承者载入史册。正如梅林在悼念拉布里奥拉逝世(1904年)时所说："懂得把资产阶级文化中最精粹的东西拿来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服务的老一代不可挽回地逝去了，而年轻的一代将以别的旗帜进行战斗。我们给拉布里奥拉的告别词是向一代人中的一个老战士说的，我们永远不会再见到这样的一代人了。"①

思考与讨论

1.19世纪末的时代特点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形势。

2.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的根本缺陷及其表现。

3.对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宣传的意义。

4.19世纪末对工人运动有较大影响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潮及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

① 《格林贝格文库》第13卷。转引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13期第69页。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第一卷）
作者=
页数=495
SS号=10230087
出版日期=